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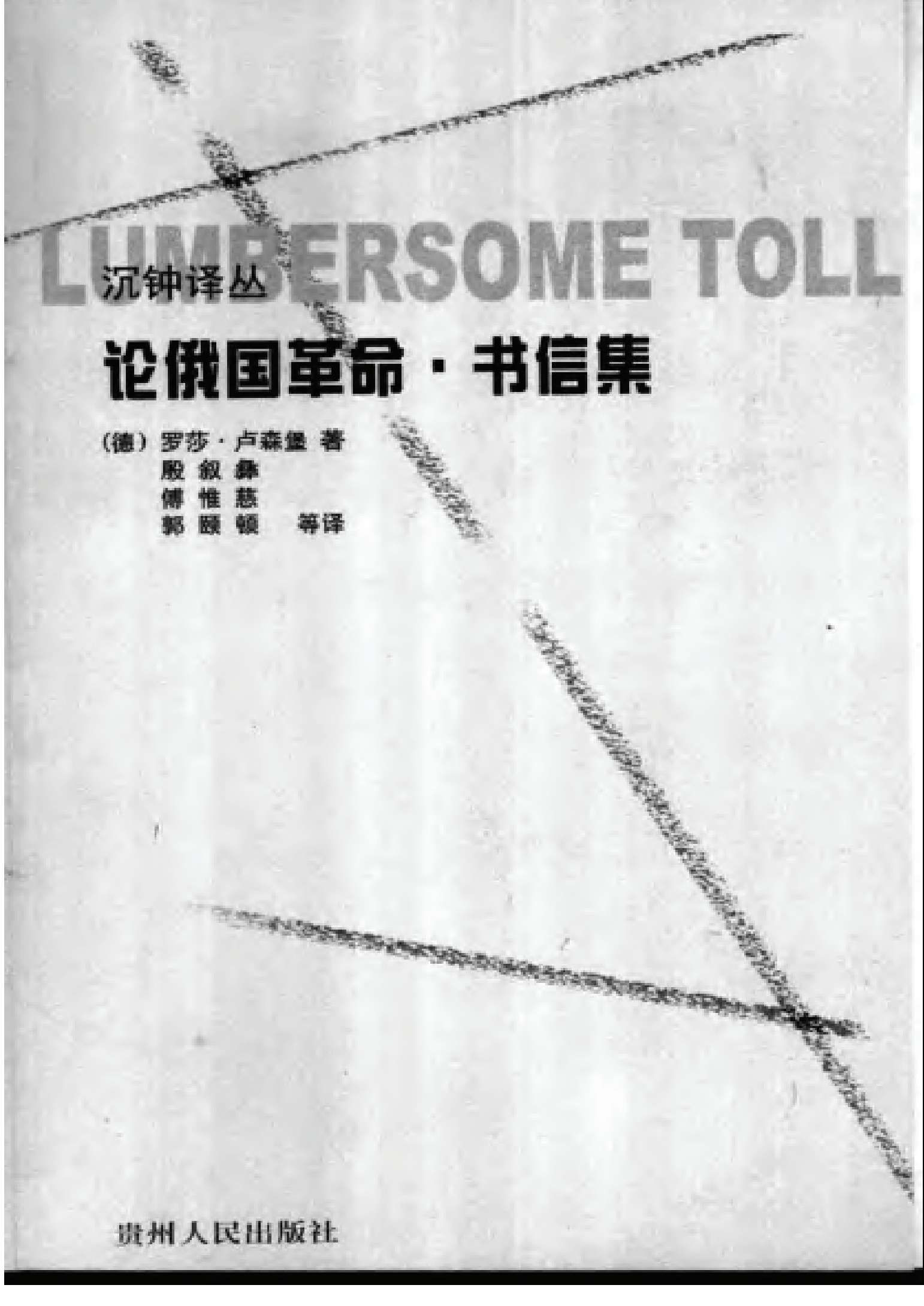
沉钟译丛



论俄国革命·书信集

(德) 罗莎·卢森堡 著
殷叙彝
傅惟慈
郭颐顿 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LUMBERSOME TOLL

沉钟译丛

论俄国革命·书信集

(德) 罗莎·卢森堡 著
殷叙彝
傅惟慈
郭颐顿 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论俄国革命·书信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俄国革命·书信集/(德)卢森堡著;殷叙彝、傅惟慈、郭
颐顿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0
(“沉钟”译丛)
ISBN 7-221-05582-3

I. 论… II. ①卢…②殷…③傅…④郭…
III. ①卢森堡-书信集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研究
IV. ①K835.167=5 ②K5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2156 号

著者	[德] 罗莎·卢森堡
译者	殷叙彝 傅惟慈 郭颐顿等
责任编辑	黄筑荣
装帧设计	曹琼德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2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格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数	245 千字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9.875
印数	6000

ISBN 7-221-05582-3/B·146

定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沉钟译丛》总序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与此同时，也是世界走向中国的过程。

所谓世界走向中国，不只在自鸣钟、金鸡拿、火炮历法电报之类的使用，也不只在铁路矿山工厂银行的开设，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解构、改造、建设与完善。在此期间，西学的引进，作用不可谓不巨。所谓西学，是指西方的观念、思想、理论，以及系统的科学知识。其时，传播的渠道颇不少，如教会、学校、报刊等等，但影响最大者当推译书。朝廷人物曾国藩奏稿有云：“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上下存此共识，“西风东渐”，自成气候。

从晚清到辛亥以至“五四”期间，翻译事业的发展是迅速的。从事翻译的，由西人到中国知识分子，由个别行为到专门的译书机构；而机构，亦由官方系统及于民间组织。至于译述内容，则由应用科学、自然科学，扩大至社会科学。“西山排闼送青来”。正是翻译，带来了新的局面、新的机运。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化教育，无不因西学的沾溉而有所创造。康有为的《大同书》，有学者认为，即接受了英人所著《佐治刍言》的影响；严复的《天演论》，被称为“中国西学第一”，更是风靡一时，面世后十年，累计达三十多种不同版本，何止乎熏陶一代人。翻译界前辈百年前起于“世变之亟”，多方开拓，筚路蓝缕，垂范至今，使我们不能不感到愧怍而且感奋；希望追随其精神，承续其事业，而有所增强。

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几经山重水复，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复重新起步。此时，有“第二次西学东渐”之说。翻译业蓬蓬勃

勃,再开一代风气,虽未见大家如严、林者,而西著出版实在不在少数。当此几个世纪缩在一时之际,译界不免趋时务实,所译多为“现代”及“后现代”著作,“前现代”则少人问津矣。殊不知,新旧前者是相对而言的。而且,思想观念其来有自,惟有穷根溯源,庶几较为全面深入把握其本质,而不失固有的完整性。何况,被称为经典者,自有其独立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故可跨越时代,历久而弥新。

《沉钟译丛》是我们策划编辑的一套开放性大型丛书,所载为上起古希腊罗马,下迄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经典性文化学术著作,其中偏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译丛》拟陆续分批出版,不求大而求精;文史哲经,可容杂处,假以时日,当自成统系也。

蒙获出版界、翻译界同仁襄助,幸莫大焉。

广州日报大洋图书编译室

2000年10月

出版前言

罗莎·卢森堡(1871~1919),是波兰、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

卢森堡诞生于沙俄统治下的波兰,从青年时代起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其后,被迫流亡瑞士,19世纪90年代开始在德国定居,并参与和领导了德国的工人运动。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党内的思想论战,先后创办和主编多种刊物,撰写了不少著名的论文,捍卫革命和民主的原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崛起的德国军国主义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几度身陷囹圄,在狱中仍然著述不辍。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卢森堡出狱后,立即投身其中,旋即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决裂,创建德国共产党。在斗争中,以意志坚决著称,敌人称之为“嗜血的罗莎”。1919年1月斗争失败,同李卜克内西一起惨遭杀害。

作为革命家的一生,卢森堡憎恨一切压迫和奴役行为,具有明确的民主思想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她所留下的大批著作,从论文到书信,对此都有着充分的体现。

本书编入论文《论俄国革命》,仅此一文,即可窥见作者的政治睿见,她的革命原则所在。这篇至今仍有争议的著作,不仅是卢森堡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富于理论价值的著作之一。该文抄件于1921年以《俄国革命——批判的评价》为题首次发表。发表后,立即在国际共运

中引起激烈的争论。1928年，在柏林发现手稿原件。此后，在德、法、美等国曾多次出版过单行本，影响很大。但是，由于此文涉及到苏联模式这个敏感的问题，所以几十年来，人们避免涉及它。这种状况，一直延至70年代中期才开始改变过来。导言及附录部分，除了帮助阅读正文外，也是具有一定思想价值的文字。

此外，本书还收入卢森堡近百封书信。这些书信，不但同论文一样闪耀着思想的光辉，而且，通过更多的关于私人生活及内心世界的亲切的诗性叙述，读者可以更全面地看到作为革命家的卢森堡的高尚、纯洁、完满的形象。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殷叙彝、傅惟慈、郭颐顿诸先生的热情支持，谨此表示由衷的谢忱。

《沉钟译丛》编委会

2000年11月

目
录

论俄国革命·书信集

总 序	
出版前言	
一、论俄国革命	
论俄国革命	1
一	1
二	5
三	11
四	21
附录：关于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的版本/商 鼎	36
二、书信集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22封)	45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26封)	98
致利奥·约基希斯(29封)	148
致考茨基夫妇(19封)	209
致汉斯·狄芬巴赫(14封)	244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6封)	299

论俄国革命^{〔1〕}

(1918年)

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发，它的史无前例的激进主义，它的持久的影响，最好地驳斥了官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起初十分卖力地从思想上为德帝国主义征服战争进行粉饰的谎言；德国刺刀担负着推翻俄国沙皇制度和解放受它压迫的各族人民的使命。俄国的革命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动摇了一切阶级关系，展示了全部社会和经济问题，它按照内在逻辑的必然性顺理成章地从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共和国阶段向前推进到更加深入的各个阶段——推翻沙皇制度在其中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简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一切清清楚楚地说明，俄国的解放不是战争和沙皇制度军事失败的成果，并不像考茨基编辑的《新时代》在社论中所许诺的那样是“德国人手中的德国刺刀”的功劳，而是在自己的国土里有着深厚的根源，并且内部已经完全成熟了。德帝国主义

〔1〕这是一篇未完成的手稿，1922年保尔·列维第一次以小册子形式发表本文时用的书名是《俄国革命——批判的评价》。此后出版的历次德文版单行本和英文、法文译本都以《俄国革命》为书名。我们在这里采用的是民主德国1974年出版的《卢森堡全集》第4卷中的文本，篇名是全集编者加的，编者说明这是根据原稿的照相复制件排印的。——编者注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盾牌掩盖下进行的战争冒险并没有引起俄国的革命,却仅仅是起初——在1911~1913年间它的第一次狂风巨浪的高潮之后——使它中断了一个时期,然后,在革命爆发之后,为它制造了最困难、最不正常的条件。

但是对于每一个动脑筋的观察者来说,这一过程也是反对考茨基同政府派社会民主党共同主张的教条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据,按照这种理论,俄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农业为主的国家,对于实行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不成熟的。这一理论认为俄国只适合进行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从这一观点也产生了俄国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联合的策略,而俄国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一翼,即在阿克雪里罗得和唐恩的老练领导下的所谓孟什维克的理论也是这样的。双方即俄国和德国的机会主义者在俄国革命的这一基本观点(对策略的具体问题的态度是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上同德国的政府派社会党人是完全一致的;三者都认为俄国革命应当停留在推翻沙皇制度的阶段,而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神话,实现这一阶段就是德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崇高使命。如果俄国革命越出了这一阶段,如果它把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了自己的任务,那么按照这一学说,这完全是俄国工人运动激进一翼即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而革命在进一步向前发展中发生的一切坏事,使革命遭受损失的一切混乱,无非是这一致命的错误的结果。施塔姆普费尔编辑的《前进报》和考茨基同样都把这一学说当作“马克思主义思考”的成果来推荐,它在理论上归结为这一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的”发现,即社会主义革命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本身的民族事务,也可以说内部事务。像考茨基这样的人当然懂得在虚无缥缈的抽象图式中十分详细地描绘资本的世界经济联系,这种联系把一切现代国家组成了一个互相关联的机体。

俄国革命是国际发展和土地问题的结果,它是不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解决的。

在实践方面这一学说具有使国际无产阶级,首先使德国无产阶级摆脱对俄国革命的命运的责任、否认这一革命的国际关联的倾向。战争和俄国革命的过程不是证明俄国不成熟,而是证明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对俄国革命进行批判性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明白无遗地揭示这一点。俄国革命的命运是完全取决于国际(事件)的。布尔什维克在确定自己的政策时完全着眼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正是他们的政治远见、他们的原则的坚定性、他们的政策的魄力的光辉证明。从这里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在最近十年的巨大跃进。1905~1907年的革命在欧洲仅仅引起微弱的反响。因此它始终只能停留在开始阶段。它的继续和解决是受欧洲的发展约束的。

显然,不加批判的辩解不能发掘出经验和教训的宝藏,只有详细的、深思熟虑的批判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试验,而且这一试验是在可以想象出来的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一场帝国主义国际屠杀的世界战火和混乱之中,在欧洲最反动的军事强国的铁圈之中,在国际无产阶级彻底不起作用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认为在如此不正常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工人专政的试验中,俄国所做的一切正好就是完善的顶峰,这确实是一种荒谬的设想。与此相反,根据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概念以及对它的必要的历史前提的了解,人们不得不这样假定:在如此不幸的条件下,甚至依靠最伟大的理想主义和最经得起风浪的革命毅力也不能实现民主制和社会主义,而只能实现二者的软弱无力的、歪曲的开始阶段。

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基本义务正是要清楚地认识这一情况的全部深刻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因为只有根据这样一种痛苦的认

识才能衡量国际无产阶级为俄国革命命运承担的特殊责任的全部分量。另一方面,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团结一致的国际行动发挥其起决定作用的重要意义,而这种国际行动是一个基本条件,如果缺乏它,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哪怕具有最伟大的才能和作出最崇高的牺牲,也不可避免要陷入一片混乱的矛盾和失误。

同样不容怀疑的是,领导俄国革命的聪明人物,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他们的荆棘丛生、陷阱遍地的道路上,仅仅是在内心十分疑惑并且思想上非常勉强的情况下采取许多决定性步骤的,他们自己决不可能认为,他们在事件纷至沓来的情况下出于万不得已的全部所作所为会被国际当作社会主义政治的崇高范例;对这种范例只应当毫无批判地赞扬和热情地模仿。

认为对俄国革命迄今走过的道路进行批判性检验就会严重地损害俄国无产阶级的威望和富有吸引力的榜样,而只有这一榜样才能克服德国群众致命的无所作为,这种担心同样是错误的。再也没有比这更加错误的了。德国工人阶级革命行动能力的觉醒再也不能用已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那种监护的办法,依靠对群众示意,依靠对某一毫无瑕疵的权威(无论是本国的“上级”还是“俄国的榜样”)的盲目信仰用魔法召唤出来。德国无产阶级的历史行动能力是不能凭制造欢呼革命的气氛而产生的,而是相反,只有通过了解任务的全部惊人的严肃性和全部复杂性,依靠政治成熟和思想独立性,依靠群众几十年来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以种种借口有计划地加以扼杀的批判的判断力才能产生出来。把俄国革命放在它的全部历史关系中进行批判的探讨,就是最好地训练德国和国际的工人去完成目前形势向他们提出的任务。

二

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从它在三月爆发到十月革命)就其一般进程来说是完全符合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发展图式的。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孕育的革命力量同旧社会的桎梏进行的任何一次最初的伟大总决战的典型发展过程。

革命自然而然地按上升线展开:从温和的开端发展到提出愈来愈激进的目标,与此相应,从各阶级和各党派的联合发展成最激进的党派的独占统治。

在1917年3月的最初时刻,领导革命的是“立宪党人”即自由资产阶级。革命洪流的第一次全面高潮把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卷进去了:第四届杜马是政变所产生的最反动的四级选举权的最反动产物,却突然转变成了一个革命的机关。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包括右派民族主义者在内,突然组成了一个反对专制主义的严密阵营。专制主义在受到第一次冲击后几乎是不战而溃,就像一个已经死亡的机体一样,一碰就倒了。甚至自由资产阶级想至少挽救王朝和王位的短暂尝试也在几个小时内失败了。发展的进程迅猛异常,在几天和几小时之内就飞越了法国当时需要几十年才走完的距离。这证明,俄国已把欧洲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的成就化为现实,尤其是证明,1917年的革命是1905~1907年的革命的直接继续,而不是德国“解放者”的礼物。1917年3月的运动在十年前的运动中中断工作的地方同它直接连上了。民主共和国同革命的第一次袭击一样,都是准备好了的、内部成熟的产物。

但是现在比较困难的第二项任务开始了。革命的动力从最初时刻起就是城市无产阶级群众。但他们的要求并不满足于

政治民主制,而是指向迫切的国际政治问题:立即实现和平。与此同时,革命还依靠同样提出立即实现和平这一要求的士兵群众和把1905年以来就已成为革命关键的土地问题提到首位的农民群众。立即实现和平和得到土地——在这两个目标上,革命阵营的内部分裂是确定无疑的了。立即实现和平的要求同以米留可夫为代言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倾向发生了非常尖锐的矛盾;土地问题起初是让资产阶级的另一翼即土地贵族害怕的妖怪,但立刻就由于侵犯了整个神圣的私有制而成为使各资产阶级恼恨的问题了。

这样就在革命最初胜利的次日,在革命队伍内部,围绕和平和土地这两个尖锐问题展开了一场内部斗争。自由资产阶级开始采用拖延和逃避的策略。工人群众、军队、农民的进攻越来越猛烈了。毫无疑问,共和国的政治民主制的命运本身也是同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各资产阶级在革命的第一次风浪的冲击下也随着潮流前进直到接受了共和国政体,但很快就开始为向后退寻找支持并且悄悄组织反革命。卡列金的哥萨克部队向彼得堡的远征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倾向。如果这次突击取得成功的话,那么不仅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而且民主制和共和国本身的命运也就决定了。建立军事专政以及对无产阶级实行恐怖统治,然后回到君主制,将会是不可避免的后果。

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俄国的考茨基派社会主义者即孟什维克所遵循的策略的空想性和反动本质了。

看到这个勤奋的人^{〔1〕}在世界大战的四年间通过孜孜不倦的写作活动,泰然自若和有条不紊地在社会主义上捅出一个接一个的理论破洞,简直是令人吃惊的,这一工作的结果使社会主

〔1〕指考茨基。——德文版编者注

义成了一个百孔千疮的筛子。考茨基的追随者不加批判地、平心静气地看着他们的这位官方理论家勤勤恳恳地进行这项工作,把他的日新月异的发现吞咽下去,连眉毛都不皱一下,能与之相比的只有谢德曼之流的追随者,他们同样平心静气地看着谢德曼之流在实践方面破坏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完满地互相补充的,而考茨基这位马克思主义神殿的官方守护人从战争爆发以来实际上仅仅是在理论方面完成了谢德曼们在实践方面所做的事情:第一、国际,和平的工具;第二、裁军和国际联盟,民族主义;最后第三、民主制,而不是社会主义。

他们死抱住捏造出来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说法不放,认为目前俄国还没有成熟到能进行社会革命,因而拼命坚持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联合,也就是说坚持把由于革命发展自然的内在过程而陷于分裂和彼此发生极其尖锐矛盾的那些成分勉强结合在一起。阿克雪里罗得们、唐恩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同那些对革命及其第一个成就即民主制威胁最大的阶级和党派合作。

布尔什维克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作出了历史功绩,他们从一开始就宣布要实行那种惟一能挽救民主制和将革命向前推进的策略,并且坚定顽强地把这一策略贯彻到底。全部权力由工人和农民群众单独掌握,由苏维埃单独掌握——这实际上是使革命摆脱困境的惟一出路,这是用挥剑斩断戈迪安之结的办法使革命走出窄胡同,为它提供不受阻碍地进一步展开的广阔战场。

因此,列宁的党是俄国惟一在那最初时期就理解革命的真正利益的党,它是革命向前推进的因素,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它是惟一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党。

由此也可以说明这一情况: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开始时是在四面八方受到排斥、毁谤和迫害的少数派,却在很短时期以后就能处于革命的领导地位并且把全部真正的人民群众即城市无产

阶级、军队、农民以及民主派中的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的左翼集合到自己的旗帜下来。

俄国革命的实际形势在几个月之后就归结为二者择一的问题：是反革命取得胜利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卡列金还是列宁。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在最初的狂热消逝之后立刻就会出现这样的客观形势，在俄国这是由关于和平和土地的具体迫切问题造成的，这些问题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

在这一方面，俄国革命只不过证实了任何一次伟大革命的基本教训，革命的生存规律是：它必须非常迅速和坚决地向前猛进，用铁腕克服一切障碍，日益扩大自己的目标，否则它就会很快地倒退到它的软弱无力的出发点后面，并且被反革命扼杀，在革命中是没有静止状态的，不能原地踏步，不能满足于最初一度达到的目标而进行自我克制。谁想从议会的蛙鼠之战中把这种平庸的真理搬到革命策略上来，那只会证明，他对于革命的心理、革命的生存规律本身，正像对于全部历史经验一样，都是一窍不通的。

英国革命从1642年爆发以来的过程。按照客观事物的逻辑，起初长老会派软弱动摇，长老会派的首领在反对保皇派军队的犹豫不决的战争中故意逃避决战和对查理一世的胜利，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独立派必须把他们从议会赶出去并且自己夺取政权。同样，在这以后，在独立派军队内部，士兵中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即里尔本的“平等派”形成了整个独立派运动的推动力。最后，士兵群众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即表现为掘地派运动的走得最远的社会革命分子，他们又是民主的“平等派”的党内的酵母。

如果没有革命无产阶级分子对士兵群众施加思想影响，没有民主派士兵群众对独立派的资产阶级上层施加压力，那么长

期议会既不会“清洗”长老会派,也不会胜利结束同保皇党和苏格兰人的战争,既不会审判和处决查理一世,也不会废除贵族院和宣布共和国。

法国大革命中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在这里,经过四年斗争之后,雅各宾派的夺取政权表现为惟一能挽救革命成就、实现共和制、摧毁封建主义、对内和对外组织革命防御、镇压反革命阴谋、把革命浪潮从法国扩展到整个欧洲的手段。

考茨基和他在俄国的思想伙伴(他们坚持俄国革命应当保持它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性质”)同上一世纪德国和英国的自由派一个模样,那些自由派把法国大革命区分为著名的两个时期:第一阶段即吉伦特派阶段的“好”革命和雅各宾政变以后的“坏”革命。自由派从自己的浅薄的历史观出发当然不需要去理解,如果“无法无天”的雅各宾派没有举行政变,那么连吉伦特派阶段最初取得的谨慎和不彻底的成就也会立刻被埋葬在革命的废墟之下;正像1793年的历史发展的铁的进程所表明的那样,雅各宾专政的真正代替品不是“温和的”民主制,而是波旁家族的复辟!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都无法保持“中庸之道”,革命的自然规律要求迅速作出决断:要就是火车头沿着历史的上行线全速前进,直到顶点,要就是它由于本身的重力重新退回到出发时的洼地上去,并且把那些在半路上想凭自己微弱的力量使它停下的人无可挽救地一同带下深渊。

由此可以说明,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只有那个有勇气提出向前推进的口号并把它贯彻到底的党才能掌握领导并且夺得政权。由此可以说明俄国孟什维克即唐恩、策烈铁里等等所扮演的可悲的角色,他们起初对群众拥有巨大的影响,但在较长的东摇西摆之后,在竭尽全力反接受政权和承担责任之后,他们可耻地被人们从舞台上扫除出去了。

列宁的党是惟一理解一个真正革命党的使命和职责的党，它通过提出全部权力归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口号保证了革命向前的进程。

布尔什维克就这样解决了关于“人民的多数”那个著名问题，这个问题从来就像梦魇一样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胸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痴呆症已经深入骨髓，它简单地把议会育儿室的平庸真理搬到革命中来，认为人们必须先取得多数，才能有所作为。也就是说，在革命中也是：我们先要争取“多数”。但是革命的真正的辩证法却把这——鼠目寸光的议会真理颠倒过来了：不是通过多数实行革命策略，而是通过革命策略达到多数。只有一个懂得领导也就是懂得向前推进的党才能在风暴中争取到追随者。列宁和同志们在决定性时刻提出了惟一能向前推进的口号即全部权力归无产阶级和农民！他们的坚决态度使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受迫害、受毁谤的“非法的”少数（其领袖不得不像马拉那样藏在地窖里）成为形势的绝对主宰。

布尔什维克也立刻提出了完整的最彻底的革命纲领作为夺取政权的目标：不是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由此树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宣布为实际政治的当前纲领。

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完全做到了。西方社会民主党缺乏的全部革命荣誉和革命行动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

三

布尔什维克是英国平等派和法国雅各宾派的历史继承者。但是他们在俄国革命中取得政权后遇到的具体任务比他们的历史先驱者的任务要困难得多。^{〔1〕}当然,为了达到摧毁大地产和使农民立刻依附革命政府这两个目的,由农民立即直接夺取和分配土地的口号是最简短、最简单、最简练的公式。作为巩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府的政治措施,这是一个良好的策略。可惜它有两面,它的反面在于,由农民直接夺取土地几乎是同社会主义经营毫无共同之处的。

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土地关系来说要有两方面的前提。首先,大地产集中了技术上最先进的农业生产资料和方法,因此恰恰只有对大地产实行国有化才能成为农村社会主义经营方式的出发点。当然不需要剥夺小农的小块土地,可以让他从容不迫地决定,依靠社会经营的优越性争取他起初自愿地赞成组织合作社的方法,最后自愿地纳入社会的总经营,因此不言而喻,农村的任何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必须从大地产和中等地产开始。这一方面的经济改革首先必须把财产权交给民族,或者交给国家(这二者在社会主义政府说来是一回事),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按照互相关联的广阔的社会主义角度来组织农业生产。

〔1〕 卢森堡写在稿纸上方空白处的注,未说明插入何处:“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早在1905年 然后第三届杜马中的右派农民! 农民问题和国防-军队。”——德文版编者注

但是其次这一改造还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要消灭农业和工业分离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为两者的互相渗透和融合，为按照统一的观点全面安排农业和工业生产创造条件。不管具体说来如何实际经营，就像有些人提议的那样由城市公社还是由国家中心经营，无论如何，前提是要有一次统一实行的、由中央开展的改革，而这一改革的前提就是土地国有化。大地产和中等地产的国有化，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这是任何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两个基本观点，没有它们就没有社会主义。

俄国的苏维埃政府没有实行这一重大的改革——谁能为此责备它呢！要求或者期望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他们统治的短暂时期，在国内和国外斗争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混乱状态中，在四面八方受到无数敌人和种种阻力的困扰的情况下，竟能解决社会主义变革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我们甚至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是最困难的任务），或者哪怕仅仅着手去解决这一任务，这可以说是开一个蹩脚的玩笑！如果我们一旦掌握了政权，那么我们即使在西方，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要在这个硬核桃上折断几颗牙齿，才能仅仅从这一巨大任务的上千个复杂的困难问题的最严重的几个中摆脱出来！

但是一个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府无论如何必须做一件事：采取措施来促使后来对土地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那些基本前提得到实现，它至少必须避免做妨碍它采取这些措施的一切事情。

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由农民立刻占有和分配土地的口号恰好肯定会朝相反方向起作用。它不仅不是社会主义措施，而且切断了通向这种措施的道路，它为按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土地关系制造了一大堆不可克服的困难。

由农民占有土地是按照列宁和他的朋友们提出的简单扼要

的口号办事的：去把土地拿过来！这种做法的结果简直是突然无秩序地把大地产转变成农民的地产。由此产生的不是社会财产，而是新的私有财产，而且是把大财产分散成中等财产和小财产，把比较进步的大经营分散成在技术上用法老时代的手段劳动的原始的小经营。还不止于此：通过这一措施以及实行这一措施的无秩序的、纯粹任意的方式，农村的财产差别并没有消灭，而只是加剧了。尽管布尔什维克要求农民组成农民委员会，以使用某种方式使占有贵族地产成为一次集体行动，但是显然这种一般的建议丝毫不能改变真正的实践和农村的真正力量对比。不管有没有委员会，在任何一个俄国农村都实际上掌握着当地权力的农村资产阶级即富农和高利贷者肯定成了土地革命的主要受益者。

任何一个人无须思索就可以明白，分配土地的结果是，农民内部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并没有消除，而只有加深，那里的阶级矛盾激化了。但是这一权力转移肯定是对无产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没有好处的。

列宁的演说讲到必须实行工业的集中化，银行、贸易和工业的国有化。为什么不提土地国有化呢？在这一方面却相反，是实行分散化和私有制。

列宁自己在革命前提出的土地纲领却不是这样的。上述口号是从备受咒骂的社会革命党人那里接过来的，或者正确些说，是从农民的自发运动接过来的。

为了在土地关系中采用社会主义原则，苏维埃政府现在企图从无产者——大部分是城市的没有工作的人——建立农业公社。但是很容易预测，如果用土地关系的全部规模来衡量，这一努力的成果一定始终会是微不足道的，在判断这一问题时根本

无须加以考虑^{〔1〕}。(在把大地产这一社会主义经营最合适的出发点分散成小经营之后,现在却试图从微弱的开端来建立共产主义模范经营了。)在现有情况下这些公社只能要求承认它们有试验的价值,而说不上是一次全面的社会改革。

从前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最多遭到贵族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大地主这一个小小阶层以及很少数富裕的农村资产阶级的反抗,革命群众剥夺他们就像儿戏一样。现在,在“占有”以后,要对农业实行任何社会主义的社会化,遇到的敌人就是人数大大增加、力量大大加强的有产农民群众了,他们将拼命保卫自己新获得的财产,反对一切社会主义的侵犯。现在,关于今后的农业社会化的问题,也就是俄国整个生产的社会化的问题,已成为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问题。农民对城市实行抵制,不供给城市粮食,以便完全像普鲁士容克地主那样拿粮食来做投机买卖,这说明矛盾现在已经多么尖锐。法国的小农成了法国大革命最勇敢的保卫者,因为革命把没收来的流亡者的土地给了他们。他们作为拿破仑的士兵举着法国国旗走向胜利,走遍了整个欧洲,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摧毁了封建主义。列宁和他的朋友们可能曾经指望他们的土地口号起与此相似的作用。但是俄国农民自行掌握了土地之后,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要保卫俄国和把土地交给他们的革命。他们一心想着他们的新财产,听任革命受敌人攻击,国家瓦解,城市居民挨饿。

列宁的土地改革给农村的社会主义制造了一个新的强大的敌对的人民阶层,他们的抵抗比贵族大地主的抵抗危险得多,顽强得多。

〔1〕 卢森堡写在稿纸左边的注,未说明插入何处:“谷物垄断加奖金。现在,在事后,他们打算把阶级斗争引进农村了。”——德文版编者注

军事上的失败转变成俄国的崩溃和瓦解,布尔什维克对此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且布尔什维克自己使这一客观的困难形势大大尖锐化了,他们把这样一个口号^[1]提到他们政策的首要地位;所谓的民族自决权,或者在这句话后面实际隐藏着的:俄国的国家分裂。这一用教条主义的顽强精神一再宣布的关于俄罗斯帝国各民族有权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直到同俄国实行国家分离”的公式,是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反对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的战争^[2]时的一个特殊的战斗口号,它是他们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国内政策的轴心,它是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整个纲领,是布尔什维克用来反对德帝国主义的强力地位的惟一武器。

列宁和他的同志们顽固地和百折不挠地坚持这一口号,这种态度的令人吃惊之处首先在于,这一口号既同他们在其他政策上明确主张的集中主义截然矛盾,也同他们对待其他民主主义原则的态度截然相矛盾。他们对于立宪会议、普选权、言论和集会自由,总之对于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基本自由的全部设施(这些基本自由加在一起构成了俄国本身的“自决权”)明显地采取十分冷漠的蔑视态度,却把民族自决权当成民主主义政策的珍宝,为了它,一切现实批判的实事求是的观点都必须停止发表。俄国选举立宪会议的人民投票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权并且在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完全自由的条件下举行的一次人民投票,他们对它却毫无敬佩之念,并且根据十分冷静的批判性的考虑,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但是他们在布列斯特却为俄国的异民族就自己的国籍举行“人民投票”而斗争,把这当作任

[1] 在原稿中“口号”为“政策”。——德文版编者注

[2] 指俄国临时政府决定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编者注

何一种自由和民主的真正保证,人民意志的货真价实的精髓,决定各民族政治命运问题的最高准则。

这里暴露出来的矛盾由于以下的原因就更加不可理解了:正如我们在下面还要进一步看到的,在任何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实际上关系到社会主义政策的最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基础,而著名的“民族自决权”却无非是空洞的小资产阶级废话和胡说。

实际上,这一权利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社会主义政策反对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正如它反对任何一种压迫一样,这是对社会主义政策的起码知识。

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一向是冷静的和抱批判态度的政治家,他们对于任何一种空想主义的废话如裁军、国际联盟等等都只是耸一下肩膀表示讽刺。尽管如此,他们这次却恰恰把一个完全属于这一类型的空洞词句当作自己的得意杰作,我们认为,这是由一种随机应变的政策产生的。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显然是考虑到,除了以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名义给予俄罗斯帝国内部的许多非俄罗斯民族以极端不受限制的支配自己命运的自由,就没有任何更加可靠的手段可以使它们支持革命的事业,支持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事业。这同布尔什维克对待俄国农民的政策相类似,直接占有贵族土地的口号应当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从而使他们拥护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旗帜。可惜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打算都完全落空了。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显然指望,他们作为“直到实行国家分离”的民族自由的拥护者,将会使芬兰、乌克兰、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等等统统成为俄国革命的忠实同盟者,但我们看到的场景却相反:这些“民族”一个接一个地利用刚刚赠送给他们的自由,作为俄国革命的死敌同德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俄国革命,并且

在德帝国主义的保护下把反革命的旗帜打到俄国本土来了。在这方面,在布列斯特发生的与乌克兰冲突的插曲是一个范例。它使那次谈判发生了决定性转折,也使布尔什维克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整个局面发生了决定性转折。芬兰、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各民族的行动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决不是一个偶然的例外,而是一个典型的现象。

当然,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实际上不是“各民族”实行了这一反动政策,而仅仅是同本民族无产阶级群众处于极其尖锐矛盾之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把“民族自决权”歪曲成了他们的反革命阶级政策的一个工具。但是,——我们这就正好涉及到问题的症结了——这一民族主义词句的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性质恰恰就在于,它在阶级社会的残酷现实中,尤其是在矛盾极其尖锐化的时期,干脆变成了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一个手段。布尔什维克应当在他们自己和革命吃了大亏以后接受这一教训:恰恰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没有任何“民族”自决权,在阶级社会中民族的每一个阶级都力求按不同的方式“实行自决”,对于各资产阶级来说,民族自由的观点已完全退居阶级统治的观点之后,芬兰的资产阶级同乌克兰的小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民族自由要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宁可要德国的暴力统治,而不要民族自由。

希望通过一次“人民投票”(布列斯特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一问题的)使这一现实的阶级关系转化成它的反面并且依靠革命的人民群众取得赞成加入俄国革命的多数票,这是不可理解的乐观主义,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是认真地这样想的话。如果只是想把这当作同德国暴力政策进行决斗时的策略花招,那会是危险的玩火。即使没有德国的军事占领,如果在边疆各国举行这样的“人民投票”,那么由于农民群众和广大的还漠不关心的

无产者阶层的精神状态,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倾向以及资产阶级的上千种对投票施加影响的手段,完全有可能到处都得到一种会使布尔什维克很不愉快的结果。在这种就民族问题进行人民投票的事情上可以说有一个无法违反的规律:或者是这种投票不合统治阶级的胃口,他们就能加以阻止;或者是他们能够用一切大大小小的手段影响选举的结果,这样也就会使我们不能通过人民投票的方式实行社会主义。

居然把民族意向和分离倾向的问题拿到革命斗争中来,甚至通过布列斯特的和平把这一问题放到突出的地位,并且简直赋予它以社会主义政策和革命政策的识别标志的特征,这种做法已在社会主义队伍中引起极大的混乱,并且恰恰动摇了边疆各国无产阶级的地位。在芬兰,当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还是作为团结一致的俄国革命阵营的一部分进行斗争时,它已经获得了支配性的实力地位;它已在议会中,在军队中占多数,它已使资产阶级陷于完全无力的状态,并且控制了本国的局面。俄罗斯乌克兰在本世纪初年,当“乌克兰民族主义”关于卡尔鲍瓦涅茨^{〔1〕}和“乌尼维尔萨尔”^{〔2〕}的蠢事以及列宁关于“独立的乌克兰”的得意杰作还没有发明的時候,曾经是俄国革命运动的堡垒。早在1902年到1904年间,革命的第一批熔岩之流就是从那里,从罗斯托夫,从敖德萨,从顿涅茨地区倾泻出来,使整个俄国局部燃烧起来成为一片火海,从而为1905年革命的爆发作了准备;这种情况在目前的革命中再次出现,南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部队的精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从1905年以来是最强大、最可靠的革命策源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那里

〔1〕乌克兰人对卢布的称呼。——编者注

〔2〕1917年乌克兰反革命政权“中央会议”的宣言。——编者注

起了支配作用。

那么反革命怎么会突然在所有这些国家都取得了胜利呢？民族主义运动使无产阶级脱离了俄国，正因如此它使无产阶级陷于瘫痪并且听任边疆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摆布。布尔什维克不是恰恰按照他们一向捍卫的纯粹国际的阶级政策的精神力图把俄国所有地区的革命力量最紧密地团结起来，竭尽全力维护俄罗斯帝国作为革命地区的完整性，把俄国革命范围内一切民族的无产者的一体性和不可分离性当作至高无上的政策原则来反对一切民族主义的分离意图，而是恰恰相反，他们通过“民族自决权直至实行国家分离”这一大叫大嚷的民族主义废话，给一切边疆国家的资产阶级提供了求之不得的、最漂亮的借口，简直就是为他们的反革命意图提供了旗帜。布尔什维克不去警告边疆各国的无产者提防陷入任何一种分离主义的纯粹资产阶级的陷阱，不是在分离主义意向处于萌芽状态时就用铁腕扼杀它（在这一事例上使用铁腕确实是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宗旨和精神的），反而用自己的口号使一切边疆国家的群众发生迷惑并且受资产阶级蛊惑宣传的支配。布尔什维克通过这一民族主义的要求导致了和准备了俄国本身的瓦解，从而把刀子送到自己的敌人手里，好让他们用它来扎进俄国革命的心脏。

当然，如果没有德帝国主义的帮助，没有像考茨基的《新时代》所说的那种“德国人手中掌握的德国枪托”，乌克兰的卢宾斯基们和其他恶棍，芬兰的埃里希们和曼纳海姆们，以及波罗的海的男爵们永远对付不了他们本国的社会主义无产者群众。但是民族分离主义是把手上拿着刺刀的德国“同志们”带进所有那些国家的特洛伊木马。现实的阶级矛盾和军事力量对比招致了德国的干涉。但是布尔什维克提供了为这一反革命进军进行伪装的思想，他们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地位，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地

位。最好的证明就是在俄国革命的命运中起了如此致命作用的乌克兰,在俄国,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同捷克的、波兰的或芬兰的民族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无非是几十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纯粹的糊涂事和傻念头,在本国的经济、政治或精神条件中没有一点基础,没有任何历史的传统,因为乌克兰人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民族或者建立一个国家,除了舍夫琴柯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诗歌外没有任何民族文化。这简直就像是沿海地区的人在随便哪一天早上想按照弗里茨·罗伊特⁽¹⁾的说法建立一个新的低地德意志民族和一个独立国家一样!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却用他们关于“民族自决权直到”等等的教条主义宣传把不多几个大学教授和大学生的这一可笑的滑稽剧人为地夸大成一个政治因素。他们却赋予起初的滑稽剧以某种重要意义,一直到这一滑稽剧成为十分认真的事情;并不是成为一个认真的民族运动,因为这种运动过去和今后都是没有任何基础的,而是成为反革命的招牌和集合旗帜!德国的刺刀在布列斯特就是从这个臭蛋里孵化出来的。

词句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有时是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布尔什维克在这次世界大战中被选定来为反革命政策提供思想遁词,这是社会主义的不祥的命运。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爆发时迫不及待地从马克思主义堆放废物的屋子里找出一副思想盾牌,把德帝国主义的掠夺进军打扮起来,他们宣称这次进军是我们的老导师们在1848年就已经憧憬的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解放者远征。政府派社会党人的对立面布尔什维克却被注定用“民族自决”的词句给反革命的磨盘注水,从而不仅为扼杀俄国

〔1〕 弗里茨·罗伊特(1810~1874),德国幽默作家,用低地德意志方言写作。——编者注

革命本身,而且为计划中的用反革命方式结束整个世界大战提供了一种思想体系。我们有一切理由从这一方面十分彻底地考察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民族自决权”同威尔逊恩赐的国际联盟和裁军加在一起,成了一个战斗口号,即将发生的国际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世界的清算就将在这一口号下进行。显然,关于民族自决的词句和目前成为对国际社会主义最大威胁的整个民族运动正是由于俄国革命和布列斯特谈判而特别加强了。我们还必须详细地探讨这一纲领。这一套词句在俄国革命中的悲剧性遭遇(俄国革命会陷在它的毒刺之中,被扎伤流血)应当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鉴戒。

随着这一切而来的是德国的专政。从布列斯特的和平到“补充条约”!莫斯科的二百名牺牲者!从这一局面产生了恐怖和扼杀民主。

四

我们打算根据几个例子作进一步的考察。

1917年11月著名的解散立宪会议事件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起了突出的作用。这一措施对于他们后来的立场是起决定作用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策略的转折点。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直到十月胜利以前都激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正是克伦斯基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拖延政策成为布尔什维克谴责那一政府的一个理由,为他们进行激烈攻击提供了口实。这是事实。托洛茨基甚至在他那本有趣的著作《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中说,十月革命简直是“对立宪会议的挽救”,正像它挽救了整个革命一样。他继续说:“我们说,通向立宪会议的入口不是经过策烈铁甲的预备议会,而是经过苏维埃夺取政权,我们这样说

是完全正确的。”

在作了这些公开的声明以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散这个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本来是应当成为通向这一会议的入口的。有什么理由能使他们决定采取这样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呢？托洛茨基在上面提到的著作里详细谈到了这一点，我们打算在这里引用他的论据：^{〔1〕}

〔“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月是群众向左转，工人、士兵和居民自发地涌向布尔什维克的时期，而这一过程在社会革命党内部表现为左翼通过削弱右翼得到加强。但是在社会革命党的党员名单上，老的右翼党员的名字仍旧占 3/4。……

还有这一情况，即选举本身是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几个星期内举行的。关于已经发生的变化消息比较缓慢地像同心圆那样一层层传播开去，从首都传到外省，从城市传到乡村。许多地方的农民群众对彼得堡和莫斯科发生的情况很不了解。他们投票支持‘土地和自由，并且投票支持它在土地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些代表多半是站在‘民粹派’旗帜之下的。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是投票支持了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也夫，而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也夫却解散了这一土地委员会并逮捕了委员们。……这一情况使人对立宪会议已在多大程度上落后于政治斗争和党派组合的发展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

这一切是十分精彩和很有说服力的。只不过人们一定会奇怪，像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聪明的人竟没有从上述事实得出最简单的结论。既然立宪会议早在决定性转折点即十月革命之前

〔1〕 据《卢森堡全集》第4卷原编者注，原稿中缺这一论据，也没有说明是托洛茨基哪一篇著作。但从上下文看来，卢森堡仍是指《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因此1963年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的《俄国革命》单行本在这里补上了该书中的一段话，即下面方括号中的引文——编者注

很久就已选出,并且就其组成来说反映了已经过时的旧状态,而不是新的形势,那就自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正是应该宣布过了时的、也就是说生下来就是死胎的立宪会议无效,并且立即举行新的制宪议会的选举!他们不想也不应当把革命的命运托付给一个反映了昨天的克伦斯基的俄国、反映了动摇和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时期的会议。那么好吧,只剩下……一件事了,立即召开一个从已经更新、已经前进的俄国产生的会议来代替它。

托洛茨基不是这样做,而是根据十月间召集的立宪会议这一特殊的有缺陷的情况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认为任何由普遍的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在一切革命期间都是无效的。

“由于为争取政府权力进行了公开和直接的斗争,工人群众在极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验,迅速地从本身发展的一个阶段提高到另一个阶段。国家愈大,它的技术设备愈不完善,民主机构的笨重的机制就愈不适应这一发展。”(托洛茨基上引书,第93页)

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一般的民主机构的机制”这种说法了。针对这种说法首先需要强调,这种对代议机构的评价表现出一种多少有些公式化的、僵硬的观点,一切革命时代的历史经验恰恰是与这种观点明显矛盾的。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论,任何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会议永远只反映它的选民正好在他们走向票箱的那一时刻的精神状态、政治成熟程度和情绪。因此民主机构总是选举日的群众的映像,正如赫歇尔^[1]星空图所展示的天体始终不是我们朝它注视时的那个样子,而是它们从无限的远方向地球发出光信息的那一时刻的那个样子。已经当选的人同选民之间的任何活生生的精神关系,二者之间的持续的交互影

[1] 弗里德里希·威廉·赫歇尔(1738~1822),德国天文学家。——编者注

响在这里都被否认掉了。

这同全部历史经验有多大的矛盾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却与此相反。人民情绪的活的流体始终包围着代议机构，渗透它们，指引它们。否则我们怎么有可能在每一个资产阶级议会里都有时看到“人民代表”非常有趣的疯癫行径呢？他们突然受到一种“新的精神”的鼓舞，唱出了完全出人意料的调子。为什么每当工厂、车间和大街上发出喧嚷声时，连最干枯的木乃伊有时也像青年人一样行动起来，而形形色色的小谢德曼一下子就在自己的胸脯里找到革命的声音呢？

群众的情绪和政治成熟性对当选的机构施加的这种始终生机勃勃的影响难道恰恰会在一次革命中，由于党派标志和竞选名单仍是僵死的老一套就失去效力吗？恰恰相反！恰恰是革命通过它的火热激情创造了稀薄的、振动着的、敏感的政治空气。在这种空气中，人民情绪的波浪、人民生活的脉搏立刻就以其奇妙的方式对代议机构发生作用。一切革命的最初阶段的那些著名的、动人心魄的场面恰恰总是以此为基础的，那时，老的反动的或极端温和的、在旧制度下根据有限的选举权选出的议会突然成了革命的英勇代言人，成了冲锋陷阵的人。著名的英国“长期议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在1642年被选出和召集，坚守岗位达七年之久，在它的内部，人民情绪、政治成熟性、阶级分裂的一切变动以及直到顶峰的革命进程中的一切变动，从最初在一个跪着的“代言人”率领下恭恭敬敬地同国王进行小规模冲突直到取消贵族院、处死查理和宣布共和国为止，都得到了反映。

难道在法国的三级会议里，在路易·非力浦的按纳税额选举的国会里，在第四届俄国杜马里，没有重复这种同样令人惊奇的变化吗？最后这个最惊人的例子是托洛茨基十分清楚的，第四

届杜马是在 1912 年^[1]的恢复年代、在最严酷的反革命统治下选出的，1917 年 2 月它突然像晚年的恋爱一样感到了革命的气息并且成了革命的出发点。

这一切都表明“民主机构的笨重的机制……”有一个有力的纠正者——这正是生机勃勃的群众运动，是它的不断施加的压力。机构愈民主，群众政治生活的脉搏愈活跃愈有力，影响就愈是直接和密切——尽管有死板的党的标志，过时的候选名单等等，当然，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这恐怕是人类设立的一切机构都有的。只不过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惟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

让我们再举一个惊人的例子，即苏维埃政府规定的选举权。这一选举权具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意义，不十分清楚。从托洛茨基和列宁对民主机构的批判可以看出，他们原则上否定根据普遍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只想依靠苏维埃。那么究竟为什么又要规定普选权，这的确不清楚。我们也不知道这一选举权曾经以某种方式实行过；人们对于根据它而选出某种人民代表机构的事毫无所闻。有人推测它始终只是一种理论产物，可以说是纸上谈兵，这倒是更有可能的；但是就它现在的情况来看，它是布尔什维克的专政理论的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产物。对于任何一种选举权，正像一般说来对于任何一种政治权利一样，不应当按照某种抽象的“正义性”公式或者类似的资产阶级民主废话的公式来衡量。而是应当按照它所适应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来

[1] 原稿中为 1909 年。——德文版编者注

衡量。苏维埃政府规定的选举权正是针对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按照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这一专政所作的解释的精神,只给予那些靠自己劳动为生的人以选举权,而拒绝给予一切其他的人。

显然,这样的选举权只有在—一个经济上也有能力使—切愿意劳动的人可以依靠自己劳动获得充裕的、文明的生活的社会里才有意义。目前的俄国说得上这样吗?苏维埃俄国必须在与世界市场隔绝、最重要的原料来源被切断的情况下同巨大的困难作斗争;它的经济生活普遍遭到惊人的破坏,生产关系由于在农业、工业以及商业中改变财产关系而发生急剧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有无数的人非常突然地被赶出家园,脱离了自己的生活常轨,客观上没有任何可能在经济机构中以任何方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这不仅涉及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而且也涉及小的中间等级这一—广大阶层和工人阶级本身。工业的紧缩引起城市无产阶级大批流向农村,到农业中寻找栖身之处,这确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把普遍的劳动义务当作经济前提的政治选举权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措施。就其倾向来说,它本应当只使剥削者丧失政治权利。当能生产的劳动力大批离乡背井之时,苏维埃政府反而屡次认为必须用所谓租让的办法把国有工业交给从前的资本家所有主。同样,1918年4月苏维埃政府也认为必须同资产阶级消费合作社实行妥协。后来又表明,利用资产阶级专门人才是无法避免的。同一现象的另一个后果是,无产阶级中愈来愈多的阶层作为赤卫队等等由国家用公费养活。这实际上使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广大的并且愈来愈多的阶层丧失权利,对于这些人,经济机构是没有任何办法要求他们履行劳动义务的。

把选举权描述为一种空想的、脱离社会现实的幻想产物，这是荒谬的。正因如此，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认真的工具。^{〔1〕}

整个中间等级、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以后抵制苏维埃政府达几个月之久，使铁路交通、邮政电讯、学校和行政机构陷于瘫痪，用这种方式来反对工人政府，这时不言而喻不得不采取一切镇压措施如剥夺政治权利、不发经济生活资料等等来反对他们，用铁拳来粉碎他们的抵抗。正是在这时社会主义的专政得到了表现，它为了维护整体利益，不怕使用任何威力来强制实行或阻止某些措施。与此相反，如果用一种选举权宣布普遍剥夺广大的社会阶层的权利，在政治上把他们置于社会之外，而在经济上却没有能力在这一社会本身的范围内为他们提供位置，而这种剥夺权利的做法并不是为了一个具体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措施，而是作为普遍的规定持久发生影响的，那么这就不是专政所必需的，而是一种缺乏生命力的临时凑合的做法。^{〔2〕}

但是问题并不仅限于立宪会议和选举权，我们还要考察取消健康的公共生活和工人群众政治积极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民主保证这一问题：取消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反对者都被剥夺了这些自由和权利。要为这一侵犯自由

〔1〕 卢森堡写在稿纸右边的注，未说明插入何处：“一种时代错误，提早实行一种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完成时才合适，而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过渡时期却不合适的法律状态。”——德文版编者注

〔2〕 卢森堡写在稿纸右边的注，未说明插入何处：“作为支柱的苏维埃以及立宪会议和普选权。”在未注号码的散页上写的笔记：“布尔什维克把苏维埃说成是反动的，因为农民（农民代表和士兵代表）在它们中间占多数，在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以后，它们就成了人民意见的正确代表者了，但是这一突然的转变仅仅同和平与土地问题有关。”——德文版编者注

和权利的行为辩护,上述托洛茨基关于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的笨重性的论据是远远不够的。相反,没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报刊,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统一恰恰是完全不能设想的,这是一个彰明较著、无可辩驳的事实。

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简单化了的观点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需要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某种有限的程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这种训练和教育却是生存的要素,是空气,没有它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存在。

“由于为争取政府权力进行了公开和直接的斗争……”托洛茨基在这里自相矛盾并且同他的党内同志发生了针锋相对的矛盾。正因为这句话说得对,所以他们压制公共生活就是堵塞了政治经验的源泉,阻碍了向上的发展。否则人们就只好假定,直到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之前,经验和发展是必需的,并且已达到了顶点,在那以后就成为多余的了。(列宁的演说:俄国已被说服,相信社会主义了!!!)

实际情况相反!布尔什维克大胆而坚决地去迎接的巨大任务恰恰要求对群众进行最深入的政治训练和积累经验。^[1]

按照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精神,专政理论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前提: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政党口袋里已有现成处方的一件

[1] 卢森堡写在稿纸左边的注,未说明插入何处:“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的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德文版编者注

事,只需要努力去实现就行了。^[1]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这要看情况而定——事情并非如此。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法律的体系,它的实际实现决不是一些只需要加以运用的现成处方的总和,而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纲领里所有的只不过几条大的方针,它们指明应当按照什么方向寻找措施,而且这些方针主要是消极性质的。因此我们大致知道,为了给社会主义经济开辟道路,我们必须首先取消什么;与此相反,为了把社会主义原则运用于经济,法律和一切社会关系在每一步骤上必须采取的上千项大大小小的具体的实际措施是什么样子的,对此并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党纲和社会主义的教科书加以说明。这不是缺点,而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优越的地方。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应当而且只能是一个历史产物,它是在它自己的经验的学校中,在它得到实现的那一时刻,从活的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的;历史归根到底是有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它同有机自然界完全一样,有一个好习惯,总是在产生实际的社会需要的同时也产生满足这一需要的手段,在提出任务的同时也提出解决的办法。但是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主义显然就其本性来说就是不能钦定的,不能通过敕令来引进的了。它需要一系列针对财产等等的强制措施作为前提。消极的东西,即废除,是可以命令实行的,积极的东西,即建设,却不行。这是处女地。问题上千。只有经验才能纠正错误并且开辟新的道路。只有不受拘束的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出成千的新的形式,即兴而来的主意,保持创造力,自己纠

[1] 卢森堡写在稿纸左边的注,未说明插入何处:“说实在的,布尔什维克自己也不打算否认他们不得不一步一步地摸索、尝试、实验,朝各个方向试验,他们的措施很大一部分并不高明。如果我们着手去干,我们大家也都会并且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尽管条件可能不是到处都那么困难。”——德文版编者注

正一切失误，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证据：1905年和1917年2~10月）政治方面和那时一样，经济和社会方面也一样。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

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的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列宁语，见《通报》第36期〔1〕）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在几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下已经退化的群众在精神上彻底转变。社会本能代替自私本能；群众首创性代替惰性；把一切苦难置于度外的理想主义，等等，等等。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列宁知道得更清楚，描绘得更透彻，也没有人曾像他那样坚持不懈地反复强调，〔2〕只不过他采取的手段完全错了。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

〔1〕卢森堡在原稿中误写为第29期。《俄国革命以后》一文发表在1918年12月8日的《柏林及郊区社会民主党选民协会联合会通报》第36期上。它详细转述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内容，一部分是逐字译出的。——德文版编者注

〔2〕卢森堡写在散页上的笔记，未说明插入何处：“列宁关于纪律和腐化的演说：‘在我们这里以及在所有的地方无政府状态也将是不可避免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附在资产阶级社会身上，同它是不可分离的。’

“证据：

“一、东普鲁士、‘哥萨克人’的劫掠。

“二、德国普遍发生抢劫和盗窃（‘黑市交易’、邮政和铁路人员、警察、秩序井然的社会同苦役监狱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

“三、证据：工会领导人迅速坠落。对此，严酷的恐怖措施无能为力。相反，他们还进一步腐化。惟一的解毒剂：理想主义和群众的社会积极性、不受限制的政治自由。”

写在散页上的论述，未说明插入何处：“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同流氓无产阶级的斗争都是一个本身具有高度重要性的问题。我们在德国和所有的地方也将遇到这一问题。流氓无产阶级分子深深地附在资产阶级社会身上，不仅作为特殊的阶层，作为在社会制度的墙倒塌时特别大量增长的社会废物，而且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

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一切都是治标的办法。达到再生的惟一途径: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恐怖统治恰恰是败坏道德的。

如果这一切都取消了,现实中还剩下什么呢?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惟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

“德国(一切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是这样)的事件进程表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阶层是多么容易堕落为游民。商人的投机倒把,波兰小贵族的黑市交易,空头买卖,食品掺假,诈骗,官吏贪污,盗窃,破门盗窃和抢劫等等之间的层次差别已经消融,因此可尊敬的市民同苦役监狱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当资产阶级的精华在海外殖民的条件下被移植到外国的社会基础上时通常要迅速堕落,这一现象在这里又重复出现了。随着道德和法律的侵袭的界限和支柱被废弃,资产阶级社会直接地不受阻拦地干脆堕落了,因为它的最本质的生存规律就是极度的不道德:人对人的剥削。无产阶级革命将不得不到处同它的这一敌人、同反革命的这一工具进行搏斗。

“但是即使在这一方面恐怖也是一把钝剑,甚至是双刃的剑。严酷的战地司法对于流氓无产阶级骚乱的爆发是无能为力的。不错,任何持久处于攻城状态的联队都不可抗拒地会趋向专横独断,而任何一种专横独断都会对社会起腐化作用。无产阶级革命手中惟一有效的手段在这里也是:采取激进的政治和社会性质的措施,最迅速地改变群众生活的社会保证,点燃革命的理想主义,但后者只有在政治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依靠高度活跃的群众生活才能长久保持。

“正像太阳光线的自由发挥作用对于疾病传染和病原菌是最有效的净化和治疗手段一样,革命本身及其革新的原则,由革命唤起的群众的精神生活、积极性和自我负责态度,从而也就是作为革命形式的最广泛的政治自由,是惟一起治疗和净化作用的太阳”——德文版编者注

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三个月召开一次推迟到六个月!)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是专政还是民主”既是布尔什维克,也是考茨基对问题的提法。考茨基当然决心维护民主,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他正是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社会主义变革的代替品。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心维护专政而反对民主,从而维护一小撮人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对立的两极;二者同样都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很远。如果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它永远不能按照考茨基的善意劝告,在“国家不成熟”的借口下放弃社会主义革命而仅仅献身于民主,他们这样做就不可能不是背叛自己,背叛国际,背叛革命。他们恰恰应当并且必须立即劲头十足地、不屈不挠地、毫无顾虑地采取社会主义措施,也就是实行专政,但这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托洛茨基写道:“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1〕当然,我们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我们也从来不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偶像崇拜者。难

〔1〕《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第93页。——德文版编者注

道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如果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使我们感到不方便,我们也可以像库诺-连施-帕尔乌斯那样把它扔进废物间吗?托洛茨基和列宁是这一问题的活的否定回答。我们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这不过是说:我们始终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内核同它的政治形式区别开来,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壳所掩盖着的社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涩内核——不是为了抛弃这个外壳,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叫他们不要满足于外壳,却去夺取政权,以使用新的社会内容去充实这一外壳。如果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它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是在乐土中才开始的,那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已经创造出来,社会主义民主制将作为现成的圣诞节礼物送给曾在这一期间忠实地支持了一小撮社会主义独裁者的恭顺的人民。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它在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那一时刻就开始了。它无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是啊:专政!但这一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是在于有力地、坚决地侵犯资产阶级社会的既得权利和经济关系,没有这种侵犯,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实现。但是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

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受到世界大战、德国占领和一切与此相关的异常困难的可怕压力,布尔什维克肯定完全会这样做的,而这种困难必然要使任何充满最良好意图和最美好原则的社会主义政策遭到歪曲。

可以说明这一观点的明显论据是：苏维埃政府如此大量使用恐怖手段，特别是在德帝国主义崩溃前的最后时期，在暗杀德国大使事件发生以来这样做。革命不是用玫瑰香水施洗的，老生常谈本身就是相当贫乏的。

俄国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是因果之链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它的出发点和最后促成它的事情是：德国无产阶级不起作用和德国帝国主义在俄国的占领。如果还打算期待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这样的情况下用魔法召唤出最美好的民主制、最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那是对他们提出超人的要求。他们通过自己坚决的革命态度，模范的行动毅力，不可动摇的忠诚，确实为国际社会主义充分作了他们在如此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所能作出的贡献。他们把被迫采取的行动当成自愿做的好事，后来把他们被这些致命条件所迫而采取的策略的一切部分都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并且打算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从这时起危险就开始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完全没有必要地给自己造成损害，把自己真正的、无可反驳的历史功绩掩盖在被迫犯下的过失之下，同样，当他们打算把在俄国由于困难和压力而造成的一切谬误统统当作新的认识搬进国际社会主义的武器库时，他们也是给国际社会主义（他们曾为国际社会主义进行过斗争和受过苦）帮了倒忙，因为那些谬误归根到底只是国际社会主义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的破产的后果。

德国的政府派社会主义者尽管可以叫嚷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统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幅讽刺画。如果它曾经是这样或者现在是这样，那么这只不过是因为它正是德国无产阶级的态度的一个产物，这一态度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讽刺画。我们大家都受历史规律支配，而社会主义政策恰恰只能在国际规模

上实现。布尔什维克表明他们能做到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历史可能性的限度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他们不应当打算造成奇迹。因为在一个孤立的、被世界大战弄得筋疲力竭的、被帝国主义卡住喉咙的、被国际无产阶级出卖了的国家实行一次模范的和完美无缺的无产阶级革命,会是一个奇迹。重要的事情在于,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本质的东西同非本质的东西、核心同偶然事件区别开来。我们在全世界都面临着最后的决战,在这一最后时期,社会主义的最重要问题(而且这简直就是迫切的当前问题)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个或那个具体的策略问题,而是: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群众的革命毅力,社会主义本身的取得政权的意志。在这一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旧是惟一能用胡登^[1]的话高喊“我敢于这样做了!”的人。

这是布尔什维克政策中本质的和持久性的东西。在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始终有着这样的不朽的历史功绩:他们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面,夺取了政权并且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实践问题,他们在全世界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决战大大向前推进了。在俄国只能提出问题。问题不能在俄国得到解决,只能在国际规模上得到解决。在这一意义上说,未来是到处都属于“布尔什维主义”的。

1922年于柏林出版

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

德文版,第4卷,第332~365页

(殷叙彝译)

[1] 乌尔利希·冯·胡登(1488~1523),德国宗教改革的拥护者,1523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编者注

附录：

关于罗莎·卢森堡 《论俄国革命》的版本

商 鼎

1981年2月出版的《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增刊(卢森堡专辑)》第一次刊登了罗莎·卢森堡的重要著作《论俄国革命》的中译文(殷叙彝译),还发表了费里克斯·魏尔的《“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前言》(周家碧译)、周懋庸的《卢森堡的〈俄国革命〉手稿的写作和出版及其影响》等文章,对这一著作的写作和出版经过作了介绍。从最近几年我国关于卢森堡的研究工作看来,很有必要对这一著作在版本方面的复杂情况作进一步的说明,本文就是为此而写的。

《论俄国革命》是一篇未完成的手稿。原稿一度遗失。1921年(也可能是1922年),德国共产党原领导人保尔·列维根据卢森堡的秘书玛蒂尔德·雅可布所抄的一个副本第一次出版此书。1928年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在征集工人运动历史文献时在柏林发现手稿原件。费里克斯·魏尔拿它同列维出版的小册子对照,发现列维的版本有不少脱漏和错误,曾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第13年卷(1928年莱比锡德文版)上发表上述文章加以说明,并发表了几处在小册子中脱漏的较长的正文和评注,同时声明,该文库不可能根据原稿校正并重新发表这一著作,这一任务应当由《卢森堡全集》去完成(应是指蔡特金、瓦尔斯斯基和弗勒利希在20年代编辑的《卢森堡全集》,该书从1923~

1928年共出3卷,未收入这一著作)。

在这以后,在德、法、美等国出版过本书的一些德文版本和法文、英文译本。我见到过的有:1961年美国密执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1963年西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本,1964年巴黎弗朗索瓦·马斯佩洛出版社出版的法译本。1974年民主德国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版的《罗莎·卢森堡全集》第4卷中也收了这篇著作。

1961年的英译本除《俄国革命》外还收入卢森堡的另一篇文章《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因此书名为《〈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译者贝特兰·D.沃尔夫在导言中提到,在30年代,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集团“新道路”曾出版过本书的一个德文本;莫利斯·奥列维尔曾出版过法文译本;还有一个名为英特格的人曾把本书部分地译成英文在他编辑的《国际评论》(纽约出版)上发表。但沃尔夫没有具体说明这些版本的出版年份。他认为魏尔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上发表的版本(实际上这并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版本,魏尔自己说得很清楚)是“第一个经过科学校勘的版本”。沃尔夫声称自己曾根据这个版本,并对“所有的”其他德文、法文和英文版本的异文进行了研究,在1940年完成了一个英文译本,由纽约的工人世纪出版社出版。1961年的英译本就是根据这一版本重印的。

1964年的法译本(书中还收入卢森堡《批评的自由和科学》一文)的译者为法国社会党人布拉克,是根据他以A.M.德卢梭为署名在1946年的《斯巴达克手册》上发表的法译本重印的,由洛贝尔·巴里写了导言。导言中未对译本所根据的原文版本作任何说明。

1963年德文版(书中还收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和下面提到的另一篇文章)是由著名的西德学者,3卷本卢森堡《政治论文集》编者奥希普·弗莱希特海姆编辑出版的,在他写的导言中未对版本作任何说明。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提到1939年的巴黎法译本,1948年的汉堡德文版,1957年的哈默伦德文版。^{〔1〕}这些我都未见到。

我所见到的上述几个版本除列维的版本外显然都吸收了魏尔发表的校勘成果,但没有材料可说明编者或译者曾见到手稿原件。关于这一问题,1974年《卢森堡全集》第4卷的编者序言中是这样说的:“自从叛徒保尔·列维发表了关于俄国革命的布累斯劳手稿(本书是卢森堡在布累斯劳的监狱中写的——引著)以来,罗莎·卢森堡的这一未完成的著作曾一再由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家编辑出版。他们在这样做时企图造成这样的印象,即这一著作是卢森堡已经完成了的,或者甚至是她的政治遗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自己把引文补齐或者补充进去,把罗莎·卢森堡草略写下的思想插入正文,尽管作者对这些并没有作精确的说明。这些编者从来没有查阅手稿原件,他们沿袭了保尔·列维版本中存在的而费里克斯·魏尔的校正说明没有提到的所有错误和脱漏。这一切都已经表明,这些思想家关心的不是这一手稿的科学版本。”^{〔2〕}全集编者这样笼统地把所有其他版本的编者或译者一概斥为“资产阶级的”或“修正主义的”,对此我是不能同意的。由于我自己也未见过原件,所以对于编者从版本角度对他们作出的否定性评价不好发表意见。尽管如

〔1〕 参看周懋庸:《卢森堡的〈俄国革命〉手稿的写作和出版及其影响》,载于《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22~29页。

〔2〕 《卢森堡全集》第4卷,柏林1974年德文版,第30页。

此,在对比这几种版本后很容易看出,《卢森堡全集》版本的校勘和编排工作是其他版本远远比不上的。

由于这一著作是写在学校作业纸上的未完成的手稿,正文 87 页,有不少写在边上的注,还有一些写着补充意见、评注等等的散页,因此出版时必须经过整理,这不仅给编辑工作造成困难,而且也是各种版本产生差别的客观原因。最主要的差别是:

第一,书名或篇名。原稿没有加标题。列维出版时用的书名为《俄国革命。批判的评价》。我见到的那些单行本都用《俄国革命》为书名或篇名。《卢森堡全集》第 4 卷则用《论俄国革命》为篇名,并注明这是编者加的。

第二,章节的划分。列维的版本、1963 年德文版和《卢森堡全集》版本都分四节,无分节标题,看来是根据原稿。1963 年英译本分八章,并加如下标题:一、俄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二、布尔什维克的土地政策;三、民族问题;四、立宪会议;五、选举权问题;六、专政问题;七、反对腐化的斗争;八、民主和专政。1964 年法译本分五节,并加如下标题:一、批评的重要性;二、布尔什维克,俄国革命的动力;三、两个小资产阶级口号;四、解散立宪会议;五、民主和专政。

第三,对边注和散页的处理。列维版本在这方面有不少脱漏。1963 年德文版、1961 年英译本和 1964 年法译本都根据文意将卢森堡写在稿纸边缘上的注和写在散页上的笔记插入正文,一般未加说明,仅在两处用脚注说明这是写在未编号的散页或插入的散页上的笔记(见德文版第 72、76 页,英译本第 66、75 页,法译本第 59、67 页),但英译本的注文比较详细,此外还在个别地方加了编者说明(如第 34 页),在这一点上比另两个本子略

好一些。^{〔1〕}

据《卢森堡全集》第4卷编者说明,他们的版本是根据手稿原件的照相复制件刊印的。编者的做法与上述所有版本都不一样,凡是不属于正文的材料一律放在相应地方的脚注中,并分别说明这是“写在稿纸上方空白处的注”,“写在稿纸左边(或右边)的注”,“写在散页上的笔记”等等。这样的校勘工作对于研究卢森堡的思想是有重要意义的。例如,《论俄国革命》中有一段关于“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的著名的话,在上述三个单行本中都放在正文中,但《卢森堡全集》却放在脚注中,并说明这是“写在稿纸左边的注”(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87页)。我们由此可以设想几种可能性:或者是,卢森堡准备在修改文章时把这些话补充进去;或者是,卢森堡在当时可能还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当然还可能有其他情况。总之,我们的思路可以更加开阔。因此我认为,《卢森堡全集》的版本是迄今最好的一个版本。

第四,引文的处理。手稿中有两处引文只开了一个头,没有写全。《卢森堡全集》版只在该处注明:“删节号是原稿中的”(见第355、359页,第359页还注明引文出处),而德、英、法文三种单行本都把这两句话补齐了,我认为这样做是可以的,当然最好还是说明一下原稿情况并注明引文出处(见德文版第69、72页,英文版第59、60页,法文版第55页)。还有一处,手稿中只提到要引用托洛茨基一本著作(实际上就是该文上一段提到的《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中的论据,并没有写下引文,

〔1〕拿这些版本同魏尔的上述文章对照就可发现,凡是魏尔只提“对××页所加的注(或边注,或插入语)”的地方,这些版本都未作说明。只有两处魏尔明确指出是“写在散页上的”,这些版本才加注说明。

《卢森堡全集》版只是注明：“原稿中没有这些论据，也未指出是托洛茨基的哪一著作”（见第353页）。我认为《全集》编者在这里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德、英、法文单行本在这里都补进了两段取自《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的引文^{〔1〕}，但未注明出处，也未说明这是原稿没有的，这种做法也有缺点。

此外，在段落的划分和编排上，《卢森堡全集》和上述几个单行本有些出入，几种单行本之间也有出入。《卢森堡全集》同其他版本在个别文字上和标点上（如是否加引号或着重号）还有些出入。《全集》版还对原文中的一些明显的笔误作了校正。关于这些，这里都不一一赘述了。

最后，与《论俄国革命》手稿同时发现的还有一篇14页关于战争、民族问题和革命的论文手稿，已编好页码，但没有标题。据魏尔分析，这份残稿有可能是《论俄国革命》中的一章，但无法肯定。魏尔已将这一残稿刊载在他的文章后面，但我所见到的《论俄国革命》版本都没有把它当作《论俄国革命》的一部分，只是1963年德文版把它刊载在书的最后部分，仍用魏尔加的标题：《关于战争、民族问题和革命的残稿》，并注明是根据魏尔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上发表的文本，未作其他说明。《卢森堡全集》第4卷也收入此文，次序排在《论俄国革命》之后，标题同上，并加注说明：“标题是编者加的。——按原件的照相复制件刊印。”（见第4卷第366~373页）

我在1981年翻译《论俄国革命》时使用的是《卢森堡全集》第4卷的版本，并和1963年法兰克福版德文单行本作了对照，注明二者在个别文字和标点上的差别。我也参考了列维的版本

〔1〕 参看托洛茨基：《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以前的俄国革命史》，1919年伦敦英文版，第117~118页。

和上述英、法文译本，但未从版本和校勘的角度加以对照和说明。现在看来，《论俄国革命》这一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既然存在不同版本，我们就有必要对它的各种版本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这样既可以做到尽可能去伪存真，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帮助我们思考和研究问题。

我见到的版本有限，特别是没有见到手稿原件，对已见的版本也未作全面的对照校勘，这里只是举几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希望引起同行学者的注意，以便共同进行研究。

二

书信集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 (22 封)	邝崇仁	傅 韦	译	45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 (26 封)	柴方国	译	98	
致利奥·约基希斯 (29 封)	郭颐颀	李映芳	译	148
致考茨基夫妇 (19 封)	郭颐颀	李映芳	译	209
致汉斯·狄芬巴赫 (14 封)	郭颐颀	李映芳	译	244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 (6 封)	郭颐颀	李映芳	译	299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

邮片

1916年7月7日

寄自莱比锡^{〔1〕}

我亲爱的小宋娅!^{〔2〕}

今天的天气潮湿而又闷热，莱比锡的天气大半是这样的——这里的气候我简直受不了。上午我在公园里水池边坐了两个钟头，我在念《有产者》，^{〔3〕}这本书很精彩。一位老妇人在我旁边坐下来，看了一眼书的扉页，笑嘻嘻地说：“这一定是本好书。我也喜欢看书。”在我坐下来看书以前，当然我先环顾一下园中的景色以及周围的树木和灌木丛——一切熟悉的景象依然如故，我心中异常满意。相反地，同人的接触反而愈来愈使我失望；我想不久我也要退隐苦修了，像圣·安东尼一样，但再也没有什么“诱惑”了。^{〔4〕}祝你愉快和平安。衷心的问候。

问候孩子们。

罗莎

〔1〕 1916年7月10日罗莎·卢森堡被捕，这是她被捕前写的一张邮片。

〔2〕 宋娅·李卜克内西，也译作桑尼亚·李卜克内西。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夫人，卢森堡的好友。

〔3〕 《有产者》是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1867~1933）的一本小说。

〔4〕 法国小说家福楼拜著有《圣·安东尼的诱惑》。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

邮片

1916年7月7日

寄自莱比锡^{〔1〕}

我亲爱的小宋娅!^{〔2〕}

今天的天气潮湿而又闷热，莱比锡的天气大半是这样的——这里的气候我简直受不了。上午我在公园里水池边坐了两个钟头，我在念《有产者》，^{〔3〕}这本书很精彩。一位老妇人在我旁边坐下来，看了一眼书的扉页，笑嘻嘻地说：“这一定是本好书。我也喜欢看书。”在我坐下来看书以前，当然我先环顾一下园中的景色以及周围的树木和灌木丛——一切熟悉的景象依然如故，我心中异常满意。相反地，同人的接触反而愈来愈使我失望；我想不久我也要退隐苦修了，像圣·安东尼一样，但再也没有什么“诱惑”了。^{〔4〕}祝你愉快和平安。衷心的问候。

问候孩子们。

罗莎

〔1〕 1916年7月10日罗莎·卢森堡被捕，这是她被捕前写的一张邮片。

〔2〕 宋娅·李卜克内西，也译作桑尼亚·李卜克内西。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夫人，卢森堡的好友。

〔3〕 《有产者》是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1867~1933）的一本小说。

〔4〕 法国小说家福楼拜著有《圣·安东尼的诱惑》。

1916年8月5日

寄自柏林（巴尼姆街监狱）

我亲爱的小宋娅！

今天，8月5日，我才同时收到你的两封信：一封是7月11日的（!!），另一封是7月23日的。你看，寄到我这里的信比寄到纽约去的时间还长。同时，我还收到你寄来的书，为了这一切我衷心地感谢你。在你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离开你。我感觉十分难过；我多么想跟你一起在田野里再散一散步，或者坐在厨房前面凉亭里眺望落日……我接到海尔密一张详细描述旅途见闻的邮片。我也非常、非常感谢你送我的荷尔德林〔1〕的集子。但是你千万不要这么为我花钱，这使我心里很难过。我也非常感谢你寄来的那些好东西和蚕豆。你快点写信，这样我本月内也许还接得到。我紧紧地、热烈地和你握手。你要和过去一样勇敢，不要沮丧。我很想念你。请你多多向卡尔和孩子们问候。

你的 罗莎

彼尔·洛蒂〔2〕的作品好极了，别的书我还没看。

〔1〕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抒情诗人。

〔2〕 彼尔·洛蒂（1850-1923），法国小说家，著有《冰岛渔夫》等。

邮片〔1〕

1916年8月24日

寄自佛龙克

亲爱的宋尼契嘉〔2〕，现在我不能跟你在一起了！这件事使我非常难过。但是请你昂起头来，有些事今天虽然是这样，但迟早一定会改变的。你现在必须到别处去——随便到哪个乡村去，到野外去，只要那个地方美丽，有人照顾你就行。你继续呆在这里，使你的身体愈来愈坏下去，这是毫无意义的。要等到终审恐怕又得过几个星期。请你尽快地离开吧……如果卡尔知道你去休养，他一定也会感到宽慰。多谢你10日写的热情的短简和那么好的礼物。明年春天我们一定能一起在田野里，在植物园里漫步，我现在想到这件事已经高兴得了不得。但是现在你要离开这里，宋尼契嘉！你能不能到地中海去领略一下南国的风光？你走以前，我一定要见你一次，你可以到司令部去申请一下。请你赶快再写一张便笺来。不管怎样，你要安心、愉快！我拥抱你。

罗莎

衷心地千万遍问候卡尔。

海密尔和包壁的两张邮片我都收到了，使我很高兴。

〔1〕写这张邮片的那天，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判处四年徒刑。

〔2〕宋尼契嘉、宋儒莎均系宋姬的爱称。

1916年11月21日

寄自佛龙克

我亲爱的小宋尼契嘉，我从玛蒂尔德那里听说，你的兄弟阵亡了。你又受到这样一个打击，真使我非常震惊。最近一个时期，你要忍受多少痛苦啊！而我却不能在你身边，给你一点温暖和鼓舞！……我也替你母亲担心，她怎能忍受这样的悲痛啊。这真是一个万恶的时代，我们一生中谁都能开出一张很长的死亡名单。现在简直像当年塞瓦斯托波尔的情景，真是度日如年啊！〔1〕但愿很快就能看到你，我一心渴望着这件事。你是怎么得知你兄弟的噩耗的，从你母亲那里还是直接得到的？关于另外一个兄弟有什么消息吗？我真想通过玛蒂尔德送给你点什么，可惜我这儿除了一块小花手帕外什么也没有。你别笑话我；让它把我对你的深挚的爱传递给你吧。赶快给我写几句话来，好让我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请你千万次问候卡尔。我热烈地拥抱你。

多多地问候孩子们！

你的 罗莎

〔1〕 1854~1855年，英、法、土耳其联军围困塞瓦斯托波尔达十一个月之久。

1917年1月15日

寄自佛龙克

……啊，今天有一刹那，我感到非常痛苦。3点19分火车的笛声告诉我，玛蒂尔德已经走了。我像笼子里的一头困兽，沿着墙走来走去，作我惯常的“散步”；我的心由于痛苦而痉挛起来，为什么我不能离开这儿，噢，只要能离开这儿啊！然而，我一有非分之想，立刻就受到打击，我必须服从；这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像一条驯服的狗那样服从。让我们别谈我的事吧！

宋尼契嘉，你知道战争结束后我们将要做什么吗？我们一起到南方旅行去。我们要这样做！我知道，你梦想着跟我一起到意大利去旅行，这是你的宿愿。我却另有打算，我要把你带到科西嘉去。那里比意大利还要好。在那里我们可以忘掉欧洲，至少忘掉现代的欧洲。你想象一下，辽阔、雄伟的景色，到处是陡峭的高山和险峻的峡谷，上面是一片银灰色的光秃的岩石，下面是葱茏茂密的橄榄树、月桂和古老的栗树。一种太古时代的寂静笼罩着这一切——没有人声，没有鸟语，只是在不知什么地方的石洞中，一条小溪潺潺地流着，或者在高空，在悬崖绝壁之间，呼啸着劲风——这就是吹扬起俄底修斯^[1]的船帆的那种风。你碰见的人物，也是和那里的景色和谐的。譬如说，忽然从山路拐弯的后边出现了一队人——科西嘉人走路的时候总是一个跟着一个，排成一直行，不像我们这

[1] 俄底修斯为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他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回返故乡，在海上曾一度得到风神帮助，但因他曾经触怒海神，终于在海上飘流了十年。

里的农夫拥成一团。前面常常跑着一条狗，后面慢吞吞地走着一只山羊，或者一只驮着几口袋栗子的小驴子，最后跟着一匹硕壮的骡子，上面侧身坐着一个女人，两条腿笔直地垂在一边，怀里抱了个孩子。她笔挺地坐着，苗条的身躯宛如一株柏树，纹丝不动，旁边一个大胡子男人，坚定沉着地跨着大步，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你会坚信：这就是神圣家庭^{〔1〕}。这种景象你在那里随处都可以碰到。像我素常碰到完美无瑕的景物时一样，每次都激动得禁不住要在他们面前膜拜。那里圣经中的世界和古罗马时代的景象又呈现在你眼前。我们一定要去，像我曾经做过的那样：徒步横贯全岛，每夜我们在一个新的地方休息，每天我们在漫游的途中迎接日出。这吸引你吗？如果我能使你看到这个世界，那我多么幸福啊……

多念些书，你在思想上也需要进步，而且你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你还有朝气，还天真未凿。现在我必须搁笔了。祝你这一天愉快、安谧。

你的 罗莎

〔1〕 据基督教传说，“神圣家庭”指圣母玛利亚、圣父约瑟夫和圣婴耶稣。

1917年2月18日

寄自佛龙克

……很久以来，再也没有什么像马尔泰简短给我谈到的你去探望卡尔的情况那样使我悲伤了，他告诉我你怎样看见他站在铁栅栏后面，以及这事对你有了什么影响。为什么你瞒住这件事不對我讲呢？我有权分担你的一切痛苦，别剥夺我的权利吧！这件事使我生动地回忆起十年前我在华沙监狱里第一次接见兄弟们的情形。当时我被带到一个用铁丝编起来的双层笼子里，这就是说，一只小笼子四面脱空地放在一只较大的笼子里面，我们必须隔着两只笼子的闪闪发亮的铁丝网交谈。因为那时正是我绝食六天之后，我是那么虚弱，那位骑兵上尉（我们的典狱长）不得不把我连拉带拖地送到接待室，我双手紧抓住铁丝支持着身体，这样子更像动物园里的一只野兽了。笼子搁在室内光线非常昏暗的一个角落里，我的兄弟把脸紧贴着铁丝。“你在哪儿呢？”他不停地问，一面擦掉夹鼻眼镜上妨碍他视线的眼泪。——如果我现在能够坐在鲁考监狱的笼子里，代替卡尔承受这一切，我多么心甘情愿，多么欣慰啊！

请你代我向番姆弗尔脱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他送我的高尔斯华绥的书。我很高兴昨天我把这本书看完了。当然这部小说远不如《有产者》那样使我喜欢，尽管它有强烈的社会倾向性；我不喜欢它，恰恰因为它的社会倾向性太多了。在小说里我不看它的倾向性，我要看艺术价值。因此这本《全世界的弟兄们》使我生厌，高尔斯华绥太俏皮了。我的这个见解大概不

至于使你惊讶。萧伯纳〔1〕和奥斯卡·王尔德〔2〕也正是这样一种类型，这一种类型目前在英国知识界中颇为流行；这是一种非常聪明、文雅而又厌倦一切的人的类型，他们总是以嘲笑、怀疑的目光来观察世界上的一切。高尔斯华绥常常摆出一副最严肃的面孔，对自己书中的角色说出一番隽妙、讽刺的话，这些话每每使我大笑起来。但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从来不讽刺他笔下创造出来的人物，正如真正有教养而高尚的人，即使他们发现周围的一切都非常可笑，也从来不嘲笑或者很少嘲笑他们周围的人一样。你当然知道，宋尼契嘉，这并不是说，不能写伟大风格的讽刺作品。例如盖尔哈特·霍普特曼〔3〕的《埃曼奴爱儿·昆特》，这就是百年来对现代社会最能一针见血的一部讽刺作品。但是，霍普特曼自己并没在一旁讥笑；在作品结束时他的嘴唇颤抖着，眼睛睁得大大的，晶莹的泪珠在眼睛里闪耀。高尔斯华绥却与此相反，不断用他诙谐的插话来打动我，正如晚宴席上一个同餐桌的人，每当一个新客人走进客厅时，他就在你耳边低声咕哝，说这位新客人怎么长怎么短……

……今天又是星期日，对于被监禁起来的人，对于孤独的人，这是一个最死气沉沉的日子。我很悲伤，但是我热切地希望你不是这样，卡尔也不是这样。快点写信给我，告诉我你到底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休养去。

我热情地拥抱你，并向孩子们问候。

你的 罗莎

〔1〕萧伯纳（1856~1950），美国戏剧家。

〔2〕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英国唯美派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3〕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戏剧家。早期作品《织工》等多写社会问题。

番姆弗尔脱能再给我送几本好书来吗？是否能送几本托马斯·曼^{〔1〕}的作品来？他的书我还没有读过。

还有一个请求：在户外阳光开始刺痛我的眼睛，是不是你能够在信封里寄给我一块一公尺长的黑色薄面纱，带黑点子的！我预先在这里谢谢你。

〔1〕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小说家。

1917年4月19日

寄自佛龙克

昨天你问候我的邮片使我从心坎儿里高兴起来，虽然你的语调是那么伤感。我多么想现在能跟你在一起啊，为的是像前次卡尔被捕后那样使你重新欢笑起来。你还记得吗，我们俩在“弗尔斯登霍夫”咖啡馆里恣意地大声嬉笑，惹得不少人瞠目而视？不管怎样，那时这一切是多么美啊！我们每天清早到波茨坦广场去赶汽车，然后一起乘汽车向监狱驶去，路上经过开满鲜花的动物园，驶进那条栽着高大的榆树的静悄悄的莱尔脱尔街；归途中照例在“弗尔斯登霍夫”下车，然后你又免不了到绥登南来拜访我，那儿的一切都沐浴在绚烂的五月和煦里；还有我厨房里的一段舒适的时刻，你和咪咪坐在铺着白桌布的桌子旁边，耐心地等着我的烹饪杰作（你还记得那美味的haricots verts a la Parisienne^{〔1〕}吗？）……除了这些景象外，我还清清楚楚地回忆起那永远不变的晴朗、暖和的天气，也只有在这种天气里，才能使人产生真正愉快的春天的感觉。然后到了傍晚，我照例去拜访你，待在你精巧的小房间里——我特别喜欢作家庭主妇时的你，你带着少女般的风韵，站在桌子旁边给人斟茶，显得特别招人怜爱，——最后在深夜里，我俩穿过芬芳而又黑暗的道路相互伴送回家，你送我一程，我又送你一程！你还记得绥登南的童话般美丽的月夜吗？在这夜晚我伴送你回家，那轮廓峻峭的黑魃魃的屋脊被可爱的天蓝色的晴空衬托着，我们觉得好像是古代的城堡一样。

宋儒莎，我真想永远在你身边，让你能够散散心，跟你一

〔1〕 法语：巴黎式的绿豌豆。

起聊聊天，或者默默相对，使你不至于陷入忧郁、绝望的沉思里去。你在你的邮片里问：“为什么一切都是这样呢？”你真是小孩子，生活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一切不外是痛苦、别离和思念。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切，而且要把这一切看成是美的、善的。至少我对待生活就是这样。这并不是我苦思冥想出来的生活哲理，而是发自我的本性。我本能地感觉到，这是对待生活的惟一正确的方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在任何情况下确实都感到是幸福的。我不希望从我的生活中去掉些什么，也不希望过跟过去和现在有什么不同的生活。要是我能够使你也这样的人生观那就好了！……

我还没有谢过你送给我的卡尔的画像。你这张画像使我多么高兴啊！这真是一件你能够送给我的最好的生日礼品。这张画像现在嵌在一个精美的镜框里，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走到哪，卡尔的目光跟到哪（你知道，有些画像，不管你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它总好像在瞧着你）。这张肖像画得像极了。卡尔现在该为俄国的消息而多么高兴啊！即使你，也应该高兴了；现在总没有什么阻碍你的母亲到你那儿去了吧！你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没有？为了你的缘故，我热切地希望阳光和温暖早日到来。这儿一切才将萌芽，昨天这里还下过雹子。我的缓登南的“南国风光”现在该是什么样子了？去年在那里我们俩站在窗子前面，看到花儿盛开你还赞叹不止……

你不要为写信而费神。我要经常写信给你，你呢，只要寄我一张邮片，简单地写两句问好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你要多在外面走走，多采些植物标本。你有没有把我的那本小花谱带着？祝你平安和愉快，亲爱的，一切都会变好的！你瞧着吧！

我再次地并且热烈地拥抱你。

永远是你的 罗莎

1917年5月2日

寄自佛龙克

……你还记得，去年四月里有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我匆促地打电话给你们俩，请你们到植物园来跟我一起欣赏夜莺演唱的音乐会。我们悄悄地隐蔽在茂密的灌木丛里，坐在石头上，紧傍着一条流水琤琮的小溪；在我们听完了夜莺的歌唱之后，突然之间，一种单调而哀怨的啼声传进我们的耳朵里，那啼声似乎是“格里格里格里格里格里克！”我当时说，这好像是一只沼泽里的鸟或者水鸟，卡尔也同意我的话，可是我们怎么样也没弄清到底这是一种什么鸟。你想，前几天一大清早，就在这儿附近，我忽然又听见了那一模一样的啼声，我的心焦急得怦怦地跳动着，迫不及待地要知道，这究竟是什么鸟。直到今天发现它为止，我一刻也不能安静下来：这不是一只水鸟，这是一只歪脖子，一种类似啄木鸟的灰色雀儿。它比麻雀大不了多少，因为它一遇到危险，便用很滑稽的动作使头部脱臼，来把敌人吓走，所以得了这样一个名称。这种鸟儿只以蚂蚁果腹，像食蚁兽一样用它那带有黏性的舌头把蚂蚁黏集在一起。因此西班牙人称它“霍尔米皆罗”——食蚁鸟。此外默利克^[1]曾给这种鸟做了一首绝妙的打油诗，雨果·沃尔夫^[2]还给它谱了曲子。我自从知道了这种啼声如怨如诉的鸟儿是什么之后，好像获得了一份礼物似的。如果你把这事写信告诉卡尔，恐怕他也会感到高兴的。

我念什么书？主要的是自然科学书籍：植物地理和动物地

[1] 默利克(1804~1875)、德国诗人，戏剧家。

[2] 雨果·沃尔夫(1860~1903)，德国作曲家。

理。昨天我恰巧念到一段文章论及德国鸣禽减少的原因：由于日趋合理化的森林经济、园艺经济和农业学，它们筑巢和觅食的一切天然条件——空心树木、荒地、灌木丛、园地上的枯叶——都渐次被消灭了。我念到这里，不禁痛心已极。我并非是为了人类不能聆听歌唱而难过，我是为了那毫无抵抗能力的小动物竟这样默默无声地不断灭绝下去而悲痛，我甚至要哭出来了。这使我想起了西勃尔教授著的一本论北美洲红色人种灭亡的俄文书来；这本书还是我在苏黎世^{〔1〕}的时候读到的；他们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被有文化的人从本土排挤出去，正默默地、悲惨地沦亡下去。

当然我是病了，所以如今什么事都这么使我激动。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有这种感觉，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什么鸟、什么兽，只不过赋有人的形状罢了；当我置身于像此地的这样一个小花园里，或者在田野里与土蜂、蓬草为伍，我内心倒感觉比在党代表大会上更自在些^{〔2〕}。对你我可以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你不会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吧。你知道，我仍然希望将来能死在战斗岗位上，在巷战中或者监狱里死去。可是，在心灵深处，我对我的山雀要比对那些“同志们”更亲近些。这并非是我要在自然界寻找一个避难所，一个休息的地方，像很多失意政客那样。相反地，我在自然界中也处处遇到许多残酷现象，令我非常痛心。你想想，譬如下面这样一桩小事我就始终不能忘怀。去年春天我从田野间散步回来，在一条空旷的僻街上行走，这时地上一小团黑黝黝的东西引起了

〔1〕 苏黎世，瑞士的城市，卢森堡曾在这里读大学。

〔2〕 与罗莎·卢森堡同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很多都沦为机会主义者。这里卢森堡明显地表示出对他们的厌恶。

我的注意。我俯下身去，看见一幕无声的惨剧：一只很大的粪甲虫正仰卧在地上，用它的腿绝望地挣扎着，同时一大群小蚂蚁麇集在它身上，正要把它——活生生地吃掉！这景象使我感到恐怖，我拿出我的手帕来，着手把这些残忍的东西赶走。然而它们却是这样大胆、顽固，我不得不跟它们大战一场，等到最后我把这个可怜的受难者解放了，远远地放在青草上面的时候，它的两条腿已经被咬掉了……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急忙走开，我终归对它只是做了一桩效果很值得怀疑的善举。

现在傍晚时候的苍茫暮色已经拖得很长了。平日我是多么喜爱这段时刻啊！在绥登南的时候我有许多山鸟，如今在这里我却一只也看不到，一只也听不见。整个冬天我只喂了一对山鸟，现在它们也没有影踪了。在绥登南时，我惯于在傍晚时分到街头徘徊散步；那真是美极了，紫色的残霞还滞留在空中，而街灯上的玫瑰色的煤气火焰已突然燃烧起来，在朦胧的薄暮里显得那么奇特，这些火焰仿佛还有些羞答答的样子。一会儿匆匆地从街上掠过——一个买东西来迟了的女仆或者使女的模糊的身影，急于赶到面包房或者杂货铺子去买些什么东西。我认识的鞋匠的几个孩子常常天黑了还在街头玩耍，直等到有人在转弯角上大声地喊他们回家。这时候往往还有一只不安宁的山鸟像顽皮的孩子似地突然从睡梦中尖声鸣叫起来，或者吱吱喳喳地啼个不休，又扑刺刺地从一棵树飞到另外一棵树上。我站在街中央，数那最先出现的星星，简直不想从这和煦的微风和薄暮中走回家去；白昼和黑夜在这薄暮里是这样柔和地交融在一起了。

宋儒莎，我会很快地再写信给你的。祝你平安和愉快，一切都会变得顺利，卡尔也会这样的。下次信中再谈。

我拥抱你。

你的 罗莎

1917年5月19日

寄白佛龙克

……现在这儿多美啊！到处是葱翠的绿色，百花怒放。栗树披上了鲜嫩而华丽的绿叶，醋栗树上点缀着许多黄色的小星，长着略带红色的叶子的樱桃树已经盛开，黑桦树也正含苞欲放。今天路易丝·考茨基来看我，临行时，她送给我一簇毋忘我花和蝴蝶梅，我便亲自把它们栽种起来。我把毋忘我花和蝴蝶梅交错相间种成两个圆球形的花簇，又在中间笔直地种了一行。所有的花都种得那么好，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种花，居然种得这么成功。正巧到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的窗前有这么多的鲜花！

现在这儿有许许多多新来的鸟儿，我每天都认识一种以前从没有见过的。啊，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跟卡尔一起一清早在植物园里听夜莺叫，我们看见一棵硕大无朋的大树，一片叶子还没长，却密密层层地生了一树闪闪发亮的小白花；我们苦苦地思索，这到底是什么树啊？因为它显然不是一株果木树，花儿的形状也有些奇怪。现在我知道了！这是一棵白杨树，上面长的其实不是花，而是小嫩叶。白杨树的长成的叶子下面是白的，上面是深绿色的，可是初长出来的幼叶却两面都盖着一层白色的茸毛，在阳光下像是白色花朵一样闪烁发光。而今我的小园中就耸立着这样一棵高大的白杨树，所有的鸣禽都特别喜欢停在上而。那时候，就是在同一天，你们俩晚上在我家里，你还记得吗？那时候多么美啊：我们朗诵了一些东西，夜半我们站起来分别的时候，从敞开的阳台门外，吹进来一股夹着茉莉花香的清风——我还给你们唱了那首我很喜欢的西班牙

牙歌：

真值得赞美，谁创造了世界，
他把世界创造得多么完美，
他创造了深不可测的海洋，
他创造了船儿，飘过大海。
他创造了永远光明的天堂，
他创造了大地——和你的面庞。

啊，宋尼契嘉，如果你没听过沃尔夫谱曲的这首歌，你就不知道在最后这两句纯朴的结句中包涵着多少炽烈的感情。

现在，我正写这封信的时候，一只很大的土蜂飞进我房里来了，房间里充满了低沉的嗡嗡声。这多么美啊，在这因为夏暑、花香和辛勤的工作而发出的嗡嗡声里含着多么深刻的生之乐趣！

宋尼契嘉，祝你愉快，请你快快写信来，我渴望着。

你的 罗莎

1917年5月23日

寄自佛龙克

……在我把我的信付邮的时候，你14号写的最近的一封信也寄到这里了。很高兴，我又能跟你联系了，今天我要向你热烈地祝贺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这可爱的节日来到了。”歌德的《列那狐》^{〔1〕}便是这样开始的。但愿你度这佳节时心境稍微舒展些。去年圣灵降临节那一天我们跟玛蒂尔德一起到利希登拉特去作了一次愉快的远足，在那里我给卡尔采了些穗花和一支开着花的非常好看的桦树枝。黄昏的时候，我们手里拿着玫瑰花，像“拉温娜地方三个贵妇”似地在缓登南的田野里散步……

现在这里紫丁香也已经开花，今天开得绚烂极了！天气暖和得我必须穿上最薄的线衫。但是虽然又是阳光，又是温暖的天气，我的小鸟儿却逐渐地几乎完全沉寂了。非常明显，它们正在忙于繁殖后代；雌鸟在窝里孵卵，雄鸟为了给自己、给配偶寻觅食物，忙得不可开交。也许它们都在田野里或者大树上筑巢，至少现在我的小花园是寂静起来了；只是偶尔夜莺短促地啼叫几声，或者青雀足声得得地在那里踱步，或者深夜里金翅雀长鸣一声，我的山雀却踪影全无了。昨天我忽然有一只青山雀从远处啼了一声，向我问候，这使我非常感动。青山雀不跟荏雀一样，它不是常住鸟，总要到三月底才飞回我们这儿来。起初青山雀也常停留在我的窗子附近，跟其他的鸟一起飞

〔1〕《列那狐》是欧洲中古时代流传的一个动物故事，歌德根据这个题材在1794年写了一篇故事诗。

到窗子跟前来孜孜不倦地唱它那令人发笑的“戚戚勃”，可是它把声音拉得那么长，活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在嬉笑。我每次听了总忍不住要笑，并且模仿它的叫声来回答它。以后到了五月初，为了到外面产卵去，青山雀也跟其他的鸟一起消失无踪。我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看见它听到它了。昨天我忽然从墙那边（这堵墙把我们的院子和监狱另一处地方隔开）听见了这熟悉的问候声，可是声音完全变了，只是很短促的接连三声“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以后就寂然无声了。我的心不觉紧缩在一起。在这远远传来的一声短促的啼声中包涵着多少东西啊。它包涵着一只鸟儿的全部简短的历史。这就是青雀对于初春求偶的黄金时代的一个回忆，那时候它成天歌唱、追求别的鸟儿的爱情；可是现在它必须成天飞翔，为自己为家庭寻觅蚊虫，仅仅是一瞬间的回忆：“现在我没有时间——啊，的确，从前真美——春天快完了——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相信我的话吧，宋尼契嘉，这样一声情意绵绵的鸟叫会深深地感动我。我的母亲，她认为除了席勒^{〔1〕}以外，圣经是最高智慧的泉源，固执地相信所罗门王是通鸟语的。我嘲笑她的慈母的天真，因为我那时才14岁，优越感很强，又受到现代自然科学的教育。现在我自己跟所罗门王一样，也懂得禽言兽语了。当然这不是说禽兽也用人类的语言，而是说我懂得了鸟兽的鸣叫声中各种最细微的差别和感情。只有一个漠不关心的人的粗鲁的耳朵才觉得鸟儿的歌唱永远是千篇一律的。如果我们喜爱动物，了解它，那么我们会发觉它们的声调千变万化，完全是一种语言。即使是初春时百鸟喧鸣之后出现的现在这种普遍的沉默我也能了解，我知道，如果秋天我还

〔1〕 席勒（1759~1805），德国诗人，戏剧家。

在这里（看样子非常可能），我所有的朋友都将重新回来，在我的窗前寻找食物；我现在已经为一只雀雀而高兴，它跟我特别亲昵。

宋儒莎，你对我的长期禁锢感到愤慨，并且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一些人可以决定另一些人的命运。干么要这样呢？”

请你原谅，我念到这句话时忍不住要放声笑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1]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位卓克拉可娃太太。她在社交场合中常常提出的也正是这些问题，她一面问，一面一筹莫展地瞧瞧这个人，看看那个人，可是还没等人回答，她又跳到别的问题上去了。我的小鸟儿，人类的全部文化史——这部历史按照最低的估计已经有两万余年了——都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决定另一部分人的命运”之上的，这事的根源在于物质生活条件之中。只有经过极端痛苦的进一步的发展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我们现在正是这一章痛苦的历史的目睹者，你问，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根本不是对整个生活和生活形式的概括。为什么世界上有青雀？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很高兴世界上有青雀，而且如果我突然听见从墙那边远远地传来一声短促的“戚戚勃”时，我就把它当作是一种甜蜜的慰藉。

你把我的“镇静”估计得过高了。可惜我内心的平衡和喜悦，只要有一片极其轻微的阴影笼罩着我，便化为乌有了，我那时就感到说不出的痛苦，我的特点只不过是沉默不语而已。宋尼契嘉，我那时真的一个字也说不出。譬如说在前几天我很欢畅、愉快，阳光使我很高兴，突然间星期一阵冰冷的风暴向我袭来，一下子把我爽朗欢愉的心情变成了最深沉的苦

[1]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小说家。

痛。如果我心灵的幸福真的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会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多只不过用迟钝的目光控诉我的绝望而已。当然我很少想讲话，我甚至几星期听不见我自己的声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毅然下了决心不让我的咪咪到这儿来的原因。这小动物已经过惯了愉快、热闹的生活，它喜欢我唱歌、笑、跟它在所有的房间里穿来穿去捉迷藏，它在这里会使我忧伤的。所以我就让它留在玛蒂尔德那里了。玛蒂尔德在最近几天要到我这儿来，我希望那时能重新振作起来。也许圣灵降临节对我也会成为一个“可爱的节日”。宋尼契嘉，你为了我要愉快、安心，一切都会转好的，相信我吧。请你代我衷心地向卡尔问候，我多次地拥抱你。

多谢你那张美丽的小画片。

你的 罗莎

1917年5月底

寄自佛龙克

宋儒莎，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我在哪儿给你写这封信吗？在花园里！我把一张小桌子搬到外边来，很隐蔽地坐在绿森森的灌木丛中。我的右边是丁香般芬芳的黄醋栗树，左边是一簇矮矮的女贞，在我顶上，一棵尖叶的枫树和一棵亭亭玉立的小栗树彼此交搭着它们宽大的绿油油的手掌，在我前面是一棵枝叶扶疏的肃穆而慈祥的白杨，它徐缓地摆动着它那白色的叶子，沙沙作响。淡淡的叶影和一圈圈闪闪的阳光在我正写字的信笺上舞动，从雨水润湿的树叶上时而有水珠滴在我的脸上和手上。监狱的教堂里人们正在做礼拜；低沉的木管风琴声隐约地传出来，给树木的飒飒声和小鸟的愉快的合唱声盖住了，这些小鸟今天都非常愉快；从远处传来杜鹃的啼声。这多美，我多么幸福，人们几乎感到有些仲夏的气息了——夏季的丰满茂盛和生命的沉醉；你知道瓦格纳^{〔1〕}的歌剧《歌唱的能手》里一幕群众场面吗？一大群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在拍手：仲夏的节日！仲夏的节日！忽然间大家跳起皮特尔梅尔华尔兹舞来了。在这种日子里人们很容易想起这种情调来。——我昨天是怎么样过的呀！我一定要把昨天的经历告诉你。上午我在浴室的窗子上发现一只大孔雀蝶。它大概在屋子里已经有好几天了，它在坚硬的玻璃上无力地飞扑着，已经奄奄一息了；它的双翼仅仅还有微弱的一丝生机。我一看见它，不禁焦急得战栗起来，赶紧重新穿上衣服，爬到窗上，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手

〔1〕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

里，——它一点也不挣扎，我想它恐怕已经死了。我把它放在身边的窗栏上，让它苏醒过来，那时它的生命的火焰跳动得还是很微弱，它依然静静地伏着；我于是把几朵盛开的鲜花放在它的触须前面，让它可以有一点东西吃；正在这时一只鹌鹑在窗前响亮而又神气地唱起歌来，唱得嘹亮极了；我不禁大声说：你听，这只小鸟歌唱得多愉快，那么你这小小的生命也必须恢复过来才是！我竟对这半死的孔雀蝶讲起话来，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我想：这话是白说的！可是并不，——半小时后这只小动物缓过来了，它先来回滑行了一下，终于缓缓地飞走了！拯救了这条小生命我多么高兴啊！这是我遇到的一件小事。

下午我当然又走到花园里去，我从早晨8点到12点（直到有人喊我去吃饭为止）又从3点到6点一直消磨在花园里。我等待着太阳，我觉得太阳在昨天似乎一定会，一定会出来的。但是它竟没有出来，我变得忧郁起来了。我在花园里踱来踱去，一阵微风吹来时，我发现一件奇妙的事：白杨树上完全成熟了的柔荑花绽裂开来，随风飘荡，它的包着种子的绒毛到处飞舞，像雪花似地飞满天空，把泥地和整个院子都铺满了；漫天飞舞的银白色的绒毛，这景象多么神奇！白杨比其他一切飘花絮的树开花开得晚，全靠繁密地散播种子，使自己传播到极远的地方，像野草似的，在墙缝里，石块间，到处都有它的幼苗在抽芽。

6点钟我又跟平常一样给关进去了，凄凉地坐在窗口，天气闷热，我的头昏沉沉地像压着一块什么重物。我仰望高处，蔚蓝色的晴空衬托着片片白云，白云下边，在令人目眩的高空中，几只燕子愉快地来回穿飞，好像要用它们的小剪刀似的尖翅膀划破长空。但是一会儿天暗了，万籁俱寂，突然一阵大雷雨袭来，夹着倾盆大雨和两声惊天动地的霹雳。大雷雨之后，

出现了一幅使我难忘的景色：雷雨一会儿就过去了，天上密布着一色灰云，晦暗、苍白、阴霾的暮色忽然降临到大地上，仿佛垂挂着一层严密的灰色纱幕，雨点轻柔而均匀地洒落在树叶上，紫红色的闪电一次又一次地划破铅灰色的天空，远处的隆隆雷声像汹涌澎湃的海涛余波，不断滚滚传来。在这阴森森的氛周中，蓦然间一只夜莺在我窗前的一株枫树上鸣啭起来！在雨中，在闪电中，在隆隆的雷声中，夜莺啼叫得像是一只清脆的银铃，它歌唱得如醉如痴，它要压倒雷声，唱亮昏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美的声音。它的歌声在那时而铅灰，时而艳紫的天空的烘托下像一道灿烂的银光在闪闪辉耀。这是那么神秘，那么美得不可思议，我不禁反复吟诵歌德那首诗的最后一行：“啊，但愿你在这里！……”

永远是你的 罗莎

1917年6月1日

寄自佛龙克

……兰花我本来就熟悉；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有一处极其漂亮的花房，里面有一部分摆满了兰花，我在那里遭了一场官司，坐了一年牢之后，曾经花了好多天工夫辛勤地对兰花作了一番研究。我觉得兰花在它的轻盈幽雅中，在它的美妙但不自然的造型中，有一点儿矫揉造作、颓伤的样子。我觉得兰花仿佛像是洛可可时代的浓妆盛饰的娇艳的贵夫人。我怀着内心的矛盾和某种不安的心情来欣赏兰花，因为我的本性是与一切颓伤、诡异不相容的。比方说，我对于朴素的蒲公英就要喜欢得多，蒲公英的颜色含着许多阳光，它完全跟我一样，向着阳光怀着感激的心情盛开着，但是只要被些许阴影遮盖住，它就羞怯怯地闭上了。

如今的黄昏和夜晚多美啊！昨天万物都披上了一层难以描摹的魔幻般的色彩。太阳早已下山，天空涂着一层亮晶晶的乳白色，上面有一条五色缤纷的彩带，仿佛是一块大调色板，画家辛勤地工作了一天之后，临休息前把他的画笔在上面信手一挥。空气中有一股雷雨前的郁闷，有一种微微使人心神不宁的紧张气氛；灌木丛纹丝不动地簇立着，夜莺也听不见，可是那不知疲倦的黑头的鸫鸟还是在枝头跳来跳去，尖声地叫个不停。万物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我凭窗伫立，也在等待——上帝知道我在等什么。6点被“禁闭”起来后，我在天地之间根本不再有什么可以等待的了……

1917年7月20日

寄自佛龙克

宋尼契嘉，我亲爱的，我在这儿待的日子要比我原来预料的拖得还长些，所以你还可以接到最后的一次从佛龙克寄出的问候。你怎么会想到我会不再写信给你了呢！在我的心头对你还是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有什么改变。我没有写信，是因为我知道你离开爱本豪逊后有千百种琐事要做，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暂时没有心情写信。

关于我要到布累斯劳去的事情恐怕你已经知道了。今天一清早我在这里就和我的小花园告别。天色晦暗，是一种要起风暴、落雨的天气，在天空中破絮似的云片驰骋着，可是我今天还是尽量地享受我照例的清晨散步。我跟沿墙的那条狭窄的石子路告别，在这条路上我来回地走了差不多有九个月之久，这条路上几乎每块石头，每株石缝间的小草我都熟悉。我喜欢铺路石子的各种颜色：近乎红色、蓝色的，翠绿的，铅灰的。尤其是在那漫长的冬天，叫人向往着一些富有生机的绿色的时候，我的渴望颜色的眼睛总设法在这些石块上寻觅一点彩色和鼓舞。现在夏天到了，在石头中间可以看到那么多稀奇而有趣的东西了！成群的野蜂和黄蜂在这儿做窝！它们在石头和石头之间钻了许多胡桃大的圆洞和很深的孔道，把泥土从里面扒到地面上来，叠成很好玩的一簇簇的小土堆。它们在这里面产卵、制蜡、酿野蜜；它们经常飞进飞出地忙个不停，为了不踩坏这些地下住宅，我在散步的时候必须很小心。在好几处地方蚂蚁筑的小径笔直地穿过路面，在这些小径上它们来往不停地走动，这些路径真得惊人，好像它们知道这条数学定理：两点

之间的直线是最短的连接线（对于这一点有些原始民族至今还是茫然无知的）。此外，墙边还茂密地从生着野草；一些小植物已经开过花了，一片片花絮散落下来，另外一些小植物还在继续不断地萌芽。整个一代的幼树成长起来了，这些幼树都是今年春天我亲眼看着它们从路旁、墙边的泥土中茁壮成长起来的；有一棵小槐树显然是从一个由老树上落下来的荚壳里抽出芽来的。更多的小白杨树也是五月以后才出世，可是现在已经茂密地缀满了半白半绿的叶子，在风雨飘摇之中，这些小树便婀娜地摆动着叶子，跟老树一模一样。我曾多少次走遍了这条小径，可是每次我内心的感受和思想是多么的不同！在隆冬季节，雪后初晴，我常常用自己的双脚给自己开辟出一条路径来，在这时候我的可爱的小麻雀来伴着我；我本来希望在秋天能与这只小麻雀重逢，然而当它再飞到窗前就食的旧地时，它将找不到我了。三月里，我们在寒冷中碰到几天解冻的天气，我的路变成了一条小河。我还记得，一阵薰风吹来时，水面上如何皱起片片涟漪，墙上的砖石如何清晰地倒映在晶莹的水里。最后五月来临了，墙边长出了第一朵紫罗兰，这就是我送给你的那朵紫罗兰。

每逢我像今天这样漫步、观察并且沉思的时候，歌德的一句诗老是在我的脑海里低回着：

梅林老人在霞光四射的坟墓里
年轻时候我曾在那儿会见过他……

其余的部分你当然是知道了。这首诗跟我的心情，跟我内心所思虑的当然毫无关系。只是那首诗的词句的音韵和奇异的魔力使我沉湎在恬静之中。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一首美丽的诗，尤其是歌德的，每值我心潮起伏或悲痛欲绝之际，会使我感受如此之深。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生理作用，仿佛像我下渴的嘴唇啜饮了琼浆玉液，使我肺腑清凉，身心都健壮起来。你在上次信里提到的《西东集》里的一首诗，我没有读过，请你把这首诗抄给我吧。还有一首诗我也很久以来就想要它，这就是我手边一本小歌德集子中缺少的那首《花的问候》。这一首四行至六行的短诗，是我从沃尔夫的歌曲里看来的，它真是美得难以描摹。尤其是最后一节，大概是这样：

我把它采下来
怀着炽烈、痛苦的思恋，
我把它按在心头，
啊，几乎有千百遍！

这首诗在音乐里听起来那么圣洁、温柔和娴静，像是默祷时的跪拜。但是全文我记不清了，我想要它。

昨晚9点钟左右，我还看到壮丽的一幕，我从沙发上发现，映在窗玻璃上的反照是玫瑰色的，这使我非常惊异，因为天空完全是灰色的。我跑到窗前，着了迷似地站在那里。在一色灰濛濛的天空中，东方涌现出一块巨大的、美丽得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摆脱一切，独自浮现在天际，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像是来自陌生的远方的一个问候。我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魔力的图画。有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然后生活才美妙，才有价值，不是吗？我用目光饱餐这幅光辉灿烂的图画，把这幅画的每一线玫瑰色的霞光都吞咽下去，直到我突然禁不住笑起自己来。天

哪，天空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佛龙克，用得着我来跟它们告别；不，它们会跟我走的，不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跟我同在。

不久我就会从布累斯劳告诉你我的情况，一有可能，你就到那儿来看我。请你代我向卡尔致以热烈的问候。

我多次地拥抱你。在我的第九个监狱里再见。

你的忠实的 罗莎

1917年8月2日

寄自布累斯劳

我亲爱的宋尼契嘉，我28日接到的你的来信是从外界传到这里来的第一个信息，你不难想象，这封信使我多么高兴。你对我这次迁徙肯定看得过于悲惨了，这当然是出自你对我的亲切关怀……我怀着必要的开朗、沉着的心情去承担命运的一次坎坷，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对于这儿的生活已习惯下来，今天我的书籍也从佛龙克运来了，不久我这里的两间牢房就会摆上书、装上画片和我一向随身携带的朴素的饰物，就会像在佛龙克一样看来非常舒适，像个住家的样子了。那时我将以加倍愉快的心情来从事工作。我在这里所缺少的当然是我在那边曾经有过的相对的行动自由，在那里，牢房整天开着，而在这里我却索性给关起来了；其次，这里没有清新的空气，没有花园，而最主要的，是没有鸟儿！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地依恋这些小伙伴。当然这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而且不久我就会忘掉，我过去的环境比这里好。这里的全部情况和巴尼姆街^{〔1〕}颇为相似，只是缺少了那个陆军医院的漂亮的绿色庭院，在那儿我每天总能够有一些动植物学方面的小发现。此处供我散步的铺着石子的大院子里却没有可以“发现”的。我散步的时候总把我的目光紧张地凝视着铺在地上的灰色石块，有意不看那些在庭院里忙着干活的囚犯。这些犯人穿着带有侮辱性的囚服，我看到她们总感到痛苦；她们中间有几个人的年龄、性

〔1〕 罗莎·卢森堡自1915年2月至1916年1月被囚禁在柏林巴尼姆街女监中

别、面貌特征，在打上这种极端凌辱人格的烙印之后，被抹煞无余了。可是由于一种痛楚的磁力，她们却老是吸引住我的目光。当然，不论什么地方总有这样一些个别的人物，就是监狱的囚服也不能减损她们的美貌，她们会引起一个画家的青睐。我在这儿的庭院里就已经发现一个年轻的女工，她那窈窕而俊俏的身段以及蒙着布帕的头部的端庄的侧影活像是米勒〔1〕笔下的形象；看她拖曳重物时的仪态如此美丽大方，真是一种享受，她的消瘦的面庞皮肤绷得紧紧的，白得像均匀地敷了一层粉，这使人想到悲剧中彼叶罗〔2〕的面具。但是惨痛的经验教训使我聪明起来，现在我总是设法回避这些虚有其表的人物。在巴尼姆街的时候，我也曾经发现一个确实具有高贵的外形和仪态的女犯，我猜想她的内心也必和她的外表相称。接着她到我那里谄媚来了，两天以后原形毕露，在这一副美丽的面具下面隐藏着那么多的愚蠢和卑鄙的思想，因而以后每当她走到我面前来时，我总是把我的目光避开去。那时候我曾想过，米洛的爱神之所以能永保最美的女人这一盛誉，历经千百年而不衰，归终只是因为她沉默不语的缘故。如果一开口，恐怕她的全部动人之处都将破坏了。

我对面是男犯监狱，这是一座阴暗的普通红砖房子。但一眼从墙头望过去，我可以看见某所公园绿色的树梢——一株巨大的黑杨树，风儿稍大一点，树叶簌簌的声音清晰可闻，还有一排颜色比较明亮的枞树，树上挂满了一束束的黄色荚子。窗子是朝西北开的，所以我有时候看到美丽的晚霞，你知道，仅仅这样一朵玫瑰色的云彩就能够使我心旷神怡，就能够弥补一切的

〔1〕米勒（1814~1875），法国画家，作品多以农民生活为题材。

〔2〕彼叶罗是法国古代哑剧中的主角，脸上涂着白粉。

损失。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晚上8点钟（实际上只有7点钟），太阳刚刚在男监屋脊后面沉落，由于屋顶玻璃天窗的映射，阳光还很耀眼，整个天空染成一片金黄色。我觉得很舒畅，我不由得——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独自低吟古诺^{〔1〕}的《圣母颂》（这支歌你也很熟悉的）。

多谢你抄来的歌德的诗篇。《有权者》这首诗确实很美，尽管这首诗本身本来是不会引起我注意的；有时候我们往往由于别人的启发才认识一样东西的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请你替我把《安纳克来昂^{〔2〕}之墓》抄下来。你对这首诗熟悉吗？当然我还是通过沃尔夫的音乐才真正懂得这首诗；这首诗在歌曲中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宛若看到面前矗立着一座希腊式的庙宇。

现在——我笔搁片刻，眺望一下天空——太阳已经更低地沉没在屋宇后面了，天上高高地飘浮着——天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无数默然汇在一起的小云朵，它们的边缘闪耀着银色的光辉，中间呈淡灰色，所有这些撕成片片的浮云都向北驰去。它们像含着淡淡的微笑，那样的无忧无虑地飞驰而去，我也禁不住跟着微笑起来。我久已如此，总是要和周围生活的韵律相一致。我们置身在这样的天宇下，怎能“闷闷不乐”或者心胸狭窄呢？你千万不要忘记，看看你四周的一切，这样你就会永远很“高兴”。

我有一点儿奇怪，卡尔要找一本专门关于鸟鸣的书。我总觉得，鸟的声音是跟鸟的体型和全部生活不可分的，使我感到兴趣的只是这一切的总和，并不是割裂开来的某一部分。你给他一本好的动物地理学的书吧，这样一本书一定会使他很兴奋的。希望你不久就来看我。你一得到允许，就发电报给我吧。

〔1〕 古诺（1818~1893），法国音乐家。

〔2〕 安纳克来昂（公元前563?~478），希腊抒情诗人。

我多次地拥抱你。

你的 罗莎

天哪，已经有 8 页了，这次就这样吧。谢谢你的书。

1917年11月中

我亲爱的宋尼契嘉，我希望不久就有机会把这封信寄给你，因之我不胜思念地拿起笔来。这已经是多么长久了，我不得不放弃跟你在纸上谈心这个可爱的习惯！我没能写信给你，我必须把允许我写的那寥寥几封信留给等待着我的书简的汉斯·D^[1]。现在这事情已成过去，我最后的两封信已经是写给作古的人了，其中一封已退了回来。实际情况至今我仍不明白。我们还是不去谈这些事情吧，这样的事我情愿自己一个人来解决，如果有人为了“爱惜”我，对一个坏消息准备了一番话，想用自己的感叹来“安慰”我，像N所作的那样，那就会难以言喻地刺伤我。我最亲密的朋友总还是这样不了解我，低估我，他们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迅速而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死了——这事使我很生气，算了，不谈了。

……逝去的岁月是多么可惜啊，本来在这些岁月里我们可以不顾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可怕的事情，在一起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刻。你知道，宋尼契嘉，这种情况拖延得愈长，每天发生的卑鄙、恐怖的事情愈逾越常规，我也变得愈加镇静，愈加坚强，像人们对待自然灾害、草原风暴、洪水、日蚀一样，不能用道德标准来衡量它们，只能把它们看做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物，看做一个研究和认识的对象。

这显然是客观上惟一可能的历史必由之路，一个人若是想使自己不迷失主要方向，那么就必须尊重历史。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正在跋涉的整个道德的泥潭，我们正生活于其中的疯人

[1] 汉斯·狄芬巴赫是罗莎·卢森堡的挚友，在大战中阵亡。——原编者注

院，可能突然之间，譬如说，在今明两天里，好像被魔杖一指，立刻化为一种与之相反的东西，变得惊人地伟大和英勇，而且——假如战争再持续几年的话——必然会发生这种变化……你读一读阿纳托尔·法朗士^{〔1〕}的《大神饥渴了》这本书吧。我把这部作品之所以看得这么伟大，主要是因为它以天才之见给全人类指出：看啊，从这种可怜的人物，这种平凡的琐事中，在适当的历史时机，会产生出巨大的事件和宏伟的壮举。人们在社会演进中也要像在个人生活中一样，必须镇静、豁达、面含微笑地去对待一切。我确信，在战后或者战争结束时一切都会步入正轨，但是很明显，在这以前，我们必须度过一段最险恶的人类苦难时期。

……

顺便告诉你，我的最后两句话唤醒我心中另一幅景象，这是一件真事，我想说给你听，因为我觉得它是这样富于诗意，这样感人至深。最近我在一本科学书中读到关于候鸟南徙的事，直到目前为止，这一直被人视作一种相当神秘的现象，因为在候鸟南徙时，据人观察，一向如死敌般相互残杀的品种各异的鸟类，竟会和衷共济地漂洋越海共同完成他们到南国去的伟大的航程。一到冬天，庞大无比的鸟群就飞向埃及去，它们像乌云似地在高空中飞翔，晴空为之黯然失色。在这庞杂的鸟群中，有肉食的鸷鸟、苍鹰、鹰隼、鸱枭，也有成千上万只小鸟鸣禽，如云雀、金莺、夜莺等，如果在别的场合，它们是要被那些鸷鸟吞噬的，如今却置身于鸷鸟群中，一点儿也不害怕。在旅途中，好像冥冥中有一位大神在操持一切，所有的飞禽都

〔1〕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尖锐的笔调揭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腐败，对工人阶级和社会革命怀着极大的同情。

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飞，到了尼罗河畔，它们精疲力竭半死不活地僵落在地上，然后依着类属、血缘重新簇聚在一起。不仅如此，有人还观察到，在飞越那“浩森的巨潭”时，巨禽的背上背负着许多小鸟，有人就看见过成群结队的鹤这样飞过去，小候鸟栖息在它们的背上兴致勃勃地唱个不停！这不是非常动人吗？……我最近在一部原是索然无味、杂乱无章的诗集中发现雨果·封·霍夫曼斯泰尔^[1]的一首诗^[2]。我本来不喜欢这位诗人，认为他矫揉造作、语言晦涩，简直不能了解。但是这首诗我却非常喜爱，而且在我心中形成一个极其富有诗意的印象。我随信把这首诗寄上，也许它会使你感到快乐。

我现在正埋头在地质学里面。你或许觉得地质学是一门枯燥的科学，但这是一个误会。我阅读地质学时感到无限的兴味和衷心的满足，它大大地扩大了我的精神视界，使我对大自然获得一个如此统一的、无所不包的概念，这是别的科学所不能做到的。在这方面，我想告诉你的事多得很，但是我们必须面谈才行，或者是在某一天上午，在绥登南的田野里漫步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个静静的月夜，你送我回家，我又送你回去的几度往返途中。你在读什么呢？莱辛^[3]的传奇念得如何了？你的事我什么都要知道！要是可以的话，你就通过这条途径立刻给我写信吧，否则至少也要通过官方的路写信给我，那时就别提到这一封信了。我私下已在计算再过几个星期能在这里看到你。这时候恐怕新年才过了不久，不是吗？

卡尔写信说什么？你什么时候能再看到他！替我多多向他

[1] 雨果·封·霍夫曼斯泰尔（1878~1929），奥地利诗人。

[2] 该诗指雨果·封·霍夫曼斯泰尔的《天明之前》。——原编者注

[3] 莱辛（1729~1781），德国诗人，思想家，文艺批评家，启蒙时代革命民主派的领袖。

问候。我拥抱你，紧紧地和你握手，我亲爱的、亲爱的宋尼契嘉！快点写信来，写多些。

你的 罗莎

1917年11月24日

寄自布累斯劳

……你认为我一开始就不赞成现代的诗人们，这是不对的。大约十五年前，我曾经兴高采烈地读过戴默尔^{〔1〕}的作品——不晓得是他的哪一本散文集子，我仿佛记得是写一个情妇临终时的情形——曾经使我入了迷。阿尔诺·霍尔茨^{〔2〕}的《幻异集》我直到如今还能背诵。约翰内斯·史拉夫^{〔3〕}的《春天》也曾一度使我神往。可是后来我就抛开这些人回到歌德和默利克那儿去了。霍夫曼斯泰尔我不了解，盖奥尔格^{〔4〕}的作品我也没读过。这是事实：这些作家对于形式以及诗的表达方法固然已掌握得很纯熟，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但同时却缺少一种伟大高尚的宇宙观，这就使我对他们望而却步。在我心灵中，我觉得这种形式和世界观的分割使得作品非常空洞，因此这种美丽的外形对我只是一种丑态而已。这些作家常常能制造非常优美的情调，但是光只有情调决不能产生真实的人。

宋尼契嘉，这里的夜晚真是美妙异常，就如同在春季里似的。4点钟我走到院子里去，天色已经朦朦胧胧，但见四周可憎的景象都已笼罩在神秘、黑暗的薄暮中，蔚蓝色的天空却在闪光，一轮皎洁的银月浮现在空中。每天这个时候，总有成千上百只乌鸦结成稀疏、宽阔的队伍，高高地横飞过庭院，向着

〔1〕 戴默尔（1823~1920），德国诗人，思想受尼采的影响极深。

〔2〕 阿尔诺·霍尔茨（1863~1929），德国作家。

〔3〕 约翰内斯·史拉夫（1862~？），德国诗人。

〔4〕 盖奥尔格（1868~1933），德国诗人。

田野，飞到它们栖息的树上去过夜。它们徐徐地鼓动羽翼，时而互相呼应吐出几声奇异的鸣叫——这种叫声跟它们白天猎逐食物时的那种贪婪的、刺耳的“呱呱”声迥然不同。现在它们的声音是沉抑、柔婉的，是一种低沉的喉音，我听着就好像乌鸦吐出一粒金属的小弹丸似的。许许多多乌鸦一个接着一个地从喉咙里吐出这种“咯咯”声时，我觉得仿佛它们在彼此戏掷许多金属小弹丸，这些小弹子在空中飞舞着，划出一条条的弧线。它们的确是在交谈“白天的经历，当日的见闻”。

每天黄昏，在它们依循旧习，飞过这条必经之路的时候，我觉得它们是这样严肃持重，我不由得对这些大鸟怀有几分敬意，我仰起头来目送它们，直到最后一只鸟从空中掠过。然后我在黑暗中徘徊，看那些犯人在院子里匆忙地工作，他们像一些模糊不清的影子在往来走动，我很高兴，我自己不为人所看见——独自一个人自由自在地作我的幻梦或者偷偷地和头顶上的鸦群打招呼，在这种像春天一样的薰风里我真舒畅极了。再过一会，犯人们拿着沉重的锅子（晚餐汤！），两人一排，前后总共十对，整队穿过庭院走进屋子里去；我跟在最后面；院子里，管理处的灯光逐渐熄灭了，我走进屋子，门被上了两道锁，加了两道门——一天算是完了。我的情绪很好，虽然汉斯的事使我很痛苦。我仿佛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他并没有死去。对我而言，他仍然活着，当我想到他时，我常常对他微笑。

宋尼契嘉，再谈吧。我为你即将来看我而高兴。赶快再给我写信，暂时可以通过官方寄来——现在也可以这样做——，以后再相机行事。

我拥抱你。

你的 罗莎

1917年12月中 寄自布累斯劳

……卡尔在鲁考监狱里现在已经有了一年了。这个月里我常常想到这件事：整整一年之前，你在佛龙克我那儿，还有你送我的那株美丽的圣诞树……今年我在这里让人给我弄了一棵来，可是他们给我拿来的却是一棵枝残叶秃的东西——简直无法同去年的相比。我不知道该怎样把我买的那八盏小灯挂上去。这已是我在牢狱中度过的第三个圣诞节了，但是你切莫为这事悲伤。我现在非常平静、愉快，一如往日。昨天我躺在床上，长久不能入睡——如今我不到1点钟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但是10点钟就必须上床——于是我在黑暗中冥想种种事情。昨天我想：这真奇怪，为什么我会毫无缘由地一直生活在陶然自得的境界里。譬如说，我现在在一间黑暗的牢房里，正躺在像石头一样硬的褥垫上，屋中一种墓地里惯有的那种死寂笼罩着我，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坟墓里一样，天花板上映着一小块从窗子里透进来的灯光，这盏灯在监狱里边通宵点燃着。偶尔可以听见远处一列疾驰而过的火车发出的低沉的隆隆声，或者近在窗下，听见狱卒的干咳声，他穿着笨重的靴子慢吞吞地挪动几步，使他僵直的腿稍稍活动一下。沙砾在他脚下那么绝望地吱吱作响，好像人生的凄凉和无望全部随着这声音传播到潮湿、昏暗的黑夜里去了。我一个人静静地躺着，身子像是被冬天的黑暗、烦闷和束缚人的黑布层层缠裹住——但是我的心却由于一种无从捉摸的、奇怪的内在的喜悦而怦怦地跳动着，就好像我在灿烂的阳光中走过一片绚烂的草地一样。在黑暗里我向生活微笑，仿佛我已得知一个魔法的秘密，这秘密能制裁一

切邪恶和令人沮丧的谎言，并能把这一切完全化为光明和幸福。同时我自己也在寻找这种喜悦的根源，我什么也寻不着，只好再自嘲了一通。我相信，这秘密不是什么别的，它正是生活本身：漆黑的夜幕美丽、柔软得像天鹅绒，只要你能正确地看待它。在狱卒沉重、迟缓的步履下，潮湿的沙砾所发出的吱吱声也像在低唱一首短小悦耳的生活之歌，只要你懂得如何去听。在此时此刻，我就想到你，真想把这把有魔法的钥匙告诉你，让你也能够时时刻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把握住生活的美妙和奇趣，让你也能够生活在陶然自得的境界里，犹如行经一片五色缤纷的草地。我并不是想以苦行主义和虚幻的欢乐来哄骗你。我给予你的一切现实的能感觉到的快乐。此外我还想把我内心无限的欢畅给予你，让你可以披着一件绣满灿烂的繁星的外衣通过人生，这件外衣会保护你，使你不受一切细屑繁琐的杂事和一切烦恼的侵扰，这样我对你也就可以放心了。

你曾在施台克立兹公园采集了一束美丽的黑色和玫瑰紫色的莓子。长黑莓子的，看起来不是接骨木，就是女贞，后者可能性也许更大些——接骨木结的莓子像累累的葡萄串沉甸甸地挂在巨大的、羽状的扇叶中间，这种树无疑你是知道的；女贞上的莓子串则是长圆锥形的，长得笔直，很可爱，叶子是狭长、葱绿色的。那种玫瑰紫色、藏在小叶子底下的莓子可能是矮山楂子树上结的；它们虽然原本是红色，但是如今季节迟暮，它们已经熟透，有些霉烂了。因此它们常带着玫瑰紫色；叶子很像桃金娘的，纤小，顶端尖尖的，叶面深绿色，细腻得像皮革，叶背有些粗糙。

宋儒莎，你知道不知道普拉腾^{〔1〕}著的《不祥的叉子》？你能把它寄来或者带来吗？卡尔有一次曾提及，他在家里念过这本书。盖奥尔格的诗很美？现在我知道过去我们在田野里散步时你常低吟的那句诗“在微红的谷粒的窸窣声里！……”的出处了。你要是有机会，能不能把那首新《阿玛狄斯》抄给我，我非常喜欢这首诗——这当然要感谢雨果·沃尔夫谱的曲——但是我这儿没有。你还继续念莱辛的传奇吗？我又拿起郎格^{〔2〕}的唯物论史来读了，这本书永远能使我精神奋发，头脑清醒。我真希望你也能读一遍。

啊，宋尼契嘉，我这里遇上一件极端痛心的事：在我散步的院子里，常常从军队里赶来一些马车，车上满载着布袋或者旧军服、内衣什么的，衣服上时常有斑斑的血迹……，这些东西都要在这里卸下来，分配到牢房里，由犯人补缀好，再装车运回军队里去。最近来了这样一辆车，驾车的不是马而是水牛。这是我第一次在近跟前看见这种牲口。这种水牛比我们这里的牛更有气力，体格更健壮，它们的头是扁平的，角是平着往后弯的，头盖骨却和我们这里的绵羊相似，一抹乌黑，长着两只柔顺的大眼睛。这种牛产自罗马尼亚，是战利品……据赶车的兵上说，捕捉这种野兽很费力，但是更困难的是使这种过惯了自由生活的动物就范，利用它们驾车载重。要让它们懂得“嘿——吁”的吆喝声，先得把它们鞭打得头破血流……在布累斯劳一地，据说这种牛就有上百头；此外它们业已享受惯了罗马尼亚草原肥美的牧草，到这里却只能得到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草料。这些牲畜被毫无怜惜地役使着，用来拖曳各种各样的货车，

〔1〕 普拉腾（1796～1835），德国诗人。

〔2〕 郎格（1828～1875），德国哲学史家。

这样很快地就死掉了。——几天前赶来了这么一辆满载布袋的货车，车上的东西叠得这样高，以致这些水牛在进门时拉不过门槛来。赶车的兵士是一个残忍的家伙，开始用鞭杆粗大的一头没头没脑地鞭挞起它们来，他打得那么凶，连女管监的也愤愤地责问他，他对这些畜牲究竟有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对我们这些人谁又怜悯过！”那个士兵狞笑一声回答说，一面更凶狠地鞭打着……这些动物最后还是拖动了，走过这个难关，但是其中有一只血已经殷殷渗出……宋尼契嘉，俗语说，牛皮是厚而且坚韧的，如今也居然给打破了。卸货的时候，这些动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已经筋疲力尽了，其中那只淌血的，茫然朝前望着，它乌黑的嘴脸和柔顺的黑眼睛里流露出的一副神情就好像是一个眼泪汪汪的孩子一样。那简直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的神情，这孩子被痛责了一顿，却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不知道如何才逃得脱这种痛楚和横暴……我站在它前面，那牲口望着我，我的眼泪不觉簌簌地落下来——这也是它的眼泪啊，就是一个人为他最亲爱的兄弟而悲痛，也不会比我无能为力地目睹这种默默的受难更为痛心了。那罗马尼亚的广阔肥美的绿色草原已经失落在远方，再也回不去了！那里阳光普照，微风轻拂，和这里多么不同啊！那里鸟儿清脆地鸣啭，牧人富有旋律的呼啸声也和这里多么不同啊！可是在这里——这个陌生的恐怖的城市，这阴郁的厩舍，这些搀杂着烂稻草的、令人作呕的腐朽的草料，这些陌生的、可怕的人们，以及这毒打，这从新的创伤涔涔流出的鲜血……

啊，我的可怜的水牛啊，我的可怜的、亲爱的兄弟，我们两个在这里都是那样软弱无力、迟钝麻木，在痛苦、无力和满怀憧憬这点上我们是相同的。——犯人们在车子周围忙得团团转，把沉重的包裹卸下来，拖进屋子去，这时候那个士兵却两手插在裤袋里，迈着大步在院子里蹒跚，笑嘻嘻地嘴里轻声吹着一支流行

歌曲。这一场威武的战争就这样在我眼前消逝了……

快点给我写信，我拥抱你，宋尼契嘉。

你的 罗莎

宋儒莎，最亲爱的，不管一切如何，你仍然要镇静和愉快。生活就是这样，我们也就必须这样对待生活，要勇敢、无畏、含着笑容地——不管一切如何。

1918年1月14日

寄自布累斯劳

我最亲爱的宋尼契嘉，我多久没给你写信了！我相信已经有几个月之久了。直到今天我仍然一点也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到了柏林，但是我却希望，这儿行字能在你过生日的时候及时到达你的手里。我本来请玛蒂尔德替我送给你一束兰花，可是这个可怜人现在却正躺在病院里，多半不能办理我托付她的事了。但是你知道，在思想上我的心都是完全跟你在一起的，我要在你生日那天用花朵完全把你包围起来——用淡紫色的兰花，用洁白的鸢尾花，用芳香扑鼻的风信子，用一切我能得到的花。至少明年这一天我也许可以亲自把花带给你，跟你一起在植物园里，在田野里散步。这该是一件多么令人神往的事啊！今天我们这里是零度。但空气里却有这样一种温和而清新的春天的气息，头顶上厚厚的乳白色的浮云之间闪耀着深远的蓝天，麻雀也叫得这么欢跃，使人以为现在也许已是三月末了。我早已为春天即将来临而欢乐了，春天是人生一世惟一不会厌倦的东西，非但如此，随着岁月的增长，人们就更懂得珍重它，爱惜它。你知道吗，宋尼契嘉，在生物界春天现在已经开始了，这就是说，用不着等待日历上的春天到来，正初月生命就开始苏醒了。因为根据日历，冬季才刚莅临，我们就处在离天文上的近日点最近的地方，这对于一切生命起了一种极其神秘的作用，甚至于也影响到我们这个尚在冰雪包围中的北半球；在一月初，动物界和植物界就好像被魔杖从梦中唤醒了似的。草木开始吐芽，许多动物也开始繁殖起来。最近我读了弗朗塞的著作，根据他的调查，著名人物的科学和文学杰作都是在正、二两月间问世的。这样说来，圣诞节后的一至两点

在人类生活中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时机，它会使全部生命力重新高涨起来。你啊，宋尼契嘉，你也是一支在冰天雪地里吐芽的早开的花朵，因之它一生凄凄凉凉，感到不能和生活适应，需要放在暖房里得到细心的培植。

你在圣诞节寄来的《罗亭》^{〔1〕}给予我莫大的喜悦，要是玛蒂尔德不告诉我你在法兰克福，我本来会立即向你表示谢意。特别引起我共鸣的是罗亭的崇拜自然的思想，他对田野中每一棵小草的尊敬。他坦率、纯真、洋溢着内心的温暖和智慧，一定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物；他使我立刻想起饶勒斯^{〔2〕}。你喜欢不喜欢我的布鲁德库林斯？也许你早已读过这本书了吧？这本书很使我感动，尤其是书中风景的描绘饶有诗意。布鲁德库林斯跟特·古士德^{〔3〕}一样，他显然觉得，法兰德土地上的日出和日落都要比别的地方绚烂得多。我发现所有的法兰德人都偏爱他们的乡土，他们并不把它当作一块美丽的土地，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容光焕发的年轻的新娘来描写。就是在那阴郁、悲剧性的结尾，我也发现一种和《梯尔·乌兰斯匹格尔》中的壮丽的画面相似的色彩，那座公共建筑物遭到破坏即是一例。不知道你发觉这一点没有，这些书在色彩上令人想到伦勃朗^{〔4〕}的绘画：整个画面上的糅杂着古金色的深暗，对一切细节的令人赞叹不已的现实主义描写，以及这全部的总和使人有如入仙境之感。

〔1〕 屠格涅夫的一部小说。

〔2〕 饶勒斯（1859~1914），法国政治家，和平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为沙文主义者所暗杀。

〔3〕 特·古士德（1827~1879），比利时作家，他所著的《梯尔·乌兰斯匹格尔》是一部描写法兰德人民反抗西班牙皇帝压迫的英勇斗争的散文史诗。

〔4〕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

在《柏林日报》上我读到弗烈得利希博物馆陈列出提香〔1〕的一幅巨画的消息。你去参观过了吗？我承认我本来不喜欢提香，我觉得他过于工整、冷峻，也太讲究技巧——要是你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亵渎的话，请你原谅我，我却别无他法，只能依从我自己的直觉。尽管如此，假如现在我能走进弗烈得利希博物馆，鉴赏一下这位新到的客人，我该是多么幸福啊。你也看见那曾经引起轩然巨波的考夫曼〔2〕的遗稿了吧？

现在我阅读的是六七十年代几篇比较老的研究莎士比亚的论文，那个时期德国正热衷于莎士比亚问题的辩论。下列几本书——克莱恩的意大利戏剧史、沙克的西班牙戏剧文学史、格尔文努斯和乌尔利希论莎士比亚的著作——你能不能替我从王家图书馆或者国立图书馆借来？你自己对莎士比亚有什么看法？赶快给我写信！我拥抱你并热烈地和你握手。祝你依然安宁、快乐。最亲爱的宋尼契嘉，再见！

你要什么时候来呢？

宋儒莎，你能否替我作一件事：替我把风信子花送给玛蒂尔德·J。你到我这里来时，我会把花交给你的。

你的 罗莎

〔1〕 提香（1490~1576），威尼斯画家。

〔2〕 大概是指德国画家考夫曼（1808~1889），他的作品多以风景和农民的生活为题材。

1918年3月24日

寄自布累斯劳

我亲爱的米尼契嘉，我有多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可是这期间我又是多么想念你啊！当前的“情况”甚至有时把我写信的兴致也夺去了……要是现在我们能在一起，在田野里漫步，天南地北地闲谈，这真是一桩快事，可惜眼前却毫无希望可言。在把我的顽劣和怙恶不悛痛加谴责了一顿后，我的申诉书被批驳回来了，我的另一份要求至少短期开释的申请书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恐怕我只有等待着咱们战胜全世界那一天了。

宋儒莎，如果我有较长一段时间得不到你的消息，我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你像风中的一片落叶，孤独、烦闷、苦恼、绝望地飘来荡去，这使我非常痛苦。你看，现在又是春天了，白昼已经变得这么明朗，这么长，田野里一定已经有无数东西可以看看可以听了！你多到外面去走走吧，现在天空中驰骋着飘忽不定的浮云，它显得多么奇妙，多么变幻无穷，那依然赤裸着的含有石灰质的土地，在这变化无常的异彩照耀下，一定也美丽得出奇。你替我把这一切尽兴地看个够吧……这在生活中惟一不会使人感到厌倦的东西，它永远具有始终如一的新颖的魅力，永远对人忠实。你也无论如何要为我到植物园去走一趟，好详细地向我作一番报道。因为今年春天发生了一件稀奇的事。鸟儿都比往常早来了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夜莺早在3月10号就到了这里，鸫鸟一向是四月底才来的，这次在15号就叫开了，甚至那五月以前决不会来的被称作“圣灵降临节鸟”的金莺儿，一星期以来，也天天在日出前黎明的时候就鸣啾个不停！我从远处倾听那些鸟雀在精神病院的园子里喧鸣。我不知道这种早归的现象该怎样解释，

我想知道，这种情形是否别处也有，或者只是由于这里的精神病院产生的影响所致。所以你要到植物园去一次，宋尼契嘉，但是你要选一个晴朗的日子，中午时候去，仔细谛听一切，然后把情况告诉我。这对我说来，除了坎布莱^{〔1〕}战役的结果外，可算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事情，真是一桩心事。

你送给我的画片多么美啊！关于伦勃朗用不着再说什么了。提香的一幅，马比那个骑马的人更使我神往；在一个动物身上能够如此逼真地表达出威武和高贵的气魄，我过去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最美、最美的要算是巴尔托罗缪·达·委内齐亚的妇人像了（附带说一句，这个画家我过去一无所知）。色彩是多么使人陶醉，画笔是多么精湛，神情是多么富于神秘的魅力！不知为什么，她使我想到了《蒙娜·丽莎》^{〔2〕}。你送我的这些画片给我的牢房带来了喜悦和光明。

汉斯的书你当然必须保存好。他的书都没到我们手中，真叫我心痛。与任何人相比，我都更情愿把这些书送给你。《莎士比亚》你收到得是否算及时？卡尔写了些什么，你什么时候再去看他？你要为我千百遍地问候他，并且替我对他说：不管一切如何，事情总会好转的。祝你健康愉快。为了春天你要高兴些；明年春天我们将在一起过了。我拥抱你，最亲爱的。祝你复活节快乐！请你也多多地问候孩子们！

你的 罗莎

〔1〕坎布莱，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和要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8年3月和10月）曾在这里发生激战。

〔2〕《蒙娜·丽莎》是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名画。

1918年5月2日

寄自布累斯劳

……我读过了《老实人》^{〔1〕}和《乌菲尔特伯爵夫人》，我对这两本书都很感兴趣。《老实人》的版本很珍贵，所以我舍不得把它剪裁开，就那样把它读完了，因为这本书只有一面没有裁开，所以读起来也很方便。把人类一切不道德的行为恶意地加以综合起来，如果在战前，这给我的印象只是像一幅讽刺画而已，可是今天我觉得这种综合完全是现实主义的了……最后我要告诉你，“但是应该栽培我们的花园啊”这一句成语的出处到底给我找到了。这句话我自己也偶尔引用。《乌菲尔特伯爵夫人》是一部很风趣的文化方面的文献，是格里美尔豪生^{〔2〕}的补充……你在做什么？你没有享受这明媚的春天吗？

永远是你的 罗莎

〔1〕《老实人》，是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一本小说。

〔2〕格里美尔豪生（1620~1676），德国小说家，著有描写30年战争的小说。

1918年5月12日

寄自布累斯劳

宋尼契嘉，你的短筒给我这么大的快乐，使我立刻就想给你写回信。你看，逛一次植物园给予你多少乐趣，多少鼓舞！你为什么不去享受一下呢？！而且我向你保证，如果你把你的观感像这次这样热情洋溢、色彩绚丽地描述给我看的话，我也会分享到一点快乐。是的，我认识这种长在盛开的针枞上的奇妙的、色泽如红宝石的柔荑花。这种小花和大多数其他柔荑花一样美丽得出奇，当花苞怒放的时候，每每使观赏的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红色的柔荑花是雌花，日后从花里面结出沉甸甸的大球果，扭转过来，向下倒垂着。针枞树上不显目的淡黄色的雄柔荑花，就生在雌花旁边，它们散播金色的花粉。——我不知道什么是“佩托利亚”，你说它是金合欢的一种。你的意思是说，它和人们叫做“金合欢”的一样也生着羽状的小叶子和蝴蝶形花朵？你也许知道，这种俗称为金合欢的树其实并不是金合欢，而是刺槐，含羞树^{〔1〕}才是真正的金合欢；这种植物确实是开着硫磺色的小花，有一股沁人的芳香，但是我想象不出来，它会生长在柏林野外，因为这是一种热带植物。在科西嘉岛上的阿亚乔地方，十二月间，在城里的广场上我看见过许多盛开着艳丽的花朵的含羞树，这是些参天大树……可惜在这里我只能从我的窗口远眺树木的绿色，我可以从墙上面看到树木的梢头；我常常试着根据它们的外形和色泽去猜测树种，而且似乎大部分都猜对了。前

〔1〕原文为“含羞草”，系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但在热带，也有长得像树一般高大的

不久有人拾来一根断枝，它的奇特的外形引起了普遍的惊异，大家都探询这是什么。这是一枝榆树枝。你还记得在我的绥登南街上，这种树我曾指给你看过，树上正结满了一撮撮淡紫带绿的芳香的小果实，那时候也是在五月里，你被这奇幻的景象完全吸引住了，这里的人几十年来住在遍栽榆树的街上，但是都没有留心过，一株开花的榆树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动物的情况一般说来也是这样感觉迟钝。从根本上来讲大多数城里人才真正是粗鲁的野人。

相反地，我的内心却和生物自然界息息相关——与人类则并非如此——这几乎成为一种病态了，也许这与我的神经质有关系。檐下有一对带冠的云雀孵出了一只小雏儿——其余三只大概都死了。这一只已经蛮会走了。你也许注意过，云雀跑的样子多么滑稽，步子轻捷、琐屑，像麻雀那样跳跳蹦蹦，这只小鸟也能飞得很好了，但是自己却还不会寻觅足够的食物，如昆虫，小毛虫等等——特别是在这种冷天里。所以每天黄昏它必定出现在下面我窗前的院子里，吱吱地大叫着，声音又尖又厉又凄凉，两只老云雀随着也立刻都飞了出来，低声地以既害怕又忧虑的“啁啁”声回答着，然后往来疾飞，拼命地到处寻找，以冀在黄昏暮色和凛冽严寒中觅到些食物。一会儿它们飞到悲鸣的小鸟身边，把觅得的东西衔到小鸟的嘴里。这一幕现在每晚8点半钟左右总要重演一次，每逢窗下开始发出那尖声的悲鸣，我一看到那一对小父母的焦灼和忧虑，我的心就完全痉挛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又爱莫能助，因为这种带冠云雀非常胆怯，要是谁扔给它们面包，便把它们惊走了。不像鸽子和麻雀，这些鸟已经熟得像小狗似地在我后边追逐。我徒然对自己说，这是可笑的，我毫无理由为世界上一切饥饿的云雀负疚，毫无理由为一切被鞭挞的水牛——例如这里每天拖着包裹走到庭院里来的水牛——痛哭流涕。

然而这种慰藉对我毫无裨益，每当我听见或看见这些时，我就仿佛害了病似的。那欧椋鸟总是成天地在附近某处激动地啼叫个不停，一直叫得使人心烦了，可是如果它接连几日啞了，那么我的心又不安起来了，担心它会遭到什么不测，我焦灼地等待它重新唱起它那无聊的调子，好让我知道，它仍然平安无事。这样，我在自己的斗室中通过千丝万缕直接而微妙的细丝和外界千百种大大小小的生物联系起来。这一切在我内心激起不安啊，痛苦啊，自我谴责啊种种的反响……你也是属于这些飞禽走兽之列，为了它们，我的内心在远处颤抖着。我感觉到，你因为还没尝味到“生活”，时光便一去不返而苦痛着。但是你要有耐心和勇气！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还要经历惊天动地的事呢。现在我们首先觉察出来，整个旧世界如何在沉沦下去，每天有一块地方沉陷，每天有新的崩裂，每天有新的天翻地覆……最可笑的是，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觉察到，还以为他们是在坚实的土地上行走……宋尼契嘉，你也许有《吉尔·布拉斯》和《瘸腿魔鬼》^{〔1〕}这两本书，或许你能替我找到它们？我一点也不熟悉勒萨日，早就想读他的作品了。你知道他吗？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话，我就买一本廉价本。

我热烈地拥抱你。

你的 罗莎

赶快写信告诉我卡尔的情形。也许范菲尔特有斯梯恩·史特鲁威尔^{〔2〕}的《亚麻地》这本书，这是殷泽尔出版社的又一本法兰德人的作品，据说这本书很不错。

〔1〕《吉尔·布拉斯》和《瘸腿魔鬼》都是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小说。

〔2〕斯梯恩·史特鲁威尔（1871～？），比利时作家。

1918年10月18日

寄自布累斯劳

最亲爱的宋妮契嘉，我前天给你写了一封信。我给首相的电报直到今天仍没有得到答复，也许还要耽搁若干天。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从我现在的心情看，我决不能在监视下来会见朋友了。几年来，一切我都耐心地忍受过来了，在别的情况之下，也许我还能够以同样的耐心再忍受几年。但是在发生了这个大转变后，我的心灵上也有了裂痕。在别人监视下谈话，不能畅所欲言，我对此厌恶已极，我宁愿放弃一切会客的权利，直到我们成为自由人时再重见。

这种情形不会太长了。既然狄脱曼和库尔特·艾思纳都已释放，他们也不会把我囚禁多久了。卡尔同样不久也会得到自由。那么，还是让我们等着在柏林会面吧。

千百遍地祝福你，直至再见。

永远是你的 罗莎

(以上邱崇仁 傅 韦 译)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

[日期不详] 星期日

亲爱的雅可布小姐：

非常非常感谢您寄来的漂亮花束，并且还是我心爱的花：可爱的银莲花！您让我觉得的确十分愉快。可是，《北德总汇报》说得也有道理：德意志民族目前如此浪费，好像祖国没有处于危难之中似的。如果这个民族再不节俭一点，我们如何能够“容忍”？……

您关于咪咪^[2]的想法让我觉得，即使是心地善良的人，特别是就这一想法而言，也无法理解世间事物的无助和脆弱。把咪咪装进篮子，带它走一天，然后再送走！就像对待家猫族类的一只平常的动物那样！而您这位善良的人知道，咪咪就是一株小含羞草，是猫族的一位过分敏感的小公主。我这位挑剔的母亲曾想用暴力把它逐出家门，那时它便因激动而痉挛，在我的臂弯中变得僵硬，小眼睛呆滞无神。我只好又把它抱回家，过了几个小时它才回过神来。说真的，您无法理解当时我的母爱之心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因此，我们就让咪咪留在家里吧。一想到即将面临的、然而无法避免的转移监狱，——想到3月31日前必须把它

[1] 玛蒂尔德·雅可布（1873—1942），出身于犹太人家庭，卢森堡的私人秘书，在卢森堡入狱期间，她作为挚友照料卢森堡在狱中的日常生活之需，负责卢森堡与外界的书信联系。1942年夏天被捕并遇害。

[2] 卢森堡养的一只猫。——译者注

送到格吕内瓦尔德的寓所……我就感到害怕。而如果您一个人来，我会感到非常高兴。可是我明天和后天要接受两次“不能推迟的”事务性的拜会，因此我希望您星期三——如果您想把自己的时间像不义之财那样打发掉的话——来我这里。

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 罗莎·卢森堡

星期二（1915年）

我亲爱的雅可布小姐：

您在星期日寄来的信是我从外界收到的第一个书面问候，它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刚才又收到了您的第二封信，对此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请您无需为我担心：我的健康状况和“处境”很好，甚至乘“绿篷车”转狱也没有引起我的恐慌：我在华沙就已经经历过同样的遭遇。啊，两次转狱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我每次都产生了许多愉快的想法。当然，其中也有不同之处：俄国宪兵是把我当作“政治犯”有礼貌地护送的，而柏林警察则声称我是什么人这“无所谓”，他们把我塞进了车厢，而里面已经有9个“同行”了。您看，这些终归是些琐事，不要忘记，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冷静地和乐观地而对生活。我在此也在必要的程度上采取这种态度。此外，为了不让您过高估计我的英雄气概，我得愧咎地承认，当我一天两次被勒令脱去衣服搜身的时候，我是竭尽全力才忍住泪水的。当然，我当时对自己的懦弱感到气愤，现在也是如此。另外，在狱中的第一天晚上，让我吃惊的不是牢房，也不是突然同生活世界分离，而是——您猜！——这样一种事实，即我得在没有睡衣、无法梳头的情况下坐牢。就此而言，有一句经典名言说得不错：您可以回想一下《玛丽亚·斯图亚特》的第一幕，当玛丽亚的首饰被夺走时，她的乳母肯尼迪夫人说道：“生活中失去点缀”比遭遇巨大的灾难更让人伤心（您可以去查阅一下，席勒写的比我在这里说的更优美一些）。看，我胡想到哪

里去了？愿上帝惩罚英格兰，原谅我把自已同英格兰女王^{〔1〕}相比！顺便说一句，我现在已经有了睡衣、梳子和肥皂之类的“生活小点缀”——多亏卡尔^{〔2〕}天使般的善良和耐心——，生活也就有序了。我很高兴自己能够起得很早（5点40分），专心等候太阳女士效仿我的榜样，这样我可以因早起而做点什么。最美不过的是在院子里散步时可以看见鸟，听到鸟叫：一大群顽皮的麻雀有时吱吱喳喳不休，我奇怪居然没有哪个严肃的警察到它们“当中”去管管它们；还有几只乌鸫，那只黄嘴的雄乌鸫叫起来同我在聚德恩德见到的那些乌鸫完全不一样。它胡乱啼叫，让人不由地不乐。或许到三四月间（它）才会知道羞愧并且规规矩矩地啼叫。〔又及，我现在自然会想到我的住处附近那些可怜的麻雀，它们再也无法在阳台上找到我为它们摆放的食物，大概正在诧异地站在栏杆上。（看到这里您肯定会掉几滴眼泪，那种情景是感人的！）……〕

亲爱的雅可布小姐，我向您表示自己对世间人物所能奉献的最高敬意：我要把我的咪咪托付给您！只是您还要从我的律师那里等候确切的消息。到那时您要乘车把它抱在臂弯里（而不是把它装进小篮子或口袋!!!）接走，最好带上我的女管家（我是说只在乘车时，而不是在整个生活中），让她帮助您，照管咪咪的所有七件事（它的小床、细砂、碗碟、垫子以及——千万记住！——一个红色的长毛靠垫，它对此已经习惯了）。所有这些东西在车里应该能装得下。当然，如前所说，我们还要等几天。

您现在做什么？读书多吗？我希望如此。除了吃饭、散步

〔1〕 玛丽亚·斯图亚特实为苏格兰女王。——译者注

〔2〕 可能是指卡尔·李卜克内西。——译者注

和打扫牢房以外，我实际上整天都在读书。最好的时间是一天的
的高峰时刻：每天晚上7点到9点我可以在灯光下安安静静地
为自己的思想工作两小时。

遗憾的是，Z. 夫人^[1]如此激动，让我为她感到不安。

在此多次地问候您，祝您健康和愉快。

您的 罗莎·卢森堡

显然，我衷心期望见到您，但是，我们还要等待时日。我
只获准接待少量的客人，目前已经安排我的律师来这里了，此
外，到我的住处取走您的花瓶。

[1] 指克拉拉·蔡特金。——编者注

星期五 1915年4月9日

我亲爱的雅可布小姐！

但愿您在星期日能及时看到这封信，这是我的愿望。从内心里非常感谢您的那些来信，我读了许多遍，觉得十分愉快。今天收到第二封信（寄自耶拿，我不熟悉您在那里所住的旅馆），其中附有精美的附件。看到咪咪的照片我非常高兴，每当我看到它，总是忍不住要笑。每当人们“试图接近”它时，它便露出照片上显示的这种野性。这种情形我自己也经常遇到，因此，只要看一眼照片，我就几乎听到它发出不满的呼噜声了。照片照得极其出色，而对那位如此关心咪咪的年轻医生我也从一开始就产生了极大的好感。特别感谢您寄来的花，您完全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多么大的善事。它意味着我又可以收集花卉了，而收集花卉则是我的爱好和工作之余最好的休息之道。我不知道是否向您展示过我的植物标本簿，从1913年起，我在那些标本簿里登记了250种植物，并且所有的植物都保存得很好。跟其他图集一样，所有的植物标本簿都在这里。现在我可以在“巴尔尼姆大街”的题下专门新设一册。由于您寄来的所有小花恰好是我所没有的，因此就把它们收进来了。我特别喜欢金星花（随第一封信寄来的黄色小花）和白头翁花，因为在柏林一带见不到这些花。采自冯·施泰因夫人故居的两片长春藤叶子也被收进标本簿，此前我还的确没有收集到长春藤花（它的拉丁文名称是 *Hederahelix*）。它的来源地更让我喜欢。除了獐耳细辛以外，其他的花都已精心压平，这对收集标本来说是重要的。

知道您游览了许多地方，我为您感到高兴。对我来说，参

观博物馆或类似的地方则是一种惩罚，到那种地方马上就会得偏头痛，感到累得要命。对我来说，惟一的休养之道是在阳光下散步或躺在草地上享受阳光，那时我会观察细小的甲虫，或者盯着云彩发呆。如果我们将来一起出游的话，这倒是个问题，不过，我一点也不会妨碍您去参观自己感兴趣的一切，当然您也要谅解我。您当然会做到两者兼顾，这将是最好的办法。

我在“18世纪法国展”上看见过汉密尔顿夫人的一幅画像。我不记得画家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画法刚健有力，色调强烈，画像呈现出一种让我惊颤的粗犷而带有挑衅性的美。我倒是喜欢那种柔和一些的妇女类型。在这次展览上，我还清晰地看到勒布伦所画的拉瓦利埃女公爵的一幅画像，浅灰色的色调同透明的脸部、蓝色的眼睛和浅色的衣服搭配得恰到好处。我看到此画时几乎驻足不前，它体现了革命前法国的全部精美和讲究，这是一种带有一点腐朽味道的真正的贵族文化。

您正在阅读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这很好。您读过齐美尔曼的著作吗？实际上，恩格斯所论述的不是历史，而完全是一种农民战争的批判哲学。齐美尔曼的著作则对史实有详尽的叙述。如果让我到维腾堡地区那些毫无生气的村庄走一走，穿过那些散发着臭气的粪堆，目睹家鹅伸长脖子叫着不愿给汽车让道，听到满怀希望的乡村少年跟在后面叫骂，我将无法想象，正是在这些村庄曾经响起世界历史的隆隆脚步声，曾经有戏剧性的人物在那里活动过。我现在阅读德国的地理史作为消遣。您能想象得到，有人在阿尔冈纪时期——即任何有机物的迹象出现之前的地球史上最古老的时期，亦即无数万年以前——的粘土片中，即从出自瑞典的这种粘土片中，发现了一场瞬时暴雨的雨点所留下的痕迹？！我无法向您诉说这种来自远古时期的遥远的问候对我产生了多大的吸引力。我读任何读

物都不会像读地理学这样全神贯注。

此外再谈谈施泰因夫人，尽管我非常看重来自她的故居的长春藤叶，但我还是要说，（愿上帝惩罚我）她是一个蠢女人。当歌德与她断绝关系时，她的举止就像一个胆怯的洗衣妇。我坚持认为，一个女人的性格如何，不是表现在爱情开始的时候，而是表现在爱情结束的时候。在歌德所有的情人当中，我也只喜欢文雅、谦逊的玛丽安娜·冯·维勒默尔，即《西东集》里的“苏莱卡”。——您正在作必要的休养，这让我非常高兴！我的状况很好。

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 罗莎·卢森堡

替我向迪伦弗特小姐表示衷心的问候；我很高兴知道了她的地址。

日戳：1915年10月2日

我亲爱的雅可布小姐：

我刚刚获悉，人们最后忘记了把我的小包裹交付给您派来的那位友好的信使。我本来想请您把我的鞋拿去修理一下。您下次派信使来时，请让他把包裹带走好吗（另外，我还需要药水，而不是油）？您的花摆在我的桌子上，美艳无比。金鱼草的所有花蕾正在绽开，紫菀和紫罗兰也在开放。正如您照料我们的咪咪一样，我也同样悉心地照料这些花卉。此外，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柳絮，我过去不知道柳树放到温室里在这个季节里也会开花。您送来的柳树在野战医院的院子里已经长得差不多跟我一样高了（当然这并不说明什么）。——您又听到有关卡尔的什么情况吗？他给什么人写过信吗？请您尽快告诉我！我还向埃娃女士打听过消息，昨天给她写过信。我渴望从您那里得到好消息。

衷心拥抱您和咪咪！

您的 罗莎

1915年10月5日

我亲爱的雅可布小姐：

您让我突然间变得如此富有和快乐，我得赶快表示感谢。对我来说，您真的就像童话中那张“会开饭的小桌子”。^{〔1〕}几乎还没等我提出要求得到好消息的新愿望，您的信就已经送到了；由于漂亮的花束给我的牢房带来那么多的色彩和香气，并且还由于想到您就在附近，我现在都变得有些傻乎乎了。哪怕能见上您短短的一面也好啊！……首先谈最重要的事情：花。您是否也知道您送来的花是多么珍贵？不管怎样，这样说吧：带有棕色丝绒般花蕊的较小的黄花是旋复花（土木香），类似于向日葵的大黄花是菊芋（洋姜），还有一种极小的黄花长着许多粒状物，香气袭人，它们是加拿大一枝黄（*Solidago Virgaurea*），所有这三种花都属于菊科；那些带有漂亮的浅红色小叶子的自然是花楸，枝条深红的是洋李或“土耳其樱桃”，属于蔷薇科的观赏植物；最后一种花枝上带有细叶，叶子下边呈灰色，上边呈深绿色，那是柳叶状的沙棘。紫菀的颜色非常漂亮——整束花简直就是一幅秋天风景画。听说我们的“老先生”^{〔2〕}已经好转，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就如同那些大树，一点小病就使他像小孩子一样倒下，但很快又会站起来。我昨天收到卡尔的一封信，虽然他又像从前那样写得很热情，可是，他各方面的情况显然还很不好，当然，至少可以看出他正在好转；然而，这封信是他在25日写的，从那以后他

〔1〕 典故出自格林童话。——译者注

〔2〕 指弗兰茨·梅林。——译者注

的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他收到了我的明信片，我很快还会告诉他一些情况。克拉拉也给我写了一封短信。

您今天的信为何写得如此低调和哀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抑或是我的耳朵欺骗了我？希望您告诉我您所经历的一切，不管是好是坏，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不知情了。格罗兹^[1]怎么样？他又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还是缺乏活力？您应当教教他如何保持热情。——同往常一样，我还准备好了几项请求，（1）一只杯子！最好还是原来那样的样式：有棕榈叶图案。原来那只漂亮的杯子已经毁掉了；（2）杜冈-巴兰诺夫斯基的第二本书（《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它就摆在我的大书架上。当然，这些东西等到下一次再寄来就可以了。

我非常赞成您提出的在我家阳台上招待罗伯逊夫人的主意，并希望您在那里过得愉快。

还有一个小事困扰着我。您是否确实用我的钱付账，并把所有这些繁琐的开支都记录下来？倘若您能让我安心的话，我会感激不尽。

多谢您寄来的樱桃，它们真是极品，承蒙您的好意，我今天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衷心地拥抱您和咪咪！

您的 罗莎

我刚发现我的内裙上换了一条崭新的腰带。您真是一位魔术师，什么东西到了您的手中都会变得年轻！可是，您何必在这些琐事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呢？这让我觉得十分不安。

[1] 指利奥·约基希斯。——译者注

1915年11月5~6日

我亲爱的雅可布小姐：

我只想写封短信告诉您，承蒙您的好意，此间的食物已经很充足了，因此，您在星期二只需带一些沙丁鱼来就够了。您想给我寄诗集来，这个主意非常好。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读诗了（歌德的作品除外，那是我须臾不可缺少的）。我过去对荷尔德林的诗几乎一无所知（唉，惭愧！）。我觉得他的诗有点儿过于张扬，例如，只要把他的诗歌《写给希望》与默里克同一题目的诗作个比较，就会发现后者的诗显得更加恬静和富有诗意！此外，雨果·沃尔夫还把默里克的那首诗谱成一支优美的歌曲。到星期二的时候，我会把荷尔德林的诗歌和里卡尔达·胡赫的《费德里戈·康法罗尼里伯爵的一生》一同交给您，您对后者大概还不了解。我读过胡赫几乎所有的作品，觉得《费德里戈·康法罗尼里伯爵的一生》是最好的。亲爱的朋友，您想把“大个子迈尔”^{〔1〕}从聚德恩德搬到这里来吗？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可是，我该把这套22卷四开本的书放到哪里呢？不，您先把它们放在那里，我这里的书籍已经够用了。——我对克拉夫特迈尔·冯·沃尔佐根的书有所了解，但我很想再读一遍，如果再找到它，请顺便把它带来。——我十分熟悉十大功劳和冬青，两片叶子来自完全不同的植物，我会在下一封信中把它寄给您。

感谢K.夫人^{〔2〕}的来信。克拉拉也给我写了信。

〔1〕指《迈尔大百科辞典》。——译者注

〔2〕指路易莎·考茨基。——编者注

衷心地拥抱您和咪咪！

您的 罗莎

Das Solarum Lycopersicum, 译成德语就是：蕃茄，那是一个出色的想法，我沉醉于其间。

1915年11月10~11日

我亲爱的雅可布小姐：

您真是太好了！又寄来了一袋子东西，而您上个星期送来的食物我还没有吃完呢！我的糖足够我以后在这里开个小食品店了（我每天只吃一块半方糖，而您却整公斤整公斤地给我寄来）。多谢您寄来好看的紫菀和里卡尔达^{〔1〕}的书。我当然马上就认真地阅读了她的诗集，但是，我得承认：当众渲染女性的色情一直是令我难堪的事。正如我们的奥艾尔^{〔2〕}曾经说过的那样：“不能怎样做就怎样说。”无论如何，我还是喜欢她的散文。不过，您把她的书送给我，这毕竟让我高兴。——如果您下次见到贝蒂娜，请替我向她表示衷心的问候。——关于老先生来访的事我是这样想的：从内心讲，我很愿意见到他和小埃娃，但11月的探视机会已答应给玛蒂尔德·乌尔姆了，因此，老先生大概要到12月才能有机会来。此外，我还很想再见到R.夫人。或许她在12月份可以找机会替您来这里一趟。——另外，我今天还给老先生写了一张明信片。

衷心地拥抱您和咪咪！

您的 罗莎

能给我寄来我的N. Z.^{〔3〕}索引吗？

天哪，请您不要叫我“亲爱的好人”。您这是跟克拉拉学的，我可承受不了这个昵称。

还有一个请求：再给我带些酒来！我快变成真正的酒鬼了！

〔1〕指女诗人里卡尔达·胡赫（1864~1947）的书。——编者注

〔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他支持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但告诫他不要公开说出来。——译者注

〔3〕《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译者注

1916年11月7日

亲爱的玛蒂尔德！

请寄来我的：

蓝色套装和裤子、

可洗的外衣、和服、

防寒的淡红色内裙、

3条带宽边的床单、

3条不带边的床单、

3个枕套（都要带字母图案的）、4条手巾、浴巾、

内衣裤（不要羊毛袜）、

6条餐巾（要新的）、6条厨房用的手巾（要新的）、

床前小地毯、脚凳、鞋拔子、

女佣床上的绿色缎面床罩、带花的白色小被子、闹钟（调好！）、棕色空手提袋、带有艺术家图案的文件夹（米开朗基罗、特纳、费尔巴哈）、旅行毛毯和皮带、

我的印章。

至于书籍，请寄来：

巴尼姆大街的所有书籍，但荷马的著作、《愤怒之子》、格里尔帕尔策的著作（我已经不需要它们）。

此外，还需要：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共产党宣言》（新购）、

法文版《圣经》、
三位仲马^[1]的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
拉萨尔的著作、
《德国地理》、
阿尔伯特·朗格：《唯物主义史》、
《民族学》、
存于我家图书室的马库利·克莱弗爵士的著作《德意志》
(万有文库版)、
吉卜林的第二本丛林小说（陶赫尼茨版）。
致以问候！

罗莎·卢森堡

何时寄书请等我的消息。

[1] 疑指大仲马、小仲马和让·巴蒂斯特·杜马。——编者注

1917年2月

寄出日期：2月7日

我亲爱的玛蒂尔德！

我已经感到内疚：玛尔塔今天来过这里，而我那时恰好情绪不好，不过下一次我会注意控制自己。您提出把我生日那天的探视机会让给露易莎，这绝对不行。我坚持我开出的证明。自两个星期以来我就在等待您的这次来访，并且迄今为止我每到生日那天总是接见您，而您现在却想用我的“本钱”表现自己的大度！我刚给露易莎写了信，请她五月份来。好了，请让我来决定谁该来这里，什么时候来。

今天我因侮辱警察罪受到判决：入狱十天并交罚款。请您敦促魏因贝格博士的事务所采取必要的行动。此项判决是柏林中区陪审法庭第136处于1月25日作出的，文档号码是136DII56516。在判决理由中所写的无非是对我已承认的事实的确认。

您也因为我的手指受伤感到不安吗？其实那并不严重：我只是在关柜子抽屉时用劲大了一些，忘记了小手指还在里边，等拔出来时它已经挤坏了。这就是当时的经过。

唉，玛蒂尔德，什么时候我才能再同您和咪咪一起坐在聚德恩德的家里，给您们朗读歌德的诗呢？不过，我现在就想给您背诵一首今天夜里又一次记起的诗（不知道为什么）。这首诗是那位可爱的瑞士人康拉德·菲迪南·迈耶写的，他还写过关于于尔格·耶纳奇的长诗。您现在坐好，把咪咪抱进怀里，像往常听我给您读诗的时候那样，做出一副小羊般可爱的表情静静聆听。好了，安静：

胡滕的忏悔

我此时在自己的墓地上行走，
嗨，胡滕，你想忏悔吗？
这是基督教习惯。我把手放到胸口，
生为人者谁无罪恶感？
我后悔对自己的职责明白得太晚，
我后悔内心的火焰跳动得太弱，
我后悔投入战斗时
没有攻击更锐利，行为更果断，
我后悔只有一次被逐，
我后悔经常被人的畏惧攫住，
我后悔那些没有伤口的日子，
我后悔那些不穿铠甲的时光，
我后悔，我带着悔恨忏悔，
从前没有更加果敢。

您要把这句结束语刻在我的墓碑上……您把这句话当真了吗，玛尔德？哎，您对此置之一笑好了。无论在我的墓碑上还是在我的生活中都不会有傲慢自大的空话。我的墓碑上只能写两个音节“Zwi - zwi”。这两个音节就是大山雀的叫声，我能够模仿得很像，一听到我的声音，它们马上就会飞来。您想想看，这两个音节往常像闪亮的钢针一样直率而平淡，而从最近几天以来则带有一点极小的颤音，一点细微的胸腔音。雅可布小姐，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是即将到来的春天轻轻吹来的第一缕气息——尽管备受冰雪和孤独之苦，但我们（大山雀

和我)觉得——春天来了!如果我因为烦躁活不到那一天,不要忘记在我的墓碑上刻“Zwi - zwi”……除此以外什么都不要写。

十分渴望拥抱您和咪咪!

您的 罗莎

1917年4月19日

佛龙克

我亲爱的玛蒂尔德：

昨天收到了您的短信和包裹清单，并在此期间给您写了收条。可是，您好像没有及时收到我的邮件，这大概是您那里的邮局缺少人手的缘故：您在昨天的来信中还说只收到我的一张明信片，而我在昨天就已经寄出第三张了。因此，我今天早晨把一本小书作为礼物以急件方式给您寄去，这样您在星期天肯定就能收到它。您向我索要《世界这个小舞台》，奇怪的是我无法找到它，或许是我已经把它送给玛尔塔^[1]了。不过，您肯定会喜欢老希波克拉底的书《单调的生活方式和滋润的生活方式》。我昨天睡觉时还在读它，书中许多地方至少让我忍不住发笑。——您经常给我带来一些生命的音讯，这让我十分感激！您这样做使我觉得温暖和愉快。请您放心，我的境况很好。——关于购鞋证的事情并不像您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我必须先写一份书面申请，然后等待结果。也就是说，先要发誓证明自己需要鞋。这件事情可能会很有趣，我倒要看看是市长先生到我这里来让我发誓呢，还是让我到他那里去。或许玛尔塔个人出面会使事情变得简单。请您尽快写信告诉我她打算什么时候来。——今天有几只鸟飞临窗外，成为我的不速之客，它们是三只红尾鸫鸟和一只黄雀。复活节过后，甚至夜莺也勇敢地飞来了，尽管天气仍然寒冷并有冰冻。我昨天才在我的小院子里听到它们的叫声，当然只是短短的一会儿。我从我的书中

[1] 指玛尔塔·罗森鲍姆。——译者注

发现了韦森东克的五首歌，均为瓦格纳谱曲，我想尽快把它们送给玛尔塔，让她的丈夫去评价。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们的曲子很宝贵，那些歌词则平庸乏味。——我收到了宋娅的明信片，她的问候如同一个受伤的心灵在呼喊，像她那样长期沮丧下去是可怕的，一定要有人在她身边给予照料才行。我自然会经常给她写信，给她些许鼓励。——玛蒂尔德，獐耳细辛的小蓝叶子已经凋落，但三片绿叶（它们看似花萼）和雄穗还在，它们是一种如此本色的和漂亮的小花束！没有人会猜出那是一种什么小花。您的杜鹃花真是奇特：它能不断开花，而且没有花朵凋谢！桂香竹已经完全绽放，呈现出一种华贵的金褐色。

千百次地拥抱您和咪咪！

您的 罗莎

衷心地问候您的母亲和格雷特欣小姐。

我的“婴儿食品”很快就要告罄了。

1917年4月24日

佛龙克

我最亲爱的玛蒂尔德：

我刚刚收到您昨天写的信，就立即遵从您的愿望复信。向莱比锡上级法院提出上诉要立即着手进行。我最终（因为您的缘故）同意延请德鲁克博士，尽管我对他并不了解，现在您要（或者让库尔特^{〔1〕}）尽快同他联系，无论如何要告诉他怎样做才能使我免遭羞辱。此外，还要让他不要忘记在辩护时把我的拘留期折算成刑期。您现在经常念叨让我尽快回家，对这项要求我无法满足：对我的新拘留令刚刚下达，又是三个月的预防性监禁。您大概真的以为能否离开这里取决于我的良好愿望！……

我根本无法诉说我多么盼望玛尔塔的来访，如何迫不及待地等待星期五这一天的来到。可以说这种渴望心情几乎又一次让我生病。您暂时无需给我寄什么东西。我在这里让人弄到了奶糖，还请汉斯^{〔2〕}从波兹南寄来一些，也有书籍可供阅读。目前我也没有心思去读纯文学作品，更没有心思去读诗。咪咪为什么又变得像您说的那个样子？肯定是它的胃不正常。您还给它吃点炼乳吗？我又省下了鸡蛋让玛尔塔带去，这样咪咪就又能吃到鸡蛋了。我感到内疚的是没有带些肉去，可是现在提供的肉食很少，而且我也担心带过去时就不太新鲜了。——只

〔1〕 库尔特·罗森费尔德（1877~1943），柏林的律师，曾为卢森堡辩护。——译者注

〔2〕 汉斯·狄芬巴赫，卢森堡的医生和朋友。——译者注

要我拿到这里的表格，办购鞋证倒不会费多大周折。

最亲爱的，马上给我写一封好信，我的内心非常痛苦……
拥抱您和咪咪，最衷心地问候您的母亲和妹妹！

您的 罗莎

1917年4月29日

我最亲爱的玛蒂尔德：

非常感谢您所做的一切！您和咪咪如此铺张浪费，又给我寄来了许多东西，这简直是罪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亲吻你们两个，因为你们真是太好了。您终于收到了老希波克拉底的书，这我就放心了。您说得对：我寄许多急件无非是出于烦躁。只要我在这里遭受渴望之苦，我就肯定会要求想法快点与外界接触，就会去打电话，拍电报，寄急件等。以后我会改正这一点。——您根本没有提到我寄给咪咪的小肉块是否还新鲜，那肯定意味着您收到时它已经变坏了！可是您要记住，我一直希望了解真相。

我会如实填写购鞋证，并把它给您寄回去。请您原谅，我是如此需要帮助，您在这方面对我毕竟有足够的了解。库尔特认为我应当申请把人狱十天的处罚折算成拘禁期，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可是我不知道现在还能否这样做（我一直没有收到开始服刑的命令），要向谁提出申请？请您让他把这些写清楚，再寄给我签字。

随信附上授予德鲁克博士诉讼代理权的证明。迄今为止，我没有直接从杜塞尔多夫收到任何东西。我根本不明白他们为何总是不理睬我。

有关“反批判”^{〔1〕}的事情我不清楚。您曾经说过，您打

〔1〕“反批判”：指罗莎·卢森堡主要针对奥托·鲍威尔对她在1913年发表的文章《资本积累论》的批判所做的反驳。参见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或者追随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出了什么、一个反批判》，莱比锡，1921年版。

印了三份样稿，一份交给了汉斯，一份给了老先生，还有第三份想委托玛尔塔寄给我，让我尽快修改？如果手边找不到第三份样稿，请立即给汉斯写信，让他把他那份样稿以挂号急件寄给我。这样我就可以马上动手修改，然后寄给印刷者和 H.

您不必因为逮捕令悲痛不已。我确实对此无能为力。我的头脑中现在考虑的全是关于俄国的想法。或许我会决定就此写一篇文章，但是这（能否）做得到？一个大问题！

今天就写这些。千百次地拥抱您和咪咪，盼望着圣灵降临节的到来。啊，时间还长着呢！

您的 罗莎

1917年5月3日

佛龙克

我亲爱的，亲爱的玛蒂尔德：

今天早晨看到您的短信，我感到十分伤感，因为您还从未给我写过如此短的信，从信中我明显地感觉到您又是那样忙碌和疲惫不堪！直到下午又收到您寄来的装有堇菜花的包裹后，我才觉得有所安慰。非常感谢您寄来的包裹，为了让您放心，我便立即给您写了这封信。

我现在经常到室外的阳光下坐坐，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新鲜事。这种时候您那把漂亮的藤条椅就很有用，它容易搬动，坐在上面也很舒适。今天飞来了一群蝴蝶和大黄蜂，但它们在院子里没有发现一朵花。——见此情形，我便把玛尔塔送来的那盆盛开的雪叶莲搬出来。您真该来看看，那群小动物是如何扑向花朵，尽情采食花蕊的。此外，我今天还看见一只平生第一次见到的漂亮的小鸟：黄鹌。由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不动，它一直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因此我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它。这就是我在佛龙克所见识的一切！真的，玛蒂尔德，我在这里获得大量的新见识，并立即去查对了有关材料，觉得自己真是变得充实了。

非常感谢您寄来的样稿。然而，在我着手修改之前，我想请您通过莱娜到老先生那里了解一下，他是否做过这件事情，做得怎么样了。我确实不能把样稿直接寄给出版者，而是要寄给梅林，可是，如果让他做很大一部分徒劳无功的工作，他会很伤心的。

露易莎今天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来信，说她可能在10号到15号之间到这里来。而我想尽快知道她来这里的确切日期，以

免成天在此烦躁不安地等待。请您打电话问她一下（或者写信到法兰克福市立医院，她在那里跟她的儿子在一起），让她再告诉我。露易莎自己肯定不会这样做。

我今天给您寄去番姆弗尔脱的三本书，请您去还给他，并表示感谢（这些书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我根本不想读它们），还寄去要送给玛尔塔夫妇的一个小笔记本。自从听了您最近的说教以后，我不敢再寄快件，因此很想知道您什么时候收到包裹。现在我渴望您再写一封好信寄来，那会让我感到十分愉快。然而，我更渴望见到您本人，希望到圣灵降临节时又能见到您身着我所喜欢的轻便纱衣来这里。难道您不能把那些让衣服显得难看的黑色边饰去掉，换成暗绿色和暗蓝色的镶饰吗？

您听，最亲爱的！宋娅竟如此气愤地抱怨莱娜，说她忽略了“卡尔的家事”和“卡尔的孩子，”说莱娜在宋娅不在的时候本应该照料这些事情的。据说卡尔也生气了。如果莱娜太忙，难道不能请老先生去做这些事情吗？然而，无论如何得让可怜的神经质的宋娅不要烦躁！……

十分渴望千百次地拥抱您和咪咪！

您的 罗莎

谢谢您寄来的信纸，可我觉得那些纸有点软，希望要些至少带有硬纹的纸。无法买到这种纸了吗？我指的是我现在写信用的一种。

1917年6月2日

佛龙克

我亲爱的玛蒂尔德：

联想到您最近那次探视时我们所谈的话，您大概能够从附件中弄清我的意思。那么，请寄来我的出生证，或者更确切地说，寄来那张代表我的出生证的滑稽的小纸片。我已经不记得那里是否还有经过公证的上述证书的德文翻译件。如果没有，就请您寄来俄文原件（挂号）。我可以自己翻译，波兹南的先生们只好凑合着看了。

您看，我写给您信一直还没有寄出。人们还要我去索要逮捕令！这个我办不到；您现在拿到了副本，想必它够用了。

您让人转送给我的那些漂亮的鲜花大概采自水边或沼泽：它们是马蹄莲，在德语中称为沼地蛇草。我好像还未曾见过这种植物在野生状态下的样子（它们通常被当做观赏植物来培植）。它们属于海芋属植物，并且跟该属所有植物一样是有毒的。

我完全忘了问您，我那篇不幸的修改稿送到《柏林事务》后的命运怎么样了？修改稿现在已被及时交走了吗？修改理由是怎样写的？

今天我吃惊地发现自己的纱衣完全坏了，可是又根本没有别的薄衣服，因此想请您让人新做一件蓝色的（式样与我常穿的衣服相同，只是裙子的下边要宽一些，领子用蓝色丝绒并且配同样颜色的扣子）。我马上寄去旧的灰色衣服当尺寸，因为新衣服的腰部太肥了。不过裙子要缩短6公分（后面缩短8公分）。

我寄给您的明信片写于“5分钟探视”之前。但愿这次不幸的结局没有让您在离开时过于失望。今天早晨我又听见布谷鸟在

近处的叫声，但它很快就飞到远处去了。

拥抱您和咪咪！

您的 罗莎

衷心问候您的母亲和格雷特欣小姐。

1917年8月6日

布累斯劳

我最亲爱的玛蒂尔德：

今天，即星期一我收到您（写于1日和3日）的两封信。为了让您明白，我要说明一下：此前我于1日已经收到您的一张明信片，2日又收到您的一张明信片和玛尔塔的全部信件。我之所以没有写信，是为了等您确认已经收到我的第一封信。现在既然已经得到您的确认，我就可以写信了。——从佛龙克寄来的箱子已于2日运到这里，我当然立即就着手把里面的东西腾出来，到现在已经完全“安置”好了。拥有两个房间乍看上去合乎人情，只是我担心这件事情实际做不到，我还是要被关进一间牢房里。如果可以自由出入，拥有两个房间当然不错，可是我总是受到严格管制，要想到另一个房间去的话，必须先敲门叫来女看守。且不说经常指使人这一点不合我的心愿，实际上这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女看守有好多事情要做，往往根本不在值班岗位。此外，她在1点至4点之间根本就不来这里（午休时间），晚上6点以后又下班走了，而我获准可以到10点才关灯。因此，一切事情都很麻烦。我或者被迫同我的床铺（本来我可在工作间歇息时或觉得不舒服时上去躺一会儿的）、煮咖啡壶和药品分开，或者被迫同写字桌和晚间的灯光分开。这里的情形与佛龙克和巴尼姆监狱真是不同，那里只有到夜间才把受到保护性拘留的人关起来，白天则允许他们在院子里自由活动。如前所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怀疑是否有必要住两间牢房，可是我的确也觉得很难把所有的东西都安顿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当然，我很快就会明白该怎么办了，请您不要为此担心。做事要怎样可行就怎样做。——

自星期五以来，我感到胃部疼痛，不过现在觉得病情正在好转。我想胃痛是由于我还吃不惯的本地面包引起的。除此之外，那位妇女为我提供的饭菜是很好的。——获准为我看病的专科医生欧普勒博士写信来说，他正在外出旅行，到八月底回来。在此期间由狱医先生们负责。可是他们一时对我的病情几乎无能为力，因为所有的药物对我的胃都不起作用。不过，您也不要为此担心，毕竟我觉得好些了。

您在信中写到宋娅希望尽快来看我，但没说她是否获得批准。这才是关键所在，在获得许可之前任何喜悦都无从谈起。

您仍然没有写对地址。请您记住：不必用两个信封和付双份邮资，只要写上布累斯劳要塞司令部转罗莎·卢森堡博士就行了。这就足够了。我听说，有人往这里寄明信片时，在地址栏既写上司令部又写上监狱。明信片最终当然能送到，时间却给耽误了。（我还没有取回那张明信片。）然而，要塞司令部的人却非常清楚我住在何处。因此，请您告诉宋娅、玛尔塔等人如何写地址。从梅林那里我收到一封友好的书信，我将很快回复他。

我觉得您对咪咪变得冷淡了！……这让我感到伤感。请相信我，它肯定能感受这一点，并且接着会变得无精打采、毫无生气。请您跟过去一样关心关心它！

感谢您寄来的绿被子。没有那两幅图片我也住得不错，最好不要寄太多的东西来！我倒是需要随便什么样的轻松的消遣性读物。把书装在信封里或用纸条捆好寄来就行了。玛蒂尔德·乌尔姆曾很快给我寄来一本，但是它不适合我阅读，——还有，我的一瓶胶水已经用完了，请您让宋娅给我带来一瓶。

千百次地拥抱您和咪咪！

您的 罗莎

向您可爱的母亲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1917年8月11日

我最亲爱的玛蒂尔德：

我简直无法告诉您，我收到您8日寄来的信后感到多么震惊。

我的咪咪几个月以来染上重病，而我直到现在才知道消息，并且还是偶然知道的，可以说是因为我问到它您才不得不说的！您居然能够这样做，对我隐瞒了我如此关心的事情！我要问您，这哪里谈得上对我的尊重，而不像对待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物件”那样对待我？这跟未经我的同意就提出呈文简直如出一辙！军警出于戒严的原因把我投入监狱关押数年之久，而我的朋友们则还对我实行个人性的戒严，把我当作未成年人对待，以我的名义行事，或者对我隐瞒重要消息。

您曾经是惟一让我觉得可以相信的人，可现在我也无法再相信您了，我感到十分孤独。我觉得是这样。

现在请您直接告诉我咪咪病了。我觉得这就够了！不必写怎么病的及病情如何。可是，关于咪咪“年龄”的这种说法！一年前我被捕的时候，它还年轻、漂亮、健康，状况很好；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您还打算把它带到佛龙克来，说明那时它的状况也很好。可忽然间您对我说起它的“年龄”！现在，我请您尽快并详细地说明：（1）咪咪从什么时候起生病的，（2）症状是什么，（3）是否可以看出它的病情正在加剧，从何时看出的，（4）它是否吃东西，吃什么，（5）请哪些兽医给它看过病。——我没有汉斯的提包的钥匙，根据我的回忆，可能就藏在或放在提包里。您把咪咪的情况写得多详细，我就把自己的健康状况写得多详细。

拥抱您，最衷心地问候您的母亲！

您的 罗莎

我一点信纸都没有了。再次感谢您寄来的绿被子。我的信封也快用完了。

1917年8月17日

我最亲爱的玛蒂尔德：

顺便告诉您一件急事：佛龙克搬运商的明信片！据说箱子还没有送到，萨赫特勒夫人的地址不太合适，那里大概成天都无人在家，这样的话如何把箱子送到呢？……

您从聚德恩德寄来的友好的书信我已收到，知道您要再次去乡间旅行我非常高兴。我现在惦记着咪咪的病情，急于知道它的近况。那么，您打算去梅克伦堡旅行的事怎么样了，我没有听您再说起这件事。婚礼（我记得）是在8月4日举行的？听说您会有一星期的真正假期，我曾经感到高兴，可现在看来您并没有去成。

您送来的紫露草（绿色攀援植物）在我这里生长得很好，也很漂亮，成为整个牢房的装饰。我可也在精心养护它啊！每天都给它浇水和喷水。矮小的秋海棠也长得很好。只有须苞石竹尽管有许多花苞，但根本不像要开放的样子。我想，放在房间里的须苞石竹不会长好。

您在聚德恩德打开从佛龙克送去的箱子时，请查看一下，我是否会把司汤达《红与黑》的第2卷也装进去了。我这里可惜只找到第1卷，另一卷恐怕丢失了。

今天收到宋娅的一封信。她的情绪又变得（或者一直）很低沉。我很希望她来这里！她的来访会让我精神焕发，而且我想对她也会有益。只是这件事情耽搁了太久，很快八月份就会过去，我仍然没有见到来访者！

如果方便的话，请给我寄来一个扁长形的浅底杯子，我好把它放在写字桌上装钢笔和铅笔用，我这里现在没有合适的东

西。再寄些水杨酸漱口水来。此外，请把特纳的著作再给我寄来，我指的并不是分为6大卷的版本，而是一卷本。

多次拥抱您和咪咪！

您的 罗莎

我亲爱的，非常尊敬的雅可布夫人：^{〔1〕}

收到您的短信，知道您曾去过我的住处，我感到无比高兴。我内心里是多么想在那里亲自招待您啊！不过，一旦我从这里出去（这还要等些时日），我决不会错过请您和格雷特欣小姐去我那里做客的荣幸。我想吻您的双手，一是因为您是玛蒂尔德的母亲，二是因为您对我的咪咪那样好，三是因为您本人。

您的忠诚的和心怀感激的

罗莎·卢森堡

〔1〕这是附给玛蒂尔德母亲的信。——译者注

1917年8月24日
布累斯劳

我最亲爱的玛蒂尔德：

今天，即星期五早晨我一下子收到了：（1）您寄来的装有白色衣服、纸张、茶和《阿那克里翁》的包裹，（2）一包书，（3）您写于20日和22日的两封信，（4）宋娅的一封信。我的内心在这以前充满渴望甚至不安，因为自星期六，即18日以来我根本没有收到您的音讯。难道您不能像我这样做：什么时候寄出一封信或者什么时候收到一封信都在台历上记下来？这样做便十分容易弄清是否有信丢失。

关于咪咪我现在不想再说什么了，让我们不要再提这令人悲伤的一节吧。可是您会再次看到，坦诚布公地说出全部真相，要比出于错误的谨慎让某人受到数月之久的蒙蔽还要慈悲一些，您到佛龙克来看我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机会很多，假如您那时把这不幸的消息口头告诉我，让我能够了解我所关心的所有细节，我会感到轻松得多！现在我却只知道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对细节一无所知，而且觉得在四个月里一点都不让我知道它的不幸结局，这实在有些残忍和冷酷……好了，不提这件事了。我也只好接受您的做法，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跟您的做法完全相同。让它过去吧。

多谢您寄来的物品和书。可是，见您如此沮丧和苦闷，我感到十分难过。宋娅的来信也写得十分伤感。您往常可一直是有生活勇气和发自内心的朝气的呀！请您千万不要向各种压制性的影响屈服。只要有点儿空闲，就要读一些好书，尤其要多到乡间、野外去走走，在那里总能找到一些安慰和生活乐趣。

您肯定好久没有去植物园了。您该打定主意去达勒姆^{〔1〕}游览一番，带上宋娅，然后详细地向我描述那里的现状如何，哪些花正在开放，听到了什么鸟的叫声，等等。您要尽快到那里去，因为现在已是大多数鸣禽在此逗留的最后期限，八月末至九月初它们将重新飞回南方。植物园中栖息着大量鸣禽！鸟类比较多的地方主要是旁门附近，其次是入口处大道的右侧。我在四月的时候曾经带卡尔和宋娅到那里去看夜莺和许多其他种类的鸟。现在我想听您详细介绍生活在那里的所有鸟类。如果您能够腾出时间，当然最好是上午去。话又说回来，拿出几个小时的时间出去走走，会让您在好几天里又感到精神焕发、干劲十足。那么，您就为我去做这件事吧。

我昨天也做过一次“郊游”！也就是说，去了一趟要塞司令部（出于我的要求），因为有些事情要去那里谈一谈。我本来非常盼望这种短暂的外出机会，回来时却同往常一样弄得筋疲力尽。由于我脱离人际交往已久，几分钟后街上的喧闹便让我头昏脑胀。城市看上去也布满灰尘，烦躁不堪，树叶已经大量枯萎了。当然，外出毕竟还是“有所不同”，我在途中还买了少量的鲜花和点心（天哪！）。

宋娅推迟来访的原因在于还没有解决看护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最终反正还是可以解决的。因此，我希望在八月份就能见到宋娅。至于其他人的来访几乎没有什么障碍。如果宋娅得到了许可，请让她发个电报来。另外，我最近会给她写信。

我又给您寄去 80 页手稿。目前我正在翻译柯罗连科的小说，特别忙。小汉斯已经收到放在您那里的所有东西了吗，我当然会把写给他的信寄往斯图加特。

〔1〕 柏林地名，植物园就在那里。——译者注

至于玛蒂尔德·乌尔姆的问候我会妥善地回复，我将尽快给她写一封详细的信。

请不要给我寄躺椅来。我现在事实上只住在一间牢房里，没有地方摆放这件家具了。不过，如果方便的话，请您给我寄来格特鲁德的画，还有特纳的著作（1卷本，不要6卷本的），带兽角把的刀叉。此外，还要请您寄一些黑色的小按扣来，装在信封里寄来就行了。

我会很快再给你写信。我最亲爱的玛蒂尔德，不要气馁，不要失去生活乐趣。一切都会发生变化！要是我们能够在我聚德恩德的住处重逢、到野外采摘花朵那该多好啊！……不论发生了什么，请您振作起来、愉快一些，好吗？多谢您的母亲寄来的友好的短信。

拥抱您，向您全家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永远的 罗莎

顺便寄去我从院子里拣到的几根鸽子的羽毛。有一根羽毛的端部呈蓝红色。

1917年9月13日

布累斯劳

最亲爱的玛蒂尔德：

今天收到您寄来的装有钟石楠和刺芹的小包裹，我感到非常高兴。同时还收到宋娅的电报，她说下星期初来这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了。您现在也该对我的处境放心一些了。我今天遇到这样一件不幸的事：我在这里细心照料着您寄来的几盆花，其中长得最美的是大而红的秋海棠，它给我带来许多乐趣。可是，今天一阵穿堂风从窗户袭来，打碎了花盆：半数大一点的花枝毁掉了。这让我十分恼火。今天的风很大，我下午都没有出去散步。有空的话请把我的内衣寄来，它就装在从佛龙克送去的箱子里。

多次地拥抱您！

您的 罗莎

或许您可以给我寄点荷兰芹菜子来，从这里的药店里买不到它。

1917年9月28日

我最亲爱的玛蒂尔德：

星期一我收到了截至您的第13号明信片的所有消息。可是，您好像没有收到我于18日寄去的明信片（我在里面写道，请您每星期给我寄一张明信片，不要编号）。从那以后我没有再写信。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我在努力工作，只是进展十分缓慢！需要调剂一下的时候我就阅读《阿那克里翁》，很快就要读完了，读完后我把它寄给您；请您也读一读这本书，它肯定会让您感到振奋。您说过很快就要给我寄一个包裹来，那么，我能请您把我的蓝色薄外衣改短7公分后寄来吗？有了这件外衣后，我就可以把冬季衣服再寄回去修补了。昨天我得到了一盆新的花：盛开的帚石楠，但愿它能保持好的长势。紫露草长势良好，倒挂金钟已经第二次开花了！您现在做什么，读些什么书？宋娅在做什么？经过这次旅途颠簸后，她肯定非常疲惫。然而，跟她见面后我感到十分愉快和兴奋！请替我向她表示千百次的问候，也替我向玛尔塔。

多次地拥抱您，最衷心地问候您的母亲！

您的 罗莎

1918年6月3日

我最亲爱的玛蒂尔德：

我现在有一种需要，那就是需要感受到您在近处，至少觉得要通过书信与您交谈。

好像约好了似的，上个星期有几个食品包裹一起寄到我这里，其中有您寄的，有玛蒂尔德·乌尔姆寄的，还有莱因寄来的一个糖果盒。请您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我多次说过不需要什么东西。替我向罗丝表示感谢，让她以后也不要寄东西了。见到她随包裹寄来的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所画的小兔子形象，我倒像看见了老朋友一样高兴。

您现在做什么，过得怎么样？一想到您一直在忙个不停，迄今还没有把由于四月份来看我而耽误的必要的工作补上，我就觉得于心不安！在您把该做的所有事情好好地料理完之前，不要想着来看我，否则我们的内心都会不安，因而无法享受重逢和一起出行的快乐。至少从我目前的神经状况来看我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当我听说您恢复了常人的生活节奏，可以腾出时间去休假散步、读一本好书以后，我们再说您什么时候来这里的事。

您也领教了近几天来的寒冷天气了吧？这种天气实在糟糕。可是，尽管天气寒冷，每天晚上8点半左右都能听到远处传来布谷鸟的叫声。我现在给您写信的时候又听到它的叫声了。

冬天的时候，我曾经在此地的牢房里收养过一只褐色鸽子，那时它正在生病。它大概记得我的“善举”：有一天我在院子里散步时，它发现了我，此后每天都准时在那里等我，站在我旁边的碎石上展翅亮相，或者跟在我后面绕着院子散步。

看到这种无言的友情，人们会觉得很有意思。

我最亲爱的玛蒂尔德，我多次地拥抱您，最衷心地问候您的母亲和格雷特欣小姐。

您的 罗莎

能否给我寄些漱口水来？

1918年9月12日

我最亲爱的玛蒂尔德：

今天收到您的第二封短信，这让我从内心里感到高兴。同样，今天送到的一小盒鲜花也使我高兴。我看得出您恢复了健康，情绪不错，我也十分希望您在那里能够很好地疗养。那个地方让您觉得非常满意，这真是太好了。说实话，我当时对那个地方并没有抱多大期望，因为那里的地势根本不高（也就是300多米吧），而且也没有“名气”。然而，此事也同其他事情一样，关键在于人自己怎么看，看他能否从中发现美好的东西，要是您能够多享受一些阳光就好了！我现在每天起床时都心存忧虑地向外张望，想象您的处境。往常我根本不在乎天气如何，可是现在这连绵的雨天却让我烦恼。我希望您能够勇敢一些，不管遇到怎样的天气都出去走走（大雨天除外）。我自己就一直是这样做的，只要可以“自由活动”的话。用牛奶和夹肉黄油而包做“个人早餐”的发明真是不错。任何能够“想到”的东西您都可以去尝一尝。我希望，等您回来的时候，您的健康状况与我们最后一次分手时的情形大不相同。

今天送来的鲜花中既没有山萝卜，也没有捕蝇草。我想您大概是弄错了，把矢车菊当成了山萝卜。鲜花中还有非常艳丽的地榆虎耳草（在拉丁文中也称它们为地榆），它们的颜色呈深红色；白色的小花是海绿（小米草属）；略带红色的金黄色花朵是牛角花；两个果状花序可能是防风或其近支植物。以后寄鲜花来时，不要忘了把叶子也一起寄来，那样会减少辨认的困难。红色的薔草非常漂亮，薔薇果也很好看（当然，没有看到它的花）。我还辨认出一朵酸橙-山柳菊花（呈鲜艳的橘红

色)，还有一朵山萝卜花（请原谅，它已经完全破碎了，我一开始没有辨认出来）。此外，我还看到一些车前草、鸭茅和细小的勿忘我。我想，这就是全部内容了。

您是否把捕蝇草同其他什么花草搞混了？……

无论如何，我要对您所做的一切再次表示感谢。希望您继续送来礼物和消息，每一次的礼物和消息都能让我高兴好几天。

多次地拥抱您！

您的 罗莎·卢森堡

我前几天卧病在床时，有几只鸽子曾经飞到我的床上！是不是没有听说过这种事？

1918年9月16日

布累斯劳

我最亲爱的玛蒂尔德：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想到您可以沐浴着阳光、在景色秀美的地区漫游的情形，我感到高兴。我刚才收到您寄来的鲜花：它们还都十分鲜艳！其中有矢车菊属的矢车菊、紫色的聚合草、美丽的大毛蕊花（粗壮的花茎上长满黄色的小花朵）、柳叶菜花、一些好看的小草、白三叶草以及两朵红色的拳参花。我立刻把它们浸在温水里，这样它们就能够好好地开放了。施里士夫人^{〔1〕}也送来一束漂亮的菊花，里面有红色的，也有蓝色的。如果您再也用不着萧伯纳的书了，或许可以把它寄给我。或者您觉得不值得这样做？我是想把米勒夫人的书全部寄回去。您仍然睡不好觉吗，我希望您索性在明媚的阳光下多走一走，直到走累，接着就能睡好了。尽量多吃些东西！！

千百次地问候！拥抱您！

您的 罗莎

〔1〕指赛尔玛·施里士。卢森堡被囚禁在布累斯劳监狱期间，赛尔玛·施里士和丈夫罗伯特·施里士一同照料卢森堡的生活。——译者注

1918年9月18日

布累斯劳

我亲爱的玛蒂尔德：

今天收到您星期日写的短信，鲜花在前天就收到了，多谢！您不认识的那种紫花（正像我在明信片上所写的）叫做聚合草；您还问那种带有绿色纹理的白花是什么，它叫梅花草（奥地利人称它为 *Studentenroeschen*，其拉丁文名称是 *Parnassia palustris*）。您这次寄来的鲜花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梅花草不是常见之物，我在德国还从未采集到它。而在瑞士的日内瓦湖畔、在潮湿的沼泽地带，则可以经常看到这种花草。如果您再见到这种花，请给我摘一点。可是，可是！我要再一次提醒您，摘花时不要忘了连它的叶子，尤其是基生叶一起摘下。这样的话，叶子的形状就足以让您弄清花草的名字。黄色的直立委陵菜花早已被我收进植物标本簿，多谢！

我完全赞同让您在那里住满三个星期的主意，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在那里住三个半星期。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您自己说过，J. 小姐可以替您处理所有复杂的事情。那么，您完全可以让她再干半个星期或整整一星期。我很清楚，您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恢复过来。过早地结束疗养，很快就会失去疗养的功效。请您理智一点（！），打定主意，多休息几天！不管怎样，您都要尽快写信告诉我您是如何决定的，在什么日期之前还可以按施莱肯多夫的地址给您写信。

自星期一以来，这里的气温一直是盛夏的温度。今天晚上甚至有些闷热，以至于我都盼望来一场小雷雨了。虽然我往常咒骂热天，嫌它加重了监狱周围的讨厌的气味，而这一次我却

盼望热天，原因是想到了您，想到您在阳光下可以好好地休息。我也希望在您回家途中来这里看我的日子里，这种天气再延续几天。

尽快再写封短信来！

多次地拥抱您！

您的 罗莎

1918年10月10日

我亲爱的玛蒂尔德：

请原谅我直到今天才回复您的友好的明信片。我现在内心充满激动，期待着尽快出狱，因而几乎没有心思再去写信。同时，我还要感谢您寄来的小盒子和细小的 Spreewaelderin，后者给我带来许多乐趣。我终于收到了迈蒂的消息，她这个星期乘车前往柏林，她的姐姐一直平静地生活在柏林。我在此顺便寄去对迈蒂的第一个问候，请您转达给她。我想，我很快就能回到聚德恩德分担迈蒂的孤独了。至于我们两个人该如何工作，我现在还没有想好，但是我想那种情景是很美的。我觉得自己这个月的精神和干劲比以往大得多。但愿这种状况能持续一段时间！露易莎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她又去了布拉格，但是现在想从那里回来。宋娅没有写信，可是我能够理解：她现在大概正一心等待卡尔获释，顾不上想其他一些事情了。

您看我是一个多么实际的人！您最近给我寄来或带来的那件白色毛巾布晨衣已经完全“不合适”了，我先把它拆了，让人染成好看的浅蓝色，现在又把它缝好。这样，我立刻就有了一件像样的新衣服，而且还确实很好看！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施里士夫人又给我送来许多花（天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其中有一盆艳丽的钟石楠，还有香气袭人的紫罗兰，一枝玫瑰，几只雪果。此外，您告别时留下的丁香依然长得很好，保持鲜艳！那些鸽子同往常一样经常来探望我，我都不敢想象我离开这里以后它们会怎么样……

多次地拥抱您，衷心地问候您的母亲和格雷特欣小姐。

您的 罗莎

1918年11月4日

布累斯劳

我亲爱的玛蒂尔德：

我原来以为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放出去，因此根本没有心思去写信了。这就是我这么长时间没有给您音讯的原因。现在看来出狱的事情还要拖延很久，所以我又急着跟您取得联系——至少是书面联系。

您的最后一封信和小包裹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乐趣，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好久没有收到您的音讯了。顺便说一句，豌豆快要用完了，那些鸽子正在换毛，它们所需要的营养比我往常所能给它们提供的食物要多。它们一共是四只，现在成天待在我的牢房里，蹲在写字桌上、椅子扶手上，当我准备吃午饭的时候，它们甚至还跳进盘子里。我无法想象，当我某一天无声无息地离开这里时，它们会说什么。那些巧克力和以前收到的食品我本来已经精明面实际——像我本人一样——地收好，准备以后带回聚德恩德过日子用的，并发誓在这里不碰它们。可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的个性也无法再坚持下去，最终还是“碰了”那些巧克力。

请您不必忙着打扫我的住处。您也知道不必急于这样做。我本来打算把那些沉重的书籍分批寄回去，可是在我的住处无人接收它们（我不打算再跟萨赫特勒夫人联系）。可怜的迈蒂在维也纳大概已经不耐烦了。我今天给她写了一封短信，但不知道邮件是否还能寄到维也纳。施里士夫人上个星期送来三枝又大又艳丽的金黄色珍珠菊，今天又送来了紫罗兰和香气袭人的玲兰。她真是一个十分喜欢铺张浪费的人！——您可爱的母

亲好吗，我马上就给格雷特欣小姐写一张明信片。盼尽快回信！

多次地拥抱您。

您的 罗莎

请原谅这个信封坏了。最后几个信封用完了。

(以上柴方国 译)

致利奥·约基希斯^{〔1〕}

1894年3月24日

巴黎

我最亲爱的爱人：

上次给你写了一封完全关于我俩私事的信，万望宽恕，行吗？我感到筋疲力尽，神经绷得紧到了极点。每天都是起早贪黑，马不停蹄，现在才有空来写这封信。顺便说一句，你在信中说你爱我，并且问这对我够还不够？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呢？我百分之百是你的，而且每时每刻，无不在思念着你。思念中，我对你微微含笑。什么时候我才能拥抱你呢？不过我希望不要来得太匆忙。我要用我的工作成绩，来赢得这个机会。……

我在忙什么？星期三，我把这期〔《工人之声》〕剪贴好了。请立即函告要印多少册，以便我在星期一收到你的回音。为什么要我寄500册给你，而不是直接寄到慕尼黑呢？对我来说，寄到哪里都是一样。你会发现，在呼吁书和这一期中，^{〔2〕}

〔1〕利奥·约基希斯（1867~1919），在一些信件中，被卢森堡昵称为 Dziozio，他是卢森堡的情人、朋友和政治盟友，以非凡的组织能力而著称，为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参与缔造斯巴达克同盟。在斯巴达克同盟起义事件中，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杀；约基希斯为调查和揭露卢森堡遇害真相做了大量工作，一个多月后，他也被右翼军队杀害。

〔2〕卢森堡指的，可能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于1894年5月1日发出的总罢工呼吁，以争取民权自由和八小时工作日。参见她发表在《工人之声》5/6月合刊上的、题为“论政治自由和五一”的文章。

我对我们的政治立场，采取了断然的措施，简明扼要地提出支持宪法。如果斗争转移到群众方面（而且比我们计划得要早），那么就需要明确界定各种概念，使得这些概念、术语和基本条件，都适于交际流通。毫无疑问，其他的人必定会不断地鼓吹“政治自由”论，所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也不能再继续使用这些词汇。必须找一些替代的说法……为此，我决定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这样写：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宪法。这个决定，在我写呼吁书的几个小时里，就必须作出，因此没有机会征询你的意见。但是，我敢肯定，你是同意我的提法的。是吧？这一点我绝对敢肯定……

你的 卢

1895年3月18日

巴黎

……昨天，我出席了〔儒略·〕盖德的信徒们举行的公社庆祝宴。有好几个人发言，其中〔Zephirin〕Camelinat^{〔1〕}（第一国际的遗老），报告了公社从1864到1871年的发展史。马赛的〔麦克西米兰·〕Carnaud^{〔2〕}的发言，十分精彩。所有人的发言，必在开头大赞德国，听了简直有点倒人胃口。你听到过和德国人的“*le sentiment de la lutte de classe*”吗？！！^{〔3〕}……这个词组被他们反复使用，又屡屡受到喝彩。试想一下，要是他们这会儿还没有把恩格斯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4〕}翻译过去……又会怎么样呢？总的来说，恩格斯的東西，他们是用得不多的。盖德和〔保罗·〕拉法格都没有改动纲领的任何企图。……

你的 卢

〔1〕 Zephirin Camelinat (1840~1932)：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创建人，巴黎公社的干部，后成为社会主义党的财务官。

〔2〕 麦克西米兰·安东尼·艾伯特·Carnaud (1863~1937)：教师，改良派报纸《小共和国》的编辑、运动积极分子，1906年退出。

〔3〕 这个词组可以大致译为：“阶级斗争的感情。”

〔4〕 卢森堡指的是恩格斯1894年11月28日发表的、题为“法德两国的农民问题”的文章。文章对1892年马赛会议通过的法国社会民主党的农业纲领，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最亲爱的约基希斯：

Dziodziusia, 我心中的白马王子。昨天, 我见到了卡尔·考茨基。他陪我去商店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又陪我回家。他说, 我就汉堡工会问题撰写的系列文章, 十分精彩, 然后又喋喋不休地抱怨我没有把文章给他。他说, 把文章交给《莱比锡人民报》, 好比“把珍珠扔给猪”。他说, 党内没有人可以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论述工会问题, 因为他们大多数都不了解工会运动, 所以 [卡尔·] 列古恩之流谈起这个问题来, 口气就像 [爱德华·] 伯恩施坦。突然之间, 他们发现了我这颗没有把文章交给《新时代》的珍珠。 [考茨基] 听说了我为了证明贫困理论 (the immiseration theory) 收集的材料, 惊得目瞪口呆。他天真地说, 如果在写批判伯恩施坦的著论^[1]时, 他手里掌握那些材料, 那么他一定会拼死捍卫那个理论的。对此, 我只能报之一笑。然后, 他又死缠烂打, 要我为他写稿。而且——!!!!, 他还为我保留了一个专栏, 探讨马克思的文学遗产。你可以为我感到骄傲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荣誉呀!! 我差一点没有晕过去。此外, 他还请我对马克思的“东方问题”^[2]作一个评价! 他风趣地说, “不管怎么说, 东方问题是你解决的。”^[3] 我的回答更加风趣: “在《新时代》上, 您解决了这个问题。”

[1] 也许指卡尔·考茨基的《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纲领: 反批判》, 斯图加特出版社, 1899年。

[2] 参见卡尔·马克思的《东方问题: 1853-1856年书信之重印及克里米亚战争事件之处理》, 埃莉诺·马克思·艾威林和爱德华·艾威林编, 1897年。

[3] 指罗莎·卢森堡最初于1896年发表的、题为《土耳其的民族斗争及社会民主》的系列文章, 见《卢森堡选集》第一卷, 柏林, 1979年, 第57~68页。

不久，我就准备摆脱这种奉承。另一方面，我在考虑为《新时代》写一篇小文章。只要我一动笔，就会寄给你过目，请多提宝贵意见。不过，这篇小文章也许更适合《莱比锡人民报》。虽然我这个人爱四面出击，但是卡尔·考茨基希望我取代爱德华·伯恩斯坦在《新时代》的位置。如果那个杂种愿意用他的固定薪水来支付我的报酬的话，那么我会当即就应承下来的！

.....

衷心地吻你。

你的 卢

[可能是] 1894年3月25日

最亲爱的：

真是恨透了你，而且还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想跟你论理。所有这些事情都令我伤心，以至于打算在离开前才提笔给你写信。但是最终还是情感占了上风。以下就是我对你的第一项指责：你的来信空洞无物，我是说绝对缺乏内容，除了《工人事业报》^{〔1〕}，对我的所作所为的指责，以及我该做些什么的训示以外。如果你想气愤地说，你寄来的每一封信中，都洋溢着好多温柔缠绵的情话，那么我要告诉你，那些柔情蜜意的话语，并没有使我感到满足，如果能够换取一些关于你个人生活的只言片语，那么我情愿不读那些情话。

然而你对你的个人生活却只字不提！惟有我们的事业和过去的传统感情，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这太痛苦了！此处的工作令我感觉尤甚。每当我工作到疲惫不堪或者精疲力竭的时候，我就想稍稍放纵一下自己，以求轻松轻松。我就会让思想展开翅膀，任其翱翔。但是我觉得，世界虽大，却找不到一个属于我个人的角落。我在哪里才能够生活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呢？在苏黎世，等待我的是同样的、甚至是更加枯燥的编辑工作。留在这里，还是返回苏黎世，对我来说，都没有多少吸引力。不要以为我就不能忍受持续的工作，也不要以为我只想贪图安逸。哦，不是的！我能够承受双倍的工作。我只是在环顾左右，只看到事业的情况下，才感到倍受

〔1〕《工人事业报》，1893年在巴黎创办，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

折磨，感到无聊的。倘若我自己已经在为事业操心，已经在为它奉献，其他的人又有什么权利来对我横加指责呢？

我手里的每一封信，有别人的，也有你的，说的东西都是千篇一律的，这里有份报纸，那里有本小册子，这篇文章那篇文稿，简直让我烦透了。不管信中说些什么，但是如果里面至少能让你看到一点点人性、灵魂、个性什么的，其他的东西也就不在话下了。但是对你来说，除了**事业**，就再也没有别的。这么多年来，难道你就没有得到什么印象，没有观察到什么东西值得跟我分享吗？

也许你想问我同样的问题吧？哦，我和你不同，除了**事业**之外，每走一步，我都有很多的印象和感受，只是找不到人来和我分享罢了。找你分享？哦，我这个人自命清高，不肯屈尊。还不如找[Wladyslaw·]亨利希、^{〔1〕}Mitek [·哈特曼]^{〔2〕}或者阿道夫[·瓦尔斯基]^{〔3〕}什么的好。然而倒霉的是，我并不爱他们，因而也没有找他们的欲望。你是我的心上人，可是……可是我的话已经出口。说什么现在时间紧迫，说什么工作要赶，并非事实。只要关系对头，你总能找到一些话题来谈，并且挤出一些时间来写的。

只需看看下面的事例有多么的典型就够了。这也是我对

〔1〕 Wladyslaw. 亨利希（1869~1957）：在苏黎世读大学时起，始与罗莎为友，19世纪90年代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党员，后成为波兰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心理学家。

〔2〕 巽楚斯拉夫·哈特曼（1868~1893）：卢森堡的另一位学生朋友，后自杀身亡。

〔3〕 阿道夫·瓦尔扎夫斯基-瓦尔斯基（1868~1937）：罗莎·卢森堡的同学，《工人事业报》的编辑，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参与创建波兰共产党。俄国革命后进入列宁的核心集团，1937年遭斯大林清洗，1956年被平反。

你的第二项指责。假设你现在仅仅是为了你和我的“事业”而活着，那么你有没有在信中跟我提起过那次俄罗斯事件？出了什么事？报纸上都说了些什么？那些苏黎世人又下了些什么？你觉得没必要跟我废话不是？我知道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跟亲近的人写信，甚至连芝麻蒜皮的小事，也是可以谈的。你以为我给《工人事业报》写写稿，对你的独断跋扈的意见百依百顺就足够了不是？这真是够典型的。……

你说我不该为具体的事情劳神费心，说什么船到桥头自然直。对我做这种骑士风度的解释，只能说明你对我完全不了解！这种解释也许会令尤里克〔·马契列夫斯基〕^{〔1〕}心满意足，以免让他担惊受怕，因为他天性胆小。但是对我来说，这种解释，哪怕是在前面加上“我可怜的伊人小鸟儿”，说得温和一点儿，也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除了上述指责以外，还有你经常说的那些毫无遮掩的话：跟阿道夫打交道要如此，去〔彼得·〕拉甫罗夫^{〔2〕}家里要那般，采取这个或那个立场，所有的这些训诫，统括起来，给人以极度的不快、疲倦、讨厌和心烦的感觉。我一有空就会想起这些烦心事。当然我跟你讲这些，并不意味着我有支配你的权利。我无法要求你改变你现在的自己。我之所以这样

〔1〕朱利安·马契列夫斯基（1866~1925）：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另一位创始人。自1906年起，马契列夫斯基就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在斯巴达克同盟、德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创建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2〕彼得·拉甫罗夫（1823~1900）：或许是俄国民粹派的首席理论家，并且是瓦尔斯基的最初支持者。

写，一方面是因为我仍然保持着敢想敢说的愚蠢习惯，另一方面是想告诉你，它是一道横亘在我俩之间的障碍。……

……在写完那些文章（包括那篇〔鲍里斯·〕克里舍夫斯基^{〔1〕}的文章）之后，对开版上还剩下七个空栏。报纸的整个版面设计是这样的：妇女问题一栏，工资问题一到一个半栏，还有就是政论我还没写。这篇政论叫我大伤脑筋，因为时至今日，主题思想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当然，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写的，只是想写得短小精悍一点而已，大约两到两个半栏。剩余的版面想放一篇国外准备庆祝五一节^{〔2〕}的小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只准备谈三点：英国人把庆祝活动挪到了五月一号；德国人同意庆祝五一；法国人也都已经团结起来，准备庆祝节日。所有的党派同庆五一，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这样一来，本期的报纸就不仅内容充实，而且题材也很丰富。

至于在巴黎的观光嘛，我不太愿意出门，因为疯狂的聚会和喧闹的人群，只能令我头晕目眩，引发偏头痛。在“好便宜”呆了半小时以后，我差一点儿没倒在大街上。公社的周年纪念搞得糟糕透了。发言的只有〔保尔·〕拉法格、^{〔3〕}波

〔1〕 鲍里斯·克里舍夫斯基（1866~1919）：自19世纪80年代末起即为斗士，是著名的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作家和组织家之一。作为一名《工人事业报》的编辑，他也是《前进日报》的驻巴黎记者。在东欧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出版网，散发社会主义宣传材料方面，他和 Jogiches 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五一节：罗莎·卢森堡喜欢的问题。五月一日已经成了庆祝工人阶级团结的节日。关于这个节日的设立，是1886年在芝加哥提出的。

〔3〕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第一国际的成员，巴黎公社的积极分子。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黑白混血儿，海地人，以撰写《为懒惰而辩》而一举成名。

拉·明克^{〔1〕}、[亚历山大·] Zevaes、^{〔2〕} [雷内]·沙文^{〔3〕} 几个人。那些发言，特别是拉法格的，都是些陈词滥调。[儒略·]盖德^{〔4〕} 没有到场，尽管他事先答应出席。总共不超过 200 人吧。……

星期天，3 点 30 分于巴黎

〔1〕 波拉·明克 - Mckerska. Bogdanowiczowa (1840 ~ 1901)；法国工人党党员，第一国际和波兰移民圈中的活跃分子，也参与了巴黎公社的活动。

〔2〕 亚历山大·Zevaes (1873 ~ 1955)；研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农联盟的历史学家，两度当选国会议员，1902 年和社会主义运动脱离关系。

〔3〕 雷内·沙文；法国工人党党员。

〔4〕 儒略·盖德 (1845 ~ 1922)；也许是法国社会主义者中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为法国工人党左翼成员。和德国党内的梅林一样，盖德坚持认为，冲突在资产阶级势力的内部发生，因此他采取“非此非彼”的中庸立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蜕变成沙文主义者，并在战时内阁中担任不管部部长。

1898年9月24日

Dziodzio:

事情接踵而至，以至于都来不及向你一一汇报。第一点：我决定尽快在党代会上提出战术和机会主义的问题，并争取形成一个决议。但如果我在此前不在报纸上露面，就没法办到这一点。由于时间仓促，恐怕难在《新时代》上发表。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连坐了两天，为《莱比锡人民报》写下了洋洋洒洒107页的系列文章的缘故。因为时间紧迫，文章送出去的时候都没有抄正。

[布鲁诺·]休恩朗克^[1]高兴得快要疯了。文章共有七篇，先把头三篇奉上。^[2]休恩朗克认为这是“神来之笔”，是“辩证法的杰作”。文章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莱比锡的人为我大抱不平。也许你仍然认为我不合算，因为文章没有登在《新时代》上。废话！（1）《新时代》将继续刊载辩论，因为每次党代会结束之后，爱德华[·伯恩施坦]^[3]都会在那里登台亮相。所以，虽然 Schonlank 早就要我专门给他写稿，但届时

[1] 布鲁诺·休恩朗克（1858-1901）：《莱比锡人民报》的编辑、国会议员。

[2] 此处谈到的文章在《莱比锡人民报》上连载，并且构成了她在“修正主义大辩论”中对爱德华·伯恩施坦的批判，后来被收入她的单行本《社会改良或革命》。

[3]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恩格斯的朋友，恩格斯文学遗著的保管者，《新时代》的编辑。1898年，伯恩施坦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后被译为英语，其英语版的总标题是《演变中的社会主义》），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修正主义的大辩论。1903年，他的理论在德累斯顿党代会上遭到了正式的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并且一贯反对民族沙文主义。他也是战争期间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1920年独立社会民主党解散，他又重新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我自然也会采取爱德的做法。(2) 最重要的是，文章给休恩朗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后来想出单行本。自然，我事先就曾向他申明，为了出版单行本，我准备对文章进行加工、扩充，并且在党内机会主义的解释前再加一段基本介绍。有了这些文章撑腰，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发表一次演说，只要那帮“老兄”不把辩论给搅了。

顺便说一句，第一篇文章中有一页让我给漏掉了（忘在家里了）。但是休恩朗克这头蠢驴，虽然经过仔细的编校，竟然没有发现缺页！等我拿到校样一读，差点儿没有心脏病发作，于是马上给莱比锡发电报。他们回电说我搞错了。我又追发了第二封。这下他们叫我赶快过去修改。与此同时，我还收到一封德累斯顿发来的电报：特急，速来。等我赶到那里的火车站，尤里克〔·马契列夫斯基〕对我说，我应该去争取帕尔武斯主编的《萨克森工人报》^{〔1〕}的总编职位！这自然是 Parvus 的主意，不过，那边的〔赫尔曼·〕瓦尔费希^{〔2〕}和其他人都为此感到高兴，并且殷切希望我能接受这份工作。我有可能挺身而出做公开演讲的事儿，令他们特别兴奋。目前，我是惟一的“革命党”演讲候选人。我的对手包括：机会主义者〔麦克

〔1〕 亚历山大·Helphand - 帕尔武斯 (1869 ~ 1924)：第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一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成员。帕尔武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罢工概念，并且同托洛茨基一道研究过“永远革命”的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对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作风日益灰心，故脱离该党，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帕尔武斯还曾把德国的钱送给布尔什维克，并且组织了著名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从瑞典到俄国的火车大旅行。

〔2〕 赫尔曼·瓦尔费希 (1862 ~ ?)：德累斯顿的一位社会民主党组织者，也是《萨克森工人报》的行政协调员。

斯·] 席佩尔、^[1] 狗屁不是的乔治·格兰德纳^[2]，以及一贯见风使舵的 [乔治·] 雷德布尔^[3]……

此时此刻，我收到一封德累斯顿党的新闻委员会发来的最终确认电报，我得赶快将前往赴任的决定电告他们，详情容我稍后再禀。过去，帕尔武斯和尤里克自然得靠自己鼎力写作。我过去之后，首先就会碰到一些不肯为帕尔武斯出力的同事，比如 [弗兰茨·] 梅林^[4]（在休恩朗克的怂恿下，他俩好得像穿一条裤子似的），这样的人我得马上收拾。今天，等事情办妥之后，我就去德累斯顿接管总编室，因为胖子 [Parvus——原译者注] 和尤里克明天就必须离任！党代会之后，总编的位置我就坐稳了。他们倒是希望我立刻走马上任，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人选，但是我想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一会儿。也许下星期我会到莱比锡的编辑部去几天，看看那里的技术设备。这是休恩朗克太太的计划。她现在已经非常喜欢我了。（注意：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对她说，我的作品就像是“正宗的马克思的精品”……而且她十分希望我跟他们住在一起，不过我可能不打算去住。）休恩朗克已经在高兴地想象波伊特大街和卡茨巴赫

[1] 麦克斯·席佩尔（1859~1928）：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导人之一，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周刊的编辑，同时也是颇具声望的修正主义刊物——《社会主义月刊》的编辑。

[2] 在1898年至1906年之间，乔治·格兰德纳为社会民主党的重要干部。

[3] 乔治·雷德布尔（1850~1947）：国会中间派代表，独立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前进日报》和《萨克森工人报》的编辑。

[4] 弗兰茨·梅林（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另一位关键人物，罗莎·卢森堡的支持者（尽管他们之间的友谊时有波谲云诡）。梅林是一位政治宣传家、知名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以及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其最著名的英语作品是他和罗莎·卢森堡合著的《马克思传》。

大街上的那些人脸上的表情了。〔1〕

你的 卢
星期六上午 [柏林]

〔1〕 休恩朗克去世之后，罗莎和梅林开始共同主编《莱比锡人民报》。

1898年9月25日

[明信片] 柏林

最亲爱的，我这是第二次从德累斯顿归来。我曾致电给你，说已经接管了编辑部。我现在真可谓目不暇接，写长信根本不可能。明天我要召集[弗兰茨·]梅林、[亚瑟·]斯达德哈根、^[1] [麦克斯·]席佩尔等人开会，讨论写稿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他们可以继续写稿，而且准备立刻将他们拢在旗下。要是有可能，这个星期我还准备在德累斯顿召集一个会议，跟群众见见面。同时，我还必须为斯图加特的会议写两篇讲稿，并且争取在后天去编辑部。

《莱比锡人民报》上的文章，已经引起了轰动。^[2]帕尔武斯驰电祝贺，[克拉拉·]蔡特金^[3]致信[布鲁诺·]休恩朗克，歌颂“英雄的罗莎，对准[爱德华·]伯恩施坦那只面袋出拳猛击，顿时，粉尘飞扬，遮天蔽日，卷走了伯恩施坦之流头上的假发，令他们落荒而逃”。

这些文章对新闻委员会也产生了影响。他们（一共有17名委员）一致投了我的赞成票。开始的时候，[奥古斯特·威廉·]卡登^[4]还叫嚷道：“什么？女人政治？”结果受到众人的

[1] 亚瑟·斯达德哈根（1857-1917）：卢森堡的老朋友、律师、国会议员、《前进日报》编辑。

[2] 指罗莎在修正主义大辩论中批判伯恩施坦的文章。

[3] 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罗莎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德国妇女运动领导人。她和罗莎坚决站在运动的左翼，并且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4] 奥古斯特·威廉·卡登（185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分部的领导人，并负责出版《萨克森工人报》的党的出版社的工作。自1893年到去世为止，一直任国会议员。

耻笑。后来他自己说：“不错，她那几篇关于东方^{〔1〕}的文章，的确是字字珠玑。”〔约翰·〕饶勒斯^{〔2〕}拿到我的文章后，说了声“哦，原来是罗莎·卢森堡的大作呀”，就立刻把它放进皮包，准备回去细读。〔伊格纳茨·〕Urbach^{〔3〕}跟他见过面，说饶勒斯答应一有时间就给我写一篇文章。但是我想立即在德累斯顿给他写信，请他为《萨克森工人报》写一篇谈德雷福斯事件^{〔4〕}的专论。我也得为瑞士支部的问题，找〔罗伯特·〕Seidel谈谈。

匆匆即此！

你的 卢

〔1〕指罗莎的《〈前进日报〉里的东方政治》一文引发的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展开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辩论。

〔2〕约翰·饶勒斯（1859～1914）：非马克思主义者，为法国社会主义者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属党的右翼，也是欧洲反对穷兵黩武行径的重要骨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遭暗杀。

〔3〕伊格纳茨·Urbach：最初支持波兰社会党，后向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靠拢，在巴黎度过大半生。

〔4〕“德雷福斯事件”是欧洲历史上最为轰动的案件之一。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的犹太血统军官德雷福斯，因被诬告犯有叛国罪而贬谪魔鬼岛。为他争取平反的斗争，使得法国社会分裂为温和的共和派和激进的共和派两派。

1899年1月3日

柏林

Dziodzio:

我刚刚收到卡尔·考茨基从莱比锡寄来的《农业问题》^{〔1〕}以及一封休恩朗克的信。休恩朗克在信中称，梅林拒写书评，说他没法写，并建议休恩朗克自己操刀。可怜的休恩朗克首先缺乏写书评的自信，其次也没有那个时间，所以就请我帮他解围，并在书评中为考茨基捧捧场，顺带提一下伯恩施坦，因为迪茨^{〔2〕}写信告诉他，爱德〔·伯恩施坦〕的书过两三个星期就要出版了。如果别无他法，我也只能恭敬不如遵命了。

你知道，令我尴尬的是，我对农业问题毫不了解，因而连写评论的出发点也还没有。不过，这个出发点可能会在阅读的过程中出现。但是我的时间也可能会因此丧失，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打算把整整两三个星期都奉献给爱德。然而另一方面，这是（1）一项可以提高我的声望的任务。显然，除了Parvus和我之外，整个党内还没有一个人可以对这个必须严肃

〔1〕考茨基于1898年完成了他的《农业问题》。在这本书中，他改变了原有的立场。关于农业问题的辩论，始于1894年召开的法兰克福党代会。其重要性在于：农业问题的辩论，日后将并入修正主义的辩论。1894年，考茨基和麦克斯·席佩尔提出的观点占了上风。他们基本上认为，农业的发展规律，有别于工业的发展规律，虽然这一立场并没有对私有财产的巩固提供任何的支持，但是在1898年的著作中，考茨基又提出，现代农业确实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2〕约瑟夫·迪茨（1843~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的创办人，同时也是国会议员。

对待的问题说些什么。^{〔1〕}党正在等待一个暗示，以便决定对这本书采取什么立场。（2）我真的必须帮休恩朗克一把。^{〔2〕}他还能求谁？而且这件事情很重要。这篇书评可不简单，它涉及到一个立场问题，而你知道，在农业问题上，休恩朗克缺乏清醒的意识，因此害怕挺身而出。用党纲上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方向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站出来在《莱比锡人民报》上说话的缘故。顺便说一下，这事儿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休恩朗克在信中称，他坚决要求梅林履行职责。但是如果梅林仍然置他的要求于不顾，那么休恩朗克就会打电报通知我。

不管怎样，现在我恳求你立刻给我寄如下材料：（1）那本载有 Parvus 论农业危机系列文章的《新时代》；（2）那本载有恩格斯论法国农业的文章的刊物；（3）我们保存的那堆讨论农业问题的报纸（我这里没有，所以一定在苏黎世。）；（4）你想到的任何适用的东西；（5）德国党代会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记录。

我想你知道，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搁置论爱德的文章的，哪怕一天也不会。为了换换脑筋，我最多会两件事情同时进行。说不定那样做还会给我带来一些生气呢，因为整天思考爱德的问题，有时确实是很累人的。这几天我的工作极有效率。小腿好多了。今天医生又来过，给换了绷带。拥抱加热吻。

你的 罗莎

〔1〕这个说法很有趣。因为真正参与农业问题辩论的，都是像爱德华·大卫那样的改革派。当然，农业问题也许是整个左翼马克思主义纲领中最薄弱的一环。

〔2〕1894年，休恩朗克建议在农业问题上与资产阶级合作。

1899年1月9日

柏林

最亲爱的 Dziodzio:

……现在请你帮我——而且要快——解决下面的这个小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矛盾也在激化，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变得站不住脚了。后者，也就是资本主义政治，似乎将濒临崩溃。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说：在五六年前的国际政治中，君士坦丁堡一直起着中心的作用，整个国际斗争都是围绕着它而展开的。但是，由于这里直接牵涉到一个征服兵家必争之地的缘故，在过去的十来年中，就出现了一个稳定土耳其领土完整的政策，以图维持权力平衡。因此，君士坦丁堡的问题就被摆到了中心的位置，国际关系在那里的的发展，也就陷入了僵局。

大约在1895年，出现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欧洲列强受到资本家和国家利益的驱使，也侵入了亚洲。君士坦丁堡慢慢地隐居幕后。一个巨大的舞台，展现在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与之俱来的列强的发展面前：征服并分割整个亚洲，成了欧洲列强追求的目标。很快，中国就被迅速瓜分了。目前，波斯和阿富汗正在受到俄国和英国的侵略。欧洲对非洲的争夺，由此得到了新的动力；那里（法绍达、德利哥亚、马达加斯加）的斗争，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爆发。

显然，瓜分亚洲和非洲，是欧洲列强的最后极限，此外他们再无扩张的余地。在东欧问题上，也出现了类似的压榨。在最后的危机阶段到来之前，欧洲列强除了狗咬狗之外，别无它

途……等等。〔1〕

哦，你能理解这种形势的灿烂前景吧。认真地思考一下，如果有什么高见，立即写信给我，再说一遍，立即回信。起初，我想把这个主题，放入一篇题为“世界政治的转移”的精彩社论中见报，但后来决定把它有机地糅合到我那篇关于爱德〔·伯恩斯坦〕的论文当中，以便使论文有根有据，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最亲爱的，暂时就此打住吧。我为爱德的那篇文章倾注了很多心血。关于“英国人的眼镜”——即我写这篇文章的方式——问题，你误解了，它只是论说的一个基本部分。因为我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的策源地，资本主义的僵化也必将首先发生，而且这个僵化过程已经开始了。我有充分的证据。这也证明了爱德在英国得出的具有独到见解的结论。他是把整个英国颠倒过来看的。

自昨天起，我就感到心情压抑。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多写的原因。我从心底里给你一个吻，最亲爱的。来信吧，别等我。等我心情略有好转，再给你信。

你的 卢

〔1〕 罗莎后来的著作——《资本的积累》——的中心主题之一，在此初现端倪

星期天 1899年1月22日

柏林

亲爱的 Dziodziu:

我一直在翘首盼望你所许诺的长信，但是在收到这封短筒之后，我就好几天不想作复，现在都写得很吃力。

我认为，你对“俄国革命”^{〔1〕}所持的整个立场，都是令人无法理解、甚至是可憎的（我已经在苏黎世跟你谈起过这个问题）。最终你得承认，所有的这些批评，所有的这些挑刺（而不是想方设法把事情弄好），都是毫无意义的。早在苏黎士，我就对你的做法表示过厌恶。你对每一个试图接近你的俄国人都嗤之以鼻。拒绝跟少数人或一群人交往，以示惩戒，倒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总不该拒绝或者惩罚整个运动呀！你的整个行为，与一个坚强的、正直的人极不相称，反倒适合像[鲍里斯·]克里舍夫斯基那样的愤世嫉俗的“倒霉蛋”。

我在信中谈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你对我和俄国革命合作的意向发表了意见。你的意见对我毫无影响：虽然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整个事情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不值得为此跟你大动干戈。就个人来说，俄国革命关我屁事！但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接触对你是有好处的。但是当然啦，只有在你真正愿意参与的情况下。你的那些废话（说他们并不想真正仰仗你），真的是可笑之至！难道你自己在写信的过程中没有看出来么？总的来说，你在任何时候都会嘲笑任何一个前来接近你的人。这话可是你亲口说的。这样一来，他们还有什么办法来

〔1〕 指在移民圈中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组织。

亲近你呢？

原谅我跟你写这个。也许它会令你尴尬，使你生气，但是这一次我一定要以实相告。好好想一想，你就知道我是对的。你在过去的几年中采取的顽固立场，可以说是有失你的身份的。对于一个惯领风骚的男人来说，那样做完全是不足取的。如果不是为了泄私愤，我会表扬别人做的事情，而不会在自己不施任何援手的情况下，对样样事情都吹毛求疵。为了使之间今后不存在任何的误解，我想再次声明：我跟你写这些东西，并不是想为我参与“革命”的事儿辩解。因为俄国革命对于我，就像第五条腿对于狗一样，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完全、纯粹是为了你和这场“革命”的关系，才这样写的。

1899年3月2日

柏林

最亲爱的：

你的那些可爱的书信，成了我力量的巨大源泉，因为最近几天，我总是感觉身体不太好，一天到晚想睡觉，既不能工作，又无法思考，还不能写信。整个人就像是一只没有思维意识的小动物。

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写了四篇文章，居然被宣布犯了王法，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此时，给你写信也很费劲儿，才写两个字，就又忘了要说什么。

你知道昨天夜里我想了些什么吗？我想我可能会得精神病，因为我有好长时间（去年夏天就开始了），都有些感觉异常。此事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信里也没有提及。有时脑子里雾蒙蒙的，思维和感觉好像是通过脱脂棉进行的。有时候，强脑力劳动进行到一半，思路就突然断开，得费老鼻子的劲儿，才回忆得起我刚才到底在想什么。我现在还经常有失忆和昏睡现象。想想看，要是我记不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给你写的信，信中说了些什么，寄了信又不知道写地址没有，那该有多么的惨。然而在写那些批判席佩尔的文章时，我思如潮涌，迅猛异常，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但是话就说到这里吧。现在谈谈正经事儿。

你对我和麦克斯·席佩尔的论战的批语（即你那句最重要的话），说得我心花怒放。它使我再度确信，我可以完全信赖我的辩才。在邮局寄答辩稿的时候，我暗暗对自己说：小猫，你逾越了雷池，偏离了正道，因为我没有直接批判机会主义，

而是忘乎所以地大谈特谈我最喜欢的经济学，并且深入了理论的丛林。回去以后，我又展开你的来信，把那些熟知的内容逐字细读。

现在你也许会问我，既然你自己心里清楚，干吗还不写得好点儿？我只能告诉你，在那种环境下，能写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就已经很不错了。想想看，我得在四个小时之内，当着[布鲁诺·]休恩朗克的面，完成那篇答辩稿！我当时以为我会发疯的，大家对我的文章都赞誉有加，对席佩尔写出那样的狗屁文章都表示震惊。今天，休恩朗克跑来报告“印象”。首先，他见过奥古斯特[·倍倍尔]。奥古斯特说：“文章写得妙极了，字字珠玑，我句句同意。调子高雅，无懈可击。当然，那个宗派隐藏决定的事情，实属荒唐。这个问题必须提到党代会上去。但是……”关于这个“但是”，跟他的关系要比跟我的多——后来……

1899年3月3日

柏林

最亲爱的：

现在你知道我的脑子出了什么毛病了吧。昨天我在信中讲到倍倍尔说的“但是”，可是忘了随后解释。现在让我来补充说明一下那个“但是”吧。他接着说：“《前进日报》^{〔1〕}因为‘老头儿’（李卜克内西）的关系，一直保持沉默。当然，你知道，格兰德纳实际上是席佩尔的走卒。外省的报纸也保持沉默，因为他们不敢讲话。而我们呢，对所有的重大问题，也意见不一。如果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你自己也会变得垂头丧气，毫无斗志。”

总之，这番话传达了这么一个意思：倍倍尔本人已经是垂垂老矣，再也驾驭不住局势了。别人能够斗争，他感到快慰；但是他本人则既无斗争的精力，也无斗争的热情。辛格那个家伙，从来就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卡尔·考茨基，你知道，只对理论感兴趣。总而言之，只要环顾左右，你就会发现，目前党的情况，真是他妈的糟糕透了，简直就像是卢西尼亚人说的的那样，群龙无首。既缺乏领袖，也没有人承担责任。

在剩下的那几个可怜兮兮的正直的斗士中，帕尔武斯，跑去给那份无聊的《世界政治》写稿去了，而不是继续做他的本分——为《萨克森工人报》撰稿。鬼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做呢（显然，像 Seidel 一样，他想让党知道，没有他，则一事无成）。因为一场毫无意义的内讧，梅林那头蠢驴，居然也背弃了

〔1〕《前进日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创办的中央机关报。

《莱比锡人民报》。只有卡尔·考茨基和我，仍然忠于职守。

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具有我这样的地位的人，如果精力充沛，身体良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比如，我本应该接连召集几次会议，讨论“军国主义和民兵”这个主题，以调动群众的热情，激励一下倍倍尔和那几个老色鬼。但是，但是——我的身体！简直是糟糕透了！

千吻万吻！

你的 卢

1899年5月1日

柏林

Dziodzio:

感谢你昨天寄来的专递邮件。当时我那高兴劲儿，就别提啦，因为整整一天，我都孤苦伶仃地坐在空空荡荡的屋里，等待你的[兄弟]乔治奥。不管怎么说，我那时也无处可去，外面正在下雨，而且身体也不太舒服。然而意想不到的，邮差按响了门铃，给我带来了过去几天内朝思暮想的你的消息。

.....

你问我党代会的发言是否已经布置。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倍倍尔会谈伯恩斯坦，但是谁去讲军国主义的问题，目前还不知道。其他议题都跟我们无关。

你提出的要我“不惜代价，争取发言”的建议，简直是幼稚。你不断地给我在重大问题上出这样的馊主意，真是让我吃惊不小。难道你真的以为，一个参加运动才一年，靠几篇文章（即使是好文章）站住脚的人，一个不属于那个小圈子、没有保护伞、赤手空拳打天下的人，一个不仅被敌人（奥尔之流^{〔1〕}）所憎恨、而且为盟友（倍倍尔、卡尔·考茨基、辛格^{〔2〕}）所嫉妒的人，一个他们想冷藏得越久越好的人（因为她很可能后来居上），能有机会被委派去发言吗？你难道连这

〔1〕 伊格纳茨·奥尔（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875年起任党的书记，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为了顺应巴伐利亚社会民主组织的主流，奥尔成了一名改革派的主要领导人。

〔2〕 保罗·辛格（1844~1911）：《前进日报》的创办人，后成为稳健派，并活跃在第二国际的国际局中。他也是一名国会议员。

些都不懂？不经他们的首肯就去发言？这事儿绝对办不到，因为在幕后提线的，显然正是他们。

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异常冷静。我早就料到事态会像现在这样发展；我也知道，在今后的两三年内，无论是阴谋、憎恨，还是嫉妒，都无法阻止我在党内取得令人羡慕的职位。当然，目前的形势——伯恩斯坦——是一个例外。但是，你似乎又一次认为，世界的中心就在那里，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则满盘皆输。什么逻辑？现在（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党只是陷入了更巨大的旋涡，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但是在日常的斗争当中，党有成千上万的机会，来显示其力量和不可替代性。

话说到这里，我并没有丝毫把自己局限在批评方面的意思。相反，我意欲积极推动整个运动而不是个人，以检讨我们的全部积极工作，探索新的鼓动和实践的形式（如果能够找到的话，而我个人毫不怀疑它们是存在的），与沉闷和浮夸等等作斗争。总之，我希望继续成为运动的推动者，就像 Parvus 当初那样，可惜的是，他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半途而废了。不论怎么说，我现在具有 Parvus 当年所具有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即一个人可以为运动做很多的工作，而且可以天天做，年年做下去。

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时代。党的地位不可动摇的事实，是无庸置疑的。这在议会选举的问题上，就得到了反映。只是不幸得很，等我投身到那件事中，已经为时太晚。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诸如此类的问题，将屡见不鲜。光是关税、外交和职业工会的问题，就已经给你提供了三个极好的机会。另外，原有的口头的和书面的宣传形式，也已经僵化，几乎无法鼓动任何人。宣传必须要有新的渠道，报纸、会议和小册子，必须注入新的生命力。

匆匆忙忙给你写这些杂乱无章的话，首先是想向你表明，在关注事态发展的同时，我自己不是没有计划、没有主见的；其次，我想提醒你，这个世界并不只是伯恩施坦和汉诺威的天下。你说，在德国运动中做一个理想主义者，是愚蠢之举，〔1〕这个观点我不同意。首先，这里有不少的理想主义者，工人群众中有许多最淳朴的鼓动家；领导层中也有理想主义者，如倍倍尔。第二，你说的事情和我无涉，因为在我的波兰和德国的革命实践中，我始终奉行的最高原则，就是忠于自己；周围的环境和别人，一概不论。在波兰运动和德国运动中，我现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将来仍然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

自然，那并不意味着，我将扮演一头只知道服服帖帖地为他人卖力的毛驴的角色。我肯定会去争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职位的，但是那跟我的理想主义丝毫都不矛盾，因为除了运用我所具有的智慧以外，别的歪门邪道我一概不用。……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轻轻地给你一个吻。

你的 卢

〔1〕 约基希斯的书信没有保存下来；但是罗莎信中的这些段落，说明两个恋人之间的世界观，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1900年3月29日

柏林弗里德瑙

最亲爱的：

从波森回来之后，极度疲乏，直到今天才有力气提笔。

对于你的来信，我只能作一个简复。首先，在读完它后，我像往常那样，感到有向你报告我的整个行程和为什么突然离开的冲动。但是我又想起，在过去的8年当中，我一直在那样做，结果徒劳无功，所以就决定放弃。我只想跟你谈谈什么东西会对未来的计划产生影响，一些基本事实，等等。

你的来信使我清楚地认识到，你一再推迟迁居柏林，是因为你本人不愿意，而不是其他我能猜想到的原因。在我看来，由于你没有看到我俩的关系的永久基础，所以你就一直想半心半意地维持这么一个两地分居、你来我往的婚姻关系^{〔1〕}。

有鉴于此，永久定居柏林的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如果你本人没有迁居柏林的内在欲望，那么我们以前的同居关系，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我们不但不能像在苏黎世那样共同生活，甚至也不能用往常的语调来通信。你在信上说，让我去苏黎世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激发你迁居柏林的欲望。这个提议多么的荒诞！难道你自己看不出来？真是教人莫名其妙。

对于我的决定，也许你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是我无法跟你解释。我只能明确地告诉你，我将永远不会再踏足苏黎世，我也将不会到任何地方去会你。……至于你什么时候想

〔1〕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用那样的字眼来形容罗莎和约基希斯的婚外恋关系，是非常罕见的。罗莎的做法，表明了你对女权运动的态度。

在我的身边安顿下来(如果你有那种冲动的話),那完全是你个人的事儿。这事儿我不能、也将永远不会过问,哪怕是在信里!

至于我的健康问题,生了大病我会通知你;至于经济问题,紧急关头我会求助你。(顺便说一句,自15号从苏黎世归来以及后来的波森之行,我已经挣了这个月几乎一半的生计。如果可能,请随信给我附上50马克,希望能在1号收到。)最后还有一句话要说:拖延到今天才给你写信,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种你所认为的报复行为。它只是表明了我要摆脱这个陷身已久的似是而非的恶性循环的坚强决心。

你的 罗莎

1900年4月24日

柏林弗里德瑙

亲爱的 Dziódzio:

你的信来得正当其时，因为怎么样理顺我们之间的感情纠葛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为了解释我的心境和近来的行为，我想简单明了地告诉你，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特别是在苏黎世的逗留期间，我得出如下结论：……你已经不再爱我了，你也许已经和别人勾搭上了，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使你幸福（如果那有可能的话）的人了。

这个想法是在一个夜晚清晰地涌上心头的。那天夜里，我躺在克拉拉·蔡特金家的沙发上，思绪万千，辗转难眠，突然，它不庸置疑地、明明白白地呈现在我的面前。由于这个缘故，你不肯迁来柏林，以及你近来的整个表现，都变得可以理解了。我的心情为之一轻，就像是一个历经了千辛万苦、猜了无数个谜、解了无数个结、闯了无数个迷魂阵的人，最终对每一个问题都找到了简单明了的答案那样。

我立刻决定采取行动，让你觉得分手容易一些，也就是说，首先要断绝通信往来，不在信中缔结新的关系，也不影响你的心情。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告诫自己：这样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如果他爱我，并且想跟我共同生活，那么他会来的；反之，他会利用拒绝通信的机会，逐渐远我而去，关系就会自行“化解”。

现在，我已经开始在这里过起了我的单身生活，完全的孤苦伶仃，心想我这辈子将形单影只，孑然一身。我变得有些冷淡，也有些骄傲。每当我无意中开始设计新的计划、憧憬新的

希望，每当我看到别人是怎样的琴瑟和谐，每当我看到春天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每当我想起你也许找不到像我这样体贴入微的生活伴侣的时候，我便这样对自己说：现在他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或者你能够给他些什么？这样就足以粉碎我的白日美梦，让我咬紧牙关，继续干我的工作。

你的来信似乎表明，我误会了（好像我对某些事情表达不清似的），我们的关系仍然有基础，将来还是有希望的。你能肯定吗？你知道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如果事事如意，那就别跟我争发生了什么事情，事情又是怎么发生的。告诉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把这事儿给我了了。……

1902年2月11日

柏林弗里德瑙

亲爱的 Dziodzio:

……跟往常一样，我的这次旅行，自然也遇到了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事情。开完赖兴巴赫会议之后，每到一个城市，每开完一个会，我都必须和同志们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坐到清晨2点。顺便说一句，这样做我根本就不后悔！一位地方大员仔细地打量了我之后说：“哦，你不会超过27岁吧。我还以为你有42岁呢。”“你为什么会那样以为呢？”我惊奇地问。“哦，《南德邮报》登过你的一张画像。”〔1〕

我听完不禁大笑起来。原来这些纯朴的人，把那张画像误认为是我的真人画像，并且人手一张，个个珍藏的缘故。

另外，在（萨克森的）梅拉内的一次会议结束之后，有人正式提议要我谈谈妇女和婚姻的问题。一位英俊的青年职工，名字叫做霍夫曼的，正热衷研究这个问题。他读过倍倍尔、〔2〕莉莉·布劳恩〔3〕和《平等》〔4〕上的文章，并且正和村里的老同志争论得不可开交。老同志坚持认为，“女人的位置在家里”，因此我们必须取消让女人进厂做工的做法。当我表示赞同霍夫曼的意见时，他那个得意劲儿，就别提了。“大家都听

〔1〕他们看到的是刊登在一份由爱德华·福克斯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慕尼黑双周刊《南德邮报》上的漫画像。

〔2〕倍倍尔的经典著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妇女》。

〔3〕莉莉·布劳恩（1865-1916）：积极从事妇女和青年运动，《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是她的名作。

〔4〕《平等》是一份由克拉拉·蔡特金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妇女报刊。

见没有，权威都为我说了话！”

一个老人说，妇道人家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工厂里的小伙子之间忙来忙去，真是有失体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霍夫曼大声说：“那些都是错误的道学观念！要是我们的卢森堡今天挺着个大肚子登台讲演，那我还会更喜欢她呢！”

听到这个出乎意料的声明，我差一点儿笑破肚子。但是看到他们一个个都是一本正经、正襟危坐的样子，我也只得咬紧嘴唇，忍住不笑。

不管怎么说，下一次再去赖兴巴赫，我一定要争取挺个大肚子。听到没有？告别之后（已是清晨2点），这位年轻人拉我留了一会儿，硬要我回答他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天的婚姻安排虽然常常阴错阳差，但是他到底该不该结婚？所幸的是，我的回答是应该结婚。他听了乐得心花怒放，旁边的人也都嗤嗤地笑个不停，因为（后来他才承认）他正在准备结婚，而且时不我待，因为他的未婚妻正好处在他非常喜欢的那个状态。

……

拥抱你。

你的 卢

1905年10月6日

柏林弗里德瑙

最亲爱的：

今天，我终于决定给你写一封长信，并把它及时寄出，免得我半夜三更跑进城去。昨天，我收到倍倍尔的来信，称（不幸的是，我得把它抄录下来，否则你肯定无法辨认）：“如果有关方面请你合作，能否答应每周为《前进日报》定期写两篇社论？”

“我这样认为，你将不受日期和题材的约束。文章取决于形势，探讨经济或政治问题。主题由你自己或编委会定。如果编委会指明要某某主题的文章，那么它就必须接受这篇文章，除非新闻法禁止刊载。如果编委会认为内容不当，必须立即通知执行委员会和新闻委员会。除非你希望不时署名发表，否则文章将以社论的形式刊出。”

“自然，你的文章将获厚酬。在可能的情况下，文章一般不超过两篇，重大主题可例外，登在其他栏目。敬请回复，愈快愈好。”

如你所见，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求婚形式。条件本身就很优越，特别是有执委会的保护。……然而，这封信又把我推到了一个两难境地。关于拒请之词，我已烂熟于胸，在此不必赘述。另一方面情况如下：经过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前进日报》的这一举动，似乎在对我们这些左派说：来吧，由你们来组阁。

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因为去耶拿〔1〕的关系，我从未公开参与过那些争吵，但是由于我再次被看做是左翼的风云人物，我的拒绝将意味着：大家看吧，那些搅屎棍只会张着嘴巴说大话，让他们来点儿真格的，就一个个丢盔弃甲，临阵脱逃了！

另外，拒绝对于奥古斯特〔·倍倍尔〕来说，将是一个特别沉痛的打击，也为今后的战争留下了口实。自然，他就是那个倡导改革、很想根据我们的意思重组《前进日报》、并且认为我是能够当此大任的人！拒绝他，就等于破坏了他的整个计划，将这块阵地拱手交给艾斯纳之流。

总而言之，眼前的这个局面，比尴尬还要糟糕。由于对方限我今天回复（午饭之后，执委会将同新闻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伟大的改革事宜），所以我昨天晚上就去拜访了卡尔·考茨基，向他请教怎么办。出于某种原因，考茨基眼下对《前进日报》和奥古斯特更加生气。虽然如此，他立刻说，“拒绝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制订了下述计划：立刻与〔亨利希·〕库诺联系，马上和他及施多贝尔〔2〕（也许整个左翼）订立攻守同盟，约定双方的责权义务，一旦出现因为我的文章和编委会或执委会发生冲突的情况，全体左翼人员（而不光是我一个人）将团结一致，联合退出《前进日报》。这样一来，编委会就一定会炸锅，把艾斯纳之流炸飞出去，因为《前进日报》离了库诺，就没法生存下去。

〔1〕指在耶拿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年会。罗莎·卢森堡促成年会通过了“群众罢工决议”，使群众罢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战术武器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会代表对此则表示惊愕。

〔2〕亨利希·施多贝尔（1869-1945）：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始，他采取国际的立场，后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并且同卢森堡和梅林分道扬镳。世纪交替之时，他在《前进日报》的地位举足轻重。

今天上午，我俩一起去见了库诺。他高兴地表示赞同，并且急不可待地等着摊牌。你应该知道，库诺这个人最近对艾斯纳之流大为光火，一门心思地想退出《前进日报》，但是有了我坐在编委会上，整个事情的意义也就变得截然不同了。（顺便说一句，在耶拿年会前的一次新闻委员会和编委会的联席会上，库诺和艾斯纳竟然大打出手。库诺直扑艾斯纳，卡着他的脖子，把他推向墙壁，准备用皮带抽他，结果让别人给拉开了。不过，艾斯纳现在还是一如既往地讨好库诺，常常留他下来谈话。）

有鉴于此，我便写信告诉倍倍尔，从一开始起，我就不相信这种人为的改革会取得成功，只要艾斯纳、格兰德纳和魏茨克^{〔1〕}继续留在编委会，一切都不会改变。然而，为了表示我们左翼的友好，我将接受倍倍尔的建议，条件是：必须首先确保左翼成员在编委会中永远占压倒多数。

我就是这样处理这个局面的。虽然你肯定会扮鬼脸，但是细细一想，你就会同意，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顺告，这份工作将使我身处党的有影响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奥古斯特·倍倍尔最近对我宠爱有加）……我对我的文笔深感欣慰，我可以感觉到那精神的火花跃向我的指端。我写的文章，可以令人十步开外，就感觉到作者是谁。想到右翼分子在中央机关报上读到如此辛辣的文章时脸上该是何种表情，库诺已经开始乐得直搓手了。

现在写一点儿我的个人私事吧。你错了，心肝宝贝！我的心思并没有永远系在波兰的工作上。很不幸，恰巧相反。耶拿年会再一次把我给彻底搞糊涂了。我有时甚至怀疑，现在还有

〔1〕 亨利希·魏茨克（1861~?）：《萨克森工人报》编委会的编委之一。

没有人在做波兰的工作，因为我这个人常常是孤陋寡闻的。但是，虽然我把心思完全放在了德国的工作上，我仍然希望了解我们的工作，至少是一些重要动态，所以我要求你不要那么幼稚，更不要知情不报，强迫我和波兰断绝关系。心肝宝贝，不要再对我用你那种要么医死要么医活的疗法了，好吗？我向你保证，知晓一些事态的发展，对我来说，不仅无伤大雅，反而是一种需要。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尽管放心。……

卢

1905年10月26日

柏林弗里德瑙

最亲爱的：

附上我的文章“论自治”。^{〔1〕}收到你的电报后，我反复咀嚼电文，发现有一句话还是比较中肯的，即“文化利益不可能是自治的基础”。首先，我们在此要考虑的，不是“经济特点”（你的提法不太准确），而是阶级斗争。因为随着资本的分散，阶级斗争的性质正在日益的地方化。这就是为什么我试图修改的缘故！《火星报》^{〔2〕}的人（孟什维克）^{〔3〕}，跟在资产阶级政客的身后亦步亦趋，机械地重弹“历史和经济特点”的老调，就像小孩模仿大人似的。这只能说明他们缺少批判的才能。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接受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提法，只有特鲁

〔1〕 文章是以波兰语发表的，其英语译名为：“A Commentary to the Social Democratic Program of the Kingdoms of Poland and Lithuania”（《评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的社会民主纲领》）。

〔2〕 《火星报》创刊于1900年，其编委会包括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谢罗德、扎苏里奇和波特列索夫。1903年，继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分裂之后，列宁离开了编委会，《火星报》此后便沦为孟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

〔3〕 “孟什维克”是少数派的意思。在1903年于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会议上，列宁领导的党派，虽然在整个运动中只占少数，但却通过运用议会手腕，以多数派的形象出现，并开始使用“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称号。因革命的组织问题发生的冲突，是俄党分裂的根本原因。

别茨科伊〔1〕和斯特鲁维〔2〕才会说好。我们的党，是阶级斗争的党，不是“历史规律”的党。

至于你的其他意见，我坚持自己的立场：

（1）我认为，粉碎特权、民族平等，是我们工作之中的重头戏；自治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和结果而已。这是区分我们和波兰社会党以及他们的自治概念的关键所在。对于我们而言，共同利益才是我们的出发点。国家民族的团结，就是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波兰社会党的出发点，则是波兰的特色。其他的国家民族把他们的自治概念颠倒过来，于是就演绎出了一场以联邦主义的箴言——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家作主”、“解放自然力”——为基础的黄粱美梦。在做宣传鼓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奉行自己的逻辑主张。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准备就自治的问题，写一本小册子或一篇文章。

（2）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按照你的意思，把我的论文冠以“论自我管理”的题目的缘故。我想把它题为“国家的体制”云云，就像我们对莫斯科人说的那样，它是总纲和民族自治中的一个项目。切记，作为社会民主党人，虽然我们活跃在某个地方，但是我们还不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党，而是从国家党分裂出来的一个派别。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波兰社会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必须在任何问题上维护我党的基本的国家性质。

好了，我想我的启发性见解，已经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了吧？

你的 罗莎

〔1〕 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1862~1905）：莫斯科大学校长、哲学教授，曾向沙皇尼古拉二世递交过一份请愿书。

〔2〕 彼得·斯特鲁维（1870~1944）：19世纪90年代“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楷模，后成为宪章民主党的领袖，反对十月革命，在内战中支持反革命分子，后移居国外。

又及：关于标题，我的心里存在好几个疑问：“给所有的民族以保障”，听上去更像是一个虔诚的愿望，而不像是一个纲领性的要求。在纲领当中，应该要求特定的、具体的体制或法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一起向莫斯科人提出的那个说法（国家体制），现在似乎也同样的不合适。具体地说，我们现在应当为所有的民族提些什么要求？我认为应是：“保障居住在俄国境内的所有民族的民权平等，保障语言和文化自由（特别是在学校里），保障波兰和立陶宛的领土自治。”

1905年11月3日

柏林弗里德瑙〔据内容猜测〕

最亲爱的：

你的全部电报，均已收悉。此时此刻，又收到你的专递信件。

你问我为什么不写信，现在又在做什么？哦，“我能告诉你什么呢？”我的感觉一塌糊涂。《前进日报》的地位，很快就跌到了《萨克森工人报》的水平。最糟糕的是，我是目前惟一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卡尔·考茨基也发现了部分问题）。

编委会的人，尽是一些蠢驴，而且还妄自尊大得不行。“记者？”一个也没有！更有甚者，艾斯纳之流正在媒体上向我们发动一场恶毒的论战，而我们的应战者，不是奥古斯特·〔倍倍尔〕（！）就是 Cunow 和他的乌合之众（!!!）我只可以关心俄国的事情，不时地写上一两篇社论，提些个建议。这些好端端的建议，在执行的过程中，全部被弄得面目全非，气得我只有扯自己头发的份儿。……

因为没有人，所以我看不到什么出路。另外，我也累得要命，爬都快爬不动了。每天4点钟开车去编辑部，9点钟回家，跟这帮家伙的空谈，累得我无以言表。然后我早上8点起床（因为保姆已经起来了，搞得家里叮当响），迷迷糊糊地到处乱走，夜里因为压抑又睡不着。一句话，糟透了！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家乡的同志们的活动。只可惜出于篇幅的关系，我没法多在《前进日报》上重复。我赞扬的不光是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而是整个社会民主圈子里的人。那

就是我们针对杜马采取的战术，只要你仔细读读《前进日报》就明白了。

祝好！

卢

约 1909 年 8 月初

夸腾

……对我的首轮袭击进行鼓噪攻讦，完全是多此一举的行为。无政府主义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个观点，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早在普列汉诺夫的德文小册子〔1〕里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就连考茨基那样谨慎的“思想家”，也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建议我在《新时代》里宣扬这些观点（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在评价一个学说、一门政治的时候，谁提出这个学说或者政治主张，并不重要。因此，关于施蒂纳〔2〕、拉加代勒〔3〕和工联主义者的辩论，可以说是完全不得要领的。

我仍然深深地陷在“论自治”的写作当中。文章的出版，最好安排在报纸的第三版，而不要放在第一版。事实上，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已经吃尽了苦头，草率了事，于事无补。……

顺告，为了给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主席塞缪尔·龚帕斯〔4〕的来访营造声势，考茨基正在为《新时代》准备一篇文章。这位诚实正直的绅士，这个头号杂种，居然还受到《人类》的追捧，而且

〔1〕指的是普列汉诺夫 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2〕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哲学家，被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嘲弄为“圣人麦克斯”。他的名著为《惟一者及其所有物》。

〔3〕休伯特·拉加代勒（1875~1914）：法国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者，《社会主义运动》的编辑。

〔4〕塞缪尔·龚帕斯（1850~1924）：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长达近 40 年之久。在弹压美国工会运动内部的激进势力方面，龚帕斯充当了急先锋的作用。他强调：美国工会的立场，是谋求经济利益，而不是组织政党。

还将现身德国！尤里克〔·马契列夫斯基〕或者〔卡尔·〕拉杰克〔1〕也许该为他在《Przegląd 社会民主报》里写点儿什么了。我就写信给〔莫里斯·〕希尔奎特，〔2〕请他电告是否会写点儿什么。

我还给一些外国人士写了信，比如〔古斯塔夫·〕邦，〔3〕〔路易·〕布丁〔4〕和〔弗里德里希·〕奥斯特里茨。〔5〕〔埃米尔·〕王德威尔得〔6〕肯定会立刻动笔的，所以我必须先给他寄一些列宁、〔彼得·〕马斯洛夫〔7〕和尤里克论农业的文章，以便让他有一些特色文章参考。这些文章我花了好多时间才索到。没有它们，我就不好去求他了。……

〔1〕 卡尔·拉杰克（1885～1939）：为波兰和德国运动的左派，俄国革命后支持列宁，在创建德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回到俄国之后，他成了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党的支持者，直到托洛茨基被贬土耳其为止。随后，他又支持斯大林，并成为斯大林的欧洲和中国事务顾问。1937年遭到斯大林清洗，在莫斯科审判中承认犯有叛国罪，1939年被处决。

〔2〕 莫里斯·希尔奎特（1869～1933）：美国社会主义党的一位缔造者，既反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反对布尔什维克。

〔3〕 古斯塔夫·邦是一位丹麦社会主义者。

〔4〕 路易·布丁：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和杰出的宣传鼓动家。

〔5〕 弗里德里希·奥斯特里茨（1862～1931）：奥地利最著名的社会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也是议会议员和《工人报》的编辑。他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奥地利，1916年变为绥靖主义者。自1919年起到去世为止，一直在奥地利国民议会中任职。

〔6〕 埃米尔·王德威尔得（1866～1938）：比利时工人党的一位领袖，后任第二国际主席、首相等职。

〔7〕 彼得·马斯洛夫（1867～1946）：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的支持者，农业问题专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为一个沙文主义者，并且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

约 1909 年 8 月 10 日

写于夸腾

让我来判断布尔什维克会对党的团结造成多大的危害，以及他们是在多大的程度上摆老大哥的架子，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1〕}如果他们仅仅是因为我们投了弃权票而在中央委员会居少数地位，那么我就不明白撤出中央机构有什么意思，倒不如在中央机关内部和他们斗算了。

总之，和布尔什维克公开宣战的做法，对我们来说，是行不通的：（1）他们会利用俄国的报纸攻击我们，而我们只能以波兰语还击。对我们的反击，俄党既看不见，也听不着。（2）他们善于笔走龙蛇，炮制出许许多多粗制滥造的文章、小册子和整本的书刊，而我们只有可怜兮兮的一个半作者，光是应付目前《Przegląd 社会民主报》最迫切的需求，尚且不够。（3）下面这个理由，我个人认为似乎是最重要的：我们和布尔什维克的决裂，将会大大增加党内的混乱；而真正的赢家将是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是党的——也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因为他们充当着波兰社会党的保护伞角色。从心底里说，他们是我们最大的仇敌。

我猜想，对布尔什维克宣战的念头，主要是他们用鞑鞑马克思主义刺激人们神经的结果。这就有必要采用心理疗法，来治治他们的狂妄症。但是我认为，只要条件许可，从政治上来

〔1〕通过“国际”的斡旋调解，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内部的分歧得到了弥合，并且组成了一个联合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波兰党和（犹太人的）同盟党（Bundists），都被允许指派委员。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因此处在可以左右权力平衡的地位。然而整个妥协计划，于 1913 年宣告破碎。

讲，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中央机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的内部，和他们展开斗争。

考茨基将无条件地为《新时代》接一篇稿子，但是文章必须写得巧妙。依我之见，只要对布尔什维克提出善意的批评，不正式和它决裂，也就可以了。

关于布尔什维克的问题，我需要尽快得到一些情报。高尔基^{〔1〕}和波格丹诺夫^{〔2〕}邀请我去卡普里，到他们的学校发表演讲。因为他们出资，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到那里呆上一两个星期。但是，鉴于卡普里集团和列宁的敌对关系，我不知道这次旅行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和党团利益发生冲突。不过我想，作为一个整体的党和作为一个个人的我，对此事都可以说一句：“去他妈的。”不管怎么说，我都会等待你的回信，然后再通知波格丹诺夫。

〔1〕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9）：俄国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自传和小说《母亲》，一直被认为是经典著作。虽然高尔基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是列宁的朋友之一，他仍然反对俄国革命，尽管后来给予它以批判性的支持。起初反对斯大林，到19世纪30年代才停止公开批评。

〔2〕 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马林诺夫斯基断断续续地任列宁的幕僚、党的干部。

1908年（或1909年）

柏林弗里德瑙

昨天的谈话结束后，我心烦意乱，夜不能寐，以至到今天也没法工作。我不知道要求过多少次（但是看来还必须坚持要求下去），让你用书信的方式处理事务，以便让我拥有一个清静安宁的角落。我不需要那个房间，也不会去迈那个门槛。每当有人前来看我，我们就挤进卧室，目的不就是不用那间房吗？〔1〕话又说回来，这房子是我的，总不能让别人把它当成旅店，不经过我的同意就进进出出吧？〔2〕我再也没有力气来忍受这种情形了。我已经多次要求结束了断。整个夏天，我都到屋外去游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想看到屋里发生的事情！现在倒好，一切又重新开始了。……这种事情必须停止！我会为《Przegląd 社会民主报》和《Czerwony 旗帜报》尽我的所能；一旦需要，我也可以接手编辑部的工作。但是，我想单独享有我自己的角落！如果无法单独享有，那么我宁愿放弃整个套间，包括我请的保姆，去找一个带家具的房间。这样我就知道我是在家里，而不是在旅馆！这事儿有完没完，给我一个准信儿。我好决定到底怎么办。

〔1〕 这封信显然是罗莎·卢森堡和约基希斯绝交后写的。他显然还在用她的套房干党的工作。

〔2〕 约基希斯仍然拿着她的套房钥匙。

约 1910 年 2、3 月间

柏林

[卡尔·]李卜克内西^[1]的立场，可谓是一如既往：一忽儿左，一忽儿右。在普鲁士国会，他宣布群众罢工；在市政厅，他又跟我们的提议——“抗议禁止特莱普托集会”^[2]——唱对台戏，说我们不遵守禁令，因而行动是非法的。……

[亚瑟·]斯达德哈根两星期前来过。从跟他的谈话中了解到，他坚信群众罢工是不可能的；现在他想狠狠责骂他《前进日报》的同事，因为他们拒发我的一篇文章（我是有目的地交给他们的），而这篇文章整个媒体都转载了。

[亨利希·]库诺太激进了。但是这个库诺和整个编辑部的人员，都只不过是普鲁士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执委会的走狗罢了。后者的牛鼻子，说到底，也是让[工会的]最高委员会牵着呢。

[1] 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李卜克内西通常和罗莎·卢森堡相提并论。罗莎和卡尔之妻宋娅的关系特别亲密，后者基本上没有从政。在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活跃于政坛。1921年后，西奥多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从事律师工作的卡尔，入党后一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成员。1907年，卡尔·李卜克内西因他的《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而被判处叛国罪入狱。他是国会议员，也是第一个违反德国社会民主党纪律、并于1915年惟一投票反对政府战争预算的人。李卜克内西参加了斯巴达克同盟的创建工作，并且因为他的不懈的、大无畏的反战活动，成为群众心目中的英雄，和罗莎·卢森堡，乃至列宁和托洛茨基相提并论。在斯巴达克同盟起义过程中，他和卢森堡一同遇害。

[2] 位于柏林城外的特莱普托草坪，是举行五一节集会的老地方。

最近通过的钳制媒体的法令，是 [卡尔·] 列吉恩^[1] 一手促成的。因为我的文章的缘故，他对媒体进行了威胁。情况大致如此。全国的形势，一片高涨，史无前例，所以那件事情的意义，也不容小觑。在外省的压力之下，柏林将不得不向前推进。当然，就不要在柏林继续施压了。这个“头”只需往他屁股上踹上几脚，就会乖乖地跟上去的。

顺告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绝不能向尤里克 [·马契列夫斯基] 透露）：柏林方面问我是否愿意接受选区的一个训令，去参加国际代表大会，对执委会来一个示威。

[1] 卡尔·列吉恩 (1861~1920)：德国工会运动的总干事，也是支持战争的性格直率的修正主义者，党内的主要力量。1913年倍倍尔去世之后，弗莱德利希·艾伯特上台，列吉恩成了党的实际领袖。有趣的是，虽然他疯狂反对罗莎·卢森堡的群众罢工观点，但却是导致卡普暴动失败的总罢工的领导人之一。这场发生于1920年的右翼暴动，对魏玛共和国的生存构成了威胁。

约 1910 年 7 月 10 日

Aeschi

《多特蒙德工人报》没有接受我那篇讲巴登人民的文章（海尼施休假去了！），而且还把它转给了不来梅。鬼知道他们要不要呢！〔1〕这篇文章见不见报，对我来说，简直是太重要了！它必将给卡尔·考茨基及其一伙当头一棒。另外，我投给《莱比锡人民报》的那篇应和梅林的文章，也不知道命运如何。星期六我曾致电询问，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回音。

卡尔·考茨基自然虚构了那些“引文”。今天，我给他寄去了对他将是致命一击的更正材料。柏林方面写信给我，说他因为我的文章，已经变得有点儿神经不正常了。“每一个字都使他的头脑发昏，他用拳头敲打着桌子，新闻工作的规矩和基本常识，让他丢得一干二净。”显然，他已经发觉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万一卡尔·考茨基拒绝，我准备立即前往柏林，向执行委员会求助，给他施加一些压力（尽管这事儿有点儿像去找魔鬼的妈状告她的儿子一样），因为根据诽谤法，我是有权向他的指控提出索赔的。

我只寄去了有根有据的更正材料。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对他扔砖头，是极端的不合时宜的。在我们党内，你就是赢，也不能赢得太过分；过分了，别人是不会宽恕你的。即使现在，德国人的原则——“胜者必衰”，已经开始对我进行报复了。因

〔1〕 她的文章——《巴登人民的选择》，1910年8月发表在《不来梅报》上。巴登的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对州的预算进行了投票——此举违反了“本制度不谈钱”的原则。但是党的执行委员会，却很不愿意制裁这次违规行为。

为无论是对激进分子来说，还是对党来说，目睹卡尔·考茨基的完蛋，都将是一场小小的娱乐。顺告，[康拉德·]海尼施就我发表在《新时代》上的那几篇精彩文章，来电表示由衷的祝贺，说我“猜中了他内心深处想说的话”。

过一个星期，我将重返柏林，因为 20 号慕尼欧^{〔1〕}要带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来看我。

〔1〕 罗莎·卢森堡的兄弟。

1910年7月20或21日

柏林

附上两篇文章。^{〔1〕}至于它们的长度，我认为并没有超过规定。那篇讲工会的文章，我已经删掉了两页。如果还有可以割爱的东西，还可以再删。这篇文章也许没有再加工的必要，因为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重新写过。事实上，关于工会的那一篇，我一共写了两遍。目前的稿子，大部分是从信上直接抄录下来的，因为我觉得用这种办法，比用我自己的要更保险。我对这个题目不太熟悉。

《新时代》收到了，上面加有一篇长长的编者按。卡尔·考茨基在编者按中不单给我作了解释，而且还指责我“把个人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我准备在第二篇文章的脚注里予以回击（我已经拿到了清样）。现在，当务之急是写一篇关于巴登人民的文章，以堵住考茨基的那张臭嘴。星期六我肯定会动笔的。但是，现在我想求个清净，所以不要烦我去校改《Czerwony 旗帜报》那篇文章的芝麻蒜皮的问题，否则我哪来时间写巴登人民的文章？

如果文章必须删短，那么就把哥本哈根那篇的最后一页——讲妇女和青年会议的那节——删掉好了，那件事情只需一笔带过。

〔1〕这两篇论工会问题的文章，是用波兰语写的。

约 1910 年 8 月 29 日

哥本哈根

信中的那些个无休无止的侮谩和威胁，真是既烦人又累人。事实上，我已经没有力气，拖着自已满城跑了。这里的情形如下：支部^{〔1〕}已经成立，并且得到指示。目前，一切秩序井然。但是，因为人无完人，所以再好的指示，也无法防止人们不犯错误。听到〔卡尔·〕拉杰克在军事委员会犯下的愚蠢错误，我简直是惊得目瞪口呆！谁也没有料想到他会那么做。随后，我便去找法国人、德国人等等谈话，并且写了一份声明（拉杰克今天在分部宣读了）。不幸的是，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另一方面，尤里克〔·马契列夫斯基〕在另外一个委员会，似乎也（对捷克人）说了一些蠢话，而对于霍维奇“分裂工会运动”的拉票活动，^{〔2〕}却只字未提。所以，我今天还为尤里克写了一份声明，让他放到会议纪要里。我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关注我们的人犯了新的错误没有，然后给他们擦屁股。因为这些“右翼分子”^{〔3〕}的缘故，我就像被判了死罪那样，陷在了这个该死的委员会的泥淖里，完全没有可能为别的委员会做一点更重要的事情。^{〔4〕}我已经起草了一份关于死刑

〔1〕 在 1910 年举行的哥本哈根党代会上，社会民主运动的保守派势力占了上风，“国际”对军国主义的立场遭到了削弱，国际主义取而代之。波兰工党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那里组织了一个“支部”。

〔2〕 马克西米兰·霍尔维茨 - Walecki (1877 - 1937)：波兰社会党的著名党员，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国际，然而代表波兰社会党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却是霍维奇。

〔3〕 指波兰社会党的右翼

〔4〕 罗莎·卢森堡写了一篇题为“反对死刑”的著名文章。

问题的议案，由〔克拉拉·〕蔡特金今天以德国代表的身份在会上提出，那些右翼分子见势不妙，马上撤回了他们的议案，以免自讨没趣。我还必须为俄国分部向德国执行委员会起草一份宣言，对托洛茨基在《前进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1〕提出强烈的抗议。

在这风起云涌、惊涛骇浪的场合，对右翼分子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只可能像一只蜷缩在桌子底下的小狗发出的狺狺吠叫，被淹没在雷霆万钧的狂风巨浪的怒吼之中。我是说什么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的。一旦我开始做什么，我希望能够看到结果。在国际局下一次的正式会议上，我将不动声色地、坚定不移地提出这个问题。〔伊格纳茨·〕达苏思斯基〔2〕也在这里，他突然之间变得衰老了；卡尔·考茨基因患“完全性神经崩溃症”，不得不灰溜溜地提前退场。有些好事者已经在说，那是我的过错。星期六我争取回来。顺告，最好不要责怪拉杰克。那样做没有意义，而且他又是一个非常老实本分的人。最好也不要让尤里克发觉什么。

〔1〕此处指托洛茨基的《论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罗莎在列宁的合作下，当真起草了一份抗议。

〔2〕伊格纳茨·达苏思斯基是波兰社会党的一位知名党员，也是罗莎在波兰运动中的最著名的敌手之一。

约 1910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五晚
马格德堡或柏林

来信收悉。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条遭到了惨败〔1〕的落水狗那样。现在还真是没法跟你描述。

请读读《前进日报》上的报道，然后在星期六（也就是明天）来弗里德瑙，不过要争取 5 点钟以前赶到，因为我想早点儿睡觉。现在我只想做如下解释：跟我联名提案的人，逼迫我撤回动议，因为他们害怕会处在少数派的地位！……我倒想知道这件事情给人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其他面谈。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事先声明：我的身体处于崩溃状态。今后三到四天，任何工作一概免谈。我无法思考，无法睡觉，甚至无法吃饭。我定于 1 号对金属工人发表重要演讲。怎样才能准备好那篇稿子，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谜。这次党代会透支了我两个月的体力和健康。

那我就等到 5 点（请不要来晚了。等到我睡觉那会儿，时间肯定不会太早了）。

〔1〕 在马格德堡会议上，罗莎·卢森堡的激进的群众罢工提案，遭到了空前的惨败。由于党的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号召继续进行全民公决斗争的决议，左翼也因此顺水推舟，息事宁人。

1911年3月初

柏林

[克拉拉·]蔡特金来信说，她什么也没有收到。^{〔1〕}可能列宁根本就没有跟她联系，因为他听说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许他以为我们对考茨基有影响，所以就找他去了。我赞成派阿道夫[·瓦爾斯基]去向卡尔·考茨基解释形势。但是，这个解释一定要做得非常简单，因为一读到有关这件事的信件，就连我的头脑也会跟着发昏，没多一会儿，就不知道信上说了些什么了。露易莎[·考茨基]又来了。如有必要，我可以跟她谈谈，不过她常常曲解这类任务的意义，因此可能引起美好的误解。还是让阿道夫去的好。

我必须说明，这件事情——从他们那里抢一些钱回来——一点儿都没有让我觉得开心。党需要钱，这我十分清楚，但那是为了公益呀。在这类问题上，所有的感情因素，都必须退居二线。但是我必须坚持，我们一定不能互相踩对方的脚尖，而且位高则任重。恕我直言，这件事情，浑身都散发着抢劫和讹诈的恶臭。到头来，我猜想，布尔什维克会觉得，他们的身上沾满了吸血鬼，以至于宁愿和孟什维克公开一战，也不愿意跟我们党搞什么团结合作。要是这件事闹成丑闻，那我们在俄党中间的地位，将会受到彻底的动摇。丹他们^{〔2〕}肯定会利用一切机会，来离间我们，破坏我们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因此，先生们，一定要慎之，慎之，又慎之。……

〔1〕指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设立的一笔基金。尽管两党之间存在着正式的盟约，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仍然为了这笔基金的使用和管理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2〕费道尔·丹（1871～1947）：孟什维克成员，后在战争期间成为沙文主义者，并且反对布尔什维克。

大错特错！我无情地把执委会的摩洛哥问题传单撕得粉碎。今天我才了解到，那原来是卡尔·考茨基的手笔！〔1〕头号的劣作，而且我竟然还不知道是他干的。今天，他在《前进日报》用整版的副刊，杀气腾腾地对我进行攻讦。俄国的利益被搞得一团糟。

〔1〕指考茨基的《我们的摩洛哥——一份传单》。罗莎·卢森堡在她的《摩洛哥危机和党的执委会》一文中，予以了无情的抨击。就这一事件，罗莎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摩洛哥》。

1915年12月8日前

柏林

……我对未能及时得知 Zimmerwald 计划^[1]一事，深表遗憾。这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而且还是一场灾难，因为它把反对党和“国际”引入了歧途。我听说德国正在筹备一次大会，如果我们这次的行为，仍然保持温良恭俭让的态度，那么会议倒不如不开的好。问题在于，我们的同志认为，一定要尽快地做些事情，而为了做成“这些事情”，就一定不能得罪主流大众。这种谦卑的乞丐政策，是不可能带来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和行动的。为了不使未来的大会发展得对我们不利，有必要进行一些幕后政治。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可想，那么我们应当本着宁可失去“朋友”，也不能让他们捆住我们的手脚的态度。

在这次大会中，我们不应当去拉拢反对党，而是应当把战略转移到积极分子的物色方面，使他们成为团结在我们党纲周围的坚强核心。组织上的联盟，一定要谨慎对待，因为根据我多年从事党务工作的经验，所有的这类联盟，都会使一些原本具有战斗力的人最终瘫痪。……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像在过去的党代会上那样，采取“激进的决议模式”，来提出我们的党纲，因为在进行了无数次令人作呕的“修正”之后，我们得到的，只是一锅缺盐少料的汤而已。我们应当坚持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也就是说，即使碰到多数人的反对，也必须据守阵地。工人们，特别是柏林的工人，肯定会支持最激进的路线，因为他们对 [乔治·] 雷德布

[1] 指1915年召开的和平大会，左翼最终组成了共产国际的核心。

尔和〔亚瑟·〕斯达德哈根非常不满。心态游移者，总是跟随意志坚定者的，所以，考虑群众的因素，就要求对反对党的英雄们，采取不择手段的行为。

（以上郭颐顿 李映芳 译）

致考茨基夫妇

1899年12月30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这是在文明和野蛮的边界线上，向你们致以亲切的问候的。我的同胞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我自己也感到兴奋异常。这趟旅行非常有益：毕竟一句波兰语，胜过十句德国话。

[奥古斯特·]温特博士^{〔1〕}是一个礼貌周全、最值得尊敬的同志。他的太太做的一件小事，很有意思：在柏林见了我第一面之后，她就写信给她丈夫，说“罗莎·卢森堡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昨天，这里的同志们坦率地承认，说他们想象中的我有很大的不同：又大又胖！……我们只开了两次大会，但是他们每天晚上都为我举行“啤酒晚会”，有时是在卡托维茨，有时是在扎博……虽然这里的工人没有用大啤酒杯来喝香槟，但是 Ballestram 的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正在畅饮社会民主的甘露。

说正经的，这种私下的讨论对人们的影响，有时要比公开演说的影响还大。和其他的波兰人一样，他们都是一些情绪易于激动的人，因此个人接触就变得十分重要。每到一处，我都得讲述我是在哪里读的大学，读了些什么科目，多大年纪，在哪儿挣钱，家庭情况如何，不一而足。简直是又好笑，又感

〔1〕奥古斯特·温特博士（1866~1907）：为波兰工人聚居的上西里西亚地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缔造者，波兰社会党的反对者。

人。有些矿工下了班，浑身炭黑就赶来了。明天将举行我本次旅行的最后一次群众见面会（我准备元旦离开），也是在这家啤酒屋和本世纪的最后一次见面。

好了，祝新年快乐！祝考茨基一家三代吉祥如意！

你们的 罗莎

1900年7月13日

弗里德瑙

谢谢你们寄来的精美的明信片，得知你们在这个美好的季节，正在充分享受人生，祝愿你们前程似锦，并且锦上添花。

随信附上今天收到的〔弗兰茨·〕梅林的复函。从函中你们可以了解到我的文章的艰难历程。^{〔1〕}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奇怪的境地：因为梅〔林〕没有回答，所以我也无法〔将文章〕寄给〔亨利希·〕库诺；^{〔2〕}而且我还没法通知库诺，告诉他这一期的《新时代》不要指望我，因为我没有他的地址（我忘记把它记下来了）。我也没法向你——亲爱的卡尔——要他的地址，因为，信不信由你，在收到你的明信片之前，我把你的地址也给忘了。对于人名、地址和其他类似的细节，我的记性很不好使（波兰话叫“猫记性”）。

现在事情既然已经得到澄清，也就行了。如你所知，梅林和你均认为文章写得不合时宜。在和你谈话之后，我便意欲将文章束之高阁，让（在这个季节）蛾子去啃啮批评算了。^{〔3〕}我希望得到的，只是梅林的看法而已。然而，我之所以承认犯了战术性错误，只是看在政治运动的份上，和你本人也否认的

〔1〕不清楚是指哪一篇文章。如果指的是她已经发表的文章，那么很可能是6月份刊载在《莱比锡人民报》上的《论民族狭隘性的第一批苦果》。

〔2〕亨利希·库诺（1862~1936）：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种史学家，参加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一名社会爱国者和菲利普·沙德曼的支持者，1917年至1923年任《新时代》的编辑。

〔3〕此处借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句话。在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之后，他们决定不出版，并将手稿交由“老鼠去肉啮”。

党内的议会愚侏病无关。

但是，沐浴着七月的明媚阳光，处在大自然的浓绿、芬芳的阴凉的神殿（如你寄来的明信片上的森林）里，倾听着永恒的大海发出的喃喃细语，难道你还有必要为“议会愚侏病”去费脑筋，去争辩吗？我看还是放你一马吧。

那么就让我们来谈谈大海。在海水轻舔着你的双脚之时，你是否想到了那个美妙的希腊神话：一个双目失明的希腊歌手，在大海之滨拨响了他的琴弦，他把海水的冲刷声，误认为是人们的轻言细语；在唱完一曲最动听的歌曲之后，他没有听到群众的鼓掌，于是他痛斥听众的无动于衷，并在失望之余，奋力将琴抛出，希望将它砸碎。大海的波涛将琴接住，并且轻轻地摇撼着，载着它涌向远方。你还记得这个神话吗？

在大海之滨，你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幻觉：整个大海散发出一种新出炉的蛋糕、一种烤干了的海市蜃楼的味道，就像黑尔戈兰岛上的那位渔翁感觉的那样？〔1〕

我认为，面对永恒的、万古不变的、不偏不倚的大海，最撼人心魄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已经不复存在。在瑞士观看莱茵瀑布的时候，我也产生过同样的感觉。那一秒也不停、夜以继日、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咆哮，给了我一种灵与肉均遭毁灭的恐怖感觉。回到家里，我一蹶不振。甚至现在，每当我路过那里，每当我从车窗里看到那可怕景象，那飞迸四溅的水珠，那翻卷滚动的白色水帘，每当我听到那震耳欲聋的咆哮，我的心脏就像是被窒息了的那样。我的心里就发出一个声音：那就是敌人。

〔1〕“渔翁”指亨利希·海涅（1797-1856），德国最伟大的政治诗人，其最著名的诗歌包括《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你感到惊奇吗？那肯定是敌人——人类虚荣心的敌人。在此之前，人类一直自高自大，可是突然之间，他就分崩瓦解，变得什么也不是了。

顺便说一句，哲学当中也有类似的效果。对于世间发生的万事万物，本·阿奇巴^{〔1〕}说过：“此万古皆然矣”，“船到桥头自然直”，等等。人类的能力、意志和知识，都是多余的。……亲爱的查理曼，^{〔2〕}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这类哲学，并且坚持我们宁可从莱茵瀑布上跳下去，像坚果那样随波逐流，也不愿意装腔作势地摇头晃脑，看着瀑布奔涌而下的缘故。瀑布的奔涌，自我们远古的祖先那会儿就开始了，在我们死后还会继续下去。^{〔3〕}

〔1〕 约瑟夫·本·阿奇巴（17世纪）：犹太教士，也是犹太圣法纪传和犹太神秘教义的主要领袖人物。另外，本·阿奇巴也是卡尔·Gutzkow 剧作中的一个人物。

〔2〕 查理曼是考茨基的绰号，因其身材高大。

〔3〕 在他们的交往初期，导致考茨基和卢森堡日后分道扬镳的重大争议之一，已经出现。考茨基所持的广为人知的客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和罗莎·卢森堡的注重主观主义群众运动的观点相对立。

约 1900 年 8 月 9 日〔无日期〕

〔也许写于弗里德瑙〕

最亲爱的：

现在你们也许发现了你们的错误〔1〕。我给你们发的，是一封报告〔威廉·〕李卜克内西死讯的电报〔2〕，目的是想有利于你们安排行程，以便至少让卡尔出席追悼会。追悼会定于星期天中午 12 点举行。出席追悼会的还将有克拉拉〔·蔡特金〕。顺告，这事儿我还没有跟她说呢。……

老头儿之死，给我的震撼非常强烈。现在，所有的鸡毛蒜皮的矛盾，都业已烟消云散了，眼前我看到的，只是老头儿那健硕宽大的身影。啊，朋友们，我们周围的东西开始崩溃了。李〔卜克内西〕之死导致的精神损失，也许要比我们开初想象的还要大。老的一辈去了，新的一辈——哦，慈悲的上帝。……不久之前，在《前进日报》编辑部，我正准备离开，老头儿突然悄悄地对我说：“只要力所能及，我会尽力为你帮忙。我已经严肃提出，让你出任编辑，而且由你来掌舵，我将非常高兴。不管怎么说，只要你有轰轰烈烈的文章，只管交给我在《前进日报》上发表好了。《前进日报》的影响，肯定要比《莱比锡人民报》的大多了。”我答应他我会那么做的。未了，他发出了热情的邀请：他和他的太太随时恭候我的光临。

〔1〕李卜克内西被称为 *Der Alte*（从字面上来讲，就是“老头儿”的意思，也是“老板”的同义词）当罗莎·卢森堡在电报中说“老头儿死了”，考茨基夫妇还以为罗莎的父亲去世了呢，以至于致电哀悼。

〔2〕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参加过 1848 年的革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一国际的筹建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虽然这只是一桩小事，但是它足以使我感到欣慰，因为我是和和乎平地跟他告别的。「保罗·」辛格和我们，跟他讨论了有关省议会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还是等我们见面以后再继续谈吧。

现在谁来接替他在《前进日报》的位置？我认为，「弗兰茨·」梅林是最恰当的人选！然而不管是谁接手他的工作，变化都将是巨大的。可怜的老头儿，他却在出师未捷的途中倒下了。……

热烈地吻你们！什么时候来请通知我。我期待着你们的光临。

你们的 罗莎

邮戳为俄历 1905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

[明信片] 寄自华沙

最亲爱的：

昨夜，我安全地登上了一列没有暖气、没有点灯、由军队押运的火车。由于害怕受到“突然袭击”，火车慢得就像是老奶奶走路。城市静如坟场：总罢工，四下里都是兵。工作于今天开始，进展顺利。

最热烈的问候！

你们的 罗莎

邮戳为 1905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五
[明信片] 寄自（东普鲁士）伊洛瓦

最亲爱的：

坐在这里，吃着炸肉片和土豆，竭力不做“雕塑人”。〔1〕昨天整夜，我都呆在从亚历山德罗瓦开往托伦的慢车上，真是累得够呛。现在我在这里等候前往姆瓦伐的火车。前程如何，未有预卜。因为犹太法律的缘故，星期天之前是没有希望雇到马车的。〔2〕但是今天有火车去华沙，由军队押运！如果是那样，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面的悲喜剧色彩。整列火车都是军人，他们中间的惟一平民乘客，也许就是我。

然而，如果路上和罢工的铁路工人发生冲突，历史的笑话，将很容易变成一场惨案。希望到了华沙，我不至于受到勃郎宁手枪的迎接！

热烈的吻！

卢

〔1〕参考歌德的诗——“普罗米修斯”。因为罗莎·卢森堡是去参加俄国革命的，所以这个笑话只是说说而已。

〔2〕如果罗莎不在犹太人的聚居区，那么就是在犹太人的马车经营范围内。根据犹太人的法律，任何人都不得在星期六旅行。这肯定是造成她的滞留的原因。

1906年1月2日

华沙

最亲爱的：

这封信将会比较简短，因为我没有多少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努力了解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情况和总体形势。现在我已全身心投入工作。总体形势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但仅供你个人参考）：总罢工——特别是圣彼得堡的总罢工——差不多快要失败了。铁路工人根本不想将它进行到底。（所以说，捷乌茨^{〔1〕}提供的情报是不可靠的。）等待观望的情绪，到处可见。然而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罢工这个手段，如果单独使用，其作用已经寿终正寝。现在，只有直接发动一场全面的巷战，才能够带来革命。为此，我们必须积极准备，等待时机。这种等待也许会持续一段时日，除非有什么“事件”或者新的宣言之类的东西，突然地、自发地引爆革命。

总而言之，工作进展顺利，大家的情绪尚好，只是得不断向群众解释，为什么这次罢工斗争，未能取得任何明显的结果。各地的组织发展，可谓如火如荼，但是，由于时间仓促，状态都不很好。圣彼得堡的情况尤其混乱。莫斯科的情况好多了。他们采取的策略，把总体战略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彼得堡的领导班子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十分狭隘，简直荒唐可笑。（顺告，关于彼得堡的问题，捷乌茨曾经建议对它单独提供物质支援。我事后认为，即使从彼得堡方面

〔1〕列夫·捷乌茨（1858～1941）：为1883年建立的劳动解放组织的一位组织者，1903年成为孟什维克，1918年自动脱离政治活动。

来看，那种支援也是白搭。革命不可能在彼得堡一地取得成功，革命只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成功。)……

最亲爱的 [露易丝——原译者注]，这里一切还好。每天，城里都有一两个人被当兵的捅死，每天也都有人被捕。除此之外，日子还算好过。虽然实行军事管制，但是我们仍然在天天出版《旗帜报》，然后在街上兜售！一旦军管取消，我们的日报《论坛报》，将合法地复刊。目前，每天印刷《旗帜报》的事儿，都必须依靠武力——也就是拿着左轮手枪——在资产阶级的印刷厂里进行。军管一结束，开会活动也会立即恢复。届时再跟你细谈吧。这里天气很冷，出门靠坐雪橇。

就此收笔。吻你们俩和孩子们。请代问候格兰尼、汉斯、梅林、辛格和诸同事好。请立刻写信告诉我你们的近况、德国的形势、《前进口报》的事情，以及奥古斯特 [·倍倍尔] 是否还在骂人。平信请寄戈登堡，别忘了在信里夹一个信封。

此致

你们的 卢

1906年1月11日

华沙

最亲爱的：

我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盼来了你们的两封（短）信。因为马契列夫斯基刚好要回德国，所以我就没有给你们发电报。然而他的旅程，被耽误了好几天，这也是常有的事儿。希望他给你们捎去了我的问候，并且请你们把我要的东西用挂号信以商业文件的名义寄来，那样，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装在两个信封里面。我们这里只收到过一次《前进日报》（两份套红版的），自那以后，就什么也没收到过了！个中的原因，也许只有神仙和哥萨克才知道。我急切地想得到梅林的文章，因为他把卡尔的作品的出版都押后了！难道马契列夫斯基还没有动作？我这就写信问问他。露易莎，你也做做他的工作。

最近几天，这里来了一个孟什维克。我从他的嘴里套出了很多关于形势的情报，并且准备把它用在《前进日报》上。此外，我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想法：在这里为《新时代》定期写文章。主要是为了更好地阐述形势（但是这个目的不太适合《前进日报》）。如果有更多的时间，那该多好！

顺告，我从那个莫斯科人那里了解到，由于发现自己在上一次的总罢工中处于少数派的不利地位，帕尔武斯已经辞去了理事会主席和理事的双重职务。问题牵涉到怎么样为流产的罢工注入新生命的事情。帕尔武斯建议以莫斯科为榜样：宣布武装起义来挽救败局。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但是多数派则坚信，在现有的条件下，搞武装暴动是不切实际的。Parvus 解释

说，他充分意识到自己高估了对形势的了解，因此他很想多去摸摸情况，于是便辞去职务，专门去办报纸，结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顺告，此时此刻，整个俄国连一份社会民主报纸也见不到。所有的民主报纸都销声匿迹了；事实上，甚至连最惨淡无华、最反动的反革命报纸，也被禁止。（你大概已经听马契列夫斯基说，虽然如此，我们的《旗帜报》照样天天出版，并且在街上兜售。）

此刻的形势如下：一方面，大家都感觉，下一步的斗争，将会是武装冲突。对莫斯科以及一些最令人振奋的情况，我有相当的了解。（一俟得到准确、可靠的情报，再写信给你们报告。）眼下我只能说，在莫斯科，胜利的机会可能比失败的要大。步兵和哥萨克，整个都缺乏战斗力！只有炮兵和骑兵仍然“可以战斗”。革命派的损失，少之又少。资产阶级——即那些完全没有参加革命的人——反而承担了巨大的牺牲，因为那些上兵不仅瞎放枪，而且还毁私房。结果，整个资产阶级被激怒了，并且要反抗！为了武装工人，资产阶级捐献了大量的钱财。莫斯科的革命领袖，鲜有倒下的。但是，从一开始起，所有的社革党〔1〕对“闭门”会议，都表示不满。整个战斗都是由社民党〔2〕进行的。另一方面，选举和杜马已被列入日程。你也许已经听说了那个卑鄙的全民公决法。此外，在选举期间，军管法不会取消！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参加选举，可能要

〔1〕社会主义革命党，1901年组建，代表农民的利益，内部也不团结。1917年10月，其左翼和布尔什维克结盟，该组织即告分裂。因《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的关系，该组织退出政府。

〔2〕指社会民主党。

比在布里京^{〔1〕}召集杜马开会期间参加选举更应该禁止。哦，你们瞧瞧，为了参加选举，彼得堡的社民党已经决定利用另一种疯狂武断的计划：所有的人，不论其地位如何（外省将选民分成四等!!），都必须以全民公决的形式（根本不存在）参加投票。而且，只有选举人（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才可以当选。但是他们将不推选杜马代表，而是直接接管外省的政权。简直是鬼扯蛋！胡言乱语，不堪重复。那就是《火星报》派“战胜”列宁派的秘密，而且他们还非常的自鸣得意呢。不幸的是，我不能及时赶赴彼得堡，否则我定要粉碎他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些“另类人上”，处境就很尴尬了。具体来说，这个武断的计划在实施过程当中，将肯定会分崩离析，因为在赶第一趟选举会议的时候，大家就会感到不知所措，整个选举运动也就因此会转变为一场直接的斗争。但是，撇开我们和彼得堡的团结问题不谈，单独搞一套与众不同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对于这样的胡闹，我们不能参加进去。所以我想，我们也许会以四级制和军管法仍在实行为理由，婉言谢绝参加选举。

过几个星期，我将前往圣彼得堡。2月初，两大派别将坐下来举行首届联合党代会，协商选举事宜。我自然想去见识见识。而且我还认为，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那么它将有助于加强德国党派和革命的联系。这样做对于与会各派以及消除他们之间的磨擦，也是有益的。鉴于在现有的条件下，德国不会去彼得堡，鉴于其他人不会说俄语，建

〔1〕 亚历山大·布里京（1851~1919）：1905年任沙俄内政大臣，同年受命召集第一届杜马会议。根据收入的不同，选民被分为四个等级，每个等级选出同等数量的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推选议员。

议执行委员会授权我代表德国参加。不管怎么说我都在现场，所以执委会无需额外花费。如果你，亲爱的卡尔，同意的话，那么就请你去跟那些老爷们谈谈，我个人是不想去求他们的，主要是不想让他们认为，我在这件事中有什么私利可图。由于会议的日期还未最后确定，而且很有可能提前召开，所以希望你能抓紧时间把这事儿办妥。

在此期间，我已经完成一本论总体形势及对策的小册子，目前正在印刷之中。此外，一家德文周刊和工会周刊，也将于本周问世。因此，我正在焦急地等待《电讯报》^{〔1〕}和其他的工会报纸（奥地利）。

从健康上讲，我比想象的要糟糕。不时感到身体虚弱，但情况也在好转之中。每个星期和兄弟姐妹见一次面。他们纷纷指责我不注意身体，可我哪有时间顾得上？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都在干什么？卡洛鲁斯，你这会儿在写什么？亲爱的[依曼纽·]伍姆^{〔2〕}又怎么样了？《前进日报》的近况如何？布劳克^{〔3〕}被录用了吗？格兰尼和孩子们怎么样？在动荡和不安中，我时时都在想念着你们，亲爱的露露。敬请早复。千万个吻。

祝贺大家好！

你们的 卢

〔1〕《电讯报》是德国工会的中央机关报。

〔2〕参见1906年7月8日的信件的注释1。

〔3〕汉斯·布劳克原是罗莎·卢森堡的朋友，《前进日报》的编辑，后罗莎与之绝交。

1906年2月5日

最亲爱的：

久未通信，也许你们都在生我的气了吧。要是真的那样，你们也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出于辩解的目的，我可以列举我们这里不断遭受的无休无止的动乱和“朝不保夕”的生活。这些事儿我不打算细谈。还是说说大事儿吧：印刷厂的巨大困难，每天的逮捕，以及对被捕者的枪决威胁。我们有两位同志，头上高悬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长达数日之久。他们的问题，似乎至今还没有结束呢。

虽然如此，工作进展得还算顺利。成功的会议在工厂里召开，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传单印刷出来，尽管困难重重，报纸也是基本上每天出版。

目前，芬兰正在召开一个小型会议，所有的党派都参加了。^{〔1〕}它是“集团”概念的一个新变种，自然一事无成。然而在那里，你至少有机会更清楚地了解发生在彼得堡的情况。不幸的是，人们在那里了解的情况，似乎对《莱比锡人民报》最近发表的来自彼得堡的报道，进行了无情的嘲弄。组织内部混乱得无法形容，各宗派山头之间争吵不绝（尽管表面上团结起来了），而且还出现了普遍的压抑现象。此事请勿外传。

但是也不要过分的悲观。一旦有新事件浪潮的推动，那里的人们会以新的力量、新的激情站出来。他们现在的动摇，心态的不稳，着实是令人遗憾的。家庭聚会将推迟几天举行；但

〔1〕库卡拉会议，罗莎在此第一次约时间与列宁相会。1901年，他们在慕尼黑也见过一面。

是不管怎么说，首先要感谢长老们的问候，而且我会将他们的问候，适时地转达下去的。

眼下在彼得堡，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最棘手的问题，是大规模的失业引起的难以言表的苦难。实际上，我本打算就失业的问题简简单单地说几句开场白，然后便切入我当前最感兴趣的话题。但是我发现在这封信中，“事件”又要把我给吞噬了。

所以，我想走一步险棋，并且装模作样地问一声：你好吗，亲爱的露露？卡洛鲁斯给我写过几次信，这是千真万确的。为此我还感激不尽呢。在这动荡的年月，我的心常常被担忧和挂念所咀嚼，即便我没有写信的工夫。你突然之间变得怎么啦？到今天为止，我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影响那么持久，那准是很可怕的疾病。你现在出去玩吗？身体很虚吗？听着，在我跟你一起的那些个年头，你的身体和精神一向都是不错的。哪知我刚刚出来闯荡世界，你就突然病倒了！

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心里常常这样想：如果在那边，我就会每天在你的身边坐上几个小时，当你的贴身护士！现在，我希望你不再需要护理了。如果身体允许，请象征性地给我写上几句吧，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希望其他的人都好。孩子们还没有给我写信，有点让我气恼。这里根本没有收到过《前进日报》，就连《莱比锡人民报》，也来得断断续续。对我来说，今后的几天将决定我是短期前往彼得堡呢，还是先回家——回到你们的身旁——休息两个月。当然，就我个人而言，吸引我回家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探望你们。否则，说实话，我还讨厌回去做那份单调的工

作，继续跟波依斯和莱克斯豪瑟吵架呢。^{〔1〕}

言归正传，再说说失业问题。失业是革命的开放性创伤，而且目前还没有止血的办法！然而与失业共生的，是群众当中的一种默默的英雄主义行为和阶级团结的感情。我很想把它们介绍给可爱的德国人。各地的工人，自行达成各种协议，比如在职的工人每周把一天的工资送给失业的工人；如果上班时间被削减到每周四天，那么他们就会重新调整班次，每人每周少于几个小时，也不叫任何人失业。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方法很简单，进行得也很顺利，好像是天经地义似的，而且只是顺带着向党汇报一声。事实上，俄国工人之间的团结精神和兄弟情谊，是非常牢固的，就连我这样的亲自帮助他们发展这种关系的人，看到了也未免要大吃一惊呢。下面说说革命的一个有趣结果：在所有的工厂里，由工人推选出来的委员会，已经独立地“站立起来”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如工作条件、录用和解雇，委员会都管。事实上，厂主已经不再“当家作主”了。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有一家工厂的资方，想处罚几个很晚才去上班的工人，结果遭到了委员会的制止。资方不服，上诉到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状告工厂委员会“没有按照社会民主党的方针来办事”，因为社会民主党主张的是：勤奋、诚实地履行职责！类似的事例，层出不穷。

自然，等到革命结束、条件恢复“正常”之后，一切都会变得截然不同的。但是目前的局势，总不会连一点儿蛛丝马迹都不留下，就烟消云散吧。同时，革命取得的成就，也是十分巨大的——阶级对立日益深化，社会关系日益尖锐化和明朗化。然而在海外，这一切都无人欣赏！他们认为，斗争随着它

〔1〕 波依斯和莱克斯豪瑟是和罗莎·卢森堡唱对台戏的工会修正主义者。

的深化已经停止。在此期间，组织也在不屈不挠的发展。虽然有军管法的存在，社会民主党仍在积极地发展工会，而且做法也很恰当，会员卡是印刷的，图章、章程一应俱全，而且还定期召开会员大会。工作进行得好像是政治自由已经成了现实那样。当然，对于这样的群众运动，警察只能干瞪眼。比如在罗兹，社会民主党纺织工会旗下，就聚有 6000 名注册会员；在华沙有 700 名泥水工、600 名面包师，等等。但是在彼得堡，工作据说已经转入“地下”，因而陷入了停顿。他们在那里绝对不可能出版报纸，甚至也无法派发传单。希望我现在已在那里，了解更多的情况。……

你们的 卢

1906年3月13日收迄

最亲爱的：

4号星期天晚上，时运不济：我被捕了。我的护照已经加盖了回程的图章，而且正准备离开。眼下，只能够得过且过啦。希望你们不要过分地伤心。革命和革命带来的一切事物万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情愿坐牢，也不愿意回去吵架。他们常常让我觉得尴尬，不过别去操心。

现在我坐在市政厅里，“政治犯”、地痞流氓和精神病人，都挤在一起。我的牢房（平时堪称这里的一颗明珠），原是关押一个犯人的单间，现在则有14名住客，所幸都是政治犯。隔壁两边都是较大的双人牢房，每一间都乱哄哄地挤着大约30个犯人。听人家说，目前的这种条件，已经接近天堂水平了，因为以前一个牢房曾经关过60个人呢。夜里他们轮班睡觉，每隔几个小时换一班，没得睡的人就出去“溜达”。眼下我们都像国王那样斜着身子睡在木板上，挤得就像排列整齐的沙丁鱼。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将就得挺好，至少没有受到额外的吵闹的骚扰。比方就像昨天，我们房里来了一个新难友，一个犹太籍的武疯子。她不仅把几个政治犯都弄得涕泗涟涟的，而且还在牢房里叫呀跑的，让我们足足忙活了24小时。今天我们终于把她弄走了，眼下还有3个“myschuggene”〔1〕和我们在一起。

在院坝里放风的事儿，这里从未听说过。白天，牢房的门就被打开，犯人整天都可以在走廊里、在妓女中间游来荡去，

〔1〕意第绪语，意为“疯子”。

听她们哼唱快乐的小调，说着诙谐的谚语，并且闻着从大门洞开的茅房里飘出来的味道。然而我说这些，不外乎是想介绍介绍这里的条件罢了，我的心情良好，一如既往。我现在还在暂时使用假身份，但是恐怕瞒不了多久，因为他们不相信我。

一言以蔽之，情况很严重。但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凡是生存的，必将灭亡。”〔1〕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相信远期信用证或者公债的缘故。所以，请你们振作起来，其他的都对它嗤之以鼻。总而言之，我活着的时候，工作进行得异常的好。为此我深感自豪。在整个俄国，我们的所在，是惟一的一片绿洲，尽管也有风风雨雨，尽管也有紧张和压力，但是工作和斗争仍然保持旺盛的势头，其发展之迅速，就是比最自由的“宪章时期”，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别的姑且不谈，仅抵抗这个概念（今后将成为全俄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杰作。

至于身体，我目前还好。他们可能很快就要把我转到另一所监狱，因为我的案情很重。到时再告诉你们啦。

亲爱的，你们都好吗？孩子们，格兰尼和汉斯，你们在干些啥？请向弗兰西斯库斯〔2〕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希望《前进日报》因为有了坚强的〔汉斯·〕布劳克，情况又出现了好转。

你们的 安娜

[显然写于华沙监狱]

〔1〕 参见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

〔2〕 弗兰茨·梅林的绰号。

1906年3月15日收讫

最亲爱的卡尔：

只写几句。我很好。今天或者明天就要转狱。现在，只有一个要求：《莱比锡人民报》的记者——柏林的奥托·恩格尔曼先生〔1〕，也被关在这家狱中。（你当然是认识他的。就是那个在柯拿纳大街住了不少日子的金发男士。）要是现在《莱比锡人民报》的编辑们被问起是否确有此事，那么他们应当予以证实，说他在几个月前作为《莱比锡人民报》的记者被派往华沙。（如果有人问起同样的问题，只是当事人的姓名不同，那么他们也应同样予以证实。）我已经得到了家人的消息，很遗憾，他们对我的被捕感到那样的悲哀，并且为你们增添了无数的麻烦。我本人平静如水。朋友们坚持要我致电维特〔2〕，坚持要我给这里的德国领事写信。对此要求，我一概不予考虑！对于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合法庇护要求，这些先生们往往会拖上很久。革命万岁！快活一点儿，振作起来，不然我真的要生你们的气了。外面的工作进展得不错。我已经读到了一些新出版的报纸。乌拉！

你们的真诚的 罗莎

写于华沙监狱

你们的信可以直接寄给我收。用不了几天，收信人的地址就可以写：华沙，Ozielna街，Pawlak监狱，政治犯某某收。

〔1〕 利奥·约基希斯使用的假名。

〔2〕 谢尔盖·维特（1849~1915）：1905年至1906年任俄国总理大臣，镇压1905年革命的刽子手。

[明信片上未署日期] 1906年6月11日

邮戳为：黎万托

最亲爱的露露：

今天收到一包你寄来的书籍（邮票被人小心地撕掉了，所以看不出邮戳上的日期）。万分感谢。

现在我想趁早再请你寄一份 [古斯塔夫·] 施穆勒论政治经济学的那篇文章的摘要，是发表在《袖珍手册》上的。你上次寄来的摘要，跟我需要的不是一码事儿。我要的不是他给政治经济学下的定义，而是他那段关于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为什么只能够在18世纪崛起的解释（即为了满足建立在现代中央集权基础上的政府需要）。劳烦你把那份摘要以信的方式寄来！

等一会儿或者明天，再给你写一封更为详尽的信。这张明信片只是为了宽慰你，报告书籍已经平安抵达。拉瓦锡^[1]说得没错：世界上的物质，是不会消失的。只是有的时候，物质运动得太慢了。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匆匆即此。

你们的 卢

[1] 安东尼·拉瓦锡 (1743~1794)：法国科学家，基本上可称为现代化学之父。他驳斥了燃素学说，并且还撰写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在恐怖统治时期，拉瓦锡被杀。

1910年3月17日

最亲爱的露露：

目前我的生活一片忙乱，完全抽不出空来给你写信，虽然心里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愿望。好了，说说“战区新闻”吧：卡尔〔·考茨基〕打回头的那篇文章，已经作了修改。^{〔1〕}现在文章像样多了（更明了，更尖锐），并且已在《多特蒙德工人报》（康拉德·海尼施主编^{〔2〕}）上发表。莱比锡和不来梅方面已经转载，希望其他地方也这样做。

前天，即15号，星期二，安排了48场晚间会议，目的是要防止明天——18号——可能发生的一些活动。发言者多半是工会干部，充其量不过是四五流的水平。另外，《前进日报》已经发表社论，禁止会后上街示威游行。12号那天，我在学校^{〔3〕}了解到，他们差一位演讲人。我当即接受邀请，并于那天晚上在第四选区发表了演讲。听众人数之多（大约1500人），差一点儿令人窒息。大家的情绪，饱满高昂，所以我的利剑一出鞘，马上博得满堂喝彩。汉斯〔·狄芬巴赫〕、^{〔4〕}格特鲁德〔·兹罗特科〕、^{〔5〕}柯西亚〔·蔡特金〕和〔古斯塔夫

〔1〕 罗莎·卢森堡的文章——《下一步怎么办？》。

〔2〕 康拉德·海尼施（1876~1925）：曾为许多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撰稿。他战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成员，后蜕变为沙文主义者。

〔3〕 指1906年成立的那间党校。1907年，罗莎·卢森堡成为该校教师。

〔4〕 汉斯·狄芬巴赫（1884~1919）：内科医生，在罗莎·卢森堡和约基希斯及柯西亚·蔡特金断绝关系之后，成为她最亲密的男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

〔5〕 格特鲁德·兹罗特科：罗莎的保姆。

·] 爱克斯坦^[1]，都前来捧场；后者自昨天起，便转而支持我的观点。这可是他亲口说的。

昨天，我接到柏林的一个紧急电话，同时也收到一封埃森的来信，请我去讲群众罢工的问题。我正在考虑是否辞掉学校的工作，深入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过几天再给你寄我的文章。期盼早复。很想念你！

匆匆吻你。

你的 罗莎

[1] 古斯塔夫·爱克斯坦（1875~1916）：《新时代》的合作者，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的信徒。

[明信片，未署日期] 1910年4月13日

邮戳为：多特蒙德

最亲爱的露露：

一切顺利。开完8个会，还剩下6个没开。每到一处，我都发现，同志们无条件地、热情地赞同我的观点。对于卡尔的文章，^{〔1〕}人们则耸耸肩膀了事。特别是在基尔、不来梅、多特蒙德和索林根（和〔威廉·〕狄特曼一起），我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最好笑的是，克拉拉写信告诉我，地委书记瓦斯纳（！）在一次大会上，用最尖锐的语言，公开对卡尔的行为表示惊讶。

顺告，我当即就知道自己是不会得到清样的，^{〔2〕}因为卡尔本想尽其所能地阻止我的反击；另外，让一篇文章出现在两期报纸上，也不是你所说的“伍姆所为”，而是卡尔本人的行为，目的还是没有变。告诉他，我完全懂得怎样根据这些小心眼的事情，来评估忠诚和友谊。但是，他勇敢地在背后插我一刀的做法，的确使他自己的掉进了开水锅里。你好吗？我的咪咪又怎么样了？^{〔3〕}给我写几句吧，可以请海尼施转交（德累斯顿大街16号）。我要在这里呆到16号，然后再出去旅行。

吻你并祝你和孩子们好！

你的 罗莎

〔1〕指考茨基针对罗莎·卢森堡的《下一步怎么办？》作出的反应文章。

〔2〕指罗莎·卢森堡的文章——“Ermattung oder Kampf”（《是磨擦，还是斗争？》）。

〔3〕咪咪是罗莎的猫。在此后的书信中，它将扮演重要角色。

[未署日期]

邮戳为：1910年9月9日弗里德瑙

最亲爱的露露：

凡是你认为是对的，我也说好。要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始终如一。^{〔1〕}你现在觉得如此的悲苦，也教我心碎。你的确没有悲伤的理由。你一定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悲观地看待世界。你要静观一切，保持乐观！此时此刻，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莫过于不能安慰你，不能使你破涕为笑。再见了，快活点儿。

你的 罗莎

〔1〕 这封信标志着罗莎和考茨基的最后决裂。俩人之间的分歧一直在扩大，在关于群众罢工的辩论中，考茨基以“磨擦战略”相迎击，从而使矛盾公开化。虽然罗莎和卡尔·考茨基决裂了，但她和露易莎仍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未署日期]

1911年夏

最亲爱的露露：

收到你的来信时，因得赶赴科沃布热格去两天，所以迟复。眼下，我安坐如山，也没有旅行计划（除了出去鼓动宣传以外）。我觉得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虽然热浪滚滚，但我还是在勤奋工作，当然大都不是为了《莱比锡人民报》操劳。不过我还是想随信给你附上一支小小的飞标。^{〔1〕}它可是为我从党的执行委员会那里赢得了无数的美誉的哟！顺告，《前进日报》对那篇文章，马上采取了类似的态度，虽然它没有提为什么要那样做。

〔俄党〕内部的混战，我也没有听到多少。虽然利奥〔·约基希斯〕在那边，但是他忙得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他的地址是：巴黎皇家港39号J.哥登堡先生转利奥。

理事们^{〔2〕}的有力行为，对列宁他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屈服了，并且放弃了捣毁新成立的机构的设想。另一方面，孟什维克则处在几近癫狂的状态。在严词拒绝长达18个月之久以后，现在他们心急火燎地主动提出，要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或者党代会。这种闻所未闻的做法，自然只能起到加速分裂，侮辱布尔什维克、波兰党人和统一委员会的作用。

我们的朋友托洛茨基，正在越来越清楚地展现他那副丑恶

〔1〕无疑指罗莎·卢森堡1911年6月发表在《莱比锡人民报》上的、题为《为我们的权力而奋斗》的文章。

〔2〕卡尔·考茨基、弗兰茨·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为俄国基金会的理事。

的嘴脸。早在技术委员会从列宁那里取得独立的财权，以便可能向《真理报》^{〔1〕}提供钱物之前，托洛茨基就已经开始用最卑劣的手段，在《真理报》上向该委员会和整个巴黎会议开火了。他用了很多诸如“党的分裂分子”之类的字眼，来谴责布尔什维克和波兰党人，但是对马尔托夫^{〔2〕}反对列宁的小册子，却只字不提。这本集天下卑鄙之大成的小册子，显然是以分裂党为目的的。总之，一切乱作一团。要是党代会能够早点召开就好了！不管怎么说，如果双方联合召集会议，那么党的团结还是有救的。

说到那幅画，我正在焦急地等待聆听汉斯〔·考茨基〕的高见。^{〔3〕}我只担心，你已经让他对我偏心眼儿了。现在，我根本没有时间绘画。过几天，克拉拉还会来的。昨天，汉尼斯〔·狄芬巴赫〕又一如既往、垂头丧气地走了。尽快给我写几笔。

千吻万吻！

你的 卢

〔1〕《真理报》为布尔什维克的法定日报，1914年创刊。多年来，它屡经查禁，又屡次复刊，但名称有所不同。它至今仍是俄国共产党的官方报纸。（原注如此。——译者）

〔2〕马尔托夫（原名尤里·奥西波维奇·采捷尔报姆）（1873~1923）：孟什维克领袖，早年和列宁志同道合，关系十分亲密，后来在俄国运动中成为列宁的主要对手，1920年移居德国。

〔3〕罗莎·卢森堡最热衷的爱好之一，就是绘画，并常常将画作拿给考茨基的兄弟汉斯（1864~1937）评价。汉斯是一位职业画家，布景设计师。

[未署日期] 1911年8月中旬

弗里德瑞

最亲爱的露露：

今天。我突然从惊恐中醒来。差一点儿来不及向你道一声“生日快乐！”了。我的心里是多么的难受，简直无法形容。但是我的借口，总是多多。在过去的5天中，每一天我都想着动笔，但就是像鬼使神差似的，什么也没写。自从党的执行委员会发布宣言，抗议摩洛哥事件〔1〕以后，我便天天收到邀请我去演讲的电报和专递邮件。虽然我一概予以婉拒，但是这样一来，时间反而花得更多，因为我得一封一封地写信道歉。另外，我的兄弟和兄弟媳妇，前天也不期而至。还有，汉堡来了个信使，说〔凯撒·〕威廉将去那里，因此要我也动身前往。这事儿就发生在我准备搬家的前一天，你说我狼狈不狼狈！这样的聚首，只需一次，就足以让我当一名共和党了。但是我还是同意前往。然后，伊达〔2〕因为准备搬迁，把家里折腾得天翻地覆。你说我被弄成颠三倒四的样子，还有什么可奇怪的？所以尽管为时已晚，还是让我拥抱拥抱，亲你一下吧。不要生我的气。

你平常都好吗？自从收到你那张小小的卡片以后，我就什

〔1〕指第二次摩洛哥危机。1911年7月日，德皇派遣“豹”号巡洋舰至阿加迪尔，以“保护”德国的利益。劳埃德·乔治发表的那篇完全出乎意料的煽动人心和爱国的演说，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有条件地支持德国的立场。罗莎认为德国政府是在蓄意挑战，并对它及修正主义者提出了严厉的指责，而采取民族主义立场的修正主义者，正在谋求弥补党在1907年选举中遭受的损失。

〔2〕罗莎的保姆

么也没有得到。谈谈热浪怎么样？也许你期待着在这里发现一具使你隐隐约约地想起住在柯拿纳街上的那位花容月貌的朋友的焦尸或者白骨吧？虽然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我还是快活得像一只云雀，而且身体状态也不错。我6点钟起床，每天洗两次冷水澡（泡浴缸），感觉神清目爽，做的工作常常让别人斗得鸡飞狗跳。总的来说，我发现，即便是在最可怕的炎炎盛夏，柏林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城市，只要你眼不见热，就心里不烦。我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克拉拉·蔡特金来过，只不过是像跑龙套那样，从我身边一闪而过。她精神矍铄，兴致勃勃，虽然也生过几次病。

俄国的事情，给她和我的“假期”，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影。注意，由于尊贵的“理事们”美美地犯了一个大错，以至于我这个“不偏不倚”的人，竟然也从心底里赞成多党派合作开会的方案！其他的两位理事不知道会不会气得肝病发作？我知道有一位已经提前得了肝病。^{〔1〕}因为在我看来，那将是会议惟一的具體结果。自然，只有一小撮流亡海外的斗鸡，才会赶来赴会，叽里呱啦地争取德国理事们的聆听和同情。只有纯粹的疯子，才会期望那群公鸡能达成什么协议呢。他们的分歧已经根深蒂固，而且一个个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开展一场大辩论，只能够给他们提供一次宣泄新仇旧恨、火上浇油的机会。保持团结的惟一方法，就是促成一次大会，让俄国各方的代表前来参加。因为俄国人民都是要和平、要统一的，所以他们是惟一能够让那群流亡斗鸡理智起来的力量。因此，只要你坚持召开这种党代会，别的事情就把眼睛、耳朵和鼻子全都闭上，不必过问。我以为这是能够采取的惟一正确立场。

〔1〕指卡尔·考茨基

不幸的是，和德国人重新开会的主张，在俄国人当中制造了相当大的混乱。托洛茨基在“绝密”信件中吹嘘，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能够拨乱反正的伟人，非他莫属！那些支持他的孟什维克，因此大受鼓舞，并且开始抵制计划召开的大会；而布尔什维克和波兰党人，则完全为谣言所迷惑。

哦，希望一切都会过去。但是与此同时，就连像我这样驯服的羔羊，也在遭受专递邮件和电报的轰炸。大家要求我解释，这个那个是不是事实，这个那个又该怎样理解，而我本人对那些事情，也是一窍不通的。正如我们那位可怜的鲍鲁斯〔·辛格〕经常说的那样：“我的脑子里可以想象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这件事情和其他许多事情上，他说的都没有错。

至于别的嘛，这里冷冷清清。汉尼斯去了弗利姆斯。顺便说一句，他寄来了聪德尔〔1〕给他画的肖像，让我比较比较，倒也给我增添了不少的乐趣。你要是来，我肯定会拿给你欣赏的。

对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呀？因为凯撒的原因，我大概要推迟到30号才能搬家。你准备参加妇女大会吗？你能想象我变成了女人吗？我收到了参加大会的证件，因此8号必须动身去耶拿。但是在那之前，为了得到更多的乐趣，也是为了缩短逗留的时间，我将去杜塞尔多夫，给选民发表一个讲演。盼复。

寄上许多个吻。问孩子们好。

你的 卢

〔1〕指克拉拉·蔡特金的丈夫。他本人是一个艺术家，并且经常是罗莎的画中人。

1917年10月11日

布累斯劳

最亲爱的露露：

刚得到消息，说汉尼斯^{〔1〕}阵亡了。我现在无心多写。

你热情的 罗莎

〔1〕即狄芬巴赫。

1917年11月15日

最亲爱的 [露易莎]:

便函收悉，万分感谢。对不得不冒昧向你披露噩耗的做法，深表歉意。我也是同样得到那个消息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形（就跟碰到大手术时一样）下，采取直截了当的、不加掩饰的做法，反倒是一种解脱。我自己也无以言表。

我只希望现在能够跟你和汉斯呆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三人围绕着他织就的友爱氛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使他永生。

我至今无法从这无比的震惊中摆脱出来：这事儿可能吗？好比一句话说到一半，就戛然而止，一根琴弦在演奏之中，就突然崩裂那样，而余音却依然回响在我的耳际。

我们为战争结束之后的生活，制定了千万个计划。我们期待着以前所未有的激情，“享受生活”，旅游，读书，赏春。……我无法理解：这事儿可能吗？就像一朵突然被人掐掉、然后又加以践踏的鲜花。……

最亲爱的，冷静点儿。人应当保持骄傲和含蓄的本色。但是，我们一定要团结得更加紧密，惟有这样，才能够体会到“温暖”。以最诚挚的爱拥抱你和汉斯。

你的 卢

1917年11月24日

布累斯劳

最亲爱的露露：

……你为那些俄国人感到欣喜若狂吗？当然，他们不可能在这个魔鬼的聚会中坚持多久。但是，这并不是因为统计数字显示，俄国的经济发展落后（就像你那位聪明的先生计算的那样），而是因为西方的社会民主运动人士里面，不乏可怜的鼠辈。他们眼睁睁地呆在一边，看着俄国人流血牺牲。但是，这种牺牲，比起“为祖国而活”，要强上百倍。这种牺牲，具有开创世界历史的意义。英雄的事迹，将流芳万世。对今后的几年，我有很多宏伟的展望，但是我最真切的希望，是能够从铁窗外面来欣赏历史。

最亲爱的，要冷静，要坚强。不管风吹浪打，让你信步依然。期盼早复。拥抱你。

你的 卢

（以上郭颐顿 李映芳 译）

致汉斯·狄芬巴赫

1914年11月1日〔1〕

我最亲爱的汉尼斯：〔2〕

今天是个好日子！好几个星期以来，我都在心里为你构思最华美、最详尽的书信，尽管还没有来得及把它们写在纸上，这件事就像是一块石头，压迫在我的心上。但是，尽管一切工作都已陷入了停顿状态，我依然还是鲜有宁静和清闲。但是现在好多了。我又一次决定开始“新的生活”：早早上床，闭门谢客，拼命工作！但是难啊！给你写的这封信，就是“新生活”的第一步。你以前托汉斯〔·考茨基〕送来的两封长信，

〔1〕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人公爵法兰西斯·斐迪南被刺，这场危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各国相继实行总动员，虽然避免战争的谈判斡旋也在进行之中。在第二国际执行局，这类谈判也在进行。但是欧洲各国，似乎为一股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浪潮所席卷。8月4日，战争预算问题摆到了德国国会的面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政府的拨款要求。具体上讲，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二国际的死亡，并且使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意识形态、反对立场和国际主义等等产生了疑问。社会主义党人的新政策，就是宣扬“内部停火”，其意思不过是在欧洲冲突期间“暂停阶级斗争”。后来，8月4日就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叛变”联系在一起了。

〔2〕Hannesle（汉尼斯）是Hans（汉斯）的异体字。另一个异体字是Hanschen（汉森）。罗莎在以后的许多书信中，经常使用这个名字。狄芬巴赫是医生，卢森堡的挚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

带给了我无限的喜悦。至少我可以想象。你生活得怎么样，在做些什么，……

首先，如你所愿，写一点我自己。时至今日，我原来的那种绝望情绪，已经有所改变。这倒不是因为我现在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局势，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高兴的理由。都不是的。一旦打击成为家常便饭，那么你对所承受的第一击的疼痛，也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毫无疑问，党和国际出了乱子，而且出了大乱子。但是，这一灾难的规模，反倒使它成了一部世界史的话剧。在它的面前，客观的历史评价得到了恢复，个人的不满遭到了取代。当然，那种有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痛苦，即旧“朋友”的诡譎和卑鄙，以及新闻界所表现出来的闻所未闻的堕落，依然存在。然而，面对着这一切，我的心中更加确信，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制止这些丑恶，那么我还是可以寻找其他方式，比如读一本好书，金秋漫步（就像以前我和汉尼斯、你，踏着庄稼茬子闲庭信步那样），甚至听听音乐，来满足自己那有节制的需要。啊，音乐！久违了。我现在是多么想欣赏它啊！但是时至今日，我还是欣赏不到它。起初，只是一连几个星期没有音乐。后来，所有的剧场和音乐厅，都变成了政治集会和抗议的场所。现在，又可以试一下了。可是，汉尼斯没有去买票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人没个伴儿，听音乐也没意思。

最后，说说汉斯〔·考茨基〕吧。上星期他送来了你的信。他看上去精神饱满，红光满面，更加的青春年少了。罗马之行，对他大有裨益。就算撇开那个不谈，他留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愉快的。我当即答应有空去他家里玩，只是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时间。也许明天我会过去。他答应每天为我演奏两个小时，只要我去他家。也许他已经跟你提起过他的孩子：格蕾特是一位腼腆得可爱的斯洛伐克小伙儿的未婚妻；弗里兹是一名

英俊潇洒的中尉，罗伯特是一个出色的画家；只有小汉斯目前还是一个乖乖崽。不过他在给罗伯特的信中捉弄他的老爸，结果信让他那位可怜的老爸看见了。据汉斯说，露易莎的情绪非常低落，所以叫我最好别去；就连打电话交谈，她也应付不了。下个星期，他们（汉斯和露易莎）又要驾车去南方了。我真是羡慕他们。卡里在法兰克福/美因地区干得不错；本德尔自从得了斑疹伤寒之后，肥得像头小猪；费利克斯还是那个老样子。总之，考茨基家族虽然经历了枯容盛衰，但是仍然人丁兴旺。

上周，克拉拉〔·蔡特金〕在我这里住了6天。她的形容枯槁，身体很糟。柯西亚仍然在家，并在编辑部上班。麦克西姆又有一个月没消息了。是的，我又得到了可爱的美迪的生命迹象。她生病住院的事，你是知道的。现在她又回家工作了！布兰德尔的父亲，上个礼拜终于和克拉拉一起来了。那个可怜的家伙变化可真大，半张脸都动弹不得。他给我看了布兰德尔写来的信，真的有趣极了。小伙子在那边干得有模有样的。他离你不远，地址是：18集团军25师116现役团6连。收到你的信，他肯定会很高兴的。

库尔特·罗森费尔德^{〔1〕}经常跟我通信。他在东部，不久前在 Wilkowsky 当军需官，负责给犹太教和非犹太教肉食制定销售税，还搞抄家和其他类似的司法工作。后来他参加过一场血战，历经艰险恐怖，我想他现在又回到德国了吧。他的思维依然犀利，且身手敏捷，自然也是忠于国旗的。

你说你想知道我在做些什么，特别是在写些什么。首先，

〔1〕 库尔特·罗森费尔德（1877～1943）；罗莎的律师和朋友之一。1918年以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身份，进入普鲁士司法部；1920年又以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身份，成为国会议员。1922年，重新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我想完成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是一件好事，虽然它纯粹是出于我个人的经济背景。这项研究将会持续数月。你知道，在这战争年月，加上党校停课了，如果不是因为没完没了从早到晚的接待、大会、小会，我本来有充足的时间来干的。但是现在，这项工作，如我所说，得停下来。当然，我还想写一篇研究战争的文章，你可以想象，这种文章很快就会变得非常必要的。^{〔1〕}

目前，当然啦，正值“内部停火”阶段。不过，从内心里讲，我们在苏德坎姆^{〔2〕}之流的手下，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但是从总体上看，我的情绪正在变得越来越高昂。无论是从纯粹的理论角度，还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说，我都对这个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正如德梅尔^{〔3〕}——那个被征召的“志愿兵”——曾经唱道：“我的女人，只要我们有一点儿时间，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时间！”所有的德意志诗人、艺术家和学者的宣言，有朝一日将汇成一部世界一流的人类宣言。^{〔4〕}

似乎用不了多久，我就得把自己的“内部停火”搬进象牙塔里去。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无法假装对此感到特别的高兴。6个月以前，我像期盼节日那样期盼它的到来；然而今天，这份荣誉落到了我的胸前，就像铁十字勋章挂在了你的胸前一样。我只能够自己安慰自己，等到战争结束，我将又可以呼吸

〔1〕 首次暗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年手册：论社会民主运动的危机》。在这本文笔生动的反战册子里，卢森堡主张应当把反战斗争，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2〕 艾伯特·苏德坎姆（1871~1944）：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人，1918年任普鲁士财政大臣。

〔3〕 理查德·德梅尔（1863~1920）：德国前卫派诗人，《新时代》是他呼吁八小时工作制的劳工诗之——战争期间当过军官。

〔4〕 两大阵营的作家和学者，联合起草并签署了为各国的事业而辩白的宣言。

到自由的空气了。届时，我们将同时挺进首都：你头戴胜利者的橡树叶花环，我则一身洁白，做你的女傧相。事实上，国会里的那帮奸贼，昨天在宣布实行物价管制的时候，预计战争将持续到1915年的秋收。英俄的报界，也以为然。天下果然大乱了！人们都在问：粮食储备能挺得住吗？我倒想问问：官兵的神经挺得住吗？但愿上帝将你平平安安地留在那个好客的农妇家中，让你一往情深地替代那位出门在外的丈夫。你在上一封信中说，你毕竟还是在虚假的面纱下面，发现了几个具有同情心的灵魂。真为你感到高兴。如有可能，欢迎继续来信。你的信一到，我这里就有了庆贺的理由。就连咪咪也高兴地跟着嗅个不停呢（她说她是在“读信”）。

格特鲁德〔·兹罗特科〕15号就走了。但我还是能够自食其力的。别为我担心，汉尼斯，我会好好地过下去的。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暴发的征服者——愿意每个月扔掉一张100马克的纸币的话，那么请告诉我，能不能将它捐给一个想读大学又没有钱的天资聪颖的年轻人？如果他能够因此而利用这个战争岁月，说不定日后还能谋上一份好差事呢。顺告，格特鲁德给你写过信，并对你的沉默满腹牢骚。好啦，让我和咪咪致你以最诚挚的问候。期盼早复，不管是否收到这封信。

你的 卢

1917年1月7日
佛龙克波森要塞

汉森，今天是星期天。对我来说，星期天总是一个讨厌的日子。自从被关押到这里以来，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点像“那个拿撒勒的上帝那样可怜，那样的离群索居”。由于这个缘故，一个感觉油然而生：今天我一定要给汉森写封信。我沉默了那么久，让你生气了吧？虽然如此，每次收到你的来信，我都乐不可支，常常因为信中说的事情笑弯了腰，也常常想念你。汉森，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再在一起重温苏登德的美好夜晚？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再喝着无数杯的浓茶，朗诵歌德的诗歌，而我和咪咪则在一旁快活得懒洋洋的？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再争论天文地理，至夜方休？什么时候才能够再看到你惊奇地瞥瞥手表，然后一把抓过帽子，疯也似地向着火车站飞跑，到拐角处还不忘给我吹一声《费加罗》的小调？

我担心，战争结束以后，宁静和舒适将不复存在。天哪，我一点儿也不想去参加即将到来的打闹！身边永远都是同样的谦谦君子，同样的“天生睿智”的柏林的阿道夫·霍夫曼^{〔1〕}和他那难以言表的东西（对不起！），他穿的裤子就像是两根垮塌的陶立克柱子；永远都得看“烧饼神甫”^{〔2〕}戴的那顶褐色

〔1〕阿道夫·霍夫曼（1858～1930）：参加过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Zimmerwald大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大会。1920年加入KPD，1922年又回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出身贫寒，常常遭到资产阶级的刻薄嘲弄，其语气跟罗莎此处使用的大同小异。《魏玛宪法》之父雨果·普鲁斯穿的裤子，也曾被凯斯勒伯爵讥讽为“螺丝刀”。

〔2〕指社会民主党人威廉·Planckuch

的豪华宽边礼帽。想起这些事情将不断地围绕着我，至死方休，我就不寒而栗。“宝座崩塌，王国倾覆”，这个世界已经被掀得个天翻地覆，可是我却永远跳不出这个“恶性循环”。永远都是这么十来个人，变来变去都是老样子。所以还是听任不测事件的摆布吧！我还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因为你知道，我也是有七十二变的可能的。

我终于为你找到了一份恰当的差事，或者说是一门副业！你的主要任务，过去是、现在还将是为我的现世生活带来光明和欢愉，或者就像你在上一封信中所说的豪言壮语那样，做我的宫廷小丑。除那以外，你还得帮我们创造一种目前德国文学界还不存在的文体：文史体散文。

这种文学形式，绝非像弗兰茨·布雷伊^{〔1〕}想象的那样，是各界精神阳痿者的避难良所。散文和音乐中的浪漫曲一样，是一种完全合法的艺术形式。为什么在英国和法国生发得如此绚丽多彩的散文，在德国就完全见不到呢？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德国人的书呆子气太浓，而灵气又太少的缘故。如果他们知道些什么，马上就可以弄出一篇思想深邃的论文来，里面塞上几麻袋的引证，可就是不懂得怎样去写一篇轻松愉悦的速写。所以，鉴于汉森的灵气多过知识的事实，他似乎是将优美的散文引介到德国的最理想人选。我说这话，可不是开玩笑的！战争结束之后，阁下，你那种凤蝶一般翩翩飞舞在花坛草丛之间的生活必须结束。如果愿意，不妨找一本陶赫尼茨主编的《历史与批评散文集》来，仔细读读麦考莱^{〔2〕}的作品。

〔1〕 弗兰茨·布雷伊（1871~1942）：德国前卫派作家及诗人。

〔2〕 托马斯·麦考莱（1800~1859）：政治家、历史学家、散文作家，著有《英国史》

西伦堡的闹剧给我的打击，要比你想象的沉重得多。它不仅粉碎了我的宁静，而且还破坏了我的友情。^{〔1〕}你也许会提醒我，做人要有同情心。你知道，对于任何生物，我都是颇具同情和爱怜之心的，就是一只掉进墨水池的黄蜂，我也会用温水给它洗上三遍，然后放在阳台上晾干，让它重返大自然。但是告诉我，在这一件事上，为什么我就毫不同情对方，毫不同情那个遭到活烤，每一天都要到但丁那个七层地狱去走一遭的人呢？另外，我的同情，和我的友情一样，是有个界限的。距卑鄙哪怕只有一发之遥，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也就是说，我的朋友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在公开场合是这样，在私生活里也应该是这样。但是，在公开场合以雷霆之声大弹“个人自由”的调子，在家里却以疯狂的态度去奴役一个人的灵魂，这种做法是我无法理解，也是无法宽恕的。在这个事件中，我没有看到女人天性中特有的两项基本要素：善良和自尊。我的上帝，如果我遥遥感到哪个人不喜欢我，那么我的心，就会像一只受惊的小鸟那样，立刻离他而去。就连瞥他一眼，似乎也是褻渎神灵的。一个人，哦，一个人怎么能够那样呢？

你也许会提醒我，为了这件事儿，你要受很多的苦呢。告诉你，汉森，如果我的好朋友对我说：你只能在做卑鄙的勾当和忧愤而死之间选择其一，那么就容我冷冷静静地告诉你：我宁愿去死。至于你，我则默默地坚信，是没有干任何卑鄙的勾当的本事的，哪怕连起这个念头的本事也没有。假如你那牛奶面包的脾气和永远冷冰冰的手有时让我气恼的话，我仍然要说：没有脾气是上帝赏赐的恩典，如果它能够使我确信，你绝

〔1〕指克拉拉·蔡特金的婚姻纠葛。多少年以来，她一直不准她的丈夫（比她年轻得多）跟她离婚。

对不会像一头豹子那样，去破坏别人的幸福和宁静。你知道，我的脾气可是火爆得很，足足可以点燃一场燎原大火。但是，别人的宁静和简单的欲望，对我来说，像是一座神圣的殿堂。我宁肯在它面前折戟下跪，也不愿意去亵渎冒犯它。够了！这段伤心事，除了你以外，对别的人我是不会提一个字的。

对了，我还没有感谢你寄来的圣诞礼物呢。当然，如果收到的不是“应景礼品”，而是你精挑细选的结果，我会更加高兴的。不过我知道，在你那个穷乡僻壤，你最多不过把你的钢琴或者勤务兵送上，而我这里连存放其中一样东西的地方都没有。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去听《费加罗的婚礼》？啊哈，我怀疑你是把征服法兰西的任务交给别人去了，自己则满足于征服法兰西的姑娘吧？你这个小不正经的东西！这就是战争没有什么进展的缘故吧？但是我不能容忍任何的“赘生物”的，听到没有？让我们来一个详细的报告或者“综合忏悔”。来信直接寄：佛龙克，I. P. Festung，吕贝克博士。要快点儿写呀。对了，忘了说我在这里身体很好。别担心。多寄几张照片和你的唠叨来。

你亲爱的 卢

1917年3月15日

佛龙克波森要塞

最亲爱的汉森：

你对我的喜怒、我的青春的种种猜测，以及诸如此类的奉承，完全是错误的。首先，我的确给你写了一封8页纸的长信，但是还没有寄出（附上该信的装饰画，以兹证明。也许你会喜欢）。第二，我一直在翘首期盼着、渴望着你哪一天亲自登门拜访。冯·凯赛尔先生^{〔1〕}似乎已经发现，怎么样才能给我带来最大的伤害。现在他的意思，是要考验考验我，看我能“挺”多久。不要生气，不要给我落井下石。不断地给我写信，要不知疲倦，一如既往地爱护我，对我多点儿耐心，即使是我配。

实不相瞒，现在我正在经历一个困难阶段。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跟去年在巴尼姆街时一模一样：我坚持挺了7个月，但是到了第八、第九个月，我的神经就突然不行了。我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都变成了一座小山，得吃力地往上爬，而且任何一件小小的事情，也会给我严重的刺激。

再过5天，我第二年第八个月的单独监禁，就要结束了。届时，就跟去年一样，复活就会自行发生，特别是春天即将来临。顺告，如果我忘掉自己为人生制定的那个基本原则——做一个好人——的话，事情就不至于这么难以忍受。但是那是很要紧的。做一个好人，就这么简单。它可以决定一切，也可以约束一切，它比全世界所有的智慧都要高明。但是，连咪咪都

〔1〕 冯·凯赛尔先生是罗莎·卢森堡的公诉人。

不在身边，谁还能给我提这个醒呢？在家的時候，咪咪长久地、默默地注视着我，她往往知道怎么样把我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样我就非得给她无数个吻（就是为了气气你）不可，并且说：“对呀，做好人是最要紧的。”所以，如果你从我的话语或者沉默中发现，我变得阴沉或者古怪起来，只要提提咪咪的座右铭就是了，并且给我树立一个榜样：做个好人，即使是不配。

现在，在说别的以前，让我道一声“多谢了”。要感谢你的事情很多，比如那几本小书、糖精（以后定要加倍偿还，因为我收到了好大一包，而你自己也是十分需要的）、照片、热水瓶、水果糖、还有最后那两本书，特别要感谢罗马皇帝的画片，那简直是一堂生动的共和主义教育课。但是最要紧的，是感谢你的来信。它们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你在 Wronke 的历险，真叫我开心。可惜我没法跟你在一起，甚至没法看到一眼发生的情况。我特别欣赏你那封巧妙地企图引诱我去读黑贝尔^{〔1〕}的信。你想看到我的愚昧不是？很高兴你还是那个放荡不羁的汉森。想不到不经您（我亲爱的良师）的亲手指教，我也能了解并且理解一些什么吧。

哦，汉尼斯，我认识黑贝尔，要比认识你早多了。早在我和梅林的友谊最火热的时候，我就向他借用了黑贝尔。在那个时代，斯特格里茨和弗里德瑙之间的原野（我当时生活在那里）上，一派热带风光，猛犸象和长颈鹿卷食着凤凰树的绿叶。在那个汉森在柏林还不为人知的时候，我就读了《阿格尼丝·伯纳尔》、《马利亚·马格德琳娜》、《朱迪丝》、《希律王和玛丽安》。此后我就没有什么长进，因为热带气候突然得为大

〔1〕 弗里德里希·黑贝尔（1813—1863）：当时德国最优秀的剧作家。

冰川时期让路，而且我的格特鲁德，得趁着斯特格里茨和弗里德瑙之间一年一度的“停战”，拎着满篮子的礼物和借来的书去斯特格里茨，以换取类似货物回到弗里德瑙。

不管怎么说，我认识黑贝尔，而且对他非常的（尽管有点冷冰冰的）敬重。然而，我把他远远地排在格里尔帕策^[1]和克莱斯特^[2]之后。他虽然才华过人，文体也优美，但是笔下的人物，却是干巴巴的，缺乏血肉和生气。他塑造的人物，常常只是人为制造的、过分微妙的问题的载体。如果你想送我他的书，不如给我格里尔帕策的算了。格里尔帕策是我真正喜欢的作家。你知道他吗？你对他的评价高吗？如果你想读点好作品，就读读《朱迪丝》吧。在那本书里，你既可以欣赏到莎士比亚的简明贴切和通俗幽默，甚至还可以体察到莎士比亚不具备的柔和的诗情画意。在现实生活中，格里尔帕策是一个一本正经的公务员，一个大闷蛋，你说是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读读他的自传吧，几乎和倍倍尔的一样索然无味。）

你的阅读情况怎么样？有足够的储备吗？事实上，我最近有好几个相识，很想介绍给你，特别是盖尔哈特·霍普特曼^[3]

[1] 弗兰茨·格里尔帕策（1791～1872）：毕德麦耶尔时期的奥地利剧作家。

[2] 亨利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剧作家，其最著名的剧作为《汉堡的弗莱德利希王子》，短篇小说集为《马贩子米赫尔·戈哈斯》及《O地侯爵》。

[3] 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早期为博物学家，《织工》使他文名大噪。霍普特曼本人，并不同意罗莎对《埃曼奴爱儿·昆特》的具有同情心的评价。在那本书中，有一个常常令人莫名其妙的信徒——一个声音尖利、脾气暴躁的犹太血统波兰鼓动家，显然就是罗莎·卢森堡自己。有趣的是，她没有认出（或者刻意不提）她自己的漫画像。在那个时候，霍普特曼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者了。

的小说《埃曼奴爱儿·昆特》。你知道汉斯·托马〔1〕的基督画像吗？哦，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身材单薄的基督，在暮色苍茫中穿过成熟的玉米田的画像，在他的黑暗身影的左右，熏衣草的波浪，轻曼地流淌在银光灿烂的玉米捆上。

在无数的问题当中，我发现有一个从未在上述的作品中提及。然而对于这个问题，我是有特别深的切身体会的。这是一个悲剧。一个向群众宣传的人，话刚出口，就立即感到，在听众的头脑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变成了赤裸裸的笑料。这个曲解就把宣传者给钉在了十字架上，他只听到周围的信徒发出的粗鲁吼叫：“展现你的奇迹呀？你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吗？你的奇迹上哪儿去啦？”霍普特曼对此的描写，堪称天才。汉森，对人的判断，一定不要盖棺定论；他们仍然可以让你吃惊嘛，有时是坏得让你吃惊，有时，感谢上帝，是好得让你吃惊。我原来认为霍普特曼只不过是一个大傻瓜而已，谁料到这家伙后来竟写出了这么一本好书，既有深度，又不乏宏大，弄得我神魂颠倒，差点儿立刻给他写信。我知道，你是会鼓励我给他写信的，就像你让我给里卡达·胡希写信那样。但是，对于这种带有夸耀性质的忏悔，我平时是不轻易启齿的。对你说了，就很足够了。

千言万语，意犹未尽，你什么时候才来呀？

你亲爱的 卢

〔1〕汉斯·托马（1839-1924）：托马的新古典油画是理想主义的，其优美一如罗莎所述。它充分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并为激进党人所共享的流行审美价值。

1917年3月8日

佛龙克波森要塞

汉森：

上次说了，千言万语，意犹未尽，现在容我续前。我现在的心境，又平静了许多，因此就想给你写信。由于不想让你伤心，所以没有把那封扯碎的信邮寄给你。白纸黑字反映的压抑，要比实际上显得更加富有悲剧色彩。

我这次写信，主要是为了下述目的。玛蒂尔德·雅可布小姐在我这里。她不久将前往波森，并且希望能够见你一面。这个馊主意是我出的，因为我想你是不会反对的。她将向你详细汇报我的近况，并且向你转达我火一般的问候，顺便捎来一些别的东西。所谓别的东西，就是我的《反批判》^{〔1〕}手稿。它是我为《资本的积累》的辩护，也是对爱克斯坦和鲍尔^{〔2〕}之流的回击！你这个可怜虫，被我选为这部作品的第二位读者。（第一位读者是梅林。当然啦，手稿已经让他读了许多遍了。在读完第一遍之后，他称它“不啻为天才之作”、“真正了不起的、令人销魂的成就”，以及类似的自从马克思逝世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的赞词。后来因为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分歧，他的赞誉就变得有节制多了！……）实际上，我是很以这本著作而骄傲的。我死之后，它肯定还能流芳百世！它比《资本的积累》要成熟得多，而且结构非常

〔1〕《反批判》是罗莎·卢森堡对《资本的积累》的批判作出的回击。这本著作以更容易理解的方式，重申了她更重要的一部著作的基本主题。

〔2〕奥托·鲍尔（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第二国际中的叱咤风云人物，也是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的主要批判者之一。在《反批判》中，罗莎的辩论主要是针对他的观点进行的。

简洁明快，毫无拖泥带水之处，毫无打情骂俏或者虚应故事。整本书直抒胸臆，文笔凝练，甚至可以说像是一块大理石，“浑然无雕饰”。事实上，我的审美情趣，日前就是这样的。无论是理论作品，还是艺术作品，我只欣赏那简洁的、宁静的和粗犷的。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马克思那部著名的《资本论》的第一卷（里面效仿黑格尔的笔法，运用了大量的罗可可式的装饰），现在就显得那么的让我讨厌了（我这样的污蔑，按照党的规矩，一定会被判处5年的苦役，外加剥夺民事权利10年。……）。当然，为了更好地欣赏我的《反批判》，读者一般必须彻底掌握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那么这种人现在有多少呢？半打都不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的书就成了真正的奢侈品，完全可以印在宣纸上了。然而，《反批判》至少没有让“普通读者”一看就感到发怵的代数公式。总的来说，我相信你是弄得懂我的东西的，因为梅林赞美的，恰好是它的“清晰如水晶，议论之透明。”

好啦，麻烦你去读它一读，并且把你作为“人民的普通一兵”的看法告诉我听。你对本书的艺术性的评价，对我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也想知道你究竟能读懂多少。好啦，开始做功课！“起床啦，孩子！”要是你实在下不了床，躺着读也行。但是一定要读，并且把读后感写给我过目。重新品尝一下政治经济学的味道，对你无伤大雅。

哦，汉森，要是冬天已经过去，那该多好！这种天气把我都压折了。眼下，无论是来自人的，或是自然的残酷，我都无法忍受。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在安排旅行计划；每年的4月7日或者10日，我都会出现在日内瓦湖的身旁。现在与它阔别，已经长达3年之久。啊，那美丽的、蓝得如梦的日内瓦湖！你是否回忆得起，在经过了伯尔尼到洛桑的那段不毛之地和最后那条长得可

怕的隧道之后，突然漂浮在一望无垠的蓝色海水之上的狂喜！每一次，我的心都会像彩蝶那样，高飞入云。然后你就可以欣赏到从洛桑到克拉昂的那段壮丽风光，看到那些每隔 20 分钟就停一次的小站。放眼下望，海边的那些小小的民房，簇拥着一座同样小小的白色教堂。然后，就听到列车员那一声安然如歌的喊叫，以及车站的铃声，三次，二次，再三次。虽然火车又徐徐启动，但是铃声依旧欢快地响着。那湛蓝如镜的水面，随着路轨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时升时降；轮船好似掉进水里的六月甲虫，慢慢地爬动着，后面拖着一条条的白沫。在那座白色的防波堤外，耸立着一座峻峭的高山，山腰终年青烟缭绕，只有那积雪覆盖的顶峰，虚无缥缈地、高高地浮游在云彩之间。最令人难忘的，是那座锦绣如画、雄镇一方的登杜米迪山。亲爱的上帝，什么时候我才能再到那里去体味四月呀？每到那里，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安谧，就会像香脂那样，飘然进入我的灵魂。

在克拉昂山上的别墅，我的葡萄园里依然残留着去年的杂草。除草的工作，已经缓缓开始。我照旧获准在葡萄园里漫步，采撷那红色的野花和暗香浮动、一嘟噜一嘟噜的蓝宝石般的风信子。11 点整，农妇用篮子送来午饭，那位穿着短袖衬衫、正在忙活的父亲，便放下手中的铲子，跟他的老婆席地而坐，孩子们则团团地蹲在一边。饭篮子打开了，一家人一声不响地吃着。父亲用衣袖擦去额上的汗水，因为四月的太阳，在这个葡萄园里，还是很毒辣的。

我不言不语，静静地躺在近旁，听凭那骄阳恣意照射，不时偷眼望望那种葡萄的一家，嘴里嚼着一片草叶，脑子里虽然没有一丝儿思想，但身上却充满了一种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感觉：亲爱的上帝，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呀！生活又是多么美呀！在 the Golde Jamen 上面，一列小火车像黑色的毛毛虫，从格利翁方向蠕

蠕地爬过来。一缕青烟袅袅地悬在空中，仿佛在对一位正要远行的朋友遥相挥手！……

汉森，再见了！

卢

1917年3月27日晚

佛龙克波森要塞

亲爱的汉：

出什么事儿啦？你在13号的信中说，“明天”给我来一封信，可是两个星期以来，我什么也没有收到。我已经开始瞎猜，他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哇，是不是人突然走啦，等等。更重要的是，在遭到断然的拒绝之后，我感到非常的失望，书信成了我惟一的安慰。好了，改邪归正吧：不要把那么多的时间花在写一封信上，其间至少可以给我寄一些明信片来嘛。

顺便问问，你说你在“努力工作”，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毕竟还是一个病人呀！！再有，你的“工作”到底指什么？

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俄国发生的事情，在我的心中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许多在莫斯科、彼得堡、奥廖尔或者里加坐牢多年的老朋友，现在都获得自由了。^{〔1〕}这使我在这里的牢狱生涯变得轻快起来！我们的位置奇怪地颠了个个儿，不是吗？但是，我很满足，也不嫉妒别人的自由，虽然正因为此，我自己重获自由的机会，变得更加渺茫了。……

至于找L医生看病的结果，他开的处方，有点类似那位善良的乌芬瑙老牧师给病人膏肓的胡滕的忠告：

现在好好安息

不要去听外界消息

到这宁静的港湾，年岁的风暴已经停息

〔1〕显然指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

胡腾呀胡滕，忘掉你是胡滕。

胡滕是这样回答的：

你的忠告，我的朋友，实在高明。
为了救命……首先叫我丧命。^{〔1〕}

对于求之不得的东西，我决不会伤心太久的。我把我的整个灵魂，都聚焦到眼前和眼前的美好之上。顺告，昨天是那个不祥的第8个月结束的日子，最可怕阶段已经过去，我的呼吸也更加顺畅了。天虽有些冷，但阳光明媚。小花园里的秃枝灌木，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七彩缤纷。此外，在高高的云端，云雀已经开始欢叫；虽然仍有积雪，仍有寒冷，但你可以感觉到，春天就要来临。这使我想起去年这个时候，在两次牢狱之灾期间的复活节，我和卡尔及其妻子一起坐在加尼森教堂里听《圣马修受难曲》的情景。^{〔2〕}

但是谁还要巴赫和《圣马修受难曲》呢？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当我漫步在苏登德的街头，我想，所有的人看到我那轻盈的步伐，都会认出我来的：两只手斜插在茄克衫的衣袋里，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除了到处看看，吸吮生活。……你可以听到民居里发出的大扫除的声音，床垫被拍得噼啪作响，老母鸡不知在哪里咯咯哒哒，小学童放学回家，一路上扭扭打打，惊叫声伴着欢笑声。一列火车鸣着汽笛从你身边飞驰而

〔1〕 康拉德·菲迪南·迈耶（1825-1898）：罗莎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引诗出自迈耶的《胡滕的末日》。

〔2〕 试比较列宁对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作出的著名反应：“此曲只能上天堂，然仙乐不可多听，否则贻误革命。”

过，仿佛在向你道一声问候；一辆满载啤酒的马车，叽哩咕咚地从街道上碾过，那有力的马蹄，有节奏地敲击着铁路桥面。间或，你还听得到麻雀的叽叽喳喳。于是，在这艳阳高照的日子里，一首交响曲，一首《欢乐颂》，就这样诞生了！这首交响曲，浑然天成，是巴赫和贝多芬都无法复制的。我在心中歌颂一切，歌颂每一个朴素无华的细节。

在规模不大的苏登德火车站前面，总是有那么一群一群的闲人在游逛。你还记得吗？车站左边是一家花店；右边有一家雪茄铺子。花店的橱窗里，被装点得花团锦簇，里面那个漂亮的卖花姑娘，总是对我笑脸相迎，一边还在打理卖给一位女士的鲜花。卖花姑娘跟我很熟，因为每次路过那里，我都会买上一小束香花，即使那要花掉我最后的10个芬尼。雪茄铺子的橱窗里，陈设着各色彩票。它们是不是很可爱呀？看见那些彩票，我就不由得莞尔一笑。铺子张门迎客，里面有人对着电话大声喊（只要5个芬尼）：“是。什么？是。我5点左右赶到那里。好的，行啊。好，再见。5点左右见。再见。拜拜。”……那种油腔滑调，那种无聊的交谈，是多么的招人喜欢呀！这位先生将在5点钟到一个地方去和一个人会面，真是喜煞个人。我差不多想对他喊：请代我问候那个谁？管他哪个谁呢，只要你乐意。……

一对老妇人，胳膊上搭着购货袋，站在一旁嘁嘁喳喳，永远说着东家的长，道着西家的短。我觉得她们很可爱。……在街角，那个瘦骨嶙峋的独眼龙报贩迎面走来。他一边搓着手，一边像机器人那样喊道：“喂，看报嘞，看带照片儿的报纸嘞。”……我每天去党校上班的路上，都要经过这里。每逢天气不好，那个家伙的公鸭嗓子，就会令我感到绝望，让我觉得这辈子都折腾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玩意儿。但是现在，看到他

头到脚都沐浴着春天的阳光，我倒觉得他的“照片儿”很有感染力呢。我对他像对老朋友那样笑笑，并且买上一份报纸，试图向他表示歉意，因为自己给了他一个冬天的白眼。……在另外一个街角，坐落着一家小酒馆，那黄色的百叶窗总是给放得低低的。那些脏兮兮的、颜色晦暗的窗户，那些摆放在前花园里的、永远铺着红蓝格子台布的饭桌，原本我连瞧见都会感到心情沮丧，每次路过都得加速小跑，才不至于落下泪来，今天它们却突然变得漂亮起来了。近旁枫树的树影，在饭桌上婆娑起舞，不声不响地扭来扭去。天底下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东西吗？

我来到面包店。这里的店门经常开关，发出很响的吱嘎声。一群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仆和小孩子，欢天喜地地蹦进面包店，不一会儿又抱着白色的纸袋出来了。难道这不停的吱吱嘎嘎，没有和那诱人的面包香味和街上的麻雀叫声揉和在一起？难道你就没有品尝的本领和默默的自信的味道？难道这一切不是在说：“吾即生活，美即生活？”

离开了凝望已久的面包店，鞋匠的奶奶映入了眼帘。她寿比南山，和我住在同一条街。“哎哟，大小姐，我当你是来跟我们一起用咖啡的呢，”她鼓着瘪嘴说。（在苏登德，人人都管我叫“大小姐”，真不明白是因为什么。）虽然我没有完全听懂她的话，但还是愉快地答应有空即登门拜访。她点点头，那张皱纹密布的老脸，顿时乐成了一朵花：“准来！”她冲着我的背影喊道。亲爱的上帝，人是多么的亲善友好呀！这不，又有一位素昧生平的太太向我打招呼。她还微笑着对我望呢。也许，我那张幸福的笑脸和那双斜插在口袋里的双手，有点与众不同吧？但是谁管那些！在这暖融融的春日，手插衣袋，扣眼里别一束10芬尼的香花，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世上还有比这更幸福

的吗？

汉森，我想波森要比 Wronke 更靠近东方，四月的阳光先照到你那儿，所以请你速速把它寄来。让它再一次向我展现到处可见的人生奇迹；再一次让我得到健康，变得耳聪目明，心静如水。

卢

1917年3月30日

佛龙克波森要塞

亲爱的汉：

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摆脱了黑夜的绝望，恢复了自制。今天，天上没有一缕阳光，整个灰蒙蒙的，而且还刮着寒冷的东风。我感觉像一只冻僵了的野蜂。在深秋第一次霜冻来临的清晨，你在你的花园里发现过这么一只野蜂吗？它六脚朝天，僵得像死去的那样，小脚缩作一团，身上沾满白霜。只有等太阳将它彻底温暖，它的脚才会开始慢慢地活动舒展。然后，小小的躯体又会翻腾过来，最后笨笨地嗡地一声飞向天际。看到这样的野蜂，我总是责无旁贷地跪倒在它们身边，用嘴里呼出的热气，令它们起死回生。但愿阳光能够把我这个可怜虫从僵死中唤醒！与此同时，我也像路德那样，用墨水瓶^{〔1〕}和心中的魔鬼展开斗争。这就是为什么你得做出一些牺牲，容忍一大堆信的缘故。除非你给你的大炮填满弹药，否则我会用小炮轰得你不寒而栗！顺便说一句，如果你在 frontline 装填炮弹的速度，跟你写信的速度一样快的话，那么我对我们目前从索姆河和安克雷一线溃退的事实，就一点儿也不感到震惊了。如果在没有割到美丽的弗兰德平原这块肥肉之前就签署和平协议，那么你的良心肯定会不得安宁的。

多谢你寄来的里卡达·胡希论凯勒的小书。上个星期，在我心情最糟的时候，我饶有兴致地拜读了它。里卡达的确是才智过人，出口成章。但是，她那萎靡苍白、欲言又止、拘束呆

〔1〕据说马丁·路德曾用墨水瓶砸过魔鬼

板的文风，似乎有点弄巧成拙的味道。她那苦心经营的古典主义风格，似乎有点伪古典主义的成分。一个思想丰富、洒脱开放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自自然然地跟着感情走，又何必对自己不真呢？

我又重读了戈特弗里德·凯勒的《苏黎世中篇小说》和《马丁·萨兰德》。请不要狗急跳墙，但是我坚持认为，凯勒是既不适宜写长篇，也不适宜写中篇的。他写的东西，只能说是关于那些早已作古的人和事的故事。他的故事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无法让我涉身其中。我只听到叙述者像老人那样，搜肠刮肚地絮叨美好的回忆。只有《绿衣亨利》的前半部分，才是活生生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凯勒于我有益，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如果你喜欢某个人，那么跟他坐下来聊聊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拉拉家常，不亦乐乎？

在我所经历的所有春天中，去年的那个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可谓感触良多。也许是因为它是我牢狱生涯开始后的第一春吧，抑或是因为截至日前，我已经精确地了解了每一丛灌木、每一片草叶，并对它们的生长情况了如指掌的缘故吧。你可记得，几年以前，我俩试图为一株花儿盛开的黄色灌木确定属种。你提议把它定为“金链花属植物”。那个自然不对。3年以前，我突然投身于植物学的研究。这个决定是多么的英明呀！我研究植物，跟干其他事情一样，也是满腔热忱，全身心地投入。世界、党和工作，都悄然隐退。每日每夜，我的心中只翻卷着这么一个激情：去春天的原野漫游，采集成抱成捆的鲜花，然后回家整理、分类、鉴定，再夹到书页里去。那个春天，我活得是多么的紧张充实呀！仿佛像发高烧似的！看到一种新植物，不知道如何分类，只有坐着干着急。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况，我差点儿没急昏过去。每逢此时，格特鲁德就会动

气，并且威胁要“拿走所有的植物”。但是现在，我在这绿色王国里如鱼得水，任意纵横。我征服了它，挟雷霆万钧之势。凡是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东西，必然在你的身上开花结果。

去年春天外出野游的时候，我还有个旅伴儿：卡尔·李卜克内西。也许你知道他这么多年是怎么生活的：议会开会、委员会开会、大会小会，东奔西颠，气喘吁吁，下了火车赶电车，下了电车坐小车，所有的口袋里都揣着笔记本儿，胳膊下夹着新买的、永远也没时间读的报纸。虽然他的整个身心，都浸透了大街上的油灰，但是脸上却永远荡漾着青春温暖的笑容。去年春天，我劝说他稍微休整休整，提醒他在议会和国会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于是他，宋娅和我，就去田野和植物园转了很多次。看见白桦吐出的新花，他快活得像个小孩子似的！

有一次我们穿过原野，去了玛丽费尔德。你是识路的。记得吗？我俩是秋天踏着庄稼茬子去的。去年四月和卡尔去的时候，时值上午，田野里仍然覆盖着冬季作物的鲜绿。微风将天空中的乌云，追逐得东躲西藏。云破日出时，田野里金光灿烂；乌云蔽日时，又像绿宝石一样暗淡下来。好一场嬉戏！大家都默默地赶路。突然，卡尔止住脚步，开始怪跳起来，脸上仍保持着那严肃的表情。我愕然地、甚至有点害怕地望着他，问：“你怎么啦？”“我开心极了。”听到他那简单的回答，我们自然哄然大笑不止。

你最亲爱的 卢

又及：你想把我归类为兴登堡〔1〕的珍珠项链上的“一颗最漂亮的宝石”，那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根据官方声明，我不是战俘。证据：我必须自付邮资。

〔1〕 保罗·冯·兴登堡（1847～1934）：对俄战争的英雄，后任西线总司令，德国民族主义的象征。1925年就任魏玛共和国总统，1933年提名希特勒出任总理。

1917年4月16日

波森要塞

汉森：

星期天因为昨天收到了你的来信而变得更加美好。今天，这里下着瓢泼大雨。然而清晨，我仍在小花园里晃悠了两个小时，一如既往地没打雨伞，只戴了顶旧帽子，披了件考茨基奶奶的旧雨披。虽然雨水浸透了帽子和头发，顺着脸庞流进脖颈，但是一边遐思梦想，一边闲庭信步，又是多么的快乐呀！鸟儿也苏醒了。一只和我特熟的花雀，常常伴我一起散步。我是沿着墙壁两边的便道，在花园里行走的；花雀的走法，则是另一个模样：它跟在我的身后，从这棵灌木跳到那一棵灌木，抑或还一跳二回头。你说可爱不可爱？我们不惧怕任何天气。甚至下着鹅毛大雪的时候，我俩也坚持每天散步。今天，小鸟跟我一样，显得有些不修边幅，浑身上下湿淋淋的，而且还有些毛发蓬乱，但是我俩的感觉，却很不一般。

现在是下午时分。外面雷雨交加，因此我们不想贸然外出。花雀坐在我的窗棂上，小脑袋瓜一歪一扭的，想透过玻璃，窥视里面的我；而我呢，则坐在书桌面前写信，一边欣赏着滴答滴答的闹钟。屋子里宁馨极了。

这种天气，据我了解，对粮食的生产是灾难性的。现在不可能为夏粮作物整地。一切都已经错过了季节。遭到上一次的霜打，冬季作物损失惨重。去年这时，苏登德的冬小麦，已经长到20到25厘米那么高了；夏季作物的土地，也早已于二月份准备就绪。洪水更令农业生产雪上加霜。“最底层的百姓”，肯定又要受苦了。说不定你的老爹已经开始嘟哝：怎么连老

天，也像是英国佬雇的。^{〔1〕}

你的柏林和斯图加特之行，听起来怪可怕的。你这次损失得最惨重的，也许是不可能再因为在外边受到的折腾而怪罪我了吧？记得有一个圣诞节去斯图加特旅行，我可没有少受冤枉气。去纽伦堡和法尔茨伯爵领地周边的其他小城，安安心心地旅行几天的想法，的确非常诱人。我曾去纽伦堡和其他几个城市开过党代会什么的，现在对它们仅有依稀的记忆。在战前的最后一次会上，我记得讲台上放着一大束猩红的康乃馨。它对我的演讲只有起干扰的作用。我刚准备开口说话，会场里就爆发出一个声音：“急救！”开始我还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等到往下一瞧，才发现会场里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三个晕倒在地的人，正在被往外抬呢。这种情况总是让我感到特别的压抑，得费老鼻子的劲儿才能回过神来。在一次党代会期间，有人于晚间把我从会场中架了出来，用一辆舒适的敞篷马车拉着，在城里慢悠悠地兜了好几个小时，时值九月下旬，整座城市笼罩在灰蒙蒙的秋岚之中，斑斓的城堡、尖顶和教堂，隐约其间，周围绿色正闹，好一派中世纪风光。最令人击节赞叹的，莫过是那低垂的暗红夜幕；在那街角巷尾，暮色中的影子愈变愈深。那个时刻的美好记忆，特别是外面那被稳健的马蹄愈敲愈浓的天籁和美色，与会场当中刺耳的喧哗和低级的趣味形成的鲜明对照，一直伴随着我。我不知道坐在我身旁的是谁，只知道在整个观光过程中，我没有说一句话；只知道在旅馆门前下车的时候，瞥见过一张失望的面孔。我非常想重归纽伦堡，但不是去开会，而是想携着一卷你常常用你那浑厚的男低音给我朗诵的莫里克或者歌德。

〔1〕 那年冬人果真被称为“饥馑之冬”。

现在，在这里，你既不能给我朗诵莎士比亚，我们也不能共同朗诵《华伦斯坦》，^{〔1〕}这是多么的令人遗憾呀！我让人把威廉给带来了。（你可记得歌德的诗句：

属于爱人
崇拜英雄
使情智合一。
丽达，咫尺之幸福
威廉，至高之明星
你是我的归属。

丽达显然是冯·施特恩夫人。）我之所以对他再度发生兴趣，是被《莱比锡人民报》上的一篇剧评激起的，信不信由你。他的剧评写得文采飞扬，非常动人。我给你抄录一段他描写《如愿》中女主角的片段：

罗莎琳是诗人自己心仪的女人。她既端庄，又不失天真。她知道怎样待人接物，并且能够蔑视礼仪。她学问不高，却谈吐不凡。她热情洋溢，又含蓄节制。她可以是这一切，因为她有灵敏的直觉。她相信自己的直觉，因此得以在这个世上恣意舞蹈、跳跃、跨步，仿佛没有任何危险，可以伤及她的毫毛。莎士比亚笔下描写的自信心十足的年轻女子，并非仅此一例。在他的作品中，这样的女子可以碰上好几个。至于他是否遇见过像罗莎琳、贝雅特丽丝或者波西娅这样的女人，抑或是否有创作的模特原型，

〔1〕《华伦斯坦》，1798年作，为席勒的名剧之一。

抑或是否是根据心中的期望而进行的刻意描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坚信，女人因为特有的天性，是可以如此完美的。他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段时间，对妇女的赞颂，是其他诗人不可比肩的。他在妇女身上，看到了一种永远不受文化教养侵害的自然力的作用。她们对文化教养提供的一切养分，兼收并蓄，但决不让自己偏离自然为她们指定的道路。

他的分析是不是十分鞭辟入里？但是你知道，现实生活中的莫尔根·施特恩博上，可实在是一个少盐寡味儿的、干巴巴的怪人！可是他的心理分析，却是我希望在未来的德国散文创作中所见到的。……顺便说一句：原来你是尤斯蒂努斯·克尔纳的后裔呀！〔1〕天哪，他可是个颇有名望的祖宗！但是我对他不甚了了，只是大概记得他那刺耳的节奏，强烈的哀戚，和一种革命性的姿态，不管怎么说，这个名字本身，就相当的奇特。有些名字是永恒的，它们回荡着奥林匹斯山的诗韵，尽管我们对它们知之不多。你说是吧？今天，还有谁能背出萨福〔2〕的诗歌？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在读马基雅维里？〔3〕还有谁听过契马罗萨〔4〕的歌剧？但是对所有的人来说，这些名字给人以永恒之感；听到它们，你就肃然起敬。然而，位高则任

〔1〕 尤斯蒂努斯·克尔纳（1786～1862）慕尼黑的二流诗人、散文作家。

〔2〕 萨福，希腊女诗人，以优美的情歌而著称。

〔3〕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1469～1527）：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把政治学从神学的范畴，带到了世俗的领域。《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的传世之作。他也写过一些剧本，如《曼德雷克和克丽齐娅》。

〔4〕 多门尼科·契马罗萨（1749～1801）：意大利作曲家，其作品包括《秘婚记》为莫扎特的前辈。

重。汉森,你自己一定要有个出息,否则就对不起尤斯蒂努斯·克尔纳。

卢

又及:你对克拉拉[·蔡特金]只字未提。希望你常去看她。

1917年4月28日

佛龙克波森要塞

汉森：

很不幸，玛尔塔太太这次不可能来利萨了。她的假期太短，谁叫你的新家那么偏僻，这回该付点儿代价了吧。你知道，我立刻就在迪尔克版的旧学生地图册（就是柯西亚送我的那本，它还伴你去过斯图加特的卡尔斯体育馆呢）上查找你所在的城市。我发现利萨位于坡斯南和布累斯劳之间，即柏林的反方向。大约过两个星期左右，汉斯和露易莎〔·考茨基〕会前来拜访。露易莎获准在5月10号到15号期间外出旅行。

你不去看望克拉拉〔·蔡特金〕，实在叫我生气。你一定得找时间去。你理不理解我在这件事情当中的复杂心态？我越是在内心里谴责自己日前对她的支持不够，就越觉得你代替我去探望她是一种必要和安慰。你应该向她表示我不能给予她的温暖和体贴。可是你完全辜负了我的期望！上帝有灵，我不记得是否曾经对你说过，最好在复活节的时候去一趟斯图加特。但是我的确跟你说过，坦诚地直接写信给她，用甜蜜温馨的书信去弥补以前的冷漠过失。不要怯懦，也不要虚伪，汉森，这不是你的为人。

我读完了里卡达·胡希的《华伦斯坦》。起初，它使我觉得耳目一新，热血沸腾；后来我就发现它没什么意思了。

这本书不乏细节和精雕细刻，但是绝对没有整体感。从这本书中，你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散文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写，用什么方法才能给这一文体锦上添花。我仍然坚持：德国人的严谨，使他们无法用轻松的笔触，去创作既丰满又宝贵的生活或

者时代的写照。即使是像里卡达这样的女人，思想上也缺乏雅趣，否则她早该知道，对细节的过分雕琢，会使一个高雅敏感的读者觉得厌倦，乃至不快。作家只需精心勾勒寥寥几笔，就可以激发出读者的想象力，然后让他们自己去给作品添油加彩，使之成为一幅完整的画卷。就像高人雅士之间的促膝闲谈，轻描淡写比浓妆艳抹更为人欣赏一样。

过几天，我准备给你寄一本萧伯纳的喜剧——《玩弄女性的人》。开始读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对剧中花里胡哨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以及人物的荒诞，表现得缺乏耐心。后来几个严肃的段落，让你读了生出忧喜掺半的感觉：一方面，你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你终于探明了作者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你对他那不咸不淡的警世格言持保留态度。到了快读完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那些“严肃段落”，实际上是最逗趣儿的部分。萧伯纳只不过是拿这个世界——包括读者和他自己——开涮而已！他仿佛遵循的是这样一条座右铭：人生之中的任何东西，都不得以悲观对待。结尾的那一幕，颇似莎士比亚的手法。在干巴巴的法庭辩论期间，突然冒出一场化妆舞会，两个公诉人被拉去大跳华尔兹舞！《仲夏夜之梦》里的嘻嘻哈哈的小鬼精灵，一个个翩翩而至。半夜三更，独坐牢房，读到这最后的一幕，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前仰后合。这一点你是了解我的。这次阅读发生在我又一次极度绝望之后，所以说这本奇书，为我造福不浅。

鉴于在谈论文学，所以就想随便问一问，你能告诉我下面这几行诗的出处吗？

他昂首阔步，英俊高大，
他的微笑和眼神，高贵无尚，

他的话语，是幸福的神秘甘泉，
他的手一握——

其他的我记不得了。不过我可以打赌，这是甘泪卿在纺纱时唱的。^{〔1〕}同时，我也敢打赌，甘泪卿在纺纱时唱的，还有一首截然不同的歌，即“遥远的国王”。我这里只有你那本哈奈克版的袖珍歌德，里面没有收《浮士德》，所以无法核对。自从复活节以来，这几行诗句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以至于我开始觉得，自己的脑袋里也装着一架纺车似的。你知道，想不起一首诗或者一首歌是从那里学来的滋味，也是很痛苦的。

我的牢房的正上方，是监狱的教室。写这封信的时候，上面正在上课。开始，我听到几只脚噼里啪啦的一阵响动，然后是寂静，然后是一位老教师讲课的声音。现在，一个女子正在用单调的嗓音背诵什么，完全就像是小孩子念书一样，提心吊胆，卡着嗓门，满腹狐疑，没有任何停顿。虽然声音唧哩呜噜的，一个字也听不清楚，但它还是给了我一种宁静的、家一般的感觉。从上面这个看不到的景象，从远远传来的声音，我再次清楚地认识到，人生是美好的。

卢

〔1〕 罗莎没错。引文的确出自《浮士德》中甘泪卿纺纱的片段。有趣的是，她竟然将最后一句“啊，还有他的吻”给忘了，因为在德语中，这一句和前一句是押韵的。

1917年5月12日

佛龙克

亲爱的汉：

收到第五封信，多谢。我等着你的校对稿（有些错误是打印造成的）。由于你说《反批判》里的一些段落被删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以至于到了无法理解的地步，所以我对手稿又重新加工了一遍。通常，写好的东西，我是决不会再读第二遍的；而且写的时候越是投入，事后就越不想重读。我充分意识到，汉森，我写的这些经济学的玩意儿，只有五六个人能够读懂。实际上，我只是为一个人写的：那就是我自己。

写《资本的积累》那会儿，是我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阶段，可以说是生活在恍惚之中。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只关心呈现在眼前的那个美好的问题，其他的事情则完全不闻不问。思维过程，或是执笔写作，究竟哪个给了我更大的快乐，我闹不清楚。每当思考复杂的问题时，我常常会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咪咪则躺在红色的长毛绒台布上，一对小爪子抱在胸前，小脑袋瓜转来转去，全神贯注地凝望着我。知道吗？那洋洋洒洒900页的论著，是我一连坐了4个月的产物。这种写作速度是闻所未闻的！而且我立刻送印，初稿连审校一遍都没有。在巴尼姆街写《反批判》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然而，在全身心的投入之后，我对作品完全丧失了兴趣，甚至连出版商也懒得找。当然，鉴于过去一年半的“形势”，出版商也比过去难找多了。

你绝对高估了爱克斯坦。他对我的批评，纯粹是因为长期想跟我结交而遭到断然拒绝后的恶意报复。这种从“凡人小

事”到纯粹的理论攻讦的转变，使我对他充满了鄙夷。但是他这个人，也有善良和机智的一面。有一次在考茨基家里，我去客厅取大衣准备回家，谁想到我这个来自小人国的人，费了很大的力气也够不到衣帽钩，这时他面带微笑、风度翩翩地走了过来，为我取下大衣，然后帮我披在身上，嘴里还哼着沃尔夫的曲儿：“小东西有时有魅力。……”（我想你知道，雨果·沃尔夫和维也纳的爱克斯坦家族沾亲带故，而且还是维也纳那边供奉的家神呢！）

你提出让我写一本关于托尔斯泰的书的建议，我压根儿就没有兴趣。汉森，为谁写？写来干吗？托尔斯泰的书，人人都可以读嘛。对于那些体验不到托尔斯泰书中强烈的生活气息的人来说，我写的评论他们就能够理解吗？你能够“解释”莫扎特的音乐吗？对于那些不能从最小的事情当中体察生活魅力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本身就缺乏生活魅力的人来说，你能给他们“解释”生活的魅力是什么吗？我认为，对歌德作的所有文学批评（也就是那些关于歌德的玩意儿），全都是浪费笔墨！我觉得这类书写的太滥了。有了这些文学，美好的世界反倒给遗忘了。

不管怎么说，自从1号以来，这里天天艳阳高照。每天醒来，迎接我的就是晨曦，因为我的窗户朝东。在苏登德，你知道，我的套房像一盏多面朝阳的灯笼，清晨尤美。吃完早餐，我便把水晶棱镜，就是我书桌上的那个镇纸，移到太阳底下。那数不清的棱角，立刻将数百条小小的彩虹，映照到天花板和墙上，咪咪就会像着了迷似的，注视着反光。特别是当我拿着棱镜左摇右晃，让那色彩缤纷的光点跳荡舞蹈的时候，咪咪就会纵身跃起，去追逐捕捉那些光点。但是她很快地意识到，光点只是“子虚乌有”的视错觉，于是便目瞪口呆地、一动不动

地瞅着它们，任其跳跃舞蹈。当小小的彩虹照射到饭桌上白花盛开的风信子、书桌上方的大理石头像、或者镜子前面的紫铜大钟上的时候，那个效果，可谓是美奂绝伦。那充满阳光、清洁整齐、装饰着鲜艳墙纸的房间，吐纳着静谧和欢欣。从敞开的阳台那边穿堂入室的，惟有麻雀的歌声，间或有电车经过的嗡嗡声，以及检修附近路轨的工人的铁锤敲打声。然后，我就拿起帽子，去观察田野里一夜之间又长出了些什么，并且给咪咪采集一些鲜嫩的青草。

在这里，我吃完早餐也去小花园，尽心尽职地浇灌窗下的小“庄园”。我让人捎来一个十分可爱的小喷壶，不过得拿着它去水桶那边十几次，才能将花坛基本浇透。在朝阳的映照下，壶里流出的清水，犹如喷珠溅玉，光彩夺目；那半开的风信子，有红有蓝，承载着晃晃悠悠、欲落还休的水滴，煞是好看。

那么为什么我还如此的伤感呢？我几乎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天上的太阳的力量。不管阳光的照射是多么的猛烈，有时它却无法温暖我的心房，因为我的心房未能报之以温暖。

卢

1917年5月14日

佛龙克

亲爱的汉：

只写匆匆几行。他们可能会和露易莎〔·考茨基〕和伊格尔一家差不多时间来访。请千万不要跟他们说起《反批判》的事儿，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向他们提起过呢。如果他们从第三者方面听说，那么一定会使我感到难堪的。另外，等书一印好，我准备送露易莎一册。兴许她能读懂。

汉森，对露易莎好一点儿，让她感到温暖和快乐。可惜我做不到这一点。天哪，这可不是我的过错呀。完全是事不由己。我的心这几天都像小狗一样哆嗦着、颤抖着，而且还在不断地变得更加胆小怕事。为了露易莎，我感到非常内疚。她肯定以为，惹恼我的是她。但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码事。请你帮忙劝劝她。

今天晚上，我的情绪坏透了，真不知怎么对你说。为了寻求安慰，我翻了一下《西东集》。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因为它不仅流淌着不朽的激情，而且还有个苏莱卡-玛丽安妮。我认为，她是歌德笔下惟一讨人喜欢的女性。我觉得她自己的歌，发自内心，天真朴实，完全可以和歌德相媲美。比如，在送别飞天信使时，她唱的那段是多么美呀：“告诉他，请你委婉地告诉他：他的爱情是我的生命。只有他的亲近，才能使我心情安然不忧伤。”〔1〕不幸的是，哈奈克版只收录了部分歌词。

〔1〕引文错误，十分有趣，也许隐含着某种暗示。苏莱卡只祈求“心情安然不忧伤”，而罗莎也希望得到“心情安然”。

至于正儿八经的阅读嘛，我这是第 N 次拜读《莱辛传奇》^{〔1〕}了。你知道这本书吗？它给我提供了无穷的激励和精神食粮。

致以亲切的问候！

卢

〔1〕《莱辛传奇》是弗兰茨·梅林的马克思文学批评的经典著作。

1917年6月23日

佛龙克

汉森：

你好！我又来了。我今天感到非常的孤单，因此必须跟你聊聊，好振作振作精神。吃罢午饭，我遵照医嘱躺在沙发上休息，一边读着报纸。2点30分，我决定起身，但是马上就昏睡过去了，并且还做了一个奇梦。梦境栩栩如生，但印象却若有若无。我只依稀记得，梦里有个我亲近的人，并且还用手摸着他的嘴唇问：“这是谁的嘴呀？”他回答说：“是我的。”“噢，不是！”我笑着喊道。“那张嘴是属于我的！”醒来之后，我仍然为这种胡言乱语而感到好笑，看过手表，时间依然是2点30分。我的美梦，虽然实际上只持续了几秒钟，但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感觉，给了我莫大的安慰。然后，我便起身去了花园。

在花园里，我再度体验到了一次美妙的经历：一只知更鸟蹲在我身后的墙上，为我唱了一首小曲。一般来说，现在的鸟儿们都在忙着生儿育女，很少能够像今天的这只知更鸟那样，忙里偷闲地高歌一曲。这只小鸟五月初曾来看望过我好几次。不知道你是否认识这种鸟儿，是否听过它的歌唱？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我是到了这里之后才开始了解它的，并且对它宠爱有加，胜过那著名的夜莺。夜莺那银铃般的独唱，使我回想起那些大牌歌星、听众、雷霆般的欢呼和溢美之词。知更鸟的嗓子，细微优雅，唱出来的歌欢快活泼，颇有点起床号的味道，

听来别有韵味。在《菲岱里奥》^[1]中的监狱一幕，远方传来的解放号角，仿佛撕破了黑暗的夜空。你还有印象吗？知更鸟的歌声，听起来就是那个味道，只不过音调更加温柔，更加甜美，就像迷失在梦中的那轻丝薄雾般的记忆一样。

听到这歌声，我感到悲喜交加。我的人生和世界，顿时又沐浴着新的光华，仿佛云雾将开，新一轮日头又将明晃晃地照耀在地球之上。

听完这支温柔的小曲，我今天觉得心平气和，并且立刻为自己曾经给予别人的冤枉，以及曾经拥有的苛刻思想和感情感到惋惜。我再次痛下决心，立志做个好人——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哪怕为此付出代价。这要比“永远正确”和“锱铢必较”更好。然后我就决定今天马上给你写信，尽管我昨天立下的七条誓言仍然还在桌上。第一条誓言是：“决不写信。”看见没有，我就是这样遵守自己的“铁定”誓言的！我就是这样的柔弱！如果像你在上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阳刚的一族看到女人的柔弱表现，就会马上对她们爱怜有加，那么你现在看到我，一定喜欢得快要疯了吧。我这个人太柔弱了。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柔弱。

顺便说一句，你的这张娃娃嘴，说得居然比你想象的还准，因为奇怪得很，我不久以前就亲历了这样的事情。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大会上，你肯定见过卡米尔·惠斯曼，就是那个高个子，黑卷发，长着一张典型的佛兰德脸的小伙子？他现在理所当然地成了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主要推动者。^[2]十年以来，虽然我俩都是属于国际局的，但是十年以来，我俩却彼此敌

[1] 《菲岱里奥》是贝多芬的惟一歌剧。

[2] 指社会主义者召开的斯德哥尔摩和平会议。

视，老死不相往来。为什么？很难说得清。我认为他不能容忍积极参政的妇女。而我自己，则为他的傲慢无礼所气恼。对了，事情是这样的，1914年7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期间，那时战争还没有爆发，我俩在一起相处了几个小时候。当时是在一家豪华餐馆，我坐在一张上面摆了一束唐菖蒲的餐桌旁边，对着那束花儿出神，没有去参加其他人的政治讨论。后来，谈话的内容，不知不觉地转到我怎么离开的问题上。我在“世俗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无能，立刻成为大家议论的对象。我永远离不开一个监护人，帮我买票，送我上火车，帮我找回丢失的手袋……一句话，凡是我的那些让你多次开怀大笑的可耻弱点，全都让他们给抖了出来。

惠斯曼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我。一小时后，十年的冤家，竟然成了好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他终于看到了我的弱点，而他自己则是左右逢源。他马上决定亲自处理我的问题。他和那个讨人喜欢的小个子窝龙人安西尔^[1]，不由分说地将我拉到他家吃晚饭，还弄来一只小猫，并且为我弹唱莫扎特和舒伯特的作品。他有一台好钢琴，又有一副激越的男高音嗓子。他十分惊奇地发现，音乐文化居然也是我的生命血液。他弹奏的舒伯特的《人类的局限》^[2]，非常动听，而且还声情并茂地唱了几遍末尾的那句“和我们嬉戏风和云”。他的佛兰德口音很浓，把那个“云”字唱得像个“运”字。

后来嘛，他自然送我去火车站，而且还亲手为我提箱子。他甚至还到车厢里跟我坐下，然后突然说：“Mais il est

[1] 爱德华·安西尔（1856~1938）：比利时工人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2] 根据歌德的诗歌改编而成。

impossible de vous laisser voyager seule!”^{〔1〕}好像我当真是个小娃娃似的。他坚持要送我到德国边境。我费了好多的口舌，才促使他打消了这个主意。火车快开动了，他才跳下去，一边大声说着“巴黎再见！”因为过两个星期，也就是7月31日，我们预定在巴黎召开另一次会议。但是，当火车驰进柏林车站的时候，总动员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了。两天以后，可怜惠斯曼的可爱祖国比利时，就遭到了占领。但是他的歌声“和我们嬉戏风和云”，……却常常萦绕在我的脑际。

再过两个星期，我的牢狱生涯就整整满一年，或者说整整两年了，如果那短暂的自由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哦，要是能来上一个小时的不伤害任何人的闲聊，那将会给我带来多么大的裨益呀！在探监的时候，当然，我们匆匆谈论的都是公事，而且大部分时间，我都是提心吊胆的。除此之外，我既见不到别的人，也听不到别人的说话。

现在虽然已是晚上9点，但是天依然亮如白昼。四下里静悄悄的一片，只听得见闹钟的滴答声，以及远处传来的狗吠声。在这乡间原野，夜半的狗吠，居然勾起了我的乡思，你说怪也不怪？我马上联想到一户舒适的农家，门口站着一个人身穿短袖衬衣的汉子，嘴里衔着烟斗，正在和邻家的女人聊天。屋里，回荡着活泼可爱的童音和锅碗瓢盆交响曲。屋外，成熟的麦子香飘四野，青蛙的鼓噪依稀可闻。……

再见，汉森。

卢

〔1〕原文为法语：“让你一个人旅行是完全不可能的。”

1917年6月29日

佛龙克

汉森：

你好！哦，对了，为了你，我订的七条准则中的第一条，又要遭到违背了。其余的六条都订得比较合理，相信会获得你的批准。格拉希^{〔1〕}只肯用我来交换陆军元帅，真叫人感动。顺告，他的信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看起来，战争使他的思想成熟多了。我很乐意在我们的“愚人”俱乐部里再见到他。可那将是什么时候呢？……

每天晚上，凭铁窗而坐（这样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也可以遐思梦想），两只脚搁在另一张椅子上，附近的某个地方，就会传来谁在用力拍打地毯的嘭嘭声，或者是类似的声音。我不知道是谁在拍打地毯，也不知道是在哪里拍打。但是，通过这些有规律的声音，我已经跟那个不知名的人，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尽管是模糊的关系。这些声音，使我朦胧地想起了相应的家务活儿，想起了一个纤尘不染的小窝。也许是监狱里的某个女狱警，一个老处女或者寡妇什么的，就跟监狱里的大多数狱警一样。她只有下了班才有时间，把她的几个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当然，这些房间是没有人进去的，就连她本人也绝少使用。然而，不知怎么的，这些拍打声，每一次都带给我一种井然有序的、有一定界限的安宁感觉；同时也带给我一种被狭隘无望的贫困生活——碗柜、发黄的照片、假花、硬沙发等等——所困扰的感觉。

〔1〕 格拉希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罗莎·卢森堡的朋友、追求者。

你也体会得到这种来源不明的声音的奇效吗？我在每一家监狱里，都有这种经历。比如在茨维考，每天凌晨两点钟，住在附近池塘边的野鸭，就会准时地“嘎嘎”大叫，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开头的四声“嘎嘎嘎嘎”，激越高亢，然后声音依次递减，变成深沉的喃喃细语。每次被野鸭的叫声吵醒后，睡在硬如石头的床垫上的我，都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用几秒钟的时间，去努力回想自己到底身在何处。那总是有点压抑的身在樊笼的感觉，那特别震耳的野鸭叫声，以及不知野鸭藏身何处又只能在夜半听到的事实，给它们的叫声平添了几分神秘和意境。那每天夜半定期发生的鸭叫，具有某种不可更改性，像那亘古流传的哥普特人的格言，听上去颇有些至理名言的意味。

在那印度的辽阔夜空
在那埃及的深深古墓
我聆听到圣人的教诲……

由于无法破译野鸭的智慧，由于对它的认识只有一知半解，所以我每次听到鸭叫，都会心感不安，苦闷地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

巴尼姆街的情形，则截然不同。9点钟熄灯。不管我愿不愿意，都得上床，尽管不能入睡。9点钟以后，从相邻的房客家里，就会传来一个两三岁的男孩的啼哭。过上一阵，小家伙的抽搭，就演变成了真正的哀号；但是他的号哭，并不含有任何的强烈感情，也不表达任何的痛苦或者愿望。它只是表达了一种对生存的普遍不满，表达了他无法面对人生的艰难困苦，特别是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他那孤苦无助的哭号，会持续整

整三刻钟。然而 10 点整，我就能听到房门被用力地推开，接着是一阵轻快的脚步，然后是一个仍然挟带着户外的清新空气的、圆润的、少妇的声音：“你怎么还不睡觉？你怎么还不睡着？”话音未落，又听得“啪啪啪”三声脆响，打在那可爱的、圆溜溜的、仍然散发着床褥温暖的小屁股上。哦，说来也奇，人生的所有难题，所有困惑，就这么三下就给轻而易举地彻底解决了！呜咽声立刻停止，小男孩随即进入梦乡，出租屋里又变得万籁俱静。

这个每晚定期定点发生的情景，成了我自己的生活里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到晚上的 9 点钟，我就会绷紧神经，等待那个不知名的小邻居开始吵闹和呜咽。对于他的哭腔，我早已烂熟于胸，因此可以击节追随。他那无依无靠的情感，被我理解得淋漓尽致。然后，我会期待少妇的归来，期待那振聋发聩的喝问，特别是那脆生生的打屁股声。相信我，汉森，用打屁股这样的古老方式，来解决生存难题的做法，在我的灵魂里，居然也创造了奇迹。我的神经和男孩的一样，会立即得到放松，然后我每次都会和那个小孩一道，安然入睡。我从来也不清楚，这些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是透过哪一个装点着天竺葵的窗户，抑或是哪一间阁楼，怎样和我联系上的。在光线刺目的白天，放眼望去，所有房屋的模样，都是同样的死气沉沉、庄严肃穆和冷漠无情的。它们的表情，也是一个模样：“我们一无所知。”只有在黑暗的夏夜里，通过空气的细纱，才能够织就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神秘关系。

啊，亚历山大广场的记忆，是多么的美好呀！汉森，你知道亚历山大广场是怎么回事吗？在那里的一个半月时间，灰白了我的头发，分裂了我的神经，至今仍没法补救。但是有一个小插曲，就像一朵鲜花，绽放在我的记忆里，时值十月深秋，

那里的夜幕，在下午的五六点钟，就早早地降临。由于我的牢房中没有灯火，所以在那仅仅400立方英尺的监仓里，除了躺在挤放在乱七八糟的家具中间的行军床上睡觉以外，别的事情什么也不能干。轻轨火车不停地呼啸，犹如地狱里的音乐，时时震撼着牢房；哐哐作响的窗玻璃，流淌着车灯的红色反光。在这个环境下，我只能默默地背诵莫里克的诗句。10点钟以后，由轻轨火车演奏的狂暴音乐会，渐渐地隐退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出街头小品：首先听到的，是一个带有召唤和责怪成分的男低音；而应答他的，则是一个八龄女童的歌声。显然，女孩儿一边四处蹦哒，一边唱着一首童谣。她那银铃般的笑声，犹如铃铛一样清脆。那个男低音的主人，说不定是一个身心疲惫、脾气不好的门卫，正在呼唤小女儿回家睡觉。可是小淘气就是不肯回家，于是跟她的父亲——那个蓄着胡须、略带粗暴的男低音——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她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在大街上，用那活泼的童谣，挑逗那佯装的严厉。你几乎可以看到她那上下翻飞的短裙和频频振动的腿杆。在那节奏跳荡的童谣中，在那格格的笑声中，包含着她对人生的无限热望和企求，整个黑夜，还有警察局那座破败的大楼，仿佛为银色的雾霭所笼罩，仿佛我这臭气熏天的监房，突然之间散发出了红玫瑰的芬芳。所以，不管身在何处，我们都能够从街头巷尾捕捉到一些快乐。这种快乐告诉我们，生活是美好的，也是丰富多彩的。

汉森，你不知道今天的天有多么的湛蓝！不知道它是不是也和利萨的天蓝得一样？通常，在每晚监房“上锁”之前，我有半个小时的放风时间，可以带着小喷壶，去园子里面浇浇花（自己种的三色堇、勿忘我和福祿考！），并且散上一会儿步。这傍晚的时光，别具魅力。太阳依然是热辣辣的，但是我却非

常乐意让那散射的阳光，亲吻我的颈项和面颊。一阵清风，从灌木林间吹过，发出飏飏的声响，仿佛在说，夜晚的凉爽就要降临，白天的炎热即将过去。湛蓝的天空，闪闪烁烁，洁白的云朵，高高悬挂，淡淡的半月，徜徉其间，仿佛幽灵，仿佛是梦。燕群已经开始归巢，尖尖的翅膀将蓝天的丝绸，裁剪成无数的碎片。它们发出尖锐的叫喊，在那令人目眩的高空，上下翻滚，冲来突去，疾如利箭。我拿着喷壶，站在那里看呆了，甚至连壶里的水在往外洒，都没有注意到。我仰着头，突发奇想，想一个猛子扎进那湿润闪烁的蓝天，在里面沐浴，在里面嬉水，让水花把我吞没，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我想起了莫里克的诗句：

啊，江河，沐浴着晨曦的江河！
接纳一次，接纳
这个渴望的躯体，
亲吻它的胸膛和面颊！
湛蓝的天空，纯如孩童，
波涛在那里放歌，
天空是你的灵魂，
哦，让我化作云烟弥漫其间！
我把自己的心智和感官
沉浸在你的深蓝
虽展翅翱翔，仍飞不到天边！……
世上可有比这湛蓝更深邃的事物？
惟有，惟有爱情，
爱情永不知足，爱情对其
变幻不止的光华，永不满足。……

看在上帝的份上，汉森，别学我的坏样。也不要变得像我这样的唠叨。下次绝不这样了，我保证!!!

卢

1917年8月13日

汉森：

前几天，我给你写了一张问安的明信片，然而我却非常希望能够收到你的长信。我在这里过着十分单调的囚犯生活，也就是说，日日夜夜被锁在监仓里，只能够看到对面的男牢房。当然，只要愿意，我还是尽可以下到院子里散步的。但是，那只是一个为监狱所包围、铺着水泥路面的院子呀，狱中的苦力在里面来来往往，所以我就尽量不去那个地方，即便下去了，也是根据医嘱，为了健康的原因。在“散步”的过程中，我尽量不往别处张望。从各方面来说，从佛龙克出去的坡，都是十分陡峭的。这倒不是什么抱怨，只是想解释一下，最近我为什么没有继续写你已经习惯读到的、以玫瑰的芬芳和蓝天白云织就的佛龙克来信了。不过，快活将终究回到我的身旁，因为我储备的欢快，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我首先得把身体调整过来。这个任务，眼下完成起来很困难。在过去的10天当中，我的胃犹如翻江倒海，折腾得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礼拜。即使是现在，我也只能靠做些热敷，喝些清汤活命。胃病的起因不明，也许是对生活条件的普遍下降，作出的神经过敏反应吧。今天，我感觉略微好些，又下去晒了半个钟头的太阳。我想，最坏的时刻，该过去了吧。

院子里有两块苍白无力、像得了痲病似的草地，常常遭到附近晾晒衣服的囚徒的践踏。难怪那里的花草，全都跟受了镇压似的，永远长不茂盛。不过，我已经确定了所有植物的门类。几株矮小的菁草，正开着花；另有十来棵地丁（就算你不知道它们的学名，也肯定知道它们的模样。它们长得跟蒲公英似的，开黄花，只不过更小一点），正在抽蔓拔蕾。这会儿满

世界飞舞的菜蝶，喜欢赖在它们的身上。和所有的监狱一样，这里也有几只鸽子。它们虽然来自附近，但在此地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每当装卸军粮的时候，它们就会大胆上前，拣食地上的残渣。除了鸽子以外，还有几只麻雀，悄悄地蹿上跳下的。

我正在读米涅^{〔1〕}和库诺^{〔2〕}论法国革命的著作。果然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活剧，充满了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场面！但是，我总觉得英国的革命更加有力，更加精彩，更加富有创造性，尽管它走的是“勤俭清洁”的清教革命道路。基佐^{〔3〕}的著作，我已经读了三遍，将来肯定还会读上许多遍的。

我正在努力翻译柯罗连科^{〔4〕}写的传记，我原本答应月底交稿，但是因为生病的缘故，看来免不了要拖延一些时日了。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

我突然想起，也许你已经给我来过信了，写的是吕贝克博士太太收。但是，这里的人并不知道，那就是我呀！不管怎么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你的任何东西，并且渴望你的来信。和在佛龙克的时候相比，我在这里像欢迎贵宾那样，热烈地欢迎来信。

就此搁笔，再见！

你亲爱的 卢

〔1〕 弗朗索瓦·米涅（1796～1884）：罗莎指的是他的《法国革命史：1789～1841》。

〔2〕 亨利希·库诺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党团》。

〔3〕 弗朗索瓦·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以阶级立场的观点著有《英国革命史》。罗莎对英国革命的偏爱，在当时并非典型，左派一般以法国大革命为楷模。

〔4〕 罗莎·卢森堡翻译的，并为之作序的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1917年8月27日

布累斯劳

汉森：

今天乌云压顶，煞是恐怖，而且还下着雨，所以我在房间里闷坐了整整一天。刚才，邮差送来了邮件：有好几封信，其中一封是你的。于是，幸福和快乐又回到了我的身边。我们的通讯又顺畅了，这使我感到快慰。顺告，我刚刚把给你写的信寄往斯图加特。不过，我可以把那封信追回来，代之以这一封。

可怜的汉尼斯，我很同情你现在的心境，而且我想听的，也正是你的烦恼。我还以为，你应该搬到斯图加特去，跟你的父亲在一起。如果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想，那么和老人家同住，至少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安慰，因为人们往往在老人去世以后，才痛苦地责备自己，以前没有多给他们一点时间。我自己就是那么一个不幸的人。话说回来，我得不断地关心全人类的大事，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是在柏林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的。当时我刚刚从巴黎的国际大会和饶勒斯、密特朗、达津斯基、倍倍尔，和鬼知道谁吵得个天翻地覆回来。在此期间，老先生不能再等待了。也许他对自己说，不管等多久，等了也白等，因为我绝对没有“空闲时间”，来花在他抑或自己的身上。他就这样撒手人寰了。等到我从巴黎赶回家，老先生已经入葬一个礼拜了。现在，当然，我变得更加聪明了。但是，谁不会当事后诸葛亮呀？不管怎么说，如果有可能，就去你父亲那里，给他养老送终。这条建议对我来说，可是牺牲不少：因为你在利萨，从心底里说，离我更近；如果你去斯图加

特，我就会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现在有时间，大把的时间。……而且，慢慢地，邮差又会给我送来你那边的消息的。

汉森，我对罗曼·罗兰^{〔1〕}，并不感到陌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是那么一个怪物，没有因为战争的原因，而堕入尼安得特尔时代的原始心态。关于他写的书，我读过德译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巴黎》。虽然害怕得罪你，但我还是要一如既往地坦诚相告：我觉得那本书很不错，并且予以认同；但是与其说那是一本小说，倒不如说是宣传手册更加恰当。它不是一件正宗的艺术作品。对于这些问题，我是敏感得可爱的。我觉得，哪怕是最华美的辞藻，也替代不了上帝赋予的天才。问题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也很愿意读一点他的其他作品，特别是法语的原著，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也许，在其他的作品中，我可以发现更多的东西。

霍普特曼的《基督的愚蠢》，你读得怎么样了？开始读了吗？马上去读。在你这种心境下读它，会觉得它是一件真正的宝贝呢。如果读完了，请报告你的感想，不得延误。

在过去的几天中，有无数的土蜂，嗡嗡地飞进我的牢房（我的窗户，自然是日日夜夜都敞开着）。它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寻找食物，而我这个人，你知道，又是好客得出了名的。我在小碗里装上各种甜品，它们就蜂拥而至。瞧着这些小动物，每隔几分钟，就满载着新的货物消失在窗外，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啦。它们朝着一个远方的花园飞去，我从这里

〔1〕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作家，和平主义者，与赫尔曼·海赛过从甚密，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巴黎》之外，他最著名的作品，也许是《夏天》。罗莎·卢森堡对他的评价，有失偏颇。这个勇敢慷慨的人，现在几乎已经被人遗忘。

只能望见园里的树梢。过了几分钟，它们又从窗外飞回，直奔小碗而去。汉森，这些小眼睛，虽然还没有个针尖儿大，可是它们的方向感是多么的惊人啊，记忆力又是多么的好啊！它们每天都如期而至，过了一夜也没有忘记去那“铁窗饭店”的路线！我每天在佛龙克的花园里散步的时候，常常发现它们在地下的卵石丛中挖掘洞穴和甬道，注意到它们是怎样将泥土搬上地面的。在每一个平方米的地上，都有十几个这样的洞穴，人眼完全区分不出来。然而，每一只远足归来的土蜂，都知道如何直接飞回自己的洞里。

鸟类的迁徙（我现在正在研究），也存在着同样的未解智能之谜。你知不知道，汉森，大鸟如鹤类，在秋天南迁的时候，背上常常捎带着许多的小鸟，如云雀、燕子、金头鹳什么的？！这可不是什么童话，而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观察到的事实。小鸟们就像坐在“公共汽车的座位”上，彼此之间叽叽喳喳地聊个不停！你知不知道，在秋天的大迁徙旅途中，鹧、隼、鸢和其他的猛禽，常常和它们平时捕食的小不点鸣禽和平相处？在这样的迁徙途中，鸟类当中实行的，是一种由上帝安排的休战，或者全面停火。读到这样的东西，我不禁欣喜万分，心里充满了生活的快乐，甚至觉得连布累斯劳，也变成了一个可以活命的地方。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对我产生这样的影响。也许，它在提醒我，生活的确是一个美丽的童话。而初来乍到，我差不多把这一点给忘了。然而现在，我又有了这个认识。我决不言弃。盼复。

你亲爱的 卢

附上一封感人肺腑的前线来信。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写信的人。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1〕}

邮戳为：1916年5月11日

最亲爱的玛尔塔：

多谢你来明信片问候，也多谢你的来信。以前因为没有你的地址，所以没法给你写信。另外，我整天跑来跑去，赶这个会那个会的，忙得连想问题的时间也没有。你想象不到，自从五一节后，要做的事情竟然会有那么多！当然啦，你可能最想知道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近况如何。不幸的是，值得一说的不多。调查仍在进行之中，判决还没有下来，前景不容乐观。但是，如你所知，在这类案子中，最关键的是政治原因，所以我们还得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整个资产阶级国会，都拒绝给他豁免，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样反倒更好，因为它标志着议会主义的政治自杀。五一节的示威活动，举行得非常成功，超出了我们的预想，特别是因为我们在筹办的时候，手里没有多少力量，时间也非常紧迫。我们曾经请过独立社会民主党来帮忙，但被拒绝了。

我又一次得到了关于克拉拉〔·蔡特金〕的坏消息。自从进了一次城（她住在郊外）后，她就感觉很不好，现在医生严格禁止她出门。你也许已经从《前进日报》上，了解到了柏林这个茶壶里掀起的风暴吧。危机还在继续，何时结束，不得而知；会议多多，差不多夜以继日。不幸的是，正因为此，我不

〔1〕 玛尔塔·罗森鲍姆，卢森堡的女友

能安静地工作，空闲时间，一分钟也没有！

你的杜鹃花开了，美不可言。眼下，它开得正盛。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春天的美丽和魅力，但是我连走马观花欣赏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希望你正在彻底康复，根除那难以忍耐的胳膊病痛。

好好照顾自己，不要为本地“战区”的报道而心烦。

你的 卢

〔未署日期〕

于监狱

最亲爱的玛琛：

昨天你来探监，真是把我给乐坏了。亲人相见，倍感亲切，我真的希望，今天和星期天还能如此。对我来说，坐牢等于是一次精神大餐，我得花好几个星期坐下来慢慢享用。你的亲近，我的好玛尔塔，使我倍感温暖。过几天你还会来，是吗？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的见面了。也就是说，要是我还呆在这座监狱的话。

总而言之，你完全可以对我放心。我现在是在不折不扣地遵守医嘱，并且坚定地希望，出狱那天身体会更健康强壮，让你们所有的人都为我的斗争和工作感到骄傲。斗争既多，工作也不少。但是我绝对没有灰心丧气。最亲爱的，每当在条件变得最绝望的时刻，历史总是知道该怎么正确处理的。我这里并不是想要宣扬宿命论。相反，人的意志，一定要把它推到极限；我们的工作，就是力尽全能地进行有觉悟的斗争。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在一切似乎都显得那样绝望的情况下，对群众觉悟的影响，成功与否，还取决于历史的那些基本的、深藏不露的、曲里拐弯的弹簧。从历史的经验以及我在俄国的个人体验，我深知，每当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是那么绝望、那么乱糟糟的时候，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正在酝酿之中，而且这种变化，将会来得更加暴烈。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受历史的发展规律束缚的，而历史的发展规律，从来也没有出过差错，即便是它们没有完全按照我们制定的规划办事。不管怎么说，昂起你的头来，千万不要丧气。紧紧地拥抱你，并致以最诚挚的爱。

你的 卢

1917年4月

佛龙克

亲爱的玛尔塔：

希望这一次它不是真的！星期五（也许还有今天），我只觉得两眼发直，天旋地转，连静静地、坦诚地跟你聊聊都不行。为什么呢？是因为双重监督，而且没有其他办法可想。我猜，你现在的心境，也和我的相同。但是，见到你，感觉到你的亲近，仍然不失为一种安慰。所有事情，都如白驹过隙，一闪而过，未免太遗憾了。下一次，你一定得星期四来，呆到星期一或者星期二。我还不知道，明天是否会有吻别。但就是没有，我们也得照样过日子！现在，我的心情又恢复了常态。我是多么感谢你的探监呀！

别为我担心。至于健康嘛，我的胃病仍然没有起色，但是神经紧张状态，有缓慢改善的迹象。说不定我的胃病，也会安定下来的。要是春天来到这里，那该多好！阳光、温暖和新绿，对我的身体最有裨益。毕竟你是了解我的。

对了，俄国发生的奇迹，对我来说，好比救命的良药。对我们所有的人说，那边传来的消息，难道不就是拯救的讯息吗？我担心你们都低估了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担心你们没有意识到，在那边取得胜利的，是我们的事业。它必须，也必将成为解放全世界的楷模；它必须成为照亮整个欧洲的一座灯塔。我绝对坚信，一个新纪元已经开始，战争将不会永远持续。为了这个缘故，我希望你的心境更好，希望你兴高采烈，愉快幸福，尽管生活在悲惨和恐怖之中。看到没有，在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历史知道怎样将它摆平。为了我，开心一点儿，笑多一点儿。致你一千次拥抱，并代向库尔特

[·罗森费尔德] 问好。

你的 卢

[1917年12月11日后]

布累斯劳

最亲爱的玛尔塔：

感谢你寄来的热情洋溢的卡片。你的探监，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身心的享受，至今难以忘怀。从你身上辐射出来的爱和善，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温暖无比的。这次，一切都比我想象的要好，也更有“人道主义”。我原来还担心情况会很坏呢。希望你下次再来，条件会更加好转。我的生活依旧。每当我在丑陋的监狱院子里散步的时候，就强烈地梦想美好的东西，以至于无须注意周围的环境。剩余的时间，我在牢房里平心静气地读书写作。整整一周以来，我的心系彼得堡。每天晨昏，我的手就急不可耐地去抢新来的报纸。然而不幸的是，报上的消息，不仅寥若晨星，而且还颠倒黑白。持久的成功，虽然不可能；但是无论如何，夺权的开始，已经给了我们的社会民主党和整个昏睡的国际劈头一拳！除了用统计数据来证明，俄国的社会条件还不成熟，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外，考茨基显然狗屁不懂！好一个独立社会党的尊贵“理论家”！他居然忘了，从统计数字上来说，在1789至1793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夺权的条件更不成熟。……幸运的是，历史不是按照考茨基的理论推断来发展的。所以，我们要怀抱最好的希望。

……

你的 卢

1918年2月

布累斯劳

最亲爱的玛尔塔：

问候收悉。但我希望——如果 K 先生允许，下次能够得到你的亲吻。在你的信中，忧郁之情，溢于言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个人都不应悲观失望，而应笑傲世界。到时候，历史自有说法，自然会拨乱反正。那是肯定的，无须担心。历史总是知道该如何理顺它自己的事情。历史的车轮，碾碎过多少挡道的粪土？这一次也不例外。绝望的现象出现得越多，历史的清扫就越彻底。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昂起头颅，振作精神。

玛尔塔，我有一个要求：你一定要尽力帮助宋娅 [·李卜克内西]。她需要温暖、爱怜、陪伴和关爱。把你对我的爱，分一点给宋娅吧。如果有可能，要特别记得庆贺她的生日。她像一个孩子，非常敏感。多请她来家坐坐，跟她一起散散步（这对你也有好处）。但是，你还是得爱我！热烈地拥抱你，并向你和你的家人问候。

你的 卢

1919年1月4日

柏林

亲爱的、亲爱的玛尔塔：

给你道一千声问候。我终于给你寄来了第一期的《红旗》。为它的出版的奋斗，使我在过去的几天当中，从早到晚都忙得气喘吁吁的。我非常想见到你，拥抱你，并且和你谈谈。库尔特[·罗森费尔德]对我说，你觉得我冒犯了你。而我听了他的话，则觉得自己的脑袋被砖头重重地砸了一下。我们的友谊，已经非止一日。难道我还没有赢得你足够的信任，难道我们之间还可能存在误解吗？痛苦哇！对了，我们必须面对面地坐下来，好好地谈谈这个问题。在我和我亲爱的、拥有金子般的心的玛尔塔之间，一定不能存在任何的阴影。昨天我想给你通电话，可是没有打成。后来，我就忙得团团转，一秒钟也不得空闲。我想今天再试试。

在此期间，请允许我怀着往日的热爱和信任拥抱你，并向你和你的爱人致以一千次问候。

你的 罗莎·卢

(以上郭颐顿 李映芳 译)